

(第二次修订本)

虔诚与疯狂

(上册)

孙 涛 著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本书系自费出版,限量印制。仅供“文革”历史研究者交流并继续征求当事人和亲历者意见。

如引用书中内容,请按著作权法注明引自本书。

虔诚与疯狂(上下两册)

作 者: 孙 涛

出 版 人: 傅小华

特邀编审: 马晋乾 王宪斌

装帧设计: 林利利

封面设计: 周亮雄

出版印制: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地 址: 香港九龙中央邮局 73369 信箱

规 格: 16 开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次: 2020 年 4 月 第三次印刷

印 数: 600—1200 册

国际统一书号: ISBN 978-962-8735-25-X

定 价:(上下两册)人民币 1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是一段真实的民间信史。作家孙涛历时十余年，咬定青山不放松，采访山西“文革”亲历者和当事人数百人次，广泛求证，八易其稿，终成此书。

真实，是生长善美唯一的土地。

——本书特邀编审马晋乾

这是一部厚重的心血之作。作家的良知和责任，让孙涛先生以马拉松式的辛劳和毅力，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完成了对十年山西“文革”历史的穿越。

读这样的作品，令人沉痛，让人反思。

——本书特邀编审王宪斌

从 1966 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之后以华国锋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场历时 10 年的运动才宣告结束。本书即将叙述的这段发生在山西的历史，以太原五中学生刘灏的 10 年浮沉作为主线，结合作者多年来收集到的种种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作为铺陈内容，力求以真实作为基础，展示山西 10 年“文革”的发展过程。

那是一个虔诚的年代，也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虔诚与疯狂，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真实地再现那个荒唐的岁月，既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更是为了让没有亲临过那 10 年动乱和恶梦的读者们，以山西为例，了解一下那 10 年的历史。这种了解，可以是一种对逝去历史的猎奇，但更重要的应该是一种思考。

不因尊者讳，不为贱者隐，尽力还原历史的原生态，是本书追求的纪实风格。因为，任何对历史的思考，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真实了解之上。

——作者题记

目 录



序一：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 侯光天 / 1

序二：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 董大中 / 5

序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致孙涛兄 / 赵瑜 / 8

尾 声 / 13

蹲了两年零八个月大牢的刘灏，突然被当局正式逮捕了。回眸山西 10 年“文革”，不仅是刘灏，恐怕众多的当事人，都会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第一章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北京骤起的狂风刮进了山西。无论是党内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腔热血的大、中学生，都想积极投身那场伟大的革命。

【1】高三学生刘灏的理想 / 20

【2】毛泽东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世 / 24

【3】共同的紧跟心态 / 28

【4】毛泽东发动起亿万学生造反 / 33

【5】太原市的两个动员大会 / 35

【6】点火会让刘灏明确了斗争大方向 / 40

第二章

刘灏为好朋友的父亲袁振翻案，带领众小将大闹太原市委大礼堂。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自个儿最终会自觉不自觉地被绑到了袁振的战车上。

- 【1】十年间政治风水轮流转 / 45
- 【2】好朋友变成了狗崽子 / 48
- 【3】刘灏初识袁振 / 51
- 【4】刘灏赴京为袁振送申诉材料 / 55
- 【5】二上京城顺路搅了批斗王震的会场 / 60
- 【6】太原的官办红卫兵兴起 / 63
- 【7】破四旧：红卫兵虔诚的恶行 / 68
- 【8】五中井冈山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 78
- 【9】且看省委对运动的态度 / 86
- 【10】袁振成功地策划了申辩 / 92
- 【11】袁振事件解读 / 98
- 【12】用大字报“痛打卫恒黑帮” / 107

第三章

省城大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得不痛苦地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支持各路造反派起来革命造反。省委最初的对手，竟是一群中学生。

- 【1】太原几大群众组织简述 / 111
- 【2】杨承孝与汤建中 / 120

- 【3】 抢夺“黑材料” / 127
- 【4】 炮打省委指挥部揪斗卫恒 / 131
- 【5】 与卫恒的“革命谈判”有了结果 / 134
- 【6】 红联站继兵团之后也树起大旗 / 138
- 【7】 文峪河水库和原平劳改砖场之役 / 141

第四章

兵团的八项要求和卫恒的六条原则针锋相对。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搞好文化大革命，山西省委却被逼进了无法正常工作的困境。

- 【1】 八项要求和六条原则 / 145
- 【2】 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 / 149
- 【3】 兵团战士与省委第一书记“拼刺刀” / 153
- 【4】 五一广场再次揪斗卫恒 / 159
- 【5】 省委一心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 162

第五章

毛泽东要发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刘格平等五名领导干部策划向山西省委夺权。1·12 夺权如一场地震，有些人震上天堂，有些人震入地狱。

- 【1】 刘格平投书林彪与康生 / 166
- 【2】 毛泽东默认篡改历史 / 173
- 【3】 刘格平寻找同盟者密谋夺权 / 177
- 【4】 毛泽东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179

- 【5】被挤入夹板中的卫恒 / 184
- 【6】各路诸侯与五人大字报 / 192
- 【7】1·12 夺权(一) / 208
- 【8】当晚的一个插曲 / 215
- 【9】1·12 夺权(二) / 218
- 【10】山西省委全面溃败 / 226
- 【11】1·12 夺权(三) / 230
- 【12】《人民日报》当时的导向 / 244
- 【13】山西各地市夺权概述 / 251
- 【14】山西 1·12 夺权何以能成功 / 254
- 【15】群众组织的不同命运 / 260
- 【16】袁振组建市革委 / 267
- 【17】卫恒的惨死 / 273
- 【18】改朝换代的岁月 / 278
- 【19】刘格平组建省革委 / 283
- 【20】陈永贵杀下虎头山 / 287
- 【21】刘灏做官后聆听四条父训 / 295

第六章

兵团、红总站、红联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扑朔迷离的 4·14 事件，激起了新的政治动荡。省城太原武斗初现，中央七月会议又助长了山西的动乱。

- 【1】砸山艺造的革命行动和反革命行为 / 301
- 【2】丁磊组建起红总站 / 307
- 【3】红联站揭发杨承孝是狗崽子 / 309

- 【4】3·26报告和炮轰刘志兰 / 313
- 【5】4·14决议引发新混战 / 326
- 【6】刘司令指挥失灵 / 328
- 【7】老百姓总结的一句民谚 / 331
- 【8】红联站生擒杨承孝 / 336
- 【9】从两件事看刘灏的思维 / 338
- 【10】红联站和红总站都骂兵团是投机派 / 341
- 【11】七月会议康生收拾张日清 / 344
- 【12】来历不明的最高指示 / 350
- 【13】争先恐后去山西日报社造反 / 354
- 【14】刘灏扩军 / 357
- 【15】兵团成了最大的赢家 / 363

第七章

刘格平为自己造神。山西的武斗不断升级。兵团俨然以政府口气下达通令，而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显示出这些中学生们对领袖的一片虔诚。

- 【1】搞政治，你一定要记住两条 / 371
- 【2】《踏遍青山人未老》为刘格平造神 / 374
- 【3】从北京来的红色播火者们离别太原 / 379
- 【4】红总站密谋拦截袁振 / 387
- 【5】大型武斗剪影之一：省委党校与山西大学 / 389
- 【6】大型武斗剪影之二：平遥古城 / 393
- 【7】大型武斗剪影之三：太原重机厂 / 403

- 【8】 大型武斗剪影之四：山西机床厂 / 408
- 【9】 大型武斗剪影之五：晋中和晋南 / 410
- 【10】 大型武斗剪影之六：太原十中 / 411
- 【11】 刘灏对9·5事件的表态前后大转弯 / 420
- 【12】 兵团以政府口气发布十项通告 / 428
- 【13】 兵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 432
- 【14】 武斗继续发生 / 440
- 【15】 十二月会议康生翻脸收拾刘格平 / 448

第八章

毛泽东要引深他的文化大革命。69军登上了山西的政治舞台。所谓的斗批改和清队，造成了遍地冤狱。九大前后，杨承孝要与69军决一死战。

- 【1】 兵团要与“丁氏东风政府”叫板 / 455
- 【2】 北京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 458
- 【3】 刘格平无法稳定山西的局面 / 462
- 【4】 毛泽东要求刘格平拥军 / 467
- 【5】 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后山西的形势 / 472
- 【6】 工宣队在大学的斑斑劣迹 / 475
- 【7】 杨承孝的一五宣言 / 480
- 【8】 迎芒果大会被搅散了 / 489
- 【9】 九大前山西群众组织领导被斗私批修 / 492
- 【10】 九大后山西基层武斗依旧不断 / 495

第九章

谢振华将军借《七二三》布告威力，杀一个，关一个，努力稳定着山西政局。山西群众组织的领导们被囚在北京，革命的小将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 【1】 中央发布了《七二三布告》 / 499
- 【2】 谢振华下令杀一个、关一个 / 503
- 【3】 革命小将成了革命对象 / 514
- 【4】 赵树理的惨死 / 521
- 【5】 运动的发展造成了遍地冤狱 / 531
- 【6】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 547
- 【7】 各种方式的上山下乡 / 549
- 【8】 老劳模点拨刘司令 / 557
- 【9】 谢振华安排三大派组织领袖做官 / 561
- 【10】 十大召开前后文革派和走资派的官场邂逅 / 568

第十章

穿上军装的江青炮轰谢振华，山西派斗烽烟再度燃起。山西的批邓被省委第一书记王谦推向了高潮。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

- 【1】 江青炮轰谢振华 / 575
- 【2】 谢振华曾闹了一个“乱子” / 581
- 【3】 中央政治局集体批评谢振华 / 585
- 【4】 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批谢(一) / 595
- 【5】 整理陈永贵黑材料事件始末 / 600

- 【6】省委三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批谢(二) / 606
- 【7】王谦落选四届人大代表 / 611
- 【8】邓小平的整顿和毛泽东的批邓 / 614
- 【9】周恩来逝世 / 617
- 【10】民众的觉醒和抗争 / 623
- 【11】张铁生的山西之行 / 631
- 【12】红太阳最后的光芒 / 634
- 【13】王谦在山西掀起批邓高潮 / 638
- 【14】王谦在太原铁路局被揪斗 / 642
- 【15】毛泽东逝世 / 652

第十一章

王谦在山西“划大线、切西瓜”，山西又开始了充满派性争斗的清查扩大化。该如何反思“文革”，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命题。

- 【1】山西充满派性争斗的清查扩大化 / 655
- 【2】刘灏的一条“大罪状”和段立生的“选举名单” / 665
- 【3】山西另列清查标准的一些原因 / 671
- 【4】刘梅校长大海般的胸怀 / 681
- 【5】分解一下正在固化的历史 / 683
- 【6】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 / 690
- 【7】刘灏被无罪释放 / 699
- 【8】胡耀邦来山西解疙瘩 / 700
- 【9】“文革”是运动治国的巅峰状态 / 709
- 【10】对山西四位“文革”典型人物的政治分析 / 715
- 【11】难以承受的历史之重 / 723

- 【12】 罪与罚的话题 / 731
- 【13】 答案需要历史来回答 / 741
- 【14】 文化革命和文化复兴 / 744

后记 / 751

回忆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吸取历史教训,而历史,便存在于亲历者的许多故事中。

附录: 孙涛主要著作目录 / 756

序一：历史的责任和作家的良心

侯光天

孙涛同学：

《虔诚与疯狂》征求意见打印稿，从11月8日收到起，直到12月的月底，近两个月的时间，慢慢品味，细嚼慢咽，真是欲罢不能，欲速不能，边看边想，勾起了许多遐想和回忆。从“文革”开始至今43年，从“文革”结束至今33年，许多事许多人都已淡出记忆。仔细阅读此书，那些年代的人和事又都历历在目，不仅唤起了记忆，而且深化了认识，真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可以概括为：不容易，很成功，有价值。

首先说不容易。“文革”10年，就山西而言，构成的大小事件不下万件，知名人物不下千人，将这么多的事和这么多的人梳理出一个头绪，并连贯成一部书，谈何容易？写这样一部涵盖山西10年“文革”历史的“巨著”，通常情况下，需要几人或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才能完成，但你却独力支撑，又采取马拉松式的方式，多人采访，多处征集，其信心和毅力为我辈树立了又一楷模。你已经创作过十多部长篇小说了，加上其他作品，早有二十余部作品行世，可以说著作等身，是文坛上业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了。再写这样一部书，没有了追逐名利之心，只为了体现出一份历史的责任和一颗作家的良心，实在值得嘉许。

其次说很成功。纪实文学的要旨是真实，不管你笔下如何生花，一旦失去了真实也就失去了价值。这一点你做得非常好。我作为山西10年“文革”的亲身经历者，读罢此书，没有感觉出一丝的虚假和作

伪。尽管你用了文学语言,有的地方用了推断和理论解析,但都没有使文章失去真实性。贯穿全篇的刘灏这个人写得很生动,很传神,很成功。在“文革”中,他被错误的历史洪流卷向潮头,是典型的悲剧人物。正如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一书中,曾论述过的那种时代的“悲剧”,以及时代“悲剧”中产生的“悲剧英雄”。这样的“悲剧”和“悲剧英雄”,就因为他们无法跳出对各种现实利益和关系的积极干预和积极追求的时代形式。原话记不太清了,但意思是这样。10年“文革”是我们党和民族的一个大悲剧,又因为它是我们党内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的,这种悲剧的“时代形式”,就更显得复杂。正如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和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有刘灏这种对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充满虔诚感情的学生们,也有刘格平那种别有用心的政治家,还有如杨承孝那类专搞武斗的造反派。这是真实的历史,你确实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历史。

我国清代诗人郭嵩焘有诗云: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前两句很像在说我,但整个四句都像在说刘灏。刘灏处在一个悲剧时代,是出身于革命军人家庭的一个高中生,骨子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无比忠诚,以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中央机关报刊的社论精神参加“文革”。刘灏在被安排到太原

古交鹿庄插队前,是太原五中的革委会主任。除运动初期写过大字报外,他没有组织学生们批斗过老师和校领导,在师生中口碑很好。对五中的校园和设备保护的非常完好,基本上没有被损坏。他要紧跟领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他与刘格平和杨承孝们有本质的区别,但在那个年代,这种虔诚也必然造就了既属于时代,也属于他个人的悲剧。“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有精神,对“文革”中参与造反的中学生,一律不予追究。然而在山西,当时的当政者却拿刘灏做了清算“文革”的替罪羊。但无论如何,刘灏作为一个在我国的特定历史阶段存在过的真实的历史悲剧人物,也将伴随着历史长河流传下去。

第三说有价值。当前长篇纪实文学固然不少,但像你这部闯入禁区的纪实文学还很罕见。它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史学价值,因为对“文革”的反思,必然要来源于痛苦的历史记忆。就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它可以与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杨继绳的《墓碑——中国60年代大饥荒纪实》相提并论。而且你视角独到立意高远,趁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如实地写出了这段历史,真是完成了一件抢救工程。你已经出版二十余部大著,它们都有其社会意义,但我坚信,此书更胜于它们,一定更会成为传世之作的。

“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已进入了历史垃圾箱。回望山西10年“文革”历史,按照当时的习惯认为,除了张志安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刘普德的山西红卫兵团是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保皇组织外,社会上的三大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红联站,没有什么革命与反革命之区分,也没有所谓保皇和造反的分别,都是追随毛主席闹革命的群众组织。即使是保皇组织,也有保对保错的时候。因为你在拥护一批领导干部的同时,你又在打倒另一批领导干部,何况在打倒“刘邓司令部”方面又是完全一致的。如今三大派的司令们刘灏、黄锐庵、段立生不仅都被定性处理,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成了好朋友。“文革”简直就是

虔诚与疯狂

一场闹剧,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眼里就是一场政治笑话。若干年后,定会有人在你这部书前吟唱“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

光天草于 2009年 12月 28日

孙涛附记:我与侯光天先生都属“文革”中的老五届,他高我两级,“文革”在校时曾担任过一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分管宣传。毕业后,在谢振华和王谦先后主政山西省委期间,又一直是省委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侯光天接替刘树岗担任昔阳县委书记,继续在昔阳县反思“文革”和纠正“农业学大寨”错误。之后在担任晋中地委常务副书记期间,因“文革”中的个人身份而失意官场。经征得他本人同意,将这封信作为序一。特附记说明。

序二：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

董 大 中

拜读孙涛兄大著《虔诚与疯狂》，是一次酸甜苦辣的心灵旅游。那一段历史不堪回首，却又应该经常回首，经常反思，这才能够避免。问题的要害在于个别人的权力过于强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对知识分子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时，曾经提出一个哲学命题让大家讨论，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当然应该是历史创造英雄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在中国，从五帝开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英雄在创造历史，在改变着、设计着、玩弄着历史应走的道路，而不是听命于客观。尧帝让贤，被传为佳话，但是，假如尧帝选择的接班人不是舜，而是一个表面君子、实为小人的人，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可能出现另一条途径。美国从开国起，就由全体居民选择自己的“治人者”。试比较两种办法，其结果昭然若揭。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可以归结到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实现统一的时候，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人物，但如果出现的统一者是另一种性格的人物，秦始皇后期又不是赵高专权，秦朝会二世而亡吗？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一直没有为中国人所认识。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制度，制度就是“天子”的旨意，“天子”想怎么干，他的想法，他的做法，就成了制度。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也有黑暗，有中世纪，有僭主统治，有残酷的宫廷斗争，但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那里的哲人们，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就在研究、就在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比较合理，比较能够体现平等。欧洲的僭主统治是被当

作最专制的一种,但在中国封建君主们面前,欧洲最不好的僭主,权力也小得多。什么是中国特色?在社会制度上说,中国特色就是权力不受限制,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近20年来我在文化哲学上用的功夫比较多一些,写了一本书,指出一个社会的发展制度文化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必须把它放在最最重要的地位。

大著所观照、所书写的那个年代,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例,但在世界进入工业资本主义以来,却是罕见的,对我们亲历者说,更是刻骨铭心的。越是荒唐的岁月越不应该忘记,它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有许多经验需要总结。由于过去许多年历次运动都是知识分子遭殃,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已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变得短视、功利,只知蝇营狗苟,而不敢在有关人生道路上,在社会发展上,在国家制度上多思多想。有的人只会图解。有的自称看门狗。接到大著时,我眼睛一亮。我的第一个想法,是终于看到有心人了。20多年前,我开始光顾文物市场。我最先搜集的,是“文革”传单。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到年纪再大一点时,把那些东西拿出来,唤起回忆,或者可以写个“亲历记”之类的东西,算是不辜负自己的时代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职责。看到大著,我真的感到佩服,感到兴奋。老兄走在前边了。

大著以一个人的遭遇为主线,把一个地区的“文革”全景摄入笔底,有广阔的背景,有清晰的线索,有前后一贯、始终如一的描写中心,点面结合,内外勾连,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纪实文学作品。刘灏,那是山西“文革”的风云人物,从保袁振起家,中间经过站来站去“站队”的考验,最后被关进了监牢。人生如梦,刘灏就有如梦的人生,经过“文革”的人几乎都有如梦的人生。幸耶,不幸?在那个时代,所有的人,无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无论“拥军派”还是“反军派”,大家都是虔诚地拥护那具有四个伟大的神主,同一个目的却分成势不两立的不同组别的两大阵营,又合纵连横,所有的人被煮在一个锅

里，搅来搅去，真正成了一锅稀粥，分不出你我。大著让我们回到了过去，看到了丑陋的自我。人是渺小的，自我丑陋不要紧，重要的在于时代太丑陋了，回顾历史，如何抛弃那个丑陋的时代，才是今天人们应有的清醒。

2010年9月24日

（董大中先生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顾问，国家一级作家，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出版《赵树理评传》等10余部专著。）

序三：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致孙涛兄

赵瑜

孙涛兄如晤：

上月从府上归来，详读《虔诚与疯狂》书稿。反反复复，乃至竟夜。过去，我对晋东南地区“文革”诸事有一些了解，也完成了反映这一地区“文革”历史的《牺牲者》一书。而我对于省城“文革”的惨烈事态，却了解不深。红总站与兵团、红联站分成两大派，残酷斗争，这是我长久以来的认识。而书中始终认为这是三大派系之间的鏖战，史迹斑斑，使我长思。也许，仁兄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孙涛兄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的“文革”经历为主线，写了一系列省城“文革”风云人物的兴衰沉浮，这是极难得的开拓与挖掘。多年以来，国内“文革”研究成果本来就稀疏罕有，在仅有的少量著述中，又往往重事轻人，使得后来者看待“文革”，总是云里雾里，瞧不清庐山真面目，亦不知究竟是何种力量，推演民众“文革”巨潮翻滚。而轻视写人或者不敢于写人的结果，只能是连基本事件也说不清楚。因为任何全局性运动，无不是由具体人物来推进的。省城“文革”各大派领导，正是一批具体的历史人物。但是，象刘灏、宋捷、杨承孝、李青山、杨保明、段立生、郝庭云、黄锐庵、李大纲、方培泉、李金渭、马尚文、张志安、刘普德、高翔、王大壮、朱永成等这些当时声名显赫的当事人，却绝少被历史所研究所书写；还有从四面八方投身文革的众

多骨干,象从北京来的朱永庚、邢晓光等大学生们,省委年轻干部李辅、丁磊,技术干部汤建中,工人张建国、陈岳秋等等,更没有引起史学家们的研究与重视。他们就象一块块优种试验良田,如不加以爱护,就不能掌握农事规律进而丰产。同理,不研究这些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便不能解释“文革”运动的主流向背,也就不能看清“文革”真相。推及全省、全国各地,都是一样的道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虔诚与疯狂》各个章节中,看到了孙涛兄笔下,写出了近百名这样的重要代表,真令人开眼。也由此使我对省城“文革”内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批人物让我们进而想到:他们响应领袖号令,舍生忘死拼杀在文革第一线,本是时代产物,在当时看来则是社会先进因素,而后来的官学理论,却一律将他们划定为符号化恶魔式的造反派,斥责为一方土地上的动乱因素,这就构成了新的心灵冤案,远离了科学探索精神。可叹以上诸君,后半生大都挫折再三,历尽磨难,横灾不断。

从史实中看,“文革”之初,还有一批党政军官员,积极参与和主导了造反行动,他们更是造成天下大乱的重量级推手。翻开《虔诚与疯狂》一书,随处可见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何英才、陈守中、丁磊、刘志兰等要人们的频繁活动,还有象陈永贵那样从农村大队直冲峰巅的特殊人物。他们正是直接秉承最高层意图的造反夺权者,直接操纵了山西上下昔日政权的颠覆。而后来的“文革”官学,却不去探讨此类人物和现象,更不曾正视他们的作用和责任,事事都往青年学生和普通民众身上推,凡说“文革”浩劫,一律判定是红卫兵、造反派或者某些坏人搅动了祸水。无形的判决如此强蛮,无非是刻意转移责任。这不是对待“文革”历史的正确态度,这不公平。

文学作品写人更研究人,《虔诚与疯狂》正是抓住了这个重心,从历史人物本事出发,留给了读者一部真实的山西省城“文革”风云录。

无论怎样言说乃至争论,只要从科学纪实出发,写出了一种地缘

真相,写出了“文革”运动一段史话,写出了当年那一代人精神心灵的荒诞和政治生活的悲怆,就算尽到了我们中年作家的职责。人们把作家当成有良知的群体,这个“人们”扩而大之,也可以视为人民,人民希望作家说真话,希望作家写好书,希望作家讲人话,希望作家擎举着真理火炬,引领读者前行。孙涛吾兄不辞劳苦,积多年之辛劳,呕心沥血,精撰此著,为山西作家群体做了一个榜样。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说,“人与强权的斗争,即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话说得清醒。可叹自“文革”终结以来,统治者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忘记文革这件事,而独立知识分子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要人民不能忘记这件事。

看一看我们作家群落,几十年来,许多人放弃了知识分子使命,或被政治强权所奴役,或被经济利益所绑架,或被某种官职所陶醉,或被伪劣宣讲所欺瞒,却昏昏然不自知,不自醒,自身变做了无骨软体动物,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多么令人悲伤的现实。而被奴役者,自我矛盾重重,内心痛苦不堪,绝无欢欣可言。那么,与其痛苦余生,何不振臂书写?写出一部真文字,诉诸后人,留给历史,挥洒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写照呢?很遗憾,作家群落中不少人,宁把魂灵出让给庸俗,也没有孙涛兄的冷峻与醒悟。

我们究竟在寻找着什么?我们仅仅是在寻找“文革”史实吗?不,从深层需求上看,我们是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实质上,我们是在寻找着一个文化人真实的人生。我们从内心深处始终拒绝:被现实的大海将自身毁灭。

关于书中的一些内容,我尚且有话想说,然而这不是一篇短文的要旨。很多话题可以留待我们烟茶之间慢慢道来。比如民众为什么响应“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兴衰,部分干部的造反,群众组织的结构,高度集中体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丧失经济自主权的民众对参与运动的

抉择,大乱年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九大以后“官府文革”现象,军队政权与造反派系的交叉,1976年以后的“文革”余波等等;还有,怎样看待两派剧烈厮杀的武斗问题,怎样分辨林彪与江青两大阵营的问题,怎样认识周恩来历史作用问题,怎样廓清“文革”分期问题乃至文革起源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安下心来,一一破解。当然,我们几个作家,干不了多少大事,我们只能就一个省份、一段史实来尽力做些探索,局限性还是很大。这就需要我们能同全国作家和“文革”研究者包括国际“文革”研究者多加联系,多做交流,共同完成寻求真知的过程。

最后一件事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写了此类探索“文革”的著作,能否在短期内于国内出版问世呢?这个难题同样困扰着我和我的《牺牲者》。时间一长,我也想明白了:首先,我们做了一件作家该做的事,短期内能否出版,则是第二位的;孙涛兄完功这部书稿,我为之庆幸。至为忧惜者莫过于半途而废。《虔诚与疯狂》写完了,即得到大的胜利。无论短期内是否能出版,都不会影响她应有的价值。古往今来,大浪淘沙,曾经的巨量出版物也不见得留存后世,而古人写了好书,那时没有出版社,也可以流传至今,禁都禁不住,惟其价值界定为最终标准;再者,我不大热衷于将书稿放在境外出版,那样很难出口转内销,广大中国读者才是我们终身为之劳作的对象;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纸媒书籍已经不再是唯一的传播与阅读方式,网络等新渠道的兴起,力量极大,是可以利用的。总之,我不相信长久的黑暗,我只相信历史的规律和挡不住的光明。

做文学常常是孤独的。而孙涛兄并不孤单,你的写作和业绩,自会被清醒的国人和真挚的同仁所看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总有肩负重任的同道前行。我相信,后来者以及下一代人,必将珍重你对“文革”的泣泪书写。当前的庸俗与低迷,只是暂时现象,让一些政治家继

虔诚与疯狂

续他们的“遗忘与愚弄”吧。

不久前在北京时,一位作家朋友戏说:如果没有一两部出版不了的书,那还算中国的好作家吗?仔细一想,斯言有益。我只有再次表示钦佩并祝贺你的劳作。咱们一点都不着急。

孙涛吾兄,下次相聚,我们的话题将更加详尽具体,真乃大乐趣也。

春天来了,望兄保重身体,新年吉祥。

致以

文学工作的崇高敬礼!

2013年除夕夜南华门碑史斋

(赵瑜先生系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中长篇纪实文学近三十部。曾三次获得赵树理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大奖,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孙涛附言:本书三篇序言,都是作者读罢本书征求意见稿后的感言,都有真知灼见,我按其写作时间排列为序,特此说明。并向三位朋友再次致谢。

尾 声

蹲了两年零八个月大牢的刘灏，突然被当局正式逮捕了。回眸山西 10 年“文革”，不仅是刘灏，恐怕众多的当事人，都会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请读者不要奇怪，我们的故事，确实是从“尾声”开始的。将“尾声”放在书稿之前，是想表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和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时代，确实应该作为一段历史的“尾声”，而划出这个“尾声”的时间，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的最后一天。

1979 年 12 月 31 日，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最后一年的岁尾。就在这一天，被关押在山西省城太原某监狱牢房中的刘灏，似乎早已习惯了他的这种牢狱生活：除了放风时间，白天只能看看报纸，然后就无聊地盯着离窗口很近的那个蜘蛛网，发呆、想心事。从 1977 年 4 月 14 日正式被隔离审查，屈指算来这种囚禁生活，已经有两年零八个月了。

在被投进监狱之前，他的具体身份是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再往前数的话，他是三晋大地上曾声名显赫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

对于我们国家 1966 年以后那十个年头的历史尚存记忆的山西人，或者曾在山西生活过的各界人物，只要你肯耐着心性往下读这部书稿，刘灏这个名字也许会从你的大脑褶皱中跳出来。如果你还没有想起来他是谁，那么，请你再想想山西最大的群众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或许，你当初就曾是一名兵团战士；或许，你是坚决不同

意兵团观点的另一派造反组织红总站的成员；如果二者都不是，那你一定是与兵团有时联合有时对抗，而与红总站则是誓不两立的红联站的人马了。即便你当时是哪个组织也没有参加的逍遥派，也不可能是没有社会观点的星外来客。如果你当时不在山西，或者，你原本就是在外省市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那么，本书即将叙述的这段发生在山西的历史，也会让你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曾经经历过的那10年噩梦。那样的梦境，即便是对没有亲临其境的年轻读者们，了解和回味的过程也绝不仅仅是一种猎奇。

现在，就来看看刘灏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到来之时，在狱中碰上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天他竟会被逮捕。

还得啰嗦一句，不是作者的笔误也不是作者在故弄玄虚，在监狱里整整蹲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刘灏，实实在在还没有被逮捕。

奇怪吗？这并不奇怪。

对于10年“文革”和“文革”之后数年中的那段岁月而言，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不是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被投进如同大狱的监管室直至惨死吗？山西省省长王谦等革命老同志，不是也未经逮捕手续而被投进了大狱吗？至于惨死在造反派私设牢房内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甭说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逮捕和监禁手续了，其真正的死因，也成了一道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此种事例，在那个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不胜举。曾经名贯三晋大地的“革命小将”刘灏，在“文革”初起时，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奋起造反，与“黑省委”七斗八斗后，终于在新政权中做了中共太原北郊区委副书记这样的“七品官”。当“文革”结束后，在那场“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政治运动中，他被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确定为受清查的重点人物，该区委先成立专案组将其隔离审查，然后未经

任何逮捕手续，又按省委“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办公室”的意思，将其堂而皇之地送进了大牢。

而现在来对刘灏办理逮捕手续，则不免有些名堂了。

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共和国的土地上结束了 10 年动乱，面对着百废待兴、急需拨乱反正的局面，党和国家新的领导人，正将法制建设提到了迫在眉睫的议事日程上。1979年 7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本法自 198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同时，这部共和国的新刑法在规定主刑中，也明确写明：“管制的期限，为三个月以上两年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另外还有规定：“管制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又规定：“拘役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如何逮捕和侦察，如何审理和判刑，也有了一条条十分明确的规定。

读遍这两部大法，里面没有“隔离审查”四个字。

更重要的，是“文革”初期刘灏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炮轰“黑省委”，按当时党中央和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说法，是“革命造反”，中央还下过文件，认定他领导的群众组织是“革命左派组织”，这种行为，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一章第九条中所言，

“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刑法》一旦生效，既无罪，就该无罪释放了。

即便将“隔离审查”算做“管制”或者“拘役”，一用那两个互相计算日子的“折抵”，也得让刘灏讨个大便宜。他已经住了两年零八个月的监狱，也就是说，如果判刑，他也有可以“折抵”成两年零八个月的刑期了。何况，按《刑法》规定，他并没有可被判刑的罪行啊！

这两部大法在出台前后，报上早有种种宣传，住进号子里的刘灏曾对狱警自命为“政治犯”，监狱当局也确实没有把这位年轻的区委副书记当成刑事犯，人家给他看报纸，每天从头版头条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版的最末一个字，这是消磨时间的最好办法，也是他探寻外面种种信息的可靠渠道。他对这两部共和国新出台的大法自有他自己的理解，而且通览大法，也看不到可以给自己认定罪行的依据。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即将到来的那个晚上，他不平静的心情超过了住进监狱后的任何一天，临睡前，有意识地先轰走了那只伴随了他多时，一直盘踞在蛛网中心的蜘蛛，又一把扯碎了那张蛛网。他似乎认定，明日当这两部大法正式生效之时，就是自个可以出狱之日了。

然而他想错了。

当一步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主席用所谓的大民主形式，调动起来千千万万的“革命造反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明了“隔离审查”这一种无产阶级的专政形式以后，最早被这一形式专政了的对象，是各级领导干部中被打成的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以及被戴上牛鬼蛇神帽子的人民群众。当“革命造反派”由革命的动力，最终演变成革命的对象以后，重新掌了权的一些革命领导干部，自然也会运用这种专政手段，来回敬曾经使用过这种手段对待他们的“造反派”们。无须去责怪具体的人物了，这是由极左思潮的惯性推就的我们民族心理的大滑坡。“四人帮”的垮台，并不能使这种滑坡戛

然而止。可喜的现实是，从1980年1月1日起就要实行的两部大法，毕竟在这种大滑坡前，筑起了人民共和国开始走向法制的铁壁铜墙。所以，1979年12月31日，便成了中共山西省委当时的第一书记、曾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王谦在这两部大法实行之前，处罚刘灏的最后机会。

这天晚上，囚禁着刘灏的牢门被突然打开了。

前面是刘灏熟悉的狱警，后面是他同样熟悉的太原市北郊区委“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办公室中，具体分管刘灏专案组的一位干部。那时从省委到基层党委，都设立了这种简称“清查办”的机构。

肯定是来宣布让我出狱的命令了。刘灏的心里不由一阵暗暗欣喜。

可是，那位专案组的干部却绷着神态严峻的面孔，如此开了口：“刘灏，现在正式宣布对你实行逮捕！”

一纸逮捕证递了过来。

刘灏那双躲在镜片后的眼睛立即睁大了，虽然是近视眼，但纸上的字却看得真切。确实是一张逮捕证。也就是说，原本幻想能在两部大法生效之时走出牢门的刘灏，现在才被正式逮捕，成了一个标准的囚犯。近视镜片后的那双眼球翻了翻，似乎在琢磨眼前这梦幻般的现实，沉思良久，继而怒气冲天了：“你们凭什么逮捕我？”

那位专案组的干部依旧绷着神态严峻的面孔，面无表情地回答说：“因为你是兵团司令。”

“兵团司令算什么罪名？”

那位干部明白，两部大法里没有可以给刘灏定罪的罪名，他们这个专案组审查刘灏的案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查来查去，派性活动多得很，但可定罪的事实却一件也无法认定。今天再不逮捕刘灏，明天

国家的两部大法一生效，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选在这时给刘灏下逮捕令，不是区委的意见，是上面的招儿，他确实是奉命行事，也确实不想和刘灏打嘴皮子官司。以前刘灏当区委副书记时，他还是刘灏的下级呢。即便被区委安排进刘灏专案组工作，要和刘灏斗嘴皮子，他可没有这年轻人的功夫。

他并不回答刘灏的提问，也确实无法回答刘灏的提问，只是平静地说：“刘灏，我执行的是公务。”

刘灏又开始了滔滔不绝地辩解：“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当时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让搞的，我是受了极左路线思潮的影响，可那根儿也不在我呀。再说，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而我是保谢振华的，我怎么能成了‘四人帮’的爪牙……”

如刚刚住进清查学习班以及后来被隔离审查时，面对专案人员那样，刘灏眼下的辩解起不了任何作用。作为受审查的原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当时被送进监狱，现在当局又选在这一天给他送来逮捕证，这一切决定，并不是专案组的人可以拍板的。

不听刘灏的滔滔不绝，那位干部又对随同走进牢房的狱警发话了：“上级指示，你们要给刘灏戴上铁镣。”

明晃晃的铁镣就在狱警的手中拿着。然而毕竟是在执行法律的要害地方，狱警可懂得手中的这玩艺儿不是随便就可以给犯人戴的。这位狱警当即表示了不同意见：“这样做怕不妥吧。按惯例，只有判了死刑的犯人才给戴铁镣。你们今天才逮捕他，还没有给判刑呢。再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部大法明天就要生效……”

是的，面对庄严而神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生效的两部大法，那位干部掉过了神色严峻的面孔，再没有让狱警去落实那条“上级指示”。

号子的门再度关闭了。

蹲了两年零八个月的大狱，今天才接到了一纸逮捕证。这个晚上，刘灏再度失眠。在一片漆黑而更加沉闷的号子里，他不能不追思刚刚结束了不久的那10年“文革”历史，不能不反省自己在那10年间所走过的道路。

他真是陷入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第一章

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北京骤起的狂风刮进了山西。无论是党内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腔热血的大、中学生，都想积极投身那场伟大的革命。

【1】高三学生刘灏的理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刚刚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6个年头。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众星捧月中，将个人迷信渐渐



刘灏(右)向作家孙涛回忆历史，往事并不如烟。

地推向顶峰的年代。

那个年代正制造着无数英雄。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他们确实有着自己不凡的作为，既普通而又伟大，可对这些英雄的宣传，却被统一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模式之中。这种宣传达到极限后，一般的学习和领会领袖的著作，似乎已经不能继续表达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的原因了。于是，又出现了能将毛泽东思想溶化进血液中的刘英俊；出现了能用毛泽东思想取代被炸毁的脑神经中枢，从而继续指挥躯体战斗的麦贤得……

这些英雄的事迹是感人的，但将宣传英雄变成一种神话领袖的手段后，英雄们身上的那圈儿灵光，就让英雄的崇拜者们感到可望而不可及了。就如今日的追星族一般，那时的年轻人崇拜英雄是共同的心灵特征。不知怎么才能将毛泽东思想“溶化”进自己的血液里，怎样才能将毛泽东思想“铸入”自个脑神经中枢的年轻人们，终于找到了一条最简单的捷径，那就是由林彪首创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学



孙涛(左二)与夫人林利利(左一)与刘灏(右二)及夫人张莉(右一)合影

毛著方式。那个年代的中学生乃至大学生们，在他们单纯的心灵中，早烙入了那个时代的印痕：以为写几篇“活学活用”的日记，做几件能“立竿见影”的好事，就可以开始踏上走向英雄圣坛的一层层台阶了。

刘灏那时还是太原五中高三年级70班的学生，他也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在政治课的课堂上，和下了政治课后的课余时间里，他和其他同学们一样抱着虔诚的心，零散地读过里面的一些文章。他还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学雷锋活动，顺乎潮流地跟上同学们，一道去做一些为了增加日记的内容而去做的好事。但进入高三的中学生们，正面临着一件现实生活中日渐迫近的大事，那就是高考。“活学活用”好办，“立竿见影”也不难做到，而高考，则是高三的中学生们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谁不仰慕北大和清华的盛名？谁又不想通过高考，成为人之精华、国之栋梁？这需要在经过政治审查后，再用考试分数来决定胜败。而分数，是难以“活学活用”和“立竿见影”的。还好，刘灏的学习成绩很不错，面对即将到来的高考，他的心里已经确立了自个的人生目标。

1966年正逢太原五中建校60周年。学校要搞隆重的纪念活动，一应准备工作也进行得井然有序。当然，诸如彭真这样在中央位高权重的五中早年毕业生，是不可能回来参加母校的校庆活动的，但请彭真给他的母校题个词，或寄来一封写几句话的贺信，校领导还是寄有深深的厚望。即便此望落空，在为纪念建校60周年准备的资料里，那些不但健在，且在政界、军界、科技界、文化艺术界声名显赫的人物名单还有长长的一串，他们中无论谁为母校题个词，或者写几句话，都是五中的骄傲！但中学毕竟不是国家的人才库，也不是培育英雄的大熔炉，当时太原五中的党总支对这一届高三学生的最大期望，并不是出现几个“活学活用”的英雄，而是将今年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再度爆响。所以，学毛选、学雷锋、准备校庆固然要抓，当紧的还是抓这届高

三毕业生的最后冲刺。

就这一点而言，刘灏的班主任对刘灏很有信心也很放心。

他的脑瓜子极聪明，又是数学课代表，各科成绩也都排名在前。更重要的是他出身革命军人家庭，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的院长，堂堂的现役军官；母亲也是一位现役军官。要知道，处在那个注重出身的特定年代，仅仅成绩好而出身不好是难过高考政审关的。出身好，成绩好，这就给刘灏带来了可以在军事院校优先录取的条件。唯一不足的是近视眼。刘灏一上高中就架上了一副近视眼镜，虽有不足，但还没有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他的近视度恰好在军事院校要求的水平线以下。班主任明白，这一点，对军事院校优先录取刘灏根本无妨大局。

“刘灏，下了晚自习你来一下。”

那天的晚自习以后，刘灏就来到了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

谈话开门见山：“你的条件很好，哈军工来招生的老师看了你的档案和平时的成绩，想让你报考哈军工。”

哈军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这是一所在全国叫得很有响的高等军事学府。它是培养军官和军事专家的摇篮，能提前参加哈军工招考的学生，就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比别的同学多了一次选择的机会。军事院校向来享有在考生中提前录取的特权，即便考不中，也不影响地方院校录取。刘灏一旦考入哈军工，日后就可以和父母亲一样身着军装，雄纠纠地昂首奔向无量的前程。班主任甚至想象着那时的刘灏，是怎样的一副儒将风度。想象着在未来的五中资料室里，毕业于五中的那串大人物名单上，将会毫无疑义地排列上刘灏的名字。而这位军官，正是经他之手送进哈军工校园的。身为一名辛勤的园丁，这就是一种责任和幸福啊！

班主任老师等待着刘灏的回答。回答却令他大失所望。

“老师，我还得想一想。”

“还得想一想？想啥？”

“我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一考上哈军工，不就上不成中央电影学院了？”

刘灏的回答中带着些许羞赧，洋溢着的，是更多的天真和自信。

班主任老师惶然无语了。他真是一点也想不到，面前的这位学生所憧憬的人生理想和埋在心底的秘密，竟是想当一名演员。

年轻人的心，好难窥透啊！

20多年以后，当我想以刘灏作为一个切入点写作此书，专程与我的创作伙伴银小骏先生一道向刘灏做多次采访时，也问及他当时为什么那样固执地想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而且是选择了表演系。那时，刘灏已不再是威名显赫的造反派司令了，也不是在中共太原市北郊区委领导的地盘上位显权重的区委副书记了。他成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原因很简单，当时认为要想当个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太难了，如果当演员呢，又好玩又能演英雄，一定挺过瘾的。”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那是一种年轻人既幼稚又可爱的表现欲。

【2】毛泽东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世

中学生刘灏的人生理想是想当一名电影演员，而且一定要演那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可是，他还不懂得怎样演戏。

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走上神坛的毛泽东主席正在筹划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戏。

1965年的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来，首都的主要报纸《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都先后转载了这篇大块文章。中国共产党内从高层

领导到普通党员，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其实已通过这篇文章，向全国人民拉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她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从3月初开始动笔到11月发表，整个写作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知道。……毛泽东前后看了三遍，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和支持。……这就是说，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组织写这篇文章，是怀着重大的政治目的，是精心选择的打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

（摘自《文化大革命简史》，席宣、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用当年对待彭德怀一样，继续用“莫须有”的罪名，先对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为其扣上一顶为彭德怀翻案的帽子，继而对准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从中央到地方难以计数的被扣上“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帽子的领导干部，从而引发他心中蕴酿既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个人所为，完全是在构筑一种现代文字狱。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代,从小就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个人迷信的社会政治大环境,早已左右了他们的世界观。在“文革”中,又唱出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颂歌,伟大领袖成了亿万学生们心中不落的红太阳。红太阳如此地设定了“敌人”,且向“敌人”发起了这种突击,自然使被发动起来的年轻而少不更事的学生娃娃们,仿佛看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确实有一个庞大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似乎真如领袖所言,这个司令部的下属许多部门已经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地步,从而坚信了领袖这种绝地反击的伟大意义,鼓起了紧跟毛主席向各级走资派造反的信念和斗志。

事情发展到 1966 年的 5 月,中央发生的许多变化,让党内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预感到了一些急速发生的政治风向,但又有哪一个能预料到毛泽东主席不明示于人的悉心安排呢?再往后,他们就是一心紧跟,也时时紧跟不上了。其时,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不知如何才能紧跟上伟大领袖毛泽东,何论中央和地方上的其他领导干部呢?

这一年的 5 月 1 日,在北京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堂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竟没有露面。彭真出了问题,其时在山西知道一点此事内幕的人,只有省委的一些高层领导。4 月 16 日至 20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对彭真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之后中央又改组了北京市委,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彻底解体。5 月 5 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5 月 9 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5 月 11 日,《山西日报》转载了《解放军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的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公开批

判了北京市委三位领导人邓拓、吴晗和廖沫沙。

全国媒体都在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而这种声音来自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的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有毛泽东钦点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 8 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南方“休假”，委托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会上要通过的那个《五一六通知》，则是毛泽东多次修改后的定稿。凡毛泽东增加、修改的文字，全用了黑体字，从此开创了“文革”时期报刊上凡毛泽东的语录全用黑体字的先例，并称其为“最高指示”。特别引起与会者注意和猜测的，是毛泽东在文件中加入的“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等字眼。谁是这样的人物呢？恐怕连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想不到这段文字所指的具体对象。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排名最后的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煞有介事地大念“政变经”，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性为阴谋反党集团，说“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位夺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还如此表达了毛泽东的意思：“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林彪还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在鼓吹个人崇拜上，林彪说：“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 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5 月 16 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文革”中人们常常提到的《五一六通知》，同时宣布撤销原先由彭真具体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

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由毛泽东主席直接领导，具体地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被世人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子，一时间权倾朝野。

这样一个矛头直指刘少奇，为刘少奇的垮台作了充分的舆论和组织准备的《五一六通知》，却由毛泽东刻意安排，让刘少奇主持，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这种手段，独步古今。

【3】共同的紧跟心态

“文革”波及山西，要从华北局工作会议开始。当时，中央与各省间，有称之为局的行政大区，山西省隶属于华北局。5月22日，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就是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等中央领导的讲话精神和《五一六通知》。山西省来京参加这次重要会议的有198人，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带队，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市的党政一把手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赴京到会。山西的党政大员中，只有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武光汤一人留在省内主持一般工作，由此可见，这次会议是何等重要。

在中共党内，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可对于像刘灏这样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并没有嗅出国家政治变化的什么信息。直到这一年的6月1日，在全国人民心中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以最显著的版面和标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平静的校园才渐渐地变得不再平静起来。那篇社论，无疑就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吹响的号令呀！在那篇社论中，特别强调了林彪对政权的论述，并严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国兴起。”号角已经吹响，年轻的中学生们不再正常上课了。应届高三学生

们立志投身于这场伟大文化大革命的愿望，逐步取代了对升学考试的渴望。北京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掀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想当演员的刘灏耐不住寂寞，也同当时狂热起来的学生们一样，认定自己是幸运的。虽说爬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赶上，可赶上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氛围，立即生出想在这场革命中一展身手的欲望。不仅是刘灏，在全国，又有哪一个热爱党和毛主席的中学生，不想参加这场由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

由刘灏发起，在太原五中成立了七一战斗小组。在当时五中学生们成立的众多学生组织中，七一战斗小组的造反精神还远远落在别的组织后面。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战斗中，当别的学生造反组织开始揪斗老师时，七一战斗小组竟以保皇派的角色出现持反对意见。这个小组的成员多是平时的好学生，思想中那种较为保守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在空喊几句革命造反口号的同时，还想着不要耽误了高考，好以满意的成绩踏入大学的校门。所以，当有的学生将刘灏心目中的那些好老师打成“反动权威”，不但贴大字报批，还要面对面批斗时，刘灏和他的七一战斗小组的同伴们反对了，与这些同学展开辩论了。刘灏滔滔不绝地显示出辩才，与那些贴老师大字报的同学争论起来：“当老师，就要教好课，要教好课，就得有学问，如果把这些好老师都定成‘反动权威’，都打倒，以后没有好老师教课，考不上大学，倒霉的还不是咱们学生吗？”给老师们贴大字报刘灏反对，给校党总支贴大字报，刘灏和他的那个七一战斗小组也反对。高中73班有7名学生，联名给校党委书记王振东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总支领导运动不力。刘灏和他的七一战斗小组的战友们议论：批斗老师不对，莫非他们把党总支当成革命对象就对了？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批《海瑞罢官》这个剧

本可以，批远在北京的象吴晗那样的大人物也可以，他们离中学生们的生活很远。而具体到批老师、批校总党支，刘灏这样的好学生们便有些想不通了。这也体现出如刘灏这样的准知识分子们，当时对“文革”的理解。

那么，已经开始受到批判和冲击的知识分子们呢？我们不妨先跳出中学老师这个层面，看看全国著名且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赵树理，当时又是怎样想的。

他既觉来势猛，又不知道未来的“气象”如何。他既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可“革”，又不知道该把自己摆在哪里。他对人说：“象我们那个年代的作家，原来既没有什么协会，也没有可能跑那么多地方。现在条件好了，反而没有什么作品了。是应该有场文化革命改造改造。”有人贴出揭批作家的大字报，他仔细读了，然后题了“污垢沾身久，未能及早除。欢迎诸同志，策我去尘污”四句诗，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引自《赵树理评传》。董大中著，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0 出版）

愿意接受群众的批评，或者过火的批判，认为这全是革命的需要，认为这可以帮助自个加深改造，然后更好地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大作家赵树理的这种心态，足可以代表“文革”之初，所有受到大字报批判的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态，以及他们对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共同的理解了。五中那些被贴了大字报的老师们，也是如此。

中学生刘灏可视为“文革”动力的一种代表。大作家赵树理则可视为“文革”对象的一种代表。作为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们，他们面对突兀而至的“文革”，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和理解呢？历史已经证明，由高居神坛之上的领袖毛泽东一手发动掀起的

文化大革命，竟然延续了10年，时而波谲云诡，时而浊浪排空，将全国人民裹挟着，让千百万人蒙羞遭难，使五千年辉煌文明毁灭于旦夕，制造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和大悲剧。对此，发动者毛泽东主席本人当初不知是否始料未及，全党全民则肯定是始料未及。

放眼全国，尚未变成革命对象的各中央局和各省的党政领导，当时也怀着对党的领袖无限信任、无比虔诚的态度，开始积极投入了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京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这份重要文件，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新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的有关决定和这些决定的伟大意义。中央一下子揪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全国震惊，也震动了在前门饭店开华北局工作会议的各省代表团。在山西代表团中，当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第一个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内斗争的新形势，站出来揭发了山西省委的问题。

袁振揭发省委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几条，其一，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那份《二月提纲》炮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其二，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经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其三，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了《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傅山何人？他是明末清初山西的一代大儒。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傅山为其恩师袁继咸被宦党迫害入狱一事，率山西百余生员赴京伏阙讼冤，使崇祯皇帝终为袁继咸平反。明亡，清廷入关后，傅山于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秘密参与反清起义被捕，抗词不屈，出狱后行走江湖，终身不仕，在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由康熙下旨举办的博学鸿词科恩科中，傅山被朝中汉官举荐而拒不参加，被山西地方官员押入京城后以死相抗，表现出一位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其诗、书、画、医在明末清初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一代文宗。2007年是傅山先生诞辰400周年，这一年在中共太原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太原市举办了声势浩大的纪念这位先贤的各项活动。

但在“文革”之初的政治环境中，袁振批判傅山，还在会上拿出了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名，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其用意很明白，那就是“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在山西有活动，山西省委与之有牵连。

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袁振也有明确的态度，当即在会上做了具有批评意味的表示：“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在山西省委中，此时的袁振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相比，毕竟势单力薄。几个回合下来，带头揭发省委的袁振，就被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一举打成了“野心家”和“伸手派”，会上还有更猛的火力，说以袁振为首，在太原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不要以为那阵子只有山西代表团里斗的热闹，中央揪出个“彭、罗、陆、杨”来，其他省岂能不上行下效？不说别的省，仅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除山西揪出一个以袁振

为首的反党集团外,河北省也揪出一个以林铁为首的反党集团,内蒙古自治区也揪出了以乌兰夫为首的反党集团……

有被神化了的领袖毛泽东坐阵,有中央文革小组呐喊,阶级斗争的弦在全党的高级领导层中,确实是绷得很紧了。不论是在“文革”之初落马的党内高级领导,还是“文革”之初将同僚先打落马下,其后自个也被打翻在地的党内高级领导,他们在“文革”之初对那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其实与被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亿万大、中学生们高明不了多少。10年动乱,就这样在全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想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都想积极参与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统一目标下,大家迈着无法协调一致的步伐开始了。

个人迷信让伟大领袖坐进了神殿,毛泽东究竟要怎样往下发动和引深他的这场运动呢?

【4】毛泽东发动起亿万学生造反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将斗争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原文。更有评论员的文章号召全国的革命造反派与“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务,多老的资格”的黑帮们进行斗争,并把他们彻底摧毁。同一张报纸上,继前一天的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又发表了一篇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重要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两篇社论的鼓动下,首都北京各大、中学校开始出现了狂热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将毛泽东尊为自己的红

司令和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开始走出校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8日，《人民日报》和各省党报发表了新华社通稿：《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这些学生提出要废除现行的资产阶级高考制度，建议高中生直接到工农兵中去。《人民日报》同日发表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对高考制度作了批判。

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老人家的劈风斩浪，已经离开了体育健身的原本意义，他所要显示的，是一代伟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在党内外不可动摇的力量。是要用这种权威和力量，鼓励一代青年，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文化大革命中，跟着他奋勇前进。

7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高校招生取消考试，要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上大学，还特意指出，本年度的高等学校录取工作，从1967年1月1日开始，月底结束。

8月1日，毛泽东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去一封信，热情地支持他们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举动，这封信作为党内文件，迅速传向全国。

8月8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十六条》成了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8月17日，毛泽东主席的“大字报”作为一份“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党“县团级”。这份毛泽东写的“大字报”，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8月5日，虽未点名，矛头却直指刘少奇和邓小平。形成“中央文件”下发后，在全国开始了用大字报“炮打”、“炮轰”的各种高潮。前一段因毛泽东在南方巡察，由刘少

奇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北京和全国向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的举措，也就成了被毛泽东返京后指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神话了的领袖加上党中央的文件，一下子就把全国的学生们发动起来了。全国的学生们，不论是成立了叫啥名称的革命造反组织，都确凿地感到毛主席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太阳，都表里如一地觉得自个的一言一行，都是在红司令领导下的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自己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绝然无错！在无数没有反骨的年轻躯体内，奔腾的是殷红的、要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的热血。有毛主席挥手指航向，太原市的所有大学和中学，与北京的所有大、中学校一样，已经无法正常上课了，自然，也就没有了放暑假一说。这一年的高考，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来临而被取消了。至于明年怎么上大学？刘灏不知道。当时全国的高三学生们，恐怕全没有人知道。

【5】太原市的两个动员大会

1966年的夏天，山西与北京一样，风云莫测。

7月16日，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各级党组织下发了题为《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安排意见》，即(66)130号文件。

文件第一条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头等大事，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所有机关、学校、厂矿、商店、部队、农村和城市街道，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所有党员、干部都要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并在运动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文件第二条指出了运动的方法：

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帮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需要夺权的单位要及时进行夺权，需要改组和调整的单位，要进行改组和调整。

文件第六条指出：

开展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都必须有一支坚强的工作队。所有工作队员，都必须参加文化大革命。

文件第七条又强调了贯彻华北局会议精神的做法：

省、地(市)和正在进行四清的县，要按照规定的范围，召开一定的会议，传达讨论华北局会议的精神，开展批判和斗争。同时，要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动员，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迅速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推向高潮。

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是一心要紧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一心要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如何搞好？省委的思路是和搞“四清”运动一样，要往开展运动的单位派工作队，再按华北局会议精神开展批判和斗争。所谓“四清”，是“文革”前由中共中央发动，旨在清理农村走资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叫做“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后来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

组织、清思想”。如派出“四清工作队”一样，由省委向下面派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这是当时毛泽东在南方巡察，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时，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路和方法，当毛泽东由南方返京后，即刻将这种思路和方法，指责为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加以批判。山西省委也因此而被造反派们戴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帽子，被大批特批。省委也因此而反复检查，直至被夺权。

中共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在7月18日同时开了两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两个会议的会标一样，两个会议的情况却不太相同。

省委召开的会议在省城迎泽湖畔的湖滨会堂，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大会上做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长篇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野心的阴谋家挖出来。”显然，这是有所指的，因为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已经被定成了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在讲到要做真正的革命“左派”时，卫恒引用了《红旗》杂志的社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话说：“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是可以信赖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核心。”卫恒还强调：当真正



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袖章

派，“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他还指出：“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有明确的政治方向”；“要信任党、拥护党、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要善于团结大多数群众，”；最后号召全省各级党委“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热斗争中经受考验，锻炼自己，提高自己。”

市委召开大会的地点是新建路市委礼堂。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在大会上正式向全社会公开了华北局会议的内幕，对自己的问题做了如此检查：“太原市还有些重大问题没有揭出来，我的问题就没有揭出来嘛！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我的问题是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出来的。”他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搞了宗派活动，利用《傅山画集》等问题反对省委。”并沉痛地说：“我把自己推向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方面，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会后，按省委的部署，省委派出由省委书记处书记贾俊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太原市委，动员市级机关干部开始揭批袁振“伸手派”“野心家”的罪行。各级党委也按省委部署，要领导好运动。山西大学的情况便是一个缩影。7月22日，山大党委召开了革命师生员工代表会议，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梅在讲话中指出：“依靠无产阶级左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在野的伸手派。”并决定选举山西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运动。当下，外语系24名代表集体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认为，校党委如此而为，是走资派想操纵群众运动。虽然通过这个会也选出了山西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而且刘梅出任了主任委员，但校党委要想掌控运动的目的并未达到。

在华北局会议上，省委将太原市委书记袁振打成了“伸手派”和

“野心家”，这个搞运动的思路，直接影响到基层。如山西大学党委，便将斗争矛头定为“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在野的伸手派。”如此而为，矛头对准了群众。当群众起来造反时，省委很快又抛出了山西大学党委，让刘梅等校领导陷入了被造反、被批斗的泥淖。

根据省委决定，《山西日报》在 7月 30 日公开批判分管文教的副省长王中青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8月 5 日《山西日报》刊出山西大学化学系五年级五位同学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调查研究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这张大字报支持王谦省长讲话中对山西大学党委的批评，揭批山大党委领导不力，要求校党委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同版还有山西大学青年干部聂庆垒、樊子琚、孟绍贲、王鍾锁、王毓秀 5 人的来信。将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了山西大学校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刘梅。卫恒为了体现省委支持学生运动的政治态度，指示山西日报社领导，在 8月 5 日的报纸上还配发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点了在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刘梅，以及党委常委、秘书长宋华青的名，指责他们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同一天的《山西日报》上，还报道了太原六中革命师生揪出以党总支书记李雪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长篇报道。在省委安排下，8月 7 日的《山西日报》刊出长文《李束为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卒》，矛头指向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李束为。8月 8 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会议批判了著名作家赵树理。之后《山西日报》公开批判赵树理的罪状主要有三条：一是说赵树理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反动”；二是说赵树理是“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红人”；三是说赵树理是“反动学术权威”。在省委的领导和促动下，《山西日报》的导向又如此充满了火药味，省城太原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大学、中学，各种各

样的大字报，正铺天盖地而来。省委这种引导运动将斗争矛头对准下级的办法，被造反派们斥责为“舍车保帅”。

【6】点火会让刘灏明确了斗争大方向

太原五中的教师们，并没有因为有一个战斗力不强的七一战斗小组，而逃脱被“横扫”的厄运。在五中校园内，学生们还组建起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呢。如五四战斗小组、自来红战斗队、金猴奋起千钧棒战斗队、卫党军等等。这些组织在党支部的支持下，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老师。老师中，出身不好的，那是铁板上钉钉，一个也休想溜掉。仅仅因为言语不慎而引来灾难的老师，就大有人在。有一位外语老师，因课堂上一口流利的英语，正被造反的学生们怀疑成“里通外国”。偏偏那天他上课时，赶上天气阴云密布，偏偏在老天爷雷霆大作时，他竟由不得惊呼了一声：“啊呀呀，我看要变天啦！”把对非政治的种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引入到政治中来加以引伸和纠缠，在中国的历代文字狱中，都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手段。学生们用毛主席老人家那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尺子一量，立即就意识到“变天”的含义是何等的可怕，而公然高喊“要变天”的老师又是何等的反动。这样的阶级敌人，就活生生地站在人民的课堂上，他要“变天”，这不是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难怪毛主席老人家要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呢？恐怖的警钟，一旦如此地在他们的头脑里响个不停，小小的心灵里，就再也容不得一丝想像中阶级斗争的风吹草动了。

不仅仅是太原五中，在其他学校，《人民日报》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正在煽动起学生们怀疑一切的狂热。山西大学外语系学生荣福胜，学习了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6月3日在学

校大饭厅贴出一条标语：“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以示要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心。他写毛笔字功夫不行，可能落笔手抖，竖笔写弯了一些，就被一些崩紧了阶级斗争弦的学生，将“牛”字读成了“毛”字。再往下推理，这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吗？于是荣福胜成了胆敢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原本要革命的荣福胜，先是被也要革命的学生们揪斗，继而被学校党委以“现行反革命分子”关押。太原阳曲县农技校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韩果梅，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精神鼓舞下，挑头给黑五类出身的男学生戴晴川贴大字报，并组织自来红学生揪斗了戴晴川。6月22日晚上，受到凌辱的戴晴川晚上持刀撞入女生宿舍，杀死了韩果梅。韩果梅难以复生，戴晴川也被定为反革命罪和杀人罪被法院处以死刑。一部份学生对另一部份学生的揭发批判、打击，开始在各个校园弥漫。

学生们要造反了，要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太原五中的领导们，绝不比市委和省委的领导人高明。好在学了省委的[66]130号文件，省市委领导们都口口声声说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和支持呢！现在学生们跟上毛主席横扫牛鬼蛇神，揪斗有问题的老师了，作为学校的党总支，敢不积极领导？敢不积极支持？

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高层的党内斗争，对当时的刘灏而言，似乎还不是身边需要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作为领导的那个七一战斗小组，因为在校园内的运动中无所作为，正被校园内的其他一些造反组织斥之为保皇派。想革命、想造反的七一战斗小组的学生们，既不想参加揪斗老师的造反活动，也不愿将矛头对准校党总支。刘灏和他的战友们，确实不知将革命的靶子落在何处。刘灏猛醒过来的契机，是党中央发布《十六条》后，北京的串连学生们来到太原举办的那次传经送宝大会。8月12日，中共山西省委向全省教育战线下发了一份通知，允许各高等院校师生们在院校间互相参观大字报，互相召开座谈

会,交流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经验。

8月27日,省委出面组织了省城五千余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湖滨会堂集会,请首都来的革命小将登上了湖滨会堂的讲台,向省城太原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做了一场报告。首都革命小将赴各地串连的壮举,山西省委领导急于要站在运动前列领导好运动的心态,促成了这次大会的召开。三位来自首都革命造反的小将,穿着父辈们曾经穿过的绿军装,手握那时副统帅林彪在公开场合,跟在毛泽东身后不断摇来晃去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虽显得幼稚却威风凛凛。他们被山西省委的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请上了湖滨会堂的主席台,用年轻人高昂嘹亮且不容置疑的北京腔,向台下那一片期望着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燃烧自己血液的太原大、中学生们开始传经送宝:

……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了反修防修,为了让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已经好多天没有睡好觉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有没有呢?你们学校有没有呢?有!只有把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统统揪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在运动初期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对准老师和学生,企图扭转运动的大方向。你们的学校有没有呢?你们山西,你们太原有没有呢?……

这种会议,在那时被称为“点火”。

会议刚完,还没有走出大会堂,刘灏就急于找他的对立面辩论起来了:“你们不是说我们七一战斗小组不敢革命,不敢造反吗?你们不是说我们是保皇派组织吗?听听人家北京串连学生们的说法!学校党总支不敢引火烧身,而是放火烧人,你们不炮轰党总支,只会斗老师,你们才是保皇派呢!《十六条》里讲的明明白白,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灏要证明他带领的七一战斗小组不是什么保皇派了。一张署名为“七一战斗小组”，标题为《质问校党总支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出现在太原五中校园内。大字报指出：“支持学生揪斗老师的学校党总支书记王振东是走资派，所以党总支才要转移运动的大方向。”

在太原五中，这张大字报的结论，是众多老师和学生们在党中央的舆论引导下一想就通的道理。这张大字报使七一战斗小组的大旗哗哗响起，更多的学生便聚到了刘灏身边，连那些遭受揪斗之苦的老师们，也纷纷站出来表示支持刘灏的革命行动，因为刘灏的斗争目标是学校党总支，是党总支书记王振东这个走资派，而不是广大教师，包括出身不好的教师。刘灏终于成了太原五中一派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开始熄灭了通过高考在电影屏幕上扮演英雄的演员之梦。有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做依据，有北京的红卫兵做榜样，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潜藏于中国人心中的领袖崇拜热，特别是当时在中国青少年一代的心中，由这种崇拜热激出的政治盲目性，使刘灏踏上了一条原本不属于他的革命造反的不归之路。再往后，按照《十六条》的要求，刘灏终于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山西省委的走资派。当在这种革命造反中节节胜利，他成了太原市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后，自然而然地在太原五中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成了太原五中革命委员会主任的不二人选。这段历史，将在本书第五章第21节《刘灏做官后聆听四条父训》中详述。

刘灏在太原五中策划出的那一张大字报，在五中虽然反响甚大，但还不足以将他真正地推向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与袁振、王中青这些做大官的大人物相比，与赵树理这号大作家相比，与山西大学的校党委相比，一个五中的党总支书记算个啥？就是与太原六中造反的学生们相比，人家在市委派驻学校的工作组领导下，都把党总支定成反革命集团了，刘灏这儿才刚刚揭发学校党总支的问题，差距何

其之大！

正确地回眸历史时，我们应当看到，那时从上至下，无论党内的高级干部还是一腔热血的大、中学生们，大家都是要听毛主席的话，都是想积极投身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按党中央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来寻找文化大革命的靶子，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如此，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也是如此。太原五中的中学生刘灏，投身文化大革命后，在为同学中好朋友的父亲抱打不平时，自然也会找到文化大革命具体的靶子了。就这一点而论，在他们日后不同的命运轨迹中，却有着共同的悲剧因素，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党外形成了个人迷信的时代，在一个缺失了党内民主，而党的最高领袖却要用个人迷信发动大民主的政治环境下，在全党集体失语的迷失途中，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中学生刘灏，都一样跳不出被他们打心底称颂并高喊万岁的领袖的意志。

第二章

刘灏为好朋友的父亲袁振翻案，带领众小将大闹太原市委大礼堂。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自个儿最终会自觉不自觉地被绑到了袁振的战车上。

【1】十年间政治风水轮流转

“文革”之初，在北京前门饭店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发生在山西代表团中的那一场斗争，与当时党内高层的残酷斗争相比，在中国的10年“文革”史中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而这个小小的事件在山西，却成了引发山西“文革”之初党内公开分裂的最大导火线，也成了山西“文



“文革”初期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左一)、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中)、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右一)

革”之初革命群众造反组织之间,针锋相对的最大观点分歧。以党内而论,分裂的一方代表,是被省委大多数人支持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而另一方的代表,则是公开站出来向省委开火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不论是后来被造反派迫害惨死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还是后来在山西“文革”中时沉时浮,10年动乱尚未结束就被调离山西,在安徽省继续担任党内高层领导的袁振,他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高级干部。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论有多么浓厚的个人色彩,其本质都是特定年代中为领袖的意志所驱使。正是全党的领袖毛泽东,制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制定了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按这样的理论和目标来搞文化大革命,党内和社会上必然会出现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的乱象,必然会产生为此而不断冤死的冤魂。山西在这场残酷的党内斗争和社会动乱中,起先是袁振被省委打倒在地,其后是卫恒被混迹于造反派中的坏人折磨至死,再往后,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一齐垮掉,袁振又成了山西省和太原市新生政权革命委员会的革命领导干部。再往后呢,那10年间山西的天下,就进入了都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你方唱罢我登场,政治风水轮流转的极不稳定的历史局面。

请看10年间政治家们在山西高层不断取而代之的情况:

1966年“文革”之初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被革命造反派们称为“卫、王、王”,即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委第二书记、省人民委员会省长王谦、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

1967年1月夺权后取代他们的是“刘、张、袁”,即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以及被省委打倒的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他们率领群众造反组织一道夺了原山西省委的权后,成为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1969年中共召开九大后,69军副军长谢振华开始主持山西党的

核心小组和省革委的工作,之后,谢振华当选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又任命其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74年春天的“三上桃峰”事件后,因江青带头“炮轰谢振华”,谢振华开始受批判,王谦开始主政山西。当时已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在1975年全国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直接插手山西的工作,直到华国锋主政时期。

10年岁月中,在三晋大地上轮流主政的这些政治家中,都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命运最惨的,就是被推向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不明不白惨死的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

10年动乱结束后的1978年1月30日,在卫恒含冤逝世11周年之际,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市双塔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隆重的卫恒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1月,在中共山西省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为卫恒平反昭雪。1985年6月27日,中共五届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形成文字,弥补了在四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没有形成文字的缺憾。卫恒的在天之灵总算可以得到告慰了。

在“文革”期间被中央调离山西的袁振,一直在安徽省委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文革后又过了好几年,才从中共安徽省委顾问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职位上光荣离休,颐养天年,过起了安度晚年的幸福生活,直至谢世并盖棺定论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其他诸如刘格平、张日清、王谦等领导离开山西后,也各自继续为党工作,直至离休。他们谢世后,当局都为他们盖棺定论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历史的风云有时能抹去历史的细节。但组成历史风云的不仅仅是结论,它们更需要细节。当10年动乱结束后,“文革”的全部罪恶,

已经落在了林彪一伙和“四人帮”一伙的头上,然而,为什么林彪一伙和“四人帮”一伙,能在“文革”中崛起,并在中国大地上搅起一团团乌烟瘴气呢?我们党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在那时又做了些什么呢?不愿和不会反思的民族是一个裹足不前的民族。需要指出的是,回顾真实的历史和进行反思,并不是要去责怪那个年代里当政的某一个人。回顾和反思,是为了总结那段历史,也是为了不再重复那种历史。

我们现在不得不把当年发生在前门饭店里的袁振事件,作为一个细节,放在我们的文章中间了。因为这段历史,构成了山西“文革”初期乃至运动中期的核心事件,这核心事件释放出来的能量,竟左右并助推了“文革”之初省城太原的运动走向,也使刘灏由此而扑进了“文革”的险风浊浪,难以自拔。

【2】好朋友变成了狗崽子

事情还得从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的儿子说起。他恰恰也在太原五中上学,是高三71班学生,与刘灏不仅是同级同学,而且是七一战斗小组的成员。七一战斗小组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校党总支,这举动便让学校的其他革命小将们开始对刘灏刮目相看,追随者也愈众。刘灏以他有限的历史知识,开始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了:当年的毛委员不是依靠井冈山的革命力量,最终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吗?要想跟着当今的红太阳再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还得走井冈山的道路。别看脊梁还孱弱稚嫩,但他觉得既然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起来革命造反了,就要敢闯、敢干、革命到底,造反到底。投奔七一战斗小组的学生们多了,在扩展队伍的同时,刘灏将他的七一战斗小组正式更名为井冈山造反兵团。当年毛泽东靠井冈山武装割据获得天下,以这个革命圣地作为自个造反组织的名

称,而且从“小组”直接改为“兵团”,一下子就显示了这个中学生那时的胆略,还有要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的无畏勇气。既为“兵团”,自然得有“司令”,刘灏当仁不让,从此,井冈山造反兵团里的学生们,就口口声声地称他为“刘司令”了。再往后,连参加这个组织的教师们,也喊起了刘灏“刘司令”。待刘灏率领他的将士们杀向社会,联络其他学校的造反组织,组建起跨行业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随着社会上队伍的不断扩大,中学生刘灏确实成了号称在全省有百万大军的“兵团司令”!

“文革”开始时,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在各大中专院校里,紧跟领袖毛主席闹革命的学生们,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多如牛毛,很多学生被推举为这种组织的领导后,多自称或被组织里的“战士”们称为队长。比如山西大学最早成立的观点对立的两个革命群众组织,一个名为8·8红旗战斗队,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六条》那一天,即1966年的8月8日;另一个名为8·14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为了纪念1966年8月14日这个日子。那一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带着专人专车,给山西大学革命师生送来了大批毛主席著作,以鼓励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学习毛泽东思想,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山西大学校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对省委送来的“红宝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8·8红旗战斗队是外语系大三学生李大纲当队长,而8·14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则是中文系大二学生朱永成当队长。再拿太原另一所有影响的理工大学太原工学院为例,以革命圣地瑞金冠名的太工瑞金革命造反战斗队,队长是大一学生宋捷,以红旗冠名的太工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队长是大五学生李青山和杨保明。太原工学院还有一个永红战斗队,运动初起时,其造反劲头远不如“瑞金”和“红旗”,但当这个战斗队的队长高翔后来投奔了刘格平之后,这个“永红”就成了刘格平的一支嫡系部队,为刘格平效力不遗余力了。从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

院的情况可以看出，大学生们听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起来革命造反，不过是搞个战斗队，领导也不过当个队长，而中学生刘灏的一腔革命热血中，比山西同时的大学生们，更多了一些年少气盛的大胆，和不成熟的幼稚和张狂。

井冈山造反兵团成立了，可偏偏有人却要退出井冈山，这无疑叫刘司令大为吃惊。他不是怕自个的兵团里缺少了一个可耻的逃兵，是不相信这位要好的同学竟会失去革命和造反的勇气。他要责问伙伴，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为啥？”

“我怕玷污了咱井冈山的纯洁性。”

“你是红五类，怕啥？”

“我现在成狗崽子了。”

“为啥？”

“因为我爸爸是袁振。”

刘灏不由得一惊。袁振是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刘灏知道。袁振成了反对省委的伸手派、野心家，成了太原市委反党集团的头子，刘灏从街上的大字报上也知道了这事。但市委第一书记离他目前革命造反的靶子还远得很，他想的是校党总支的问题，还没有想到要去过问过问市委的问题。此其一。其二呢，他更没料到眼前这位要好的同学，竟然会是袁振的儿子！

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可和今天不尽相同，那阵子的中学生们，谁的父母亲是干什么的，并不是同学间的热门话题。不像现在，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官本位，越来越盛行的拜金主义早影响到了校园，同学之间，谁的父母亲是掌什么权的大官，谁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生意的大款，彼此都很了解，就是做家长的不对老师们直说，怕是做儿女的自个也难免会在同学中自吹的。

面对袁振的儿子，刘灏眨眨眼睛，明白这个红五类确实变成狗崽子了。在同届的同学中，他和这位伙伴以往就相处得很好，相信这位伙伴不会说谎话。刘灏一时无语，他得好好地想一想了。

如果说，前些时听到市委第一书记袁振成了伸手派、野心家，成了太原市委反党集团的头子，刘灏思想上也有点震惊的话，此时的震惊就分明更直截了当和不可理喻了。面前是自己最要好的一个同学，是一个和自己一道发誓，要跟上毛主席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怎么会一下子就变成反革命了呢？那个年代灌输在青年学生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观念，使刘灏在一刹那间，先决定了要与这个“狗崽子”划清界线，但心底那种做朋友就要讲义气的传统思维，又让他由不得生出了必须帮助这个好朋友的念头。他和这位要退出井冈山的同学没有再说什么，既没有批准，也没有劝阻，而是暗暗决定，要亲自去找袁振看个明白也问个明白。如果袁振确实是青面獠牙的黑帮，那就让这位同学和他老子划清界线，再退出井冈山不迟。如果是别人冤枉了袁振，那就让这位同学留在井冈山兵团，谁冤枉了他爸爸，就找谁算账。拿定主意的刘灏，只是向这位还将痛苦挂在脸上的好伙伴撂下一句话：“你等着，等我弄清楚问题后，咱们再说。”

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仅仅就是如此地做了一点思索，就轻易地一个人做出了去找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对市委第一书记进行一番考察的决定。做出这个决定的所有动机，则是对一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的仗义。从此，太原五中的高三学生刘灏，也就开始被袁振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再别无选择了。

【3】刘灏初识袁振

1966年的8月，太原市最闷热的日子。黄昏时分，刘灏只身一人

走进了市委大院。早过了机关下班的时间，原本是消夏纳凉的时光，市委大院里却依旧热闹非常。数不清的大字报，将市委大院里所有的墙壁，都装裱得一片斑驳。扫一眼那些大字报的标题，啊呀呀，几乎全是讨伐袁振的。

“揪出反党头目袁振……”袁振二字上还打上了红红的×，是定性的口气。

“袁振必须低头认罪……”是严厉的口气。

“袁振同志的问题需要彻底搞清楚……”仅从这标题上，就露出了作者明显的保皇色彩。

还有许多人围成堆在争吵、辩论，有的穿衣打扮像是机关的干部，有的像是工人，都在说袁振如何如何，口气分明不同，观点也分明不同。对于这一切，刚刚 18 岁的刘灏，终难看个明白，也终难听出个究竟，穷尽他的思维能力和判断水平，也不知大字报上的内容谁对谁



“文革”初期的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袁振

错，争辩的双方谁是谁非。此时的他只相信自己，甚至脑海中泛起一丝想法，那想法竟然和看电影时判断银幕上的好人和坏人有关。他想：只要一见到袁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不信我看不出来！

他无心再看那些大字报了，更不想听那些人瞎吵吵了，直接找袁振，他要给他“相面”去。

按袁振儿子告诉他的

方位，挺好找。先找到了排房小院，待看清了门牌号码开始敲门时，心里还惴惴的，毕竟是在敲市委第一书记的院门，这可不是造反时去敲五中党总支办公室的屋门。此时的刘灏初出茅庐，还缺乏斗争的锻炼，露出的怯懦是难免的。当后来的某一天，他把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揪上太原的五一广场主席台进行批斗时，那可就绝非是眼下这个刘灏的心态了。

门开了。眼前出现了一位个头不高且瘦弱的长者，也就是五十岁上下吧。那人面目慈祥态度谦恭，眼神中，隐隐约约还露出了一丝害怕和不安，更重要的是他的脸上布满疲惫。

刘灏冲着开门人说：“我来找袁振。”

“我就是。”

惊诧的刘灏没敢眨眼，不愿相信这个长相一般的小老头子，会与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这样大的官职有直接的联系。可眼下谁又愿意冒名顶替一个反革命黑帮呢？

他说是袁振，那看来就是袁振。刘灏想。

“我是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刘灏。”中学生自报家门后，开门见山责问小老头：“我要调查一下你是不是黑帮？”

“我怎么会是黑帮呢？是人家逼我承认的。”小老头似有满腹苦衷，摇头叹息，又显出一脸热情说：“快请进，你想听，我就好好给你们革命小将说一说我的情况。”

刘灏就这样被请进了市委第一书记家的客厅。

此时正需要有倾述对象的袁振，终于有了一个愿意听他详细倾诉的对象。他开始叙述前门会议的经过：

“……他们说我是野心家、伸手派，想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我是听毛主席的话，揭发彭真、陆定一他们在山西的问题呀。我不是伸手派，野心家，顶多是没有尊重卫恒，他们就说我不尊重卫恒同志，就是伸手

派、野心家，我是听毛主席的话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他们是有问题，所以才怕文化大革命的，办什么傅山展览，就是个明证嘛……”

“谁叫傅山？”刘灏听不明白就要问。

袁振只好先介绍几句傅山是一个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又说宣传傅山与宣传海瑞一样，活人反党，总是利用死人来做文章。更重要的，是袁振说起了邓拓在支持搞《傅山展览》和《傅山画集》问题上，与山西省委有重要关系。邓拓是何人？刘灏可是明白的。他是“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头号黑帮，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5月份在上海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山西日报》上也全文转载了。邓拓是反党分子，运动刚开始时，刘灏的七一战斗小组就批判过“三家村反党集团”，无须再多说什么了，刘灏渐渐相信了袁振说的那些个问题，确实是省委中一个又一个很大的问题。

谈话的一方是党内的高干，一方是年方18岁的准知识分子。年方18岁的准知识分子，从这位党内高干口中，听到了从未听说过的省委内部斗争，听到了袁振过去如何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前门会议上如何揭发省委的问题，又如何受到打击迫害的详细自述。左一个他们，右一个他们，说具体点，那就是卫恒。刘灏越来越听明白了。以袁振的政治阅历和能力，打动并征服面前的中学生并不难，获得这位中学生的同情，也容易得很。而来此造访的动机中，原本就夹着许多仗义色彩的刘灏，在狭隘的感情基础上立即有了推理和判断：袁振确实被冤枉了，是卫恒一伙在迫害袁振。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革命的激情。毛主席党中央叫把斗争大方向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袁振刚对准卫恒这个山西最大的当权派就受到迫害，这还行？有必要澄清是非，刘灏要为自个的那位同学和朋友讨回清白，更要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不被人扭转，不能让山西的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被人破坏而发起战斗了。

“你写一份申诉材料，我们五中井冈山兵团给你翻案。”

袁振自然高兴得直点头。那年月，靠谁能比得上靠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呢？毛主席都是靠革命小将开展文化大革命呢，今儿晚上，真是从天上往下掉馅饼儿啦！

刘灏又说：“在中央你认识谁？我们给你往上送。”

这段日子冷落了的客厅里，突然就充满了春光。袁振显然激动起来了，连声说：“多啦，多啦。我认识邓小平、薄一波，还有华北局的书记李雪峰，我认识的多啦，多啦……”

小老头一口气举出了一长串在中央地位显赫的大人物的名字，小闯将也对给小老头翻案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想，只要把袁振的案翻过来，五中井冈山兵团在太原和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中，就立下了大功，这事儿，可比当演员去演英雄来劲的多！做英雄的表现欲，让18岁的中学生冲动了，拍着胸膛大声叫了一声袁书记，再次表示了要为市委书记翻案的决心。然后，在市委第一书记口口声声的感激和鼓励下，他信誓旦旦地与袁振确定了来取材料的具体时间。

【4】刘灏赴京为袁振送申诉材料

自打这次见到袁振之后，刘灏便认定山西省委有问题，迫害袁振，就是卫恒、王谦、王大任这些省委的主要领导们，要转移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但是，此时的刘灏，不过是太原五中井冈山兵团的一名领导，身边都是与他一样的中学生，他需要有人支持，找谁呢？那阵子，他自然马上会想到山西大专院校的大学生们。8月5日的《山西日报》上，刚刚登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还点了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梅以及秘书长宋华青的名。到山西大学去串

连,一定可以找到为袁振翻案的同盟军。刘灏来到了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的形势他一看就明白了。外语系的大三学生李大纲和大一学生方培泉们,此时正在筹划成立8·8红旗战斗队。他们的观点,是虽然省委在《山西日报》上点了刘梅、宋华青的名,这正说明省委是为了保自己而舍车保帅。李大纲和方培泉当时在山大已经以造反而闻名全校,刘灏找到了方培泉,说了太原市的袁振问题,方培泉当即表态,愿意随刘灏一道见一见袁振,亲自了解一下袁振的问题。

在袁振与刘灏约定见面的那一天,刘灏又约了方培泉,一道来见袁振。市委书记的小院里很安静,院门紧闭,使劲敲门里面也没有人应声。刘灏领着方培泉绕到后墙,让方培泉扶着他扒到墙头,高喊了几声,袁振才出来开了院门。见太原五中的这位中学生,这一回又领了一个大学生来见他,袁振极高兴。又是一番倾诉,表白了自个的冤屈。而且,他和刘灏说,自个的申辩材料已经写好了,希望刘灏和方培泉能给他送到党中央去。

方培泉毕竟比刘灏大两岁,且又是大学生,从袁振家出来,两人商量一番,认识有相同处,也有小小的分歧点。相同处,是应当成立一个社会大组织,这样,起来革命造反,就会更加有力度。成立个什么组织呢?又和刘灏五中的几个战友一碰头,名字就有了,就叫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刘灏的意见,由方培泉任这个组织的司令。方培泉也满口答应,但他与刘灏还有分歧点。方培泉同意支持刘灏为袁振翻案,但不能因此而证明袁振就是革命的。在山西大学,省委可以公开在报上点刘梅和宋华青的名,那是舍车保帅,在太原市,省委在运动刚开始就将袁振打成反革命,是不是也是玩弄舍车保帅的把戏呢?先求同存异,方培泉负责回山西大学印材料,即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为袁振翻案的种种传单,又说定和刘灏一道去北京的时间。材料很快印好,但他却不能与刘灏一同赴京了。原因是山西大学校内部,有人事

处的聂庆垒等干部起来造反，需要有人外出调查山西大学走资派刘梅的材料，他们选中了方培泉等几位造反势头很猛的学生，给革命小将们安排了这个差事。方培泉无法与刘灏同行，刘灏只好一人赴京，为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袁振去鸣不平。两个多月过后，方培泉才外调完回校，此时，刘灏已经率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屡战屡胜，成了兵团名正言顺的司令。方培泉也只能以山西大学 8·8红旗战斗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与刘灏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肩战斗了。

刘灏进京，原本该风驰电掣般的列车，突然变得喘息难行。不是因为穿越太行山的崎岖山路，也不是因为娘子关内的铁轨在一路爬坡，全部原因是恶性超载。火车的车厢里面，经太原去北京的山西各地的学生们淹没了真正的乘客。他们是无须买票的天之骄子，是三晋大地上将要主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革命小将。虽然如沙汀鱼罐头般拥挤，但亢奋的学生们却不知疲累，心中涌动着革命的豪情壮志，脑海中浮现着将要到来的那最幸福的时刻。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世界革命的心脏，红太阳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毛主席已经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过全国各地赴京的革命学生了，从全国各地继续涌向北京的学生们，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和接见！

刘灏也挤在一节车厢里。身着旧军装，腰扎武装带，臂上戴的是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红袖章。他觉得突然间变得“成熟”多了。除了希望这次进京能赶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外，他还怀揣着袁振写好的申诉材料，最好能在见到毛主席时，亲手将这些材料送到毛主席手上。但他又琢磨着，如果毛主席接见来京的学生们，自个肯定上不了天安门城楼，挤在天安门广场上，怀里的材料是送不到毛主席手上的。那又该怎么办？他闭上双眼，想象着那一个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想象着那一张张曾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过的熟悉而又陌生

的面孔：邓小平、薄一波、李雪峰……想象着见到这些人时，如何能把袁振的冤枉说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比较实在的想法，能见到他们，一定比见到毛主席容易多了。他们如果能把袁振的申诉材料再送给毛主席，袁振的冤案岂不是一下子就翻了吗？对，只要他们收下材料，就跟他们提出给毛主席转送这些材料的请求……

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正踏入一摊日后欲拔不能的烂泥淖。他更不会明白，自己下定决心要“保”一个，就势必要去“打”一个的道理。他也无法知道，袁振寄希望的那些大人物，此时的命运比袁振并好不了多少。而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用心，他这样一个高中生的理解，也只是仅仅停在报纸的那些宣传口号上。正因为不知道不理解的东西太多太多，无知者也就无畏了，此番进京的中学生刘灏可谓胆大包天。

下了火车，到了北京，只匆匆望了一眼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就直奔中南海而去。面对党中央所在地，中国革命的心脏和世界革命的中心，红太阳毛主席生活的地方，看着中南海大门两边笔直挺立着的解放军卫兵，刘灏的心中确实没有一点儿顾虑。就凭这一身装束，太原市委的大门不是直进直出吗？那个年头，学生们臂上的红袖章，就是横行于天下的特种通行证。然而，中南海可不是太原市委大院，“红袖章”唬不住“红领章”。以绝对标准的立正姿势分立大门两边的解放军卫士，及时伸出手臂将刘灏拒之门外。

“干什么？”

面对这声喝斥，他不禁一愣，可是“红袖章”并不怕“红领章”，刘灏不顾一切地振臂高呼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偏偏站在这里的“红领章”不吃这一套，管你是喊“无罪”还是“有理”，请你到一边喊去，要想进去，没门！刘灏不得不服软了，但柔中有刚，想继续和“红领章”纠缠下去获得机会。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我要找邓小平总书

记,我要给袁振翻案……”

把守着党中央心脏的卫兵反正是不让他前进一步。这时,从门里传达室又出来一位解放军,抓住好机会,他又想和人家展开大辩论。在学校里练就的那张嘴巴即刻鼓唇摇舌,一遍又一遍地说开了袁振问题的重要性,自个要去找邓小平总书记的重要性,以及这些重要性,对太原和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能否搞好搞彻底所具有的更加重要的重要性。

那位解放军终于不耐烦了,又急又气。急的是这位红小将难于打发走,气的是这位红小将的政治嗅觉怎么这么迟钝?他大声打断刘灏的话,劈头来了一句责问:“你也不看看这几天的报纸?”

“废话!不看报纸能搞文化大革命?”

人家便进传达室取出一张《人民日报》来扔给他。又指着报上一段消息说:“你好好瞧瞧。”

他仔细一瞧,果然就瞧出了名堂,原先排在前面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名字,现在排在了后面。排在后面也可以找嘛,他还想纠缠,看来那位解放军是不便也不想再和他说什么了,只是板起面孔,催这位太原来的红小将快快离开。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打倒刘少奇和打倒邓小平的大标语从北京刷到了全国,刘灏才明白那位解放军让他看报纸的真正用意。

无法进入中南海的刘灏,只好沿着中南海的红墙徘徊。企图能找到一处缺口,或者一处矮墙,他把党中央的所在地想象成普通的民间大院了,自然无机可乘。原先以为给党中央送份材料容易得很,没料到连党中央的门也进不去,18岁的中学生原先挺拔的腰杆顿时萎缩了,那神态,再没有了在太原时的威严。突然间,他看见一辆黑色的红旗小轿车从长安街上急驶而来,在拐向中南海的大门时减慢了速度。喜出望外的太原红小将灵机一动,急步向前,弯下腰身,想躲在小轿

车旁边蒙混进去。中南海的卫兵长的是一对火眼金睛，刘灏的这点儿小把戏岂能得逞？

“好啊，又是你！”他被一把揪住了。

“我要向党中央反映问题，我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发起人……”

卫兵这一回只好把他带进传达室。他又见到了那位给他报纸看的解放军。那位解放军看来不想再和他多纠缠了，大声问道：“你不是要反映问题吗？有材料没有？”见面前的中学生从怀中掏出了材料，人家便接过去，又爬在桌子上写了几下，给刘灏递过来一张盖着公章的收条。收条上，把接到的材料题目名称，共有几页，写了个明明白白。

刘灏清楚，再待下去也没有用了。他只好满怀希望地望着这位解放军，大声说：“谢谢您啦，您可一定把材料给转上去呀！给哪位中央首长转，材料上全写着名字呐！”

从北京败北回到太原的刘灏，带给袁振的是一个连他也极不满意的结果。但袁振却一句也没有埋怨这位为他主动效力的中学生。市委第一书记自有洞察政治风云的眼力。看来，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已经被揪出来的“彭、罗、陆、杨”上面，还有一个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那么，山西呢？我袁振不是黑帮，那么，谁又是黑帮呢？

这里面的道理，经袁振一点，刘灏就能想透。

【5】二上京城顺路搅了批斗王震的会场

先贴出一张张省委迫害袁振的大字报，太原五中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在太原街头亮相了。为市委书记袁振翻案，使刘灏在太原开始有了小小的名气，但也有种种小道消息，说这个太原五中的中学生是袁

振的女婿，是个一心要保老丈人的小保皇派。那一天，在市委机关大院，刘灏因为带人贴大字报（自然还是袁振如何受省委迫害的内容）而受到对立面观点人们的围攻。有人就硬要说他是袁振的女婿，让他觉得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正发愁寡不敌众的刘灏，突然听到有人挤进人群帮他。是位大学生，胸前的校徽上，刻着“太原工学院”。“文革”中的群众辩论是绝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彼此喊来叫去，那位大学生拉上刘灏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出了人群。互相通报姓名以后，对方问刘灏：“你同意炮打省委？”

刘灏头一昂：“我为袁振翻案，就要找卫恒算帐。”

“你有卫恒的材料？”

“我有袁振的材料，里面有卫恒的问题。”

“这样吧，我们替你为袁振翻案，你与我们一道炮打省委，怎么样？”

“好，咱们就一起干。”

这是刘灏杀上社会后结识的第二位大学生，他就是太原工学院拉起瑞金革命造反战斗队的队长宋捷。一起干的第一步，就是这位大学生同意与刘灏一道再上北京，替袁振送申辩材料。

二上京城，刘灏身边有了一位大学生战友。中南海是绝不去了，去了也进不去。好在袁振又提供了几位在京党政军首长的地址，袁振说那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是他的战友，只要见到他们，托他们往上递材料，材料即使到不了毛主席手里，也准能到了林彪和陶铸这些大人物手里。可是，出师依旧不利，大人物们的住地倒是不难找，但往往是只能见到他们的秘书，秘书们也总是异口同声，说首长们很忙，这些日子根本不回家。虽说秘书们都收下材料了，但这回收下的材料和上回中南海传达室收下的材料一样，天晓得是不是又要石沉大海呀？待一一送罢备好的材料，一路闲走，两人竟来到了农垦部的门前。啊



“文革”初期流毒全国的群丑图

呀呀，里面正开批斗王震的大会呢！满院子的大字报，不但要打倒王震，还要火烧，还要油煎呢。王震是什么人？相随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心中的王震将军，是南泥湾359旅的旅长，是共和国的功臣和一代英豪，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批斗起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王震呢？几乎没有商量，从太原来京的这一名中学生和一名大学生就结伴冲进了会场。刘灏给袁振翻案没有结果，同行的大学生炮打省委也没有结果，一肚子怨气正无处发泄呢，两人冲到台上又喊口号又跺脚，把批斗王震的会场搅了个乱七八糟。老将军王震当时肯定弄不明白，恐怕日后也无法弄明白，从哪里跑出这么两个学生娃娃来，做了他的一次保皇派。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革命教育，使学生们的心中积淀着对党的领导人的感情，而已经走上神坛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造反烈火，又使学生们将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人。冲击农垦部的批斗会去为王震鸣不平，是出自前者的感情，在山西炮打卫恒，是出自后者的狂热。似乎是矛盾的，但那时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们，又有谁不是这

般着了魔一样的混合体呢？对领袖的敬仰和热爱，可以使他们转化成对副统帅林彪、对中央文革小组、以及其它他们认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首长们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可以转化成对刘少奇、邓小平这种被林彪、江青和康生之流称为“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以及各级党政部门中那些“钻进党内的大大小小走资派”们的仇恨和愤怒。当然，这种判断的标准是模糊的，是没有原则的，也是随着各自派别的不同利益，或者随着毛泽东手下那个中央文革小组的各种鼓吹和支使，而不断进行着变化。

二上京城为袁振送材料，还是没有结果。两位小将躺在京城的革命师生接待站里，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袁振商量如何翻案，一位是想急着回去与其他战友们商量如何炮打省委。反正在北京玩不开，还是回山西就地闹革命去吧。刘灏京城败北，想要见到的中央首长一个也没有见到，为了赶回太原向袁振交差，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几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自然也没有赶上参加。

要说刘灏此行的最大成绩，那就是太原五中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从此和省城大学的造反派们真正联手了。他将要组建起来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里，真正有了大学生的队伍。

【6】太原的官办红卫兵兴起

在刘灏忙着去北京替袁振送翻案材料之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年8月5日，毛泽东以非常手段，在中南海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向全党的高层干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点明了自己亲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打击对象。一位执政党的领袖，用这种方式，取代了党内民主。

和全国各省一样，山西省委书记处的书记们，那时也并没有洞察

党中央最高领袖的政治意图,更不知省委日后的命运,他们还在想着如何尽力加强领导,继续做好发动群众的动员和安排,将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连连出招,分明是不容各级党委和政府按部就班地搞下去了。

8月13日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也就在这一天,太原重机学院革命造反的学生共40余人,打着蓝灰色大旗和白纸黑字大标语,到省委来造反。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在会议室里接待了他们。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时任省委机关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窦凯,责问学生们为什么不打红旗而要打这种颜色的旗?当他与学生们辩论时,有的机关干部夺下了学生们打着的蓝灰色旗帜,从而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对峙。前来造反的学生们认定这是省委在压制学生运动。省委当即派宣传部副部长解玉田用汽车护送学生们回校,之后又派出宣传部部长卢梦,领着窦凯到太原重机学院作检查,并力图做工作说服学生们平息事态。这些领导被学生围攻后,省委又派主要负责人王谦、王大任前去,也同样受到围攻,直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亲自出面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宣布罢了窦凯的官,此事才算告一段落。在山西,先由造反派起来造某个当权派的反,然后再逼省委罢去此人的官,从此开了先例,并成为运动初期的一个特征。

1966年8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大会,在致词中给毛泽东主席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伟大”。林彪则站在毛泽东身边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号召全国的革命小将们:“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同

时号召全国的革命师生,要起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接着林彪在讲话中大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一千多名从各地来京的学生代表作为特别客人,被请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与他们心中的红司令毛主席一道检阅游行队伍。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红卫兵领袖宋彬彬,把一个红卫兵袖章戴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左臂上,老人家欣然接受,在广场上百万学生们的欢呼声中,党的最高领导人公开做了红卫兵的“红司令”。首都自发的红卫兵,遂成为官方支持的红五类学生组织,出现在全国。8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的社论,第一次提出:“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从此,全国媒体和人们在各种文章和各种讲话中提及毛主席时,前面必定要加上由陈伯达发明“三个伟大”,又被中央文革小组整合成“四个伟大”的副词。也就在官方主要新闻媒体报道毛主席首次接见首都百万革命师生的报道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由以往的第二位被排在了第七位。

红卫兵们首先在北京制造了红色恐怖。北京的一批干部子弟公开鼓吹“血统论”,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对所谓黑五类的迫害,也由京城向各地弥漫。北京的一位年轻工人遇罗克,针对这种“血统论”,写了一篇题为《出身论》的文章,登在一家中学生们创办的小报上,对这种血统论作了批驳,结果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大毒草。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对敌斗争大会上,被宣布死刑,并立即执行,年仅27岁。

最高领袖当了红卫兵的红司令,使北京红卫兵组织的造反行为

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们掀起的红色恐怖,让基层的党组织似乎看到了运动的方向。山西省委与全国各省省委一样,也很快做出了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的表态行动。8月20日,由山西省委出面,在太原市五一广场召开了有15万人参加的“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从北京二十六中来了三名红卫兵蒋战生、郑晋华、金嘉纳,受邀站到了主席台上。站在主席台前最光鲜、最得意的队伍,就是太原五中、十中、三中、六中、十二中、十五中、山大附中、育英中学、太原第一化工学校、太原第一机械工业学校等中学和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这些学校的红卫兵队伍,都是由学校党委或支部组织起来的。学校党委或支部已经被冲垮的,比如六中来的红卫兵队伍,则是由上级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支持和组织起来的。

省委、省人委、省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要求“革命群众要发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他指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十六条’,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区分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他还寄希望于全省各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们:“当前,我们革命师生的主要任务是要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一斗二批三改,(孙涛注:此为“十六条”的规定,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完成这个任务是很光荣很艰巨的……”

卫恒讲话后,太原三中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全市红卫兵,登上主席台宣读了红卫兵宣言。显然,当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还在极力想把已经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然而,想让革命师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造成那种政治氛围中,不要走出校门,“主要”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实在是山西省委第

一书记当时的一厢情愿了。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已经传遍全国。而按林彪的讲话精神，打倒走资派、保皇派和破四旧，成了搞好文化大革命的两项主要内容。当刘灏这样的中学生们把造反矛头对准省委，要省委给袁振平反时，另一批中学生们在各校党支部的领导下，也组织起跨学校的官办组织，他们便是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关于这两个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本书将在第三章中作详细叙述）还以五中为例，学生们参加刘灏的那个井冈山造反兵团，不论出身，只要观点相同，即可戴上这个组织的红袖章。可要想加入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或者山西红卫兵团，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要由学校党支部审核具体学生的家庭成份。凡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家庭者，属于红五类，可以参加。与所谓红五类对应的，则是所谓的黑五类，即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家庭成员中有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者。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非但不能参加这种官办的红卫兵组织，而且是这种组织打击和专政的对象。这两个官办红卫兵组织的最大特点，是以太原市主要重点中学出身红五类的中学生们为主。如五中、十中、六中、十二中、十五中、三中、山大附中、育英中学等。“文革”初始，中学的党组织还在掌控运动，他们支持这些官办的红卫兵组织批斗教师，搞红色恐怖，在太原市刮起了迫害黑五类和大破四旧的“红色风暴”。以太原十五中为例，一批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在学生领袖白遂生带领下，组建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而随后产生的红旗兵团，发起人高三学生常理正虽然也是红五类出身，则反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倡导的血统论，反对批斗老师，将矛头对准了学校走资派，出身不好的学生们，也可参加这个组织。随着运动的发展，常理正领导的十五中红旗，就受到十五中大多数学生和教工的拥护而成为多数派。其他中学两派的形成，情况大抵如此。

【7】破四旧：红卫兵虔诚的恶行

1966年8月23日，太原机械学院的红卫兵发出了《致全省红卫兵、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的公开信》，倡议在省城和全省迅速掀起一个大破四旧的造反高潮。8月24日的《山西日报》第二版全文刊出了这份公开信。

也就在8月23日这一天，太原十中红卫兵们，砸了位于解放路的太原天主堂，成为当时省城破四旧的一次革命造反大行动。

早在清同治五年，也就是公元1866年，由意大利人江类思主持建成太原天主教堂。清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10月，在太原兴起的义和团，将这座教堂焚毁。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元1902年7月16日，罗马教廷又派意大利人凤朝瑞到太原任山西北境教区代牧主



1966年8月23日，太原天主堂神职人员站在水坑中，被十中红卫兵批斗。

教。凤朝瑞主教到任后，立即主持并筹集资金，重建了现在的太原天主教堂。公元1941年，凤主教患病去世，因感念他建堂的功劳，在广大教民的请求下，经罗马教廷特许，把他葬在了教堂里。

文革开始，太原十中的干部子弟

率先成立了红卫兵,支持党支部领导文化大革命。后来,另一些同学成立十中七一战斗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对准党支部,而且杀向社会,开始造省委的反,将十中的官办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这些红卫兵为了表示他们的造反精神,在8月23日,聚众冲进太原天主教堂造反。他们砸了祭台、砸了神像、砸了大厅里的管风琴、砸了大厅里摆放的各种精美瓷器、同时批斗殴打十多名神职人员和二十多名修女,对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修女也不放过。在对他(她)们的殴打和拷问中,得知大堂地下还安葬着一名外国主教时,这些红卫兵们当即决定,要掘出这个“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起先他们自个挖,后来又命令现任大主教李德华,带领他的神职人员们挖。第三天头上,风朝瑞的墓终于被掘开,经十中红卫兵领导组决定,将风朝瑞的尸体装进一个木箱子,运到旱西关外的灰渣坡上,泼上汽油焚烧了。在这次红卫兵的恶行中,有两名修女因被打伤内脏,不幸离世。

当年的当事人之一李青云在年愈花甲之后,为求得心灵救赎,对年轻时那次虔诚的恶行,写出了回忆和忏悔的文章。那场革命释放出无数的人性之恶,当许多恶行的参与者一直集体沉默时,李青云坦诚的回忆,让后人了解了当年红卫兵在太原天主堂破四旧恶行的真相。他真诚的忏悔,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救赎,也一定能得到历史老人和当年受害者宽恕的。

当时,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以南城区和北城区划分,称为南纠和北纠,多为各个中学内的军人子弟为骨干;十中红卫兵砸了天主堂后,在里面办了个破四旧展览,并成立了红卫纠察队,自称天纠。1967年的1月12日刘格平率领省城造反组织向山西省委成功夺权后,将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其属下的南纠和北纠都打成了反动组织,十中的那批官办红卫兵们,大多投奔了十中的七一战斗队。3月的一天,杨承孝带领他的决死纵队,扫荡了这两个红卫兵组织的所在地,同时进

驻解放路的天主教堂,将此处做为他的指挥部之一。曾被红卫兵们展出的那些“破四旧成果”,也就下落不明了。

当年官办红卫兵们的破四旧,反对者不敢阻挡,困惑者不敢言声,围观的群众,体现着国人阿 Q 般的“革命”心理。在党媒的宣传报道中,全是为小将们的行动叫好、鼓劲。《山西日报》在 8月 25 日发表了题为《向英勇善战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为让今天的读者看出官方当时的导向,现摘抄几句如下:

红卫兵小将们干得好!你们作出的成就,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

红卫兵小将们英勇善战,充分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的照耀和滋润下的青年一代的革命精神、革命气魄、革命智慧、革命威力。

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率领下,红卫兵小将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在开创着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当时的《山西日报》还在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省委掌控之下,这样的社论,无疑也是省委当时的认识。

柳巷、钟楼街、桥头街一带,是太原古城最有名的商业街区,也是那时省城最繁华的闹市区。像“双合成”、“六味斋”、“清和元”、“开明照相馆”、“认一力”、“老香村”等众多的晋商老店,牌匾统统被太原各个中学的红卫兵们砸掉。店家被迫将店名改成了诸如“东方红某某店”、“工农兵某某店”、“红星某某店”等。在破四旧和横扫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中,无数出身不好的市民和公职人员、历史上为阎锡山政权服务,解放后留用于新政权的公职人员、曾被打成右派的干部和教师、全部被划入了牛鬼蛇神行列,随时被批斗,被遣返。特别是 9月

份，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提出“扫尽一切牛鬼蛇神庆祝国庆”的口号，太原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也贯彻省委省政府精神，提出了“干干净净迎国庆”的口号。在各级党委和党支部领导下，在公安局和派出所的配合下，全市各部门、各厂矿、直到街道居委会，红五类们都戴起各种名称的官办红卫兵袖章，奉命行事，与学校的官办红卫兵们一道，掀起了驱逐牛鬼蛇神的新高潮。在太原火车站和太原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大批被官办红卫兵们揪出后，勒令遣返老家的牛鬼蛇神们。他们脖子上挂着木板或纸板牌子，上面写着“反动地主”、“反动富农”或“地富狗崽子”、“大右派”等字样，标明其历史污点和黑五类的“贱民”身份。

省城知名作家、太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田毅先生，写下了一段他父亲的经历：

在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发现气氛有点不对，父亲在床上躺着，母亲说他正发着高烧，一问，才知家里出事了。原来那天下午父亲被厂里的红卫兵押着回来，言称，根据形势要求，身背着“历史问题”的父亲将被遣送农村老家去劳动改造……我一听就有些慌，忙问结果怎样？母亲说，你爸的情况原本就属内部矛盾，几次运动审查都已有结论，根据哪条都不符合条件。但人家不管这些，认定你有问题你就有的，没法讲理，也不敢说。当父亲被带到派出所去下户口时，当场就让派出所的人给压住了。据父亲回来讲，办户籍的把厂里人叫到一边，责怪他们不懂政策，怎么不够条件也给带来了？你们厂凑数啊？胡闹嘛！……那天恰好是周末，也感激当时坝陵桥派出所那位负责的民警，毕竟还有良知和正义存在，那个民警在最关键时拉了父亲一把，人家替政策把了关，带来的却是让我们全家人躲过一劫，不然，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在我记忆里，“文革”开始时那场冲击声势浩大，父亲他们厂被遣送回农村的有好几个都不够条件，却因为点名早一点，莫名其妙就被遣返农村了。其中一个在解放前仅以钉鞋为生，却背了个资方人员的名声，只因当年用五块大洋在一家商行入股，原本是想到年末分点红，不曾想却被当成资本家赶回了农村。与父亲同在厂里工作一位资方人员，姓边，五台人，他被遣返时，脖子上还给挂一大牌子，自己的名字上还打了大大的红×，他的老婆见此情景吓得尿了裤子，顿时心脏病发作，当场就挂了。结果是，人还未走，先办丧事，连棺材都是用厂里的铁皮凑合做的，临行前那人老泪纵横，却也无理可讲，只得匆匆将妻子埋掉，回乡去了。

公安局派出所也参与了“横扫”，可见“横扫”的官办色彩。当时太原市加上县区农业户常住人口为1,179,489人，太原的城市户口人数不足八十万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太原市组织史资料(1924—1987)》(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组织部、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山西省太原市档案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出版)

记载：当时太原市“‘文革’初期被遣



十中红卫兵1966年8月23日到太原天主堂造反时，命令时任主教李德华率神职人员挖1941年逝世的前主教风朝瑞的墓。

送回农村的人员达 11,435 人,随行家属 15,444 人。非正常死亡 671 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 24 人。”当时省级机关被如此处理的干部、职工有多少?我没有找到官方的记录。如上面所记田毅父亲一类受到冲击的又有多少人?更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了。

在这种“红色风暴”中,如一代晋剧大师丁果仙的家,竟被来自不同学校的红卫兵们先后抄家达 11 次。

太原机械学院地处太原北郊地面的烈石寒泉处,附近有窦大夫祠,祠侧有中国同盟会老会员、中国国民党老党员、阎锡山的老师赵戴文先生的墓地。机械学院发出倡议书的那些红卫兵学生们,把他们的红卫兵组织,比作当年林彪所统帅的“四野”大军。当年,“四野”由东北入关,在打垮国民党统治的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可这伙自持有红色血统的学生们,却去窦大夫祠造反、破四旧,先砸了那位春秋战国时代曾为民造福而被后人祭祀,由唐代工匠塑造的窦大夫塑像,顺便把赵戴文先生的墓碑也一举砸倒,以示其革命决心。

山西大学体育系的一些红五类学生,勒令系里的所谓牛鬼蛇神老师们穿上西服和皮鞋到大操场集合,再将他们的西服用剪子剪破,把他们的皮鞋捅烂,让他们在烈日下请罪。

山西财经学院的一些红五类学生,举着红卫兵大旗,杀向红土沟的南十方院破四旧。这座寺院一侧不远处,苍松翠柏中,有二十余座安葬高僧的塔林,这些红卫兵用拔河用的粗麻绳,套住这些墓塔,喊着革命口号,将其拉倒。南十方院亦称白云寺,寺中历代存留的木雕泥塑,也被这些学生当作四旧统统砸烂。

唐代名相狄仁杰故里是太原狄村,此村有狄梁公祠。来这里破四旧的那些红卫兵,与一些要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村民们(他们自然也是出身贫下中农的后生们)一道,把康熙年间由阳曲县知县戴梦熊撰文的那尊大碑砸碎,再将碎石填入了一口枯井。

省政协的原国民党起义军官、民主人士，被太原市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的官办红卫兵们揪出来先殴打，再拉到大卡车上，游街示众。

当时在太原市商业局办公室任干事的老干部徐忠诚先生回忆，他们局机关干部不足百名，被挂上牛鬼蛇神牌子驱逐出太原的就有 10 多名。其中有个干部并无什么可揪的辫子，因名字叫效石，被红卫兵说成是要效忠蒋介石，并以此罪名，将其驱逐出省城。

当《山西日报》点了太原六中党支部书记和校长的名后，六中红卫兵对校长马培云的迫害升级。一些自诩是红色血统的学生们，在校内绕足球场的一段跑道上铺上炉渣，将他们的校长押来，命其挽起裤子露出双膝，跪在炉渣上认罪，炉渣的尖角扎入马校长小腿和膝下，血迹斑斑，马校长疼得头上大汗淋漓。几天后，这位儒雅的校长，在家中一头扎进水缸，自溺而亡。

太原三中教导处干部张治中，历史上曾参加过国民党，在被官办红卫兵们当作牛鬼蛇神揪斗凌辱后，回到教导处，用两只筷子插入自个的两个鼻孔，再用力借桌面将筷子猛然顶入头部，七窍大出血而死。

太原一中校长郝春和，是一位儒雅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在晋西克难坡建立了第二战区司令部，郝春和出任了克难中学的校长。解放后以民主人士身份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被任命为太原一中校长。“文革”初红色恐怖中，他先是被起来造反的学生们揪斗凌辱，被群众专政。直到军宣队进驻学校，一直被关在学习班随时接受批斗。熬到 1970 年 5 月，老三届学生已经离校，1969 年入学的初中生们复课闹革命，由校方组成新的官办红卫兵纠察队，继续揪斗凌辱老校长。1970 年 5 月 20 日上午，在被一群十五六岁的娃娃们殴打揪斗，被勒令读校园内污蔑他的那些大字报后，年方 55 岁的郝春和校长，从年轻时就立志教育救国的那颗心，面对如魔鬼附体般的孩子们，一定彻

底崩溃了。中午，他在关他的囚室中，先如上述张志中先生那般自残，再跳楼，在忍受了五年生不如死的煎熬后，结束了自个的生命。

地处晋源镇的太原二中，占用着古太原县城的文庙。“文革”开始，大成殿前后左右的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许多老师被揪到这里批斗。语文老师刘文秀的“罪名”最大，啥罪？他和“三家村”的吴晗有书信来往。刘文秀是位爱钻研的老师，曾给吴晗写信，探讨一个学术问题。吴晗有回信，很长，和他商榷了这个问题。刘文秀将这信给别人看过，红卫兵抄家，就抄出了这封信。吴晗的亲笔信，成了白纸黑字的“罪证”。几经批斗，刘文秀被斗得死去活来。终于，在一个晚上，他在单身宿舍外的一棵合欢树上，自缢而死。

当我记述下这些悲惨的场面时，我能感到，我的文字正浸在一片腥红的血泊中。此种惨状，当时不知有多少。这些自持是红五类的中学生们，还有一些自持是红五类的大学生们，他们在制造红色恐怖时，已将灵魂交给了魔鬼。

太原十五中教师张厚余先生，曾回忆过“文革”之初，他和一些老师受迫害的情景：

1966年夏天，我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太原市十五中学任教。八月初的一天，我刚带领一个班的学生学农回来，一进校门，就在醒目的墙头，看见要把我揪出来示众的大字报，我的名字上，打上了红××、名字前，冠上了漏网右派的帽子。接着，我就被一伙红卫兵挂上黑牌，戴上纸帽，拳打脚踢推扯着拉到锅炉房附近的煤堆上去体罚，倒运如山的煤堆。倒煤的已经有十几二十位老师。煤粉飞扬，汗流浃背，周围被手执钢丝皮鞭的红卫兵们呵斥着，辱骂着，殴打着。一位女老师晕倒了，躺在煤堆上，口吐白沫与煤粉混在一起，红卫兵们立刻骂她装死，继续抽打。一位老校长累得跌倒了爬不起来，眼镜也掉

进煤堆里，爬着四处寻找，半天也起不了身……一直苦干到天黑，人人都变成了黑人，鼻子耳朵眼睛里全是煤粉，和汗沾在一起，面目全无。从那天起，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们，便被红卫兵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八月十八日伟大领袖登上天安门，全副戎装，臂戴红袖章，以红司令接受广场千万红卫兵万寿无疆的欢呼和热泪盈眶的膜拜，并为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于是，红卫兵们便如虎添翼，更刺刀见红。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们，给女老师剃阴阳头，用匕首顶着喉咙让老校长交代，五花大绑着几位班主任逼他们跪在地上，质问为何迫害贫下中农学生……我们的团委书记被红卫兵头头用大头军用皮鞋一脚踢到小腹，半天休克不醒，几乎毙命。一位从军校来的职员被脱光下身，在操场当众击打臀部，皮开肉绽，血流地上……牛鬼蛇神队伍越来越大，多至三十多人，吃饭唱嚎歌，日夜牛棚斗，家家都被抄，书籍书画尽为封资修，操场烈火俱焚烧。前校长被揪回操场，垒桌叠凳，弯腰低头，以喷气式在骄阳下挨批斗，有红卫兵一蹬桌腿，从高凳上摔下来，一时昏死无声……此后，好几位老师被勒令滚回原籍，扫地出门。

学校和机关如此，农村也不平静。太原市金胜村的红卫兵们，先是把村名改为工农兵大队，又几次发出各种通令。有位村民，保存着当年红卫兵们的《最后通令》，全文录下：

最后通令

一：八类分子（地、富、反、右、贪污、盗窃、四清中和文化大革命中有问题、黑帮）居住的好房屋，立即调换给贫下中农和革命的社员居住。

二：黑八类的生活水平，必须低于贫下中农的生活水平。

三：黑八类必须交给革命群众管制、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拒(原件如此,应为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严加惩办。

四:周昇家送奶,只许记工,不准挣现金。本月执行。(奶照常送)

五:今后一律不许上坟、做寿、做满月、大办红白喜事、大摆酒席、否则严加惩办。

六:凡 25 岁以下的青年,立即禁烟禁酒。

七:凡是戴帽子的四类分子,从明日下午起,必须在胸部右则(原件如此,应为侧)戴上黑布白字的四类分子标签,否则严加惩办。

八:流氓、地痞、二流子及一切狗崽子们,今后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耍活(原件如此,应为滑)头,否则严加惩办。

另外,警告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王八羔子们,决不许你们乘机捣乱,如胆敢有点风吹草动,立即严加惩办。

工农兵大队红卫兵

1966 年 9 月 8 日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再赘述。还需要提及的是,红卫兵们批斗校领导和老师的同时,也在互相残杀。省作协驻会著名作家张石山在 2009 年于台湾秀威资讯出版的《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一书中,就曾回忆过“文革”初期他在太原三中的一件往事:

“文革”之初,我就陷入了一件令人恐惧的“反标事件”中。运动初起,学生们响应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给一名教师写过一张大字报,题目呢,叫做《砸烂这条大疯狗》。草拟题目时,是在一张报纸上用钢笔涂写的。而最初的大字报,也都是用报纸抄录。但那时的报纸,几乎满篇都是毛主席的相片御影。我的那钢笔字迹恰恰就写在主席像的背面。大字报脱落在地,有位同学不让主席像任人践踏,端端正正剪了下来。说多巧有多巧,“砸烂这条大疯狗”几个字,可可整齐排

列在主席像背面。这还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标？

班上，几位“自来红”同学，即刻上报中学党支部。党支部指导学校“文革”运动，还没有被“文革”运动砸烂；张石山象犯人似的，被递解到支部办公室提审。

当时，我向学校党支部写了情况说明。提供了在场证人。

不久，学校领导被打倒，反标事件不了了之。但事情一直没有正式结论，我的头上高悬万人斩一柄。红卫兵大串连，我因此受到了影响。同班同学，从准备出发的队伍中揪出了我。勒令带队的支左部队营教导员，当众宣布开除。

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当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以后，他们的子女也由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里的中学生们，很多人的身份便因这种改变，有的成了“保爹妈派”，有的成了“逍遥派”，有的加入了其他组织，这两个官办红卫兵组织也就解体了。

【8】五中井冈山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虽然在太原五中也有下属成员，但在五中将红色恐怖掀起高潮的，还是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刘灏的井冈山造反兵团在学校渐渐坐大时，1966年8月25日，该校又开大会成立了官办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当时，从北京二十六中来的三名红卫兵蒋战生、郑晋华、金嘉纳，到太原五中串连，策划组建起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党总支表态支持，提供钱印传单、做袖章。黑五类子女被排除在外，刘灏和他的井冈山造反兵团，也被排除在外。北京来的红卫兵将太原五中改名为太原红卫第一中学，发表了

《致全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弟的公开信》。五中一些小组织中的红五类学生，以初中生居多，纷纷参加了这个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给全校师生的公开信如下。从这些当年的传单上，我们依旧可以嗅出当时学生们那种虔诚与疯狂。

亲爱的阶级战友们：

在我们最最敬爱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子弟，眼光最敏锐，旗帜最鲜明，斗争最勇敢，革命最坚决。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是党的亲生女儿，我们是在革命大家庭中生，在五星旗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党和毛主席非常关心我们，对我们寄有无限希望。

我们的父兄是紧紧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浴血奋战，出生入死，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我们对党和毛主席最热爱，最忠诚，我们的心中只有革命二字。我们每个细胞里，每一根血管里，都沸腾着我们父兄的革命热血。我们没有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忘记阶级仇，我们没有忘记敌人在我们父兄身上留下的伤疤（孙涛注：巴为疤之误，原文即此）鞭痕；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父兄坐穿了铁牢，坐碎了老虎凳（孙涛注：登为凳之误，原文即此）和洒在万水千山上的血迹；我们没有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生活。我们一定要保住我们革命前辈打下的江山，夺得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党中央和毛主席亲手交给我们的大权，一定要握得紧紧的，掌得牢牢的，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对谁，坚决反到底。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我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一斗二批三改三大革命任务，共同紧紧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一起战斗。

亲爱的战友们，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参加自己的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主义。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肩并肩，手携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毛主席新开辟的航道上前进！前进！！前进！！！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
万万岁！！！

太原红卫第一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1966年8月25日

成立大会上，北京来的三位红卫兵代表，登台表示加入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其中一人，激情宣读了对五中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贺词，其他两人，将早已印好的贺词传单当场散发。贺词如下：

红卫一中全体红卫兵战友们：

这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今天红卫兵在你们学校诞生了！我们以红卫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的名义向你们亲密的战友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限殷切的期望寄寄托在我们身上，把未来的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重担寄托在我们身上，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是红五类的子孙，我们的血管里奔流着革命的血液，我们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燃起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反的熊熊烈火，大立起

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句话，大立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刀山敢上，火海敢过，敢造反，反到底！永远跟着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战斗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砸烂旧世界，建设新未来！

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主义的光辉照耀下，一切愿意革命的人们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红卫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战士：蒋战生、郑晋华、金嘉纳

8月25日

在当时的形势下，仍在艰难维持工作的五中党总支，不得不支持北京来的红卫兵到五中串连，并支持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开成立大会，散发传单，将五中更名为太原红卫第一中。但令党总支书记王振东想不到的，是这些红卫兵们除了要破四旧和鼓吹血统论外，将他也打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在这个成立大会上，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代表登台发言，那真是杀气腾腾。这讲话也印好了传单当场散发，为后人留下了历史记录。摘抄一段如下：

红卫兵是无产阶级的造反队，红卫兵战士要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已经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一定要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个乱乱的，越乱越好；

对于我校以王振东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就要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资产阶级的右派先生们，我们这群造反之众，有领导，有武器，有组织，来头不小，声势浩大，切不可等闲视之。

我们的领导是伟大的党中央和毛主席！

我们的武器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的组织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

撼山易，撼红卫兵难！

传单纸早已发黄。这种口号式的行文风格和形式，也早已淘汰。但后人却可以从这些文字中，看到当时学生们虔诚的心态，和疯狂的举动。

如果说，以前五中有学生们批判老师，还停留在大字报的漫骂上，现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则要施展拳脚和皮带了。钱仁泽、任佩、唐希禹、马复兴、马茂德、程权、蒋彦和、张国瑞、沈其晏等一批教师，首先被这些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践踏在脚下。

先讲讲钱仁泽老师的故事。这位老师的父亲是南京政府的钱大均上将。钱大均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曾任黄埔军校代总教官。抗日战争中，曾任南京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南京政府任军政要职，1949年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在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历史上曾被称为蒋介石的八大金刚之一。钱大均撤台前，要安排他的长子钱仁泽一道同行，但钱仁泽拒绝父意，坚持留在大陆要为新中国服务。他代的物理课，很受学生们欢迎。为了统战工作，国家有关部门通过五中党总支，让钱仁泽每个月给台湾的父亲写一封信。大陆和台湾那时不通邮，先邮海外再转台湾的转信人，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这些信写思念之情，更要写家乡变化，宣传党的政策

等等。这分明是在为党和国家工作,钱老师有时便大意了,让传达室的传达员代邮。加上父亲偶尔回信,也要先由五中传达室代收。原本秘密的事,便得到一些公开。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有人就顺理成章的推理出来了,一个胆敢常常给台湾的反动老子写信的人,岂不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岂不是台湾蒋帮安排在大陆的大特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的一些初中生,将钱仁泽老师揪到主楼前一顿毒打。除了拳脚,还用上铜扣皮带和铁锹柄,打得他口吐鲜血,连喊绕命。这时刘灏带着他的井冈山人马赶到,驱散了这些初中红卫兵,将钱老师扶起。到了井冈山的地盘,刘灏问钱老师挨打原因,钱老师才说出自个给在台的父亲写信的原委。钱仁泽晚年向我回忆起这事,依旧心有余悸,说要不是刘灏那些井冈山的高三学生出面救了他,那一次注定要被打死了。

9月初,五中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们,在主楼墙根上,贴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大字报。而这时,刘灏正与井冈山的同伴们,还有六中3211公社的战友们,一道策划支持袁振翻案的大事呢。9月10日,在市委大礼堂,他们果然办成了此事。(此事将在本章第10节中详述)到了9月12日,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大迫害达到高潮。

五中老教师沈其晏先生曾有如下回忆:

1966年9月12日,作为五中人,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个红色恐怖时期中的一个最惨烈的日子。那天,大家刚上班,红卫兵在广播里点了20多位教师的名字,勒令这些人立刻到主楼后面集合,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时我在四楼高三年级办公室,所以,等我下楼时,楼后已有先到的,毕端毕正地站着,红卫兵点了每个人的名字后宣布:你们都是牛鬼蛇神,都给我把狗头低下。然后开始训话,当然是臭骂一通,要大家把家里的钥匙都放在身前的地上,由一个红卫兵收起

来。在我把钥匙放下的一瞬间，预感到将要大难临头，要抄家了。家里一贫如洗，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唯一担心的是我写的一些文章，现已作了处理，都埋在煤堆下，所以也就坦然些，心里想，你们动手晚了一步。

由另一批红卫兵把我们这些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押到家属院中央，一字排开的站着，前面有一叠硬纸片，笔墨已经准备好，一个红卫兵头头把一个个叫到跟前数落了一番后，要每个人把自个儿的反动身份写在纸板上，有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走资派、反动权威、杀人犯等。当点到我的名字时，当然也少不了顿臭骂，说：还是个政治教师呢，臭权威，尽写毒草当语录，毒害青少年，是三家村的干将。我还愣着，不知道该写什么。正犹豫时，突然一声嚎叫，你不就是五中的小邓拓！我只好马上在硬纸片上写下小邓拓，往头颈上挂。我们这二十多人，个个低头站在院里，不时就有红卫来指指点点，好象是来发泄他们的什么深仇大恨，谩骂接着谩骂，而另一批红卫兵已经开始抄家、破四旧。家属院是五十年代盖的一个拐角楼，红卫兵们把教师家里翻出的书报以及锅碗瓢盆等家什，从一层到三层的窗口往外掷，那是恶魔在疯狂，满地狼藉不堪入目，真象当年日本鬼子进行扫荡。在几位重点抄家的家里，简直是翻得底朝天，在一家从抽屉板的背面抄出一张2000元的存款折子，在楼道晃旮里的一个烂水壶里，抄见500元现金，在门框上抄见了首饰，为了要在一位老教师家里抄见什么贵重的东西，硬逼着老夫人脱掉了内衣。还有许多难以置信的事，把人的隐私、人格尊严统统当作四旧埋葬、践踏，累累暴行也是罄竹难书。

到了傍晚，红卫兵指挥我们一行人在家属院排着队，准备参加晚上的批斗大会，看押的是一批初中的红卫兵，他们更凶残，更疯狂。我们已经不是低头，而是九十度的弯腰，两手垂直，谁要是把腰往上拱

一拱，就狠狠地挨一棍子。时间一长，谁也无法忍受，不得不动一下身体，只要谁动就是一棍子，打得又重，一阵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实在难以承受的呻吟声，此起彼伏。当时在我前后两位老师都比我年龄大得多，当然更少不了这种非人的体罚，和野兽般的暴行，在我前面的老师无奈之下，提出情愿跪下，话音刚落，反而又挨了重重一棍子，还骂人家你倒想舒服吗？又是一棍子。我后面的老师，人胖肚子大，实在弯不了，只听到气喘声和啊呀啊呀挨打的叫喊声。我幸好在他们俩中间，也年青又瘦，看起来腰拱得比他们俩要低些，所以，这天晚上少受一些皮肉之苦。我们被押到批斗会场，因为弯着九十度的腰，脖颈上还挂着牌子，几乎和押赴刑场待斩的犯人一样，会场上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脑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要不是红卫兵们的皮带在晃动，早站不住，要瘫下了。开完批斗会已是深夜，我们又被关进澡堂，被实行了群众专政。

刘灏晚上带人来到学校澡堂，先让他的战友进去看看，有没有他们的老师。听说教他们政治的沈其晏老师也在里面时，刘灏让他的战友进去“勒令”其出来。他叫了一声沈老师，说：“你回家去吧。”刘灏敢于自作主张“解放”自个的老师，就因为他也是红五类，身后还有一个井冈山组织。

刘灏和他的井冈山组织，一直不承认五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对五中的改名。再往后，当刘灏又拉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个跨行业的大组织以后，五中那些受迫害的教师们，也组建起井冈山教工支队，投奔了刘灏。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渐渐式微，继而散伙，许多人也就参加了兵团。

对太原五中的这些剖析，是想说明，一般来讲，官办红卫兵以赤裸裸的血统论为标准，而群众造反组织却不拿出身作为标准；官办红

卫兵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打砸文物为造反宗旨,以欺凌黑五类、制造红色恐怖为乐事,而群众造反组织以走资派为造反目标,极力批判打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发展成武斗和夺权;官办红卫兵的领袖们,都是红五类出身,其中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们众多,“文革”结束后,他们都没有受到清算,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女生宋彬彬便是代表,而群众造反组织的领导们,虽然出身也多以红五类为主,却大都受到了清查整肃。

【9】且看省委对运动的态度

先说说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当时运动的心态。

1966年5月中旬,中央华北局紧急通知山西省委,要调《山西日报》总编吴象,去《北京日报》参加工作组并参加编委会。改组后的编委会第一把手是原河北日报总编翟向东,第二把手是吴象。其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已被打倒,吴象匆匆到任后,难以应付剧变的形势。先是工作组被报社职工敲锣打鼓迎进来,又成了被报社革命群众造反的对象。吴象也开始受到大字报批判,说他“屁股坐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到了8月初,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卫恒赴京参会,住到了北京饭店。趁会议代表自学文件的空档,他将吴象约去,两位老战友说了许多心里话。吴象先说了自己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许多不理解,卫恒也向他说了掏心的话:“你以为我理解?同样很不理解。但你我受党教育多年,应该懂得当一个共产党员不容易,要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接受多种多样的考验,不理解的就得不断地努力去理解。”这种不理解也要努力去理解的心态,在个人迷信弥漫于党内外的政治环境下,在党内高层很有代表性。

再说山西省委。为了能将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掌控在省委领导

之下,当基层的党组织受到群众的批判时,省委还得以另一种姿态,组织全省师生批判省委抛出的靶子,同时去支持革命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各种造反行动。

不妨说几件当时的造反事例,以及省委的态度。

8月19日,全省19所大专院校共有两万多名师生,来到太原在杏花岭体育场集会造反,批斗了被省委点名的副省长王中青,将其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省委组织的一次革命造反大会,山西大学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刘普德在大会上第一个发言,在各院校代表相继发言后,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代表省委讲话,号召全省革命师生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其时,王中青还是省委派驻大同县落阵营村的四清工作队队长。被《山西日报》点名批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后,按省委通知,回到省政府接受批判,但还有自由。这次省委组织的批判大会结束,王中青又被押回机关,也不知该做啥。他还挂念着四清前线的工作,竟独自出门,也不便要小车,一路步行出了太原。这位副省长餐风露宿,步行几天后,回到了落阵营村。他来到一户农家,主人见他们的老王又回来了,急忙招呼他上炕休息,又和老婆一块动手,要给在他们村下乡的这位省里的大官做一顿待客糕。王中青在这里蹲点搞四清,待普通老百姓好,普通老百姓也待他们的老王好。可村里毕竟有人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听说被报上点名的这个三反分子回来了,当即报告了县委。县委当时还未受到造反派大的冲击,对此阶级斗争大动向,不敢怠慢,急忙派人赶到落阵营村。可怜王中青坐在炕上正准备吃顿好糕,就被县上来的人押进吉普车,直接押回了太原。从此,王中青被看管起来,再没有行动自由了。从这个小插曲,可看到当年王中青这类老干部的作风,也可看出当时社会上“文

革”运动的氛围。

8月23日，中共忻州地委召开地直机关“向文化大革命进军大会”，会场上没有悬挂国旗，会议也没有安排向毛主席致敬的仪式，忻县师范的部分学生就此当场向地委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这些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们，还在会场内外贴出了批判地委的大字报。忻县卫校的部份学生，不同意忻县师范这些学生的做法和观点，双方当场展开大辩论，会议是无法继续开下去了，两家观点不同的学生们，又各自请求声援，叫来了支持自己观点的外单位人员和其他学校的师生，文斗和武斗相互交错，主持会议的忻州地委领导们，再也无法控制会场了。8月25日，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的三百余名学生来到太原，直接到省委请愿，要求省委罢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不分昼夜，与请愿学生谈话，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请愿的学生围着省委的大门，不依不饶地坚持自己的革命造反要求。省城来省委门前的围观者和声援者，也将省委前的一条街堵了个水泄不通。无奈之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只好出面接见了这批学生，并向请愿学生建议，由忻县师范和忻州农机学校选出代表，与省委派出的干部一道，组成一个调查组，对没有落实的问题进行调查，再作出结论。但是请愿的学生们却不同意，而是要求省委必须立即罢掉忻州地委书记徐志远的官，同时在《山西日报》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对其进行点名大批判。卫恒亲自出面与这些学生们谈判，他不放弃原则，自然也就没有结果。这些学生们愤怒了，第二天就由太原涌上火车，赴北京请愿和上访去了。

8月24日，太原重机学院由一些出身红五类的学生们，发起召开“红五类子弟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要求省委领导支持并参加大会。如何来对待这种以血统划分革命界线的会议呢？省委还没有拿出意

见，自然不好表态。太原西山矿务局子弟中学起来造校长反的学生们，也在这一天串连了省城近千名大中专院校的造反学生们，来矿中一道批判校长。有造反的，就有保皇的，矿务局子弟中学的校园里，先辩论后动手，打成了一片。孩子们的事牵动着家长们，近千名矿务局的工人们也赶到了学校。双方争着，打着，又各自结队进入市区来到省委请愿。双方对矿务局子弟中学的问题各持己见，但孩子们受了制，是因为校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观点，双方倒渐渐一致了。工人直接参与学生造反和请愿的这次活动，在全省首开先河。这次活动进行到第三天，这两支请愿队伍向省委提出了一个共同要求，逼省委先罢了矿务局子弟中学校长的官再说。为了平息事态发展，省委被迫宣布撤销了西山矿务局子弟学校那位校长的职务，这次有工人参加的请愿活动才告结束。可怜一位矿中的校长，被任命时是矿党委和太原市教育局管辖的干部，被罢官时反倒成了省委的事。

8月25日，为了向全省的革命师生表态，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亲临山西的最高学府山西大学，参加了在操场上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这里“革命师生”们的斗争矛头，已不仅仅是指向以刘梅、宋华青为首的那个“黑校党委”了。你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是指示省委机关报《山西日报》，刊发了山西大学化学系五名学生的大字报了吗？《山西日报》不是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了吗？你省委既然承认刘梅、宋华青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犯了错误，镇压了学生运动，那么山西大学“黑校党委”的黑后台又是谁？难道不是你“黑省委”吗？你“黑省委”又公开在党报上点了山大“黑校党委”的名，这还不是“引火烧人”吗？这还不是“舍车保帅”吗？

大会依旧由校党委出面主持，但主持大会的，却成了由“四清”前线刚刚奉省委之命赶回学校的党委书记李希曾了。前一段主持工作的校党委主要领导刘梅、宋华青和李子康三人，先后在大会上做了检

查。待他们三人做完检查之后，卫恒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宣布了对上述三人停职检查的决定。这个决定，分明是说明在山西大学，校党委在运动中已经犯了错误，省委是要支持革命师生造校党委反的。可是，省委这样的态度，并不能让一些学生们满意。以山西大学外语系大一学生方培泉等一些学生为主，联络了太原工学院和其他大中学校的一些学生，还是在省城成立了“炮打省委指挥部”。那位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宋捷，由于曾经与刘灏做伴赴京为袁振送申诉材料，在他进入“炮打省委指挥部”后，刘灏所率领的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自然也就成了这个指挥部的成员。“炮打省委指挥部”的几方代表，有的提出了“澄清袁振，炮轰卫恒”的战斗口号，有的提出了“支持袁振，炮轰卫恒”的战斗口号。持第一种观点的学生们，分明对袁振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怀疑袁振也是走资派，不过是省委为保帅而舍掉的车罢了。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后来这个“炮打省委指挥部”的解体。

那阵子，群众起来造本单位、本系统领导的反，省委就得支持，为平息事态以求自保，就去将被群众造了反的领导停职或罢官，直到他们最后也被冲垮。我曾见到余汝信和曾鸣的一篇长文《“文革”全国第一夺——山西 1·12 夺权概述》(据重庆市何蜀先生介绍，此文首发在海外网站华夏文摘增刊 514 期·文革博物馆通讯 348 期，2006 年 7 月 24 日出版)，两位作者做了统计，从 1966 年 7 月 25 日至 12 月 16 日，山西省委先后作出 45 项决定，撤职、停职反省的领导干部共 49 人。其中撤销职务罢官的 11 人：赵光亭(山西财经学院副院长)、窦凯(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徐志远(中共忻州地委书记)、杨国祯(山西轻工业师范学院院长)、王声(山西轻工业学校副校长)、何象履(长治师范学校党总支书记)、胡之江(阳泉市副市长)、赵宗复(太原工学院院长，罢官并被开除党籍)、郁世仁(太原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束为(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庞湘川(省财委副主任)；停职检查

或停职反省的有 38 人：贾晨林（中国科学院燃料化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奇（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弓宏（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王忠（山西轻工业学校党委书记）、黄石山（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庶民（山西省文化局局长）、陶健（山西省公安厅厅长）、石峰（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王立远（山西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兰亭（山西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隽轩（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冯瑞如（山西省民政厅副厅长）、宋志先（山西省劳动厅副厅长）、赵德（山西省邮电局副局长）、鱼波（西北一八二队党委书记）、林南（山西省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西戎（山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张塞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阎玉生（山西省储备局局长）、冯毅（山西省教育厅厅长）、解玉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慰（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校长）、贾克（山西省文化局副局长）、赵向荣（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成江（山西省地质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刘景山（山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黄清池（华北工业卫生所副所长）、郝剑明（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分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崔晓天（山西农业劳动大学副校长）、陈飞（山西省机电设备成套局副局长）、李进军（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蒋方宇（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刘敏（中共阳泉市委副书记）、康振锋（山西省物价委员会副主任）、卫逢祺（山西省副省长兼山西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刘梅（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子康（山西大学副校长）、宋华青（山西大学党委委员、秘书长）。其时，中共太原六中党总支书记李雪明、校长马培云与教师解华及中共忻州师范学校党委书记、校长程友三、党委宣传委员高云伟与教师冯陶民等，也因文革问题受到处理。上述人员中，李束为、刘梅、宋华青、李雪明、马培云、解华、程友三、高云伟、冯陶民还在《山西日报》上被点名批判。

事实是省委如此处理干部，并不能平息基层的官民矛盾。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按照省委的安排和卫恒报告的精神，在开展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形成了干部斗群众，群众斗干部的严重局面。面对这种官民矛盾，当中央高层毛泽东开始批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山西省委不得不一次次检查执行了资反路线，全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原先被斗的，又反过来斗那些曾经斗人的，你斗我，我斗你的派斗，也就越演越烈了。

红色恐怖在社会上弥漫，这种恐怖也浸入了官场。在山西省城太原，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如北京作家老舍先生一样，在这种红色恐怖中，选择了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这场刚刚兴起的“文革”。在受到运动的冲击后，他们以死明志，用宝贵的生命与浊浪扑面的“文革”作了抗争，保持了自个人格的尊严。6月22日，山西省历史学会主席、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自杀身亡；9月13日，太原市教育局局长李济生自杀身亡；10月1日，太原市公安局局长贾永秀自杀身亡。还有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部分管文艺的副部长江萍，以及多名厅局级领导，也以不同的方式，踏上了生命的不归之路。在省城，他们是领导干部中第一批“文革”的殉难者。

【10】袁振成功地策划了申辩

当刘灏率领的太原五中井冈山兵团为袁振翻案时，太原六中的32111公社，也杀向社会，开始关注起袁振问题了。五中刘灏组建的那个造反组织以井冈山冠名好理解，六中的李金渭和他的伙伴们，用一个数字32111冠名，是因为这个数字是当时我国石油工业战线在四川的一支优秀钻井队的代号。其事迹当时在报纸上作过隆重的宣传介绍。在山西“文革”初起时，李金渭这位来自晋南农村，靠根红苗壮和

优异成绩考入太原六中的中学生,其革命造反的名声,不亚于五中的刘灏。在六中,32111公社的几位学生领袖,如李金渭、史纪礼、段建中、齐福增、刘大康等,多为平民子弟和一般干部后代,在市委派驻六中的工作组领导下,学校的一些学生们揪斗老师,并把校党总支书记李雪明打成反革命时,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却将斗争矛头对准了工作组。在袁振问题上,他们和五中井冈山的观点一拍即合。六中的这些高中生,也成了袁振家中的常客。刘灏去北京给袁振送申诉材料未果,李金渭却给袁振带来了好消息。1966年的8月底,李金渭和齐福增也带着袁振的申诉材料去了北京,住到了北京外语学院,原因是李金渭认识这里的几名大学生。这几名大学生,曾在李金渭老家的村里搞过四清,他们只能安排李金渭和齐福增住下,却没法子帮他俩替袁振送什么申诉书和其他材料。有一天,正赶上学院造反的学生们开大会要批斗陈毅,这几名学生就让李金渭和齐福增也去开会,还让他俩坐到了前面。批斗会开始了,但陈毅没有被揪来,倒是听说周恩来总



袁振(前排中)与刘灏(前排右一)宋捷(前排左二)等兵团小将合影

理到了学院，要保陈毅，正和学生领袖们在大礼堂后面屋里座谈。批斗会改成批判会，造反的学生们只能念批判稿子了事。李金渭认识的那几名学生还告诉李金渭，坐在主席台上听会的一位干部，就是周总理办公室的钱秘书。李金渭和齐福增就从旁门上了主席台，找钱秘书说要见周总理。钱秘书问他俩要反映什么事，他俩就说了太原袁振的事。钱秘书答应把他俩带来的材料转交周总理，遂起身离开了主席台。批判会也因为没有揪来陈毅，草草结束。散会时，钱秘书出来叫住李金渭和齐福增，告诉他俩，总理讲了，袁振在华北局会议上给省委提意见，意见即使是对的，也是党内民主所容许的，把袁振打成‘伸手派’和‘野心家’是错误的，必须平反。李金渭和齐福增当天就给袁振打了电话，汇报了这个情况。袁振在电话中让他俩赶紧回太原，两位中学生还没有在北京好好玩一下，就返回太原。在同五中井冈山和六中32111公社的学生领袖们策划后，袁振开始了他的翻案行动。参与策划的，还有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赵日昌和宋捷。日后，赵日昌成为红联站的发起人之一，宋捷则成了兵团的发起人之一。

学生们起来造省委的反，有中央文件的精神支持，卫恒已经难以招架了。更让卫恒无法招架的，是9月9日袁振在太原市委大院里，公开贴出了大字报《我的声明》。他声明说“我没有反党，没有组织反党集团，华北局会议把我打成向党伸手的野心家，是在斗争中我被迫承认的，是冤枉人的。”同时，向社会公布了他在华北局会议上揭发省委的那些个“政治问题”。袁振是省委常委。省委的内部斗争，现在被公开了，可以想像，卫恒已经料到了日后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局面将更难控制。这位饱经革命年代战火锻炼的老共产党员，一定明白紧跟在袁振发出的那发“信号弹”后面的，必将是一个更大的行动。已经公开承认了自己是野心家和伸手派的袁振，又公开贴出翻案的大字报，这无疑预示着什么！他想到了明天，也就是定于在9月10日太原市委将要

召开的机关干部大会。原定在这个大会上，省委派驻太原市委的工作组，将要让在华北局会议上犯了错误的袁振做检查。袁振的大字报肯定是一个信号，明天的大会上会不会出现意外呢？

意外果然来了，让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其他的省委的领导们始料不及。9日10日的会议刚刚开始，由一面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大旗指引，一队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小将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刘灏带领下，来到了新建路太原市委大礼堂门前。在李金渭带领下，六中的一些学生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新建路太原市委大礼堂门前。五中和六中的造反小将们来参战，一切尽在与袁振早已谋划好的步骤中。

刘灏和李金渭的两支队伍，自然而然地遇到了阻挡，把门的不让这些突然出现的中学生们进去。他们是忠于职守的。会议是市委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市委的党员干部们，台上还坐着省委派到市委的工作组领导。你们一群五中和六中的学生娃娃，来这儿干啥？

五中造反学生的“旗手”刘灏，此时却显得胸有成竹。他与袁振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与自个的战友们和六中的战友们，也做了详细的安排。队伍排得依旧整齐，只有刘灏带着几个骨干上前交涉：“我们是来参加批判黑帮袁振的。我们要参加太原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把门的不敢做主，连忙进去通报。坐在主席台正中的首长，是接替袁振正在主持太原市委工作的代理第一书记贾俊，旁边是市委的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和其他的市委领导。贾俊此时还有一个身份，是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组长。贾俊和赵力之闻讯来到礼堂门口，面对这突兀而至的中学生们，两人说话的口气不能强硬，但态度却是有原则的也是强硬的，两张嘴轮番劝解：袁振的问题是党内的问题，今天是市委机关的党员干部会议，我看你们学生们就不要参加了吧。

你们说不要参加就不参加了？这里可不是中南海，这里是太原，

刘灏可不管这一套，刘灏的态度也十分强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让我们参加，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

不待对方回答，刘灏和身边的骨干们就大声背诵起老人家的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接着是帮腔：我们来革黑帮的命，造黑帮的反，你们为什么不让让我们进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继续帮腔：你们不让我们进去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想镇压学生运动！）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

学生们搬出了一条又一条最高指示为自个撑腰，贾俊和赵力之两位领导不得不让步了。再这么纠缠下去，里面的大会还开不开呀？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学生中打的是太原五中井冈山的造反大旗，戴的红袖章上，齐刷刷印着太原五中井冈山造反兵团。保袁振的，不就是这些学生们吗？这个组织的司令，不就是一个叫刘灏的学生娃吗？这个学生娃不就是个死保袁振的“保皇派”吗？不让他们进去不行，让他们进去会不会出乱子呢？还有六中的这些学生们怎么也来了？他俩瞅瞅面前的学生们，都是那么一张娃娃脸。两位领导又轮番说了好一通大道理，不得不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好，好，你们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要听毛主席的话，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呀，今天的大会是让袁振检查呢，这可是个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今天来就是来听袁振检查的！”刘灏狡黠地笑了，他笑自个的聪明也笑对方的糊涂。只要能进了会场，可就由不得你们了。

山西省城的两位党内高层领导，终于对年少的中学生们让了步。有毛主席当红司令，造反的学生们可是眼下的天之骄子，谁能惹得起？再看刘灏和李金渭领着的学生队伍，排着队走进大礼堂，还挺有秩序地坐在了过道上，恐怕不止是贾俊、赵力之和主席台上的其他市委领导人了，就是在台下端坐着的市委机关干部们，大约也都心想，

这些不约而来的学生娃娃们，难道果真只是来听会的？

大会终于开始了。贾俊和赵力之重新上了主席台，重新在其他领导们中间端坐入席。沦为革命对象的前市委第一书记袁振，被主持会议的贾俊叫出，从后台走向了前台，要向市委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做检查了。他走到了麦克风前，扫视了一眼台下过道里的学生们，看到了刘灏那张他已经十分熟悉了的娃娃面孔，也看到了李金渭那张他也十分熟悉了的娃娃面孔。袁振在会前已经向工作组表了态，说要在会上好好检查自己。现在，他为自个的谋略即将实现，有力地挺直了腰身，更充满了信心。他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底稿，开始了“检查”：“我的申辩书。”

声音高亢而嘹亮，充满了激烈与愤慨。他看一眼台下的刘灏和李金渭，两位革命小将也在向他点头，似在鼓励他大胆地在这种公开场合鸣冤叫屈。袁振继续大声念稿子，下面的内容，果然是为自个一条条申辩，并开始揭发省委的问题。会场的气氛顿时凝固了，大礼堂内显出铅一般的沉重。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互相低语，想让人先把袁振押下去，但刘灏、李金渭和他们安排好的学生骨干们，早一个个飞快地跳上了主席台。台上台下，刹那间乱成一团。台下有人高喊：“打倒袁振，揪出别有用心的坏人！”更有学生们高喊：“袁振无罪，申辩有理！”参加大会的市委党员干部们，在袁振问题上看法原本就不一致，此时大礼堂里成了辩论的战场，学生们更是一个个握拳相向，背诵出的一条条毛主席语录如投枪和匕首，互相争吵和推打使与会者乱成了一团，那乱劲真能把大礼堂掀翻。

有小将们让主席台上的领导们一个个报出身，这是那时候官办红卫兵们发明的一个招数，十分厉害。亲不亲阶级分，出身好与坏，就是看你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这分界线还可以灵活运用。你出身好，要打倒你，就可以说你是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你出身

不好，要打倒你更有了理由，那你就成了钻进革命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反正用这一招出手，你当权者们就得被逼进有理也说不清的处境。五中和六中的革命小将们，此时也如那些官办红卫兵一般，开始运用这一招了。轮着逼问过去，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只好说实话。报贫下中农出身的可以权且放过，报中农出身的可不能轻易放过去了，毛主席早就说了，中农是团结的对象，你一个团结的对象，怎么可以坐在主席台上呢？最倒霉的是说自个是地主出身的一位领导了，学生们一声喊，他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当下就被学生们从座位上揪出来，撵下了主席台。

刘灏开始主持大会，让袁振继续申辩。学生们高昂的口号声，加上与会者中保袁振的干部们，也跟着呼起口号。袁振就在这些口号声中，念完了他的申辩书。这次会前会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和内容，就从市委大礼堂迅速传遍了省城：太原五中和六中的革命小将们，要坚决为袁振翻案，坚决揪出打击迫害袁振的“黑省委”书记卫恒了。

在为袁振翻案的造反战斗中，刘灏取得了第一个让所有的井冈山战士们激动的胜利。在全国各地，正是诸如此类的大大小小的胜利，才使学生们的各种造反组织更加坚定了造反的信念。“文革”不仅仅使学生们的才智变得畸形发展，使学生们的激情变得扭曲可怕，在党的高层领导中，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在山西炮轰省委的造反派队伍中，现在正式站出来一位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与革命造反的学生们，站到了同一战壕里。“文革”中，各级党委中这样的领导人难道还少吗？

【11】袁振事件解读

中学生刘灏是出于对好同学、好朋友的仗义，直接去找袁振，想当面弄清原委，听了袁振的倾诉后，才认定袁振是受卫恒迫害的好干

部,从而将造反矛头直指卫恒的。一个中学生,自认为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且找准了革命的大方向,那种热血喷涌的心情,非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读者们,一定难以想象。他那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卷进了“文革”初期,山西党内高层的那场残酷斗争的旋涡。刘灏在十年“文革”中也受尽磨难,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回忆往事,唯有苦笑而已。

有必要解读一下袁振事件了。

我手头有两份材料。一份是《袁振同志在市级机关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自我检查》,时间是1966年8月8日。另一份是《我的申辩书》,时间应当是1966年9月10日,即上一节说到的那一天。那天,以贾俊为组长的省委派驻市委的工作组,要安排袁振在市委大礼堂向市委机关干部做检查。在刘灏、宋捷、李金渭、赵日昌等一批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策划和支持下,袁振当众宣读了这个材料。

这两份材料的文字都很长,可看出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向省委提了些什么意见,也可从中嗅出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受到省委和其他与会者批判的情况。为读者们阅读方便,将第一份材料简称《检查》,将第二份材料简称《申辩》。删去一些对过程的叙述,仅就袁振对省委提出的几条意见,以及他为此先检查、后申辩的文字,分别摘录如下。

一:在华北局会议上,袁振提出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出的那份《二月提纲》炮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

《检查》中说:

我在会上，对批评通知如果有错误的话，不是作自我批评，而是借这个机会，好象自己是局外人，大肆攻击省委。才开始感到省委通知问题很大，以后看到问题不是那么太大，局部上有些错误，有些缺点，我还是扩大其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胡说省委通知总的精神是错误的，有右倾情绪，麻木不仁，立场模糊，还说省委的通知基本上是按彭真的提纲写的，不放手的，是有意束缚群众手脚的，起了一定的坏作用，主张收回，向省委发了许多毒箭。

《申辩》中说：

省委的学术批判通知既然与中央的通知十条精神不符，与江青的文艺座谈会纪要精神不符，为何不能批判呢？为何不应收回呢？我对省委通知提出批判，可能有错误的地方，但绝无攻垮省委的恶意，因为我在会上明确地讲过，省委是稀里糊涂犯了错误，是上了彭真的当了，并不是有意要这么干，如果我有恶意要攻垮省委的话，要把省委往黑线上拉的话，我就不会说是上当的问题了，我就会说省委是有意识的跟彭真走一条道路了，但我从未这样说过。这就说明不论我的意见提的对不对，但我并未企图把省委往黑线上拉，因此省委认为我是在学术批判通知问题上，要把省委拉上黑线，攻垮省委，这是对我提意见的动机和目的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歪曲。

二：在华北局会上，袁振批评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精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

《检查》中说：

当时我为了攻击省委，在华北局会议上胡说，说省委对印（毛主席）语录控制的太死，考虑群众需要不够，这就影射省委受了中宣部的影响也往黑线上拉，……省委发了十五本马列主义精典著作，给干部学习，这是件好事嘛，但在会上，我发言说在这个时候发书发精典著作，对学毛著客观上起了冲击作用。……又讲省委宣传部可能受了陆定一的影响。所以这些问题尽量往高提，往纲上提，往黑线上拉，这是非常可耻的，也是非常恶毒的活动。

《申辩》中说：

我对省委宣传部批评他们对学毛著抓得不力，难道不可以批评吗？能说省（委）宣传部在过去抓学毛著很得力吗？即使我的批评重了，也并未说省委宣传部是黑线啊！只是抓得不力，只是缺点嘛……在大学毛著的时候，不发毛著，却发马列主义十本书，时间上考虑的周到吗？客观上能（不）冲击学习毛著作用吗？现在广大工农兵正在大学毛著，迫切需要毛主席的书，如果我们不发主席的书，而给他们马列精典著作，那会起什么作用呢？对省委宣传部难道就不许人家怀疑吗？能保证毫无一点（前）中宣部的影响吗？

硬说我这些批评和建议是反对省委的，是把省委拉上黑线，这是给我乱加罪名的，任意提高问题的性质。

三：在华北局会上，袁振揭发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傅山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检查》中说：

特别是在发现了傅山纪念馆的生平简介以后，上面谈到傅山与东林党人有联系，给东林党被罢了官的人赴京请愿，等等，我就主观的认为这就不是一个认识问题了，我认为搞这个傅山纪念馆，可能跟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关，具体讲，就是怀疑岳维藩同志、刘舒侠同志以及郑林同志，因此在北京参加会议前，给卫恒同志写了一封信，写信，报告问题那不是什么错啦，但是信的内容不对头，不是向省委、向卫恒同志请示这件事情怎么办理，而是除了把岳维藩、刘舒侠、郑林告了状以外，主要的是要试探一下卫恒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卫恒同志对这个问题很慎重，当时没有给我回信，从这里，我又主观地武断地对卫恒同志产生了怀疑，认为卫恒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右倾情绪，也可能是包庇，这种怀疑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到北京以后，二十日我给主席写了信，当然，每个党员都有权力写信，信上除了介绍傅山的问题（前言是毒草）以外，说这个事情省委、市委都没有批准，是省里、市里的个别同志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向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同志报告了，我们准备在华北局会议上解决，钉子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卫恒同志的态度没有讲，当时卫恒同志的态度是不明朗的，我只是说向他汇报，没有说他表示什么态度，这可以说是对卫恒同志的诬告，是按了钉子，这是非常错误的，是反党的罪恶。

《申辩》中说：

岳（维藩）、刘（舒侠）、郑（林）三个人在庐山会议后搞傅山问题是不正确的，应当引起怀疑的，把他们的问题向中央、主席、向华北局、

向卫恒同志报告一下，也是应该的，合法的，我请省委把他们的问题加以澄清，这正是对省委信任的表现，怎么能说是怀疑省委，或者要攻垮省委，把省委拉入黑线呢？

我让彭少林整理关于傅山问题的材料这是省委要整理的，省委说这个材料，把省委许多人甚至华北局个别人中央个别人，也拉入黑线了，因此是想打倒省委向党伸手自己上台，这更是夸大其词，对事物乱加歪曲，首先这份材料没有用……另外一方面材料未经核实，不一定确切，因此也是不能用的，其次即便这个材料是错误的，但我未同意用，那我也无罪啊！更主要的是这个材料上并没有讲任何同志是在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啊！这怎么能说我把许多人均列入黑线名单呢？这岂不是明明白白的歪曲事实吗？……这怎能说我把大家列入黑线，企图在此大做文章，打倒省委自己上台，甚至反华北局呢？这不是给我乱加罪名，任意歪曲事实的真相吗？

在《检查》和《申辩》中，袁振对华北局会议上自己的问题，各有不同的态度和认识，即《检查》中有许多认罪话，《申辩》中却有对自个跟上别人的批评调子乱认罪的检讨语。现在也分别摘录如下：

《检查》中的认罪话：

在华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会议上，我是自我暴露，个人主义恶性发作，企图向党伸手，对省委不在话下，很多事情是对抗省委，不听省委那一套，特别是本来自己已经做错了事情，省委作了正当的批评或者制止，由于自己个人主义挂帅，不是虚心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而是心怀不满，反省委的劲很大。

到华北局开会，是抱着打官司的态度，就是心里不服，寻机报复。所

以华北局会议上,我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进行了反党反省委的活动。

……(张德胜插话:这是鬼辩!你就是左了右了的问题?你就不说你反党活动的问题。你的不可告人的问题必须交代!贾俊插话:大家叫你交代,反省委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华北局会议开始的,还是蓄谋已久的?)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我再补充说一下,工作问题当然有些是左的形式出现,右的实质,另一方面,就是跟省委唱对台戏,不仅是八年总结,也不仅是在北京华北局会议,比较明显的是四清问题,我就觉得我在七四三的一套是对的,是对抗王谦同志在太原的做法,而且我在常委会上讲过和会后讲过,认为王谦同志搞的不如我搞的快,搞的好,那就是反对省委。……宗教问题上不听大任同志的,自己搞一套,就是自己没有把省委放在眼里,狂妄自大到了顶点。几个系统的改组问题也议论过,组织部改组换人,政法系统大调整,农村郊区班子要大调整,还有农委、农办,这个我们是商量的,所以改组是政变性质的。……所以我说有计划有组织,这是事实。

《申辩》中的检讨语:

由于我丧失立场,未坚持原则,在被迫情况下乱戴反党和反党集团的帽子,把与我一块搞八年总结的人,一块向省委提意见的人均叫做反党集团,如陈守中、李学敏、胡亦仁、彭少林等。……我再一次声明我没有反党,向省委提意见,绝不等于反党,也无反党集团。由于我乱戴反党帽子,已使太原党内造成混乱,颠倒是非,我感到非常惭愧和痛心,我犯罪了,这证明我在严重关头,经不住考验,我现在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决心革命痛改前非,不计较个人任何得失,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以前所做的检查,所贴的大字报都是说的假话,统统不算

数,以上我的申辩是实事求是的,老老实实的,为了彻底弄清是非,我向党建议,向革命的同志们呼吁:

- (一)为了使大家了解真情,请省、市委公布有关文件和会议记录。
- (二)在大家了解真相的条件下(请全体干部与学生)组织辩论。
- (三)请求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到山西,调查这一案件真情并做出结论。

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受到批判,在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中,也有记录。原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在《赵力之自述》(中共党史出版2005年7月版)一书中,对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向省委提意见一事,有过如下回忆:

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袁振就在山西中型组会议上发言,开始给省委提意见,揭发所谓所谓省委的问题。

……对于袁振的这些意见,我和到会的许多同志都感到无法同意,特别是对他采取的向省委发难的态度,更觉得无法理解。但鉴于会议刚刚进入“揭发批判”阶段,而且正好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因为考虑到会期较长,临时回太原安排当前工作去了,所以大家当时没有与之理论。卫恒同志回到北京以后,在6月7日的山西组会议上对袁振所提的意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批评他的“系统发言”是“言过其实,文过饰非,对党不老实”,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也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明确表示了对他的意见的反对态度。

在《赵雨亭革命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一书中,也记述了华北局会议上批评袁振的一些情况:

他的意见遭到了太原市小组不少人的反对，对他进行了批评。当时赵雨亭和省委另一位书记贾俊住在一个房间，他们也分析，“袁振完全是夸大自己，居然跳出来要批判省委了。”会上赵雨亭也参加了对袁振的批评。

袁振给毛泽东主席的信，毛泽东持何态度？华北局当时对袁振与山西省委的这场争斗，有何结论？如我这样的民间“文革”研究者，是难以见到相关史料的。当时毛泽东正全面部署，要击垮刘少奇和其“黑线”，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山西省委的卫、王、王就是这条“黑线”上的干部。从后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支持刘格平向山西省委夺权的一系列态度上，完全可看出毛泽东当时在山西问题上的倾向。而后来华北局又给袁振平反，可见当时在华北局会议上，对袁振如何定性，华北局应该是有些说法的。

袁振留下的这些文字，太枯燥也太沉重了。

历史的云烟早已散去。在我生活的这座太原古城，而今漫步街头，除了如我这样的白发老人，在那些步履匆匆的中年人或者年轻人中，有谁还知道卫、王、王、贾俊、袁振这些当年执政者们的名字呢？有谁还会对他们当年相争相斗的那些故事感兴趣呢？是的，他们的故事，早已沉淀在历史的深处了。然而，当我翻阅故纸堆，记下他们的这些故事时，突然想到了站队这个词。是的，就是站队这个词。

站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中，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现象。可举两次庐山会议为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上书毛泽东主席后，与最高领袖意见不一致者，没有赶紧站到毛泽东队伍中者，便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成员。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许多与会者是同意设国家主席的，一个国家，怎么能不设国家元首呢？当与会者们弄明白不设国家主席是毛泽东的意思后，又开始纷

纷表态站队了。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寻找理论根据的陈伯达，当时中国的第四号人物，成了毛泽东批陈整风的对象，而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红极一时的林彪，也因为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而被晾到了一边。

站队，当然是为了政治。袁振当年给山西省委提意见，也可视为一种要在政治上的站队。

当年的卫、王、王和贾俊、袁振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极左的年代，在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那场“文革”运动中，在当年反对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的政治氛围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人人都可以怀疑别人，人人都可能被别人怀疑，整天价你斗我，我斗你的政治环境中，山西省委整一整敢向省委叫板的袁振，是必然之事；比卫恒入党早、资格老的袁振要紧跟领袖，以阶级斗争的嗅觉找问题看问题并向省委叫板，也是必然之事。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有令当事人后来无法想见的幼稚和诡异之处，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头看去，袁振当年对省委提出的那些意见，实在没有能让历史老人可以肯定的一丁点儿价值；而当年省委打压内部的不同意见，给袁振上纲到伸手派、野心家、反党的做法，也实在不是一个执政党可以肯定和传承的应有的态度和作风。

【12】用大字报痛打卫恒黑帮

是毛主席让支持学生运动，是毛主席指出学生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正在一步步陷入困境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只能用这种思维，来取代自己的所有想法。当省委第一书记得知一个叫刘灏的中学生，带人搅了市委的大会，并且公开在口号里要揪出他卫恒时——喊口号毕竟还是动口，并没有如后来的造反派那样，除了贴大字报大标语外，还动手给省委第一书记头上戴上了纸帽子，胸前挂上了纸牌子，继而拳脚相加了——他一定内心痛苦万分。但是，正处在

风口浪尖上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那时痛苦的事情太多了，要处理的事情也太多了。他实在无暇去为自己辩解。他在体会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也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和走向。针对大权在握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他曾对自己的秘书，悄悄说过蒙在心里的话：“看他们那个样子，批了部长批总理，批了将军批老师，我们这些人更不在话下，这可能就是‘林副统帅’讲的，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呀！”面对省委已经无法控制了的学生运动，面对自己的不理解，他还是以自己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忠贞，在召集省委机关的干部们开会时，向大家打了招呼：“学生骂我们，打我们，都不要还口还手，能做到这一条，就是支持省委。”

这一年的9月11日，被全国人民视为发布党中央声音的《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

有袁振的点拨，有《人民日报》社论的撑腰，刘灏在这一天亲自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山西省委大门外的墙上。大字报的标题厉害得很：《痛打卫恒黑帮》。这可真是出手不凡，在山西，他是第一个在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名字前写上“痛打”后，又在卫恒名字后直接冠上了“黑帮”二字的造反派。至于内容嘛，一是袁振问题，主要说卫恒迫害了袁振，要同卫恒黑帮坚决斗争；二是省委向太原市委和大专院校及部分省城重点中学派驻工作队，把一批革命师生打成了反革命和右派，镇压了群众；三是毛主席的革命小将把造反矛头对准卫恒，大方向始终正确。

他贴完大字报，还想找见卫恒辩论一次，可在省委大院里转来串去，就是找不到省委第一书记。省委办公厅坚守岗位的干部们，自然不会告诉这个来贴大字报的中学生省委第一书记的行踪。可以想见，

卫恒那阵子正忙得焦头烂额，9月1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他是一定要读的。“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话，他就是不理解也得去理解。他即便知道了这天有个叫刘灏的中学生来省委，贴出了一张《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他怕是也顾不上去理会这事，更想不到要去接见这个中学生了。因为，太原天天有从北京来串连点火的大中学生们，全国的学生大串连，正在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支持。太原和其他地市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也正在组织起来开始大串连。有往出走的，也有往进涌的。从各地来太原串连的大中学生们，最多时，一天就有七千多人。对待革命学生的态度问题，在当时可是一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卫恒得亲自开省委常委会，研究成立革命师生接待站的大事。更有北京来的红卫兵来头大，动不动就要亲自找卫恒解决问题。别的省委领导接见不行，非得卫恒接见才行。在全党全国大树特树领袖毛泽东的权威，个人迷信走向极端时，在毛泽东主席直接支持学生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的前提下，全国出现的这种混乱局面，就非各级党组织所能控制了。

再说刘灏。那时有革命战歌叫做“拿起笔做刀枪”，可用手里的“刀枪”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后，他还决心要进省委找卫恒辩论。省委办公厅传达室已经加强了干部值班，刘灏要进省委办公厅，值班的干部不让进。于是就争执辩论。学生要搞文化大革命，这可是毛主席支持的，刘灏要找省委第一书记是理直气壮。值班干部又拿出会客登记薄，说是有规定，找人必须填写。刘灏不填，双方又是一阵争执。在规定面前，刘灏眼看没理了，一把拿过登记薄来，举笔就在上面写下了一行字：“老子刘灏要找卫恒！”值班干部瞠目结舌，无奈之下，只好放这位中学生进去。

事后社会上传说，刘灏在省委除了贴出《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

报,还贴出一条大标语:刘灏老子要找卫恒小子。在许多人对此摇头的同时,也有许多人开始为刘灏的造反精神叫好了。当时全国正在流行毛泽东主席的一条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条“最高指示”是在清华大学红卫兵7月份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上出现的,后来被谱上曲唱遍全国,似乎就是老人家专为“文革”发出的“最高指示”了。如今在电脑上“百度”一下“造反有理”,方知这条语录,是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时,毛泽东讲话中的一句话。再查1968年7月再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有《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题下标明写于1939年12月20日,应是毛泽东主席当时的讲话稿,文中却没有这句话。可见毛泽东当年总结的这句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谛,当初编选文集时删掉并不奇怪。任何伟人的语录,都是有时代特色和特定背景的。可惜在“文革”时期,这种正常的思维,已经被个人迷信所取代。因为“造反有理”,各种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和街痞味十足的漫骂,就成了当时大中院校革命小将们惯用的革命语言。学生们造反的潮流,正在领袖的支持和中央宣传媒体的鼓动下,在党内和共和国的土地上造成了无序和暴力。毛泽东主席需要学生们带头为他向各级党委发起冲击,至于各级党委大大小小的领导们,老人家则需要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接受他心目中那种具有诗人般浪漫色彩的反修防修的大风大浪的锻炼。北京的学生们敢于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写作“刘少狗”,在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打倒刘少狗”的大标语,与太原的学生刘灏向省委第一书记挑战自称“老子”一样,这种革命造反的行为,正体现出“文革”时期学生们的虔诚与疯狂。

因为在山西第一个“炮轰”卫恒,刘灏这位革命小将的名字,从此不但名扬省城,继而轰动了三晋大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

第三章

省城大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不得不痛苦地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支持各路造反派起来革命造反。省委最初的对手，竟是一群中学生。

【1】太原几大群众组织简述

当一个曾受到中国人民大众拥护支持的执政党在它的领袖带领下，一步步走上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时，人民大众普遍的心理，自然是



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的领导班子合影。前排左起：薛引学、李大纲、乾明坤、后排左起：方培泉、王守仁、万红生、侯光天、雷勇和延安红旗战斗队领导人樊子踞。

要在这场革命中,奋勇捍卫已被神化的领袖和他统领的党中央了。而对文化大革命各自不同的理解,也导致了人民群众之间,似乎是在同一大目标下出现了对立和动乱。正应了《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的那句话:“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在这种“兴起”中,不同的群众组织纷纷举旗亮相,山西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终于不能由刘灏一人独领风骚了。省城太原毕竟是全省的首府,全市上下,终于出现了众多的政治观点或相同、或相近、或相反的群众组织。

现在,不妨给读者照录一份资料。它的名字是:《山西几个主要组织的斗争简史》,编写者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职工总司令部”,刊发的媒体,是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主办的《兵团》报第14期第4版上,日期为1967年12月15日。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职工总司令部”,当时简称“兵团工总司”,是刘灏的革命造反队伍日益扩大后,由许多投奔他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和其他社会革命造反组织混合编成。他们不是中学生,也不是大学生,而是追随在刘司令麾下的一支庞大的机关干部和工人组织。其中自然不乏会写各种材料的笔杆子。现在已无法考证这份资料的编写人和执笔者了,不论其编写人和执笔者当时出于什么目的,这份材料却让我们现在能较为清楚地看到,在1966年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在山西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组织出现在省城的基本局面。至于这份资料中提到的山西1·12夺权,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尽叙述;这份资料里提到的所谓卫、王、王,是指“文革”前中共山西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卫恒、王谦和王大任三位领导。我们在此照录了这份资料中的其他人名,他们之中,除杨承孝在“文革”中因打砸抢被枪决外,其他人中,可能有的在“文革”结束后受到了政治处分;有的业已谢世,平安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有的也许早已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各种人材,或退休、

或还在工作岗位上；有的大约正平静地含饴弄孙，过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幸福生活。10年“文革”早已被历史所否定，但我们都曾在一个被否定了的历史时期生活过，错误的根源并不在那个历史时期成立革命造反组织的当事人，因为那个时代的党中央和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是赞赏和支持这种行为的。所以，我们对历史也无须遮掩。更何况，这种派性小报上的材料，也极有可能存在种种不准确性。

以下是该资料中《“1·12”夺权前的情况》一节的原文，有关人名及所在单位均未作勘误，照录如下：

1·12 夺权前，山西的几个主要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是反卫、王、王派，二是保卫、王、王派。

[一]反卫、王、王派

(1)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去年8月份由五中、六中等几个学校的学生成立了“炮轰组”，炮打卫恒黑帮。同年10月26日正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以五中井冈山、六中32111为主力。当时的主要骨干有五中刘灏(第一个贴出痛打卫恒黑帮大字报的学生)、郭红、李生全、六中李金渭、史纪礼、段建中(段在1·12后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袁振被开除)、齐福增、刘大康、山西大学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太机张文林、太工宋捷等。这时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

(2)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也是1966年10月26日成立的，核心是太工红旗。当时的骨干是太工红旗杨宝明、李青山、赵日昌，山农任荣廷，山医张定基，十中马尚文、付文亭，冶校吉顺行等。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

(3)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简称山大8·8)，成立于9月24日，领导骨干是李大纲、方培泉、王守仁、樊子琚、程宝珍(后二人因太

纺问题炮打关锋，而被军区逮捕，坐牢四月有余）。政治口号倾向兵团。

以上三个学生组织是山西最早反对卫、王、王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他们的骨干都是运动初期所谓的“右派”、“反革命”。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驻原省委、市委。

(4)兵团串连造反派工人，帮助成立了革命工人的组织——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工人兵团最早的骨干有张建国、李保顺、杨润智(太重红旗)、王跃文、王本宽、徐存生(太钢)、张锦秀(太纺)、张安邦(太铁)、杨忠喜(省汽修)。决死纵队的核心是杨承孝、车成林(十三治)。

(5)兵团和红联站在原太原市委的干部中发起成立市委红旗战斗队。骨干是翟仁武、吴春久、郝守礼、倪福君、李瑞芳、郭俊楼等。以上这三个组织的政治口号与兵团相同。

[二]保卫、王、王派

工人组织中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太原工人红卫兵总部，学生组织中的山西大学“8·14”、百万雄师(中学生组织)和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山西红卫兵团(由卫、王、王培养的“五好学生”刘普德组织的)。

其他组织有支持兵团的，也有支持红联站的。

照录罢这份资料，需要说明两点。

其一：兵团的核心人物是中学生，但也有大学生们参加；红联站的核心人物是大学生，却也有中学生们加入。这是走出校门闹革命的大、中学生们因观点不同而形成的一种自由组合。

其二：被这份材料归入“保皇派”的那些个群众组织，在1967年的1月12日刘格平组织山西革命造反派夺取了省委的大权，成立了



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

山西革命委员会后,就被新生的红色政权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这些组织的领导好多被投入大狱,其组织的其他成员,也就各自投奔了新的群众造反组织。也有“保卫、王、王派”的组织,在山西的政局变化中存在下来,如山西大学的 8·14 组织,他们能得以存在下来的原因,则是也开始了“炮轰黑省委”和“造卫、王、王的反”,成了山西夺权后刘格平丁磊夫妇策划,由郝庭云、黄锐庵等组建起的红总站下属组织。“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为了生存,其观点常常变化,此乃一例。

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的跨行业造反派组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还有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他们的信念是在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论其口号是“打倒卫恒,支持袁振”,还是“打倒卫恒,澄清袁振”,他们都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省委,认为省委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省委抛出袁振是“舍车保帅”。双方的分歧只在于袁振这个“车”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兵团的观点始终如一:袁振是受“黑省委”迫害的,当然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红联站的观点却是对袁振应该先打上问号,等待澄

清后，再决定对其是打还是保。红联站中，还有一些领导认定，既然山西省委是“黑省委”，袁振是省委常委，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造“黑省委”的反，自然也要打倒袁振了。

发起成立兵团的那些中学生们，如太原六中的李金谓、刘大康等，他们同刘灏一样，都是根红苗壮品学兼优的高中生。而发起成立红联站的中学生们，无疑也全是根红苗壮品学兼优的学生。以太原十中七一战斗队的领导马尚文为例，当年从临县考入十中，成了临县的“状元”，凭的就是出身好和学习好。年过花甲的马尚文，依旧带着浓厚的乡音，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对我说道：“那阵子和兵团的那些人就是不能提袁振，炮轰省委的目标都一致，可一谈怀疑袁振，刘灏他们就不干了。”也正是从这最初的认识分歧开始，兵团和红联站在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时而联合，时而对立的走向。

除却兵团、红联站这些革命造反组织以外，省城太原当时也出现了几个坚决保卫省委，支持省委领导好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革命造反，是针对向省委开炮的革命造反行为而来，为了说明情况，我们以前面那份材料中提到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为例，看看这些组织的特点。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是张志安，他当时是山西机床厂的一位年轻工人。上世纪 60 年代初，张志安因在全国几家刊物和省报上发表了一些不错的诗歌，在省城文坛上被誉为青年工人诗人。诗人的激情和表现欲，使他发起成立了这个组织，并被推上了总指挥的位置。诗人去找省委，要求领导接见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省委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卜虹云，当时就接见了这位血气方刚的工人诗人。张志安以工人阶级代表的身份，阐述了支持省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观点，卜虹云也代表省委，坚决支持革命工人们的这种革命行动，支持他们联合起来保卫省委，搞好山西的无产阶级



张志安组建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时在文瀛湖畔的烈士纪念碑前留影

文化大革命。所以，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在社会上一亮相，提出的口号便是“支持省委领导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组织也因此就被炮轰省委的各个造反组织斥之为“黑省委的保皇狗”。

再说一下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两个组织。它们都成立于1966年的8、9月份，前者是一个中学生组织，

是由太原市委中反对袁振，支持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各个中学的党支部支持的，其政治口号，前文中已有叙述，此处不再赘述。后者则是太原工学院的一个大学生组织，其中不但有大学生，还有不少教师参加，而且大部分都是党员教师，这个组织是在太原工学院的党委支持下成立的，其口号与太原红卫兵纠察队一样，坚决在省委的领导下，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两个组织成立不久，就与山西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刘普德发生了联系。早在1964年，刘普德就是名噪三晋的优秀大学生了。他是山西省委树立的学毛著标兵，担任着山西省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965年元月，全国第十八届学生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确立的5名学生标兵中，刘普德名列第一位。那

一年元月 18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以《走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道路——贫农儿子刘普德为革命而学成为优秀大学生》为题,用长篇通讯的形式报道了刘普德的事迹。接着,在 3 月 10 日和 3 月 12 日的《山西日报》上,也先后刊发了《为革命而学》和《学习刘普德迈向又红又专》两篇文章,对这位山西大学的优秀大学生进行了介绍,号召在校大学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1966 年初“文革”尚未开始前,日本青年代表团要来中国访问,山西是访问地之一。山西省委决定,由省外事办公室和团省委牵头,成立一个叫做中日青年联合委员会的临时机构,由相关的 8 个厅局派出人员组成。这个临时机构设立党委,书记由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郑林担任,而由尚未毕业的刘普德出任这个临时机构的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两职。刘普德是 1966 年 8 月到任的,其时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如烈火,开始燃遍各地。1966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主席要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三次接见全国赴京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依照当时的安排,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赴京串连的革命学生,身边有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二次是内蒙古自治区红卫兵的代表。这第三次呢?华北局就决定让刘普德站到毛主席身边,来出任这个最荣耀和幸福的代表了。刘普德度过了自个人生中最激动也最辉煌的那一天后回到山西,形势却有了变化。日本政府通知中国,说日本青年代表团取消了出访活动,于是,省委便将这个专门为日本青年访华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改成了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刘普德仍然担任主任和党委副书记。为了在接待外宾时也显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刘普德自然而然地便想到了支持市委和省委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这两个组织,并将这两个组织的领导,全吸收为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委员。由此,他自然也就被这两个“保皇组织”尊奉为实际领袖了。

应该说,我们前面援引的那份材料,对当时省城几个大组织的介

绍，较为客观。这几个大组织在山西省委被夺权后，形成了兵团与红联站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时而争斗，时而联合，又与其后成立的红总站（全称为山西省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相对立，终于在山西造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建国后不停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人总是害怕成为运动的对象，能参加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使自个成为革命的动力而免于沦落成革命的对象，实现自个的政治诉求，避免自个受打击和受排斥的危险，在“文革”之初，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官办红卫兵组织能兴盛，自发的其他革命造反群众组织也能兴盛。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打出的旗号都是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搞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忠诚和对领袖的崇敬，让年轻的学生们认定赶上了大革命的火红年代，而这场大革命，又是带领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的领袖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没有赶上过去的革命，能生逢如此幸事，岂能不积极参加？这是一种青年人的社会心态。中老年人呢，他们多年来被种种政治运动搞怕了，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全成了革命的对象时，唯恐自己也做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心态下，他们绝不敢非议学生们的革命精神。能参加一个群众革命造反组织，身上加一点政治保护层，也让许多中老年人的胳膊上，戴上群众组织的红袖章。自然，还有一些骨缝里就希望天下大乱的角色，以及热衷于政治的投机分子，还有那些在仕途上有所图谋的官场人物，在这种被《人民日报》的社论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也就无法按捺自己的冲动和表现欲了。

至于当时全省各条战线、大小机关、单位中成立起来的各种群众组织，那真是多如牛毛，无法计数。在当时的市委、市人委大院，就曾出现过两个组织，一为“平型关野战兵团”，一为“你大爷战斗队”。前者是市委组织部干部胡文才的组织，后者是太原日报社电台的机要

员战富国的组织,全是一个人。胡文才开始出大字报时,针对的是市委领导,署名是“中共党员、市委组织部干部、贫下中农后代胡文才”。战富国呢,文革前刚从部队复转,在太原日报社的电台当机要,省委的卫恒和市委的袁振有什么问题,他弄不明白,对此也没有什么观点和看法。但大字报还是要看的,看着看着,就对胡文才大字报的内容心生不满。当晚值班时,就指名道姓,写出批判胡文才攻击市里领导人的大字报,署名呢?便是“你大爷战斗队”。胡文才的大字报贴在哪,“你大爷战斗队”批判胡文才的大字报就跟在哪。更厉害的,有天晚上,战富国值夜班无事,叫上小徒弟到胡文才挂着“平型关野战兵团”木牌子的门口,摘下那个木牌子,两人抬上,趁着夜色,送给一位想做板凳缺木板的朋友了事。进入新世纪后,战富国从太原日报社副总编位子上退休。他和胡文才两人“文革”初期用大字报互相辱骂、攻讦,也是当时所谓大民主的特点之一。

那时写大字报,是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的行为,是党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中赞许的行为,至于这行为的内容和标准,那就由当事人自个掌握,无须调查论证,天晓得谁会在大字报上写出什么来。可以说,当时无论是持哪一种政治观点的群众组织,也包括胡文才和战富国这样的战斗队,他们的宗旨和信念以及出发点,都是要投身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捍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争斗双方有无个人恩怨,也都被掩饰在这种革命的红色中了。

【2】杨承孝与汤建中

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闹革命,却又观点不同而立场相异,毛泽东用无序的大民主,导致了人们政治激情的无限狂热和荒唐宣泄。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驻在太原的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简称十三冶)的一名年轻工人杨承孝。

杨承孝,辽宁省鞍山市人,十三冶的一个二级半电焊工,公司由东北迁至太原后,他也来到太原。“文革”开始时,此人才32岁。年龄不大,但身材不小,从相貌看,是条东北汉子。那一天,杨承孝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闲逛。恰恰刘灏那天也带着他的几个井冈山兵团战士,来到五一广场刷大标语。大标语的内容当然还是为袁振翻案,还是炮轰省委和揪出卫恒黑帮。山西省委并没有因为刘灏大闹新建路市委礼堂而宣布给袁振平反,卫恒也没有因为刘灏去省委写下了“痛打卫恒黑帮”的大字报而接见他。白纸、墨汁、毛笔、浆糊桶,现在依然还是刘灏的“刀”和“枪”。

闲逛的杨承孝,于是便站在刘灏这群革命小将的身后了。二级半电焊工的目光落在了大字报上,定格在袁振二字上。早想革命造反而不知从何下手的杨承孝,内心的表现欲使他突然用浑厚的东北腔,显示出一种直率和豪气:“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

刘灏猛一回头,看到了鸭舌帽下,那双内容复杂的眼睛。

“你是什么人?”刘司令发问了。

对方的回答口气大得很:“我是工人阶级!”

“你认识袁振?”刘灏又问。

“袁振在鞍钢当过经理,我就是从鞍钢出来的。(不直接回答认识与否,一个是鞍钢的经理,一个是鞍钢的工人,反正杨承孝由此表达了与袁振的关系。)袁振是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虽然语录套用的牛头不对马嘴,但小将们听了并不在意。)你们为袁振翻案,我们工人阶级坚决做你们的坚强后盾。(当其他小将告诉他与他说话的“眼镜”,就是大名鼎鼎的五中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刘灏司令时,杨

承孝的口气更激动了。)卫恒迫害我们的好经理,我们工人阶级支持你们炮轰卫恒! ”

杨承孝拍着胸膛向刘灏表态,让刘灏好不感动。有工人阶级站出来支持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省委,这正是他眼下求之不得的大好事。毛主席老人家早有最高指示,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又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些最高指示刘灏虽然稔熟于心,但自打杀向社会,成立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后,偏偏身边缺的就是工人阶级。兵强马壮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是死保省委死保卫恒的保皇派,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没有工人队伍,怎么能显示那段最高指示中讲的那种“最后分界线”和“标准”呢

“你有多少人马?”刘灏问。

对方依旧拍拍胸膛:“就我一个!”

好不叫人失望。没有兵马还能算得上是工人阶级吗?还好,杨承孝当即向刘司令表态,说回到单位马上就招兵买马扯旗放炮,拥戴刘司令,鞍前马后任其调遣,誓死革命造反。

数日后,杨承孝果然不悔前诺,找刘灏报喜来了:“刘司令,我已经拉起队伍来了,你瞧,就叫井冈山兵团冶金第一团。”

抬抬胳膊,果然戴着印有井冈山兵团冶金第一团的红袖章。

“有多少人?”

“暂时十来个,全是清一色的工人阶级。”

“什么是清一色?”

“就是他妈的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

杨承孝也许觉得这位学生娃的问话实在多余。革命、造反，不就是要向走资派开火吗？走资派都是共产党的领导，造他们的反，能要共产党员吗？可刘灏却为杨承孝的这句话，心里由不得一颤。20多年之后，说起这件往事，刘灏依旧记忆犹新。保袁振，为袁振翻案，那是刘灏心中认定袁振是好党员好干部，是受了卫恒的迫害。打卫恒，那是刘灏心中认定卫恒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中说的走资派，是钻进共产党里面的黑帮分子。在年轻的中学生心中，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是人世间最崇高最神圣的字眼和人物，革命和造反，怎么就“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要”呢？他再次打量一下杨承孝，这样的工人阶级，靠得住吗？

然而，对于一位极欲果腹的行路者，能拣到几颗麦粒，远比拣到一颗珍珠要实际得多。身处那个时代，立志革命造反，急于扩大力量的刘灏，18岁的大脑里想得最多的，自然是可食的麦粒而不是不能充饥的珍珠了。

刘灏便拉住了杨承孝的手，大声表了态：“我们井冈山接收你啦！”

井冈山兵团冶金第一团团长杨承孝，自打归顺到了刘灏司令麾下，自然也成了袁振家里的常客。再往后，杨承孝的队伍越来越大，革命造反的势头越来越猛，刘格平家的大门也就向他敞开了。

顺便说一句，最初杨承孝的旗号是“井冈山兵团冶金第一团”，待后来刘灏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杨承孝的那个“井冈山兵团冶金第一团”，就改成“兵团决死纵队”了，其所冠“兵团”，则是指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来杨承孝自立门户，他所率领的“决死纵队”就再不冠名什么“兵团”了，他自个也就成了山西一派群众组织的司令。历史总是从容且迅捷地翻过一页又一页，杨承孝从1966年夏天迅速崛起，再到1970年的11月10日被押赴刑场，一命呜乎，如鲁迅笔下的阿

Q 一般,度过了他革命造反的短暂辉煌。他的故事,他在那几年的心路历程,已经无法与他本人核实了。他对“文革”的理解,他参与“文革”的热情和勇气,以及他的性格特点,我也只能从与他有过交往的当事人口中,获得一些片言只语的说法。有当年决死纵队战士说,杨司令口才挺好,背起毛主席语录来,一句一句很顺溜。杨司令也有理论高度,会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号马列主义的话。但杨承孝和中国历史上的造反领袖一样,往往是,革命一成功,便首先考虑如何来犒劳自己。据说,杨承孝造反成功,打倒了中共山西省委以后,曾有过将全家搬进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那座小楼的念头,但卫恒被他囚禁了,家人也被撵出了那座小楼,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下属太原十二中红旗的一帮中学生们,已先行占领了卫恒一家所住的小楼。都是参与向省委夺权的革命战友们,杨司令还懂得不能为这事和刘灏的部下闹起来。这只是一种传闻,事实是杨承孝举家搬进了省政府西院宿舍8排2号。这个排房小院,原来是省物资局局长的住所,“文革”前这位领导搬走后,这个小院一直空着。杨承孝一家住进来后,他的三名保镖,也一道住了进来。一名是贴身警卫,姓孟,长短枪从不离身。另两名是看家护院的,也总是带着短枪。杨承孝出门有车,是辆伏尔加小轿车。他的老婆出出进进,嘴里总是叼着香烟。两个儿子小平和小虎,和邻居们家的孩子们,倒常在一起玩。应当看到,杨承孝的“文革”历程,更具有民间的草根气息。凡出身不好的人,在那个年代,往往处在噤若寒蝉般的生存状态。杨承孝的父亲当过旧警官,可家庭出身不好的杨承孝,不但拉起了革命造反的队伍,而且能出入刘格平和袁振这样的高干家中,成了他们倚重的工人领袖,最后担任了山西革命造反夺权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不能不说与他的胆大、义气等性格有关。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出身的保卫干部王洪文,和太原的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公司的一线工人杨承孝,在“文革”初

期起来革命造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前冲，那时，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只不过王洪文比杨承孝攀得更高，好活的日子更多了几年而已。

说罢杨承孝，还需要再说说另一个人，他不是工人，而是省级机关一个懂得无线电技术的知识分子干部，名叫汤建中。

1966年，汤建中正在山西省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机务科的副科长。这位汤科长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既懂技术，又是年轻的党员干部，还特别爱看书，古今中外的历史典故知道不少。“文革”开始时，他正在洪洞县的霍山顶上，参与建设被命名为328的一项保密工程，其工程内容，是建设一座高山转播台。汤建中在328工程工地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在那项工程中，也可谓身负重任了。此人爱思考，遇事也爱发表个与众不同的看法，比如当时报纸上有林彪副主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论述，别人看了说林副主席的论述真伟大，他偏要抬杠，说毛泽东思想到了顶峰，是不是以后就不再发展了？正如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所寓，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有人明明看见皇帝没穿衣服而只敢认为是自个看走了眼，有人看出来了却不敢说也不愿说，说真话的，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大傻蛋。比如那时最时髦学毛主席语录，他偏要在学习会上说学语录容易断章取义，要学就得读原著。那时敢说这种话是大不敬，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类话平时说得太多了，“文革”初始，机关就有人给他贴出大字报。他在运动初期也就成了广播电台机关内，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三反分子”，（“三反”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被隔离在后小河山西四清报社的那座小楼内。运动继续发展，矛头指向党内的走资派了，他这个“三反分子”没人理了，也没人批了。1966年10月下旬，被隔离的汤建中见没有人看管自己了，他也就不再关心本单位的事儿，走出了隔离室，跑到社会上去看大字报。那阵子，省委、省人委和市委、市人

委门前的大字报很多，袁振问题是大字报上辩论的一个焦点。看来看去，他对袁振的问题就有了自个的认识：毛主席要炮打司令部，省委抛出袁振来，恐怕是想保自个的问题。

有一天，汤建中又来到市委大院看大字报。那一天，带人到市委大院又去贴大字报的刘灏，正被一群人围住。这群人是反对袁振的，人多口杂，把个刘灏连骂带批，闹得难以招架。偏偏这时汤建中就挤进来了。挤进来可不是看热闹，他开口了，且口若悬河，以他对袁振问题的理解，滔滔雄辩，竟然把那群人镇的再接不上话头。猛然间出现了一个操着上海腔，穿着打扮像干部的人“舌战群儒”，刘灏真是喜出望外。助战的汤建中成了主将，刘灏反而成了陪衬。有汤建中伶牙俐齿，刘灏反败为胜，直到辩得没有了对手，他才问这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姓甚名谁，在哪里上班？于是两人就相识了，当晚就谈得十分投机。汤建中当即将刘灏作为朋友，从此与刘灏经常见面，介入了太原五中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的决策层。汤建中比刘灏大14岁，交情日深，刘灏戏称其为“高参”。汤建中从此常留宿五中，晚饭后，便找一间教室，与刘灏和他的同伴们闲聊。他用带上海腔的普通话说古论今，如讲坛开讲，吸引了大批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学生们。日后刘灏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后，兵团司令刘灏左右的人们，便沿用了刘灏的叫法，也对汤建中称之为“汤高参”。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个群众组织中没有任何职务的汤建中，就因为充当着“汤高参”的角色，最终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悲剧。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发展史上，汤建中可谓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可以说，自打汤建中与刘灏相识后，从此刘灏的许多决策，便离不开汤建中的思维了。文化大革命使这两人成了忘年交，汤建中也以这位年轻的中学生为政治依托，要施展自己的一番政治才干和抱负了。也正因为汤建中这位技术人才不再搞技术，转而成了山西一大派群众组织的“汤高参”，日后终于被打成混进革

命群众组织的坏人，成了被中共中央批准逮捕并判为无期徒刑的囚犯。他的结局，将在本书第九章第2节《谢振华下令杀一个关一个》中提及。

【3】抢夺“黑材料”

刘灏为袁振给中央送的材料，犹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刘灏与袁振策划了新建路礼堂事件，袁振的申辩书是公诸于社会了，可等待山西省委给袁振平反，却又是一个没有结果。于是袁振找来刘灏商议：“我认识的中央那些头头脑脑们，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现在也拿不准了。咱们唯一能拿准的，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代表毛主席司令部。我是不是在华北局会议上受了冤枉？山西省委是不是迫害了我？只有请中央文革裁决才是上策。”

此话说得对，刘灏频频点头。继续商量下去，思路更加明确。袁振的申辩书和小将们为袁振翻案的材料是现成的，但只有这些“红材料”还不行。要想让中央文革全面了解山西的情况，还得把有关的“黑材料”也弄到手。如果能把两种材料一道送往中央文革小组，袁振和山西省委谁是红的？谁是黑的？还愁中央文革小组不一目了然吗？

有必要向现在的年轻读者们解释一下“黑材料”的含义了。

“文革”中，什么文字都可能被定为“黑材料”，它可以由不同的人任意来界定。让我们先从中央文革小组举例。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混事，艺名蓝萍。江青成了“文革旗手”，身居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的高位，岂能让自己的这段历史留作别人的话柄？上海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与蓝萍小姐一道共事，他们保留着昔日的旧报纸、旧照片、旧书信、旧日记，其中难免会留下蓝萍小姐的芳名倩影和风流韵事的片言只语。这些东西，便被

江青定为“黑材料”。“黑材料”得销毁，曾持有过这种“黑材料”或者见过和可能持有人，就会受到加倍迫害。

另外，“文革”初始，刘少奇主持党中央工作，按中共搞运动的老办法，先向北京的大专院校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和校党委一道，给师生们按左中右排队，形成文字入档，有的学生因为种种言论，成了工作组和校党委打击的对象。具体到山西，省委还没有向大专院校全面派驻工作组，学校运动，由党委掌控。以山西大学为例，在这所山西的高校首府，校党委也沿用了过去历次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时的做法，给学生们划分了左中右。各系党支部基本上都对所谓右派学生形成文字、整了材料，以便运动后期处理。想一想吧，当年反右派时，毛泽东不就是这么搞的吗？可这一回毛泽东要发动学生造反，各级党委都想不到领袖变了个做法。等到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用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将刘少奇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和校党委原先整的材料，也就成了被整学生们要抢出来销毁的“黑材料”了。

再以太原五中举例。校党总支在运动开始后，有关如何领导运动的所有会议记录、对学生们大字报的记录和对学生们思想状况的分析和分类，凡此种种，都是被造反派学生们定性的“黑材料”。刘灏的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炮轰校党总支，抢出这些“黑材料”来，就是校党总支的罪证。待“文革”越深入发展，“黑材料”的名堂便越多。大凡被一派群众组织认定对自个不利的文字材料，都可以由这派群众组织定性为“黑材料”。对所谓的这种“黑材料”，除了要抢、要夺、要烧毁以外，有的就会被群众组织送到中央文革去请求“圣裁”。

在前门饭店召开的华北局工作会议上，袁振揭发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是为封、资、修服务；省委公开支持出版《傅山画集》就是政治问题。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会上会下都不承认这是问题，其他的省委

领导们也不承认这是问题。刘灏与他的中学生战友们，虽然对傅山这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或者全然不知，但在横扫牛鬼蛇神的那个时代，他们认定省委支持办《傅山展览》、支持出《傅山画集》，就是为封、资、修摇旗呐喊，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行为。袁振揭发省委是革命造反行为，而省委打击袁振正是要坚持自己的反革命罪行。刘灏先是派出尖刀班，就此问题与省委辩论。尖刀班的小将们没找到卫恒，却找到了省委书记处书记郑林。小将们拼刺刀要一刀见血，口口声声说傅山是封、资、修。郑林的回击也理直气壮：“傅山是个古人，算个秀才，群众中流传他会画、会写、会看病，有民族气节。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强调民族气节……”尖刀班拼刺刀拼不出名堂，回禀刘司令，刘司令心中更加认定“黑省委”这种死不认账的态度，只能说明有关傅山的材料，正是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报送的“黑材料”，只有抢到这些“黑材料”，才能向中央文革小组说明袁振不但无罪，而且揭发山西省委有功。有这些“黑材料”为证，山西省委是“黑省委”，岂不铁证如山了吗？

“黑材料”可不是能轻易到手的，唯有一个办法：抢。抢太原五中党总支的“黑材料”好办，可要想抢出山西省委的这些“黑材料”，刘灏就得想想自个的力量了。

刘灏与袁振同时想到了杨承孝。有工人阶级组成的兵团冶金第一团，还愁“黑材料”抢不到手？

1966年9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灏率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将士们出发了，摇旗呐喊的是中学生，打先锋的是杨承孝的冶金第一团，第一个战场是太原市文化局办公楼。兵团将士蜂拥而至，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是一次革命行动。中学生们先齐声高呼口号：“把‘黑省委’大搞封、资、修的‘黑材料’交出来！”值班的干部们吓得双腿直抖，还没有弄清这些来造反的学生们喊的“黑材料”是指什么，早有一群工

人冲进了楼内，领头的，正是兵团冶金第一团的杨承孝团长。他们可懒得呼什么口号，跟上革命小将刘司令是来革命造反的，光喊口号怎么能过瘾？在车间和工地上练就了的那些手和脚，此时无须借助任何工具，飞起脚来，关闭的门自能踢开。舞动双手，办公桌和文件柜上的锁头不愁扭开。工人阶级的脚嘣嘣地一路踢将下去，工人阶级的手随着咔咔声一路扭将下去，很快，兵团冶金第一团的作战部长车成林，就将装满了各种锁头的一个大包提到了刘司令和杨团长面前。刘灏面对那一个大包，由不得目瞪口呆：“我要的是‘黑材料’，要这一包锁头有啥用嘛！”仅仅是这么一句责备话，杨承孝就不高兴了，脸上的笑容也刹那间不见了：“不扫清这些地雷，你们能弄出‘黑材料’来？再说，啥是‘黑材料’，我们也弄不清楚。”说的也对，刘灏顿时感到有了工人阶级队伍，革命造反的劲头就是不一样了。司令把手一挥，中学生们紧随在工人们身后，有了用武之地，门开了，锁砸了，不管是档案还是文件，只要是白纸黑字，统统抢走再说。

文化局大楼首战大捷，撂下办公室和楼道里的一片狼藉，立即挥师太原图片社。再接着，驱车直奔太原文管会。一夜连战三处，黎明前井冈山将士班师回到五中。杨承孝带着兵团冶金第一团初试锋芒，使五中井冈山在省城的群众组织中再次威名大振。18岁的小将刘司令，为袁振平反又立下了汗马功劳。按袁振的吩咐，从抢来的“黑材料”中，凡是有关出版《傅山画集》和筹划《傅山展览》的报告、方案、批件、目录、经费计划等等文字，统统挑出来送中央文革小组，看看你“黑省委”是不是搞了封、资、修？然而，这种事，杨承孝干不了，刘灏不屑干。袁振下令，自有人专门负责挑选。挑好了，即刻委托革命小将送到了北京。随着这批“黑材料”一道送中央文革小组的，还有袁振的申辩材料。那时中央文革的首长们，送材料的小将们是见不上的，就如他们的刘司令在中南海门口乱撞一样，他们只能在中央文革接待站，把袁

振的申辩材料和抢到的这些“黑材料”留下。

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20多年后，中国大地上改革春风浩荡，古城太原，傅山研究会成立了，傅山纪念馆也在多方筹备之中。有人试图找回“文革”中被袁振和兵团小将送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那批“黑材料”，然而时过境迁，这一愿望犹如水中捞月，根本不知该如何下手。

给中央文革小组送了抢来的“黑材料”，袁振的案还是翻不了，袁振和刘灏不得不另想革命的途径。此时，在袁振和刘灏之间，已经有了汤建中的介入。办法自然有，那就是扩大队伍，先成立一个跨行业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此事刘灏与山西大学外语系大一学生方培泉等人早已议定，方培泉外调迟迟未归，汤建中建议此事不可再拖，且司令非刘灏莫属。只要这个大组织成立，再逼省委宣布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造反组织，省委承认的革命造反组织再为袁振翻案，岂不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了？

刘灏不得不佩服，看看市委第一书记和身边这位邂逅的“汤高参”，心里说，还是他们想问题比自个高明。

【4】炮打省委指挥部揪斗卫恒

那天晚上刘灏率众抢“黑材料”的行动，使刘司令斗志大增，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了。

无须去猜测和描述卫恒当时的处境和内心的痛苦了，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小小的插曲，足以说明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的那种痛苦心情，以及他作为执掌山西大权的党内高干，在万般无奈中的那种善良愿望。省委第一书记只听说五中的一个中学生叫刘灏，不但给他贴了大字报，第一次把他定为“黑帮”，还听说了这个中学生带领他的井冈山

兵团和一帮工人，抢了太原市文化局、图片社和文管会的所谓“黑材料”。试想，此风一旦盛行，党政机关还能再有安宁的日子吗？陷于困境中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决定去扮演一次班主任式的角色。他要了解一下这个中学生的父母是什么人，通过其父母再去做这个孩子的思想工作。他也许相信如此而为，会起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成效。情况很快弄明白了，刘灏的父亲是驻晋解放军某部医院的院长，这医院的所在地就在太原。于是，省委第一书记立即派人去请这所部队医院的院长，名为替自个“看病”，实际上要通过这位院长，请他好好劝劝他那位头脑发了昏的儿子。这位部队领导奉命赶来，为驻地的省委第一书记“看病”，两人言语间让卫恒好生失望，原来面前的这位院长，根本不是刘灏的父亲。刘灏的父亲是前任院长，一年前已经调往河北保定某部队医院就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只好长叹一口气，对面前的现任院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和这个孩子的父亲熟，能不能替孩子的父亲找这孩子做做工作？叫他甭再闹了，各厂矿的生产现在都在急剧下降，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啊……”那是深深的忧虑，为了国家和人民，



群众造反组织在五一广场批斗省委领导人

也是为了自己。可悲的是，那个时代让人们别无选择，包括像卫恒这样原本在山西位高权重的第一号人物。

再说炮打省委指挥部的那些个大学生们，已经从贴大字报炮轰省委，变成了直接揪斗省委领导。也就在九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卫恒被炮打省委指挥部的一些学生们，揪到了省委第一招待所。说是辩论问题，实际上是开创了揪斗省委领导的先例。

被揪到省委第一招待所，平生第一次接受革命群众批斗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那时的内心深处一定痛苦万分。省委成了被造反派们炮轰的目标，他成了被革命小将们揪斗的对象，而身为省委第一书记，他还得听毛主席的话，支持学生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当然，无论是面对炮轰省委的大字报，还是面对揪斗他的学生们，他都不敢也不愿站到学生运动的对立面去。革命和造反的理论，在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一次又一次地昭告着全党和全民，学生们不上课了，工人们不上班了，各行各业都走上社会革命造反了，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往，卫恒也曾领导和参与过党的其他运动，而这样的运动，他如何能领导？省委又如何能领导？他弄不明白。但弄不明白也得站到运动的第一线，因为，这场运动，可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虔诚让他无奈，无奈的虔诚，又让他不能动摇参加到这场运动第一线的决心。

刘灏没有参加这次行动。虽然是太原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司令，但他也只是炮打省委指挥部的一个成员。他要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要吸纳更多的革命造反组织，用那时的话说，他需要进行大量的革命大串连工作。炮打省委指挥部里有大学生，而刘灏只是一名中学生。炮打省委指挥部的那些个大学生们平时并没有把中学生刘灏看在眼里，而 18 岁的革命闯将刘灏心中期盼的，是在革命大潮中高举红旗而独领风骚。

就在卫恒被大学生们揪斗完，刚刚回到省委机关，就见到了刘灏派人贴出的大字报，白纸黑字，明令要与省委第一书记进行“革命谈判”。

【5】与卫恒的“革命谈判”有了结果

这一年的9月19日，炮轰省委的刘灏终于见到了卫恒，卫恒也终于认识了这位太原五中的革命小将。这次见面的地点是在省委机关的会议室，不是省委第一书记主动召见，而是刘灏与省城其他学校一些造反组织的领袖们策划，对省委第一书记的一次联合突击。人数不多，就二十来人，这些人既有炮轰省委指挥部的骨干，也有刘灏计划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联络下的新战友。

其时，炮轰省委指挥部正在分裂。造成分裂的原因是观点不同，而观点不同的要害是袁振问题。袁振是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受省委迫害的，支持袁振，炮轰省委，打倒卫、王、王，这是刘灏始终不变的观点。但另一些学生领袖们却不干了。他们认为，袁振是红是黑，还需要澄清，袁振本人就是省委的一个重要成员，省委抛出袁振是在舍车保帅，要炮轰省委，自然也要包括炮轰袁振。刘灏要跳出炮轰省委指挥部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另一些与刘灏在袁振问题上有分歧的大学生领袖，要和刘灏分道扬镳了。

闯进了省委办公厅，挑头的刘灏早已想好，今天不多说袁振问题，一定要紧紧抓住成立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这件事。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能和你卫恒继续斗下去。你省委第一书记今天必须明确表态，承认我们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行动。

学生的理论是混乱的——学生们既要炮轰省委，省委已经被认定是“黑省委”了，又何苦要让省委承认你们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

织呢？如果得到“黑省委”的认可，你们要成立的组织不也成黑的了吗？但那时的学生造反派领袖们自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北京的毛主席老人家支持，堂而皇之地坐进了省委办公厅的会议室里，要求却又分外简单——别的领导都不见，就得见省委第一书记；目的也分外明确——省委必须承认和支持我们成立一个炮轰省委的革命造反组织。那是无序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有的无序的行动，但却是真实的历史。

出生入死几十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理解也得执行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绝不愿意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绝不愿意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革命小将找上门来了，卫恒不能躲避也不敢躲避。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岂能将矛盾推给自己班子里的助手？他来了，走进了原本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们和常委们开会的地方。在这个会议室里，他曾领导省委一班人，多次描绘过山西省未来的前景，多次为实现这远景进行过决策。可疾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将原有的秩序全部冲垮了。毛主席要反修防修，要带头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成了全国革命小将们的红司令，现在，小将们要成立一个跨学校跨行业的革命群众组织，而且要让他承认是合法的革命造反组织，他能不承认吗？人家这回来可不是揪斗，口口声声是来“谈判”的，他能不出席吗？扫一眼那二十来个怒目圆睁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们，省委第一书记慢慢地坐下了。他想尽量以平和的态度，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到革命群众中去，与革命群众一道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刘灏就坐在了卫恒的对面。不，应该说，此时的刘灏正在感受着一种大革命赋予他的巨大变化。他能感到自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位置。能和卫恒在这里平起平坐地进行谈判，又使他感到了一种油然而生的勇气和力量。他想：要不是有幸赶上了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中学生，哪有机会能经受这样疾

风暴雨的锻炼和考验？

卫恒与面前这个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学生对视了。他或许看到了这个中学生脸上的稚嫩，或许看到了这个中学生眼中对他的仇视。从投身革命那一天起，他感受到的就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党的热爱。他一定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使这些年轻娃娃们与省委形成如此可怕的对立？他要缓和一下气氛。省委第一书记先向坐在对面的这位中学生点点头，一副长者风度，用和蔼和可亲的语气回道：“你叫什么名字呀？”

“刘灏。”回答自信而又冷漠。

“哦——你就叫刘灏？”省委第一书记大约怎么也不愿相信，这么一个毛头娃娃，就是兴风作浪，大闹省城的那个兵团司令。原本是一句吃惊的自语，当即遭到了刘灏的怒斥：

“是刘灏又怎么了？”

卫恒只能好言相劝，阐述自个的认识：“你的大字报我看了，你那一大堆帽子实在没有啥根据嘛……”

刘灏可不听这一套，劈头打断省委第一书记的话：“没根据？你敢说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根据？”

听听，还能再对话吗？

这小小的交锋过后，接着是你一言他一语的“谈判”。更厉害的，是这些自称代表着全省大中专院校革命学生的学生娃娃们，开始用最高指示逼得省委第一书记上气不接下气，再难以解释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你说，你是不是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是不是革命派？”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你说，你不想承认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是不是想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

经林彪发明后迅速普及全国的这一手实在是厉害。明明是对毛主席语录的断章取义，而卫恒却偏偏不能解释，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一高官，现在成了被革命小将们革命造反的对象，你只要一解释，就会扣你一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革命小将们的思维逻辑和革命手法，省委第一书记可是早就领教过了。还有，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说了：“……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事情就如此明摆着，你不承认这些学生们的造反组织是革命的，那不是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了吗？

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表态说，你们要成立兵团，要搞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支持你们的。在这些中学生的要求下，卫恒又答应给他们即将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一笔经费，还同意让他们进驻省委第一招待所闹革命。历史无须去责怪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时代造成的大气候如此，那时谁当省委第一书记，恐怕其时能做出的选择，也只能与卫恒无异。

刘灏等小将们与省委第一书记的“革命谈判”大获全胜。钱有了，地盘也有了，革命造反的勇气更盛。又经过一番串连，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大旗，开始高扬在省委第一招待所的大楼上。刘灏被推举为司令，六中的段建中是政委。除了五中井冈山是兵团的基本队伍外，六中 32111 公社的李金渭、刘大康、齐福增、史纪礼等、七中 115 师的田大成等、还有来自山西大学的叶积凯、王清英、焦根林等，都带着人马齐聚在刘灏麾下。汤建中呢，汤高参的雅号依旧顺延下来。

炮轰省委指挥部基本上解体了。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是全省第一个跨行业的群众造反组织。它由

省委第一书记批准成立，革命造反的矛头，恰恰又是对准了省委第一书记，以及他领导下的中共山西省委。

【6】红联站继兵团之后也树起大旗

闷热的夏天过去了，秋天已至。

1966年10月9日到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全部到会。林彪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上做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中央工作会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央工作会议还让各省省委检查自己，在领导本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山西省委的小组会上，对山西省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批评和指责，称山西省委执行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卫恒和王谦赴京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留守山西主持省委工作。10月26日下午，由太工红旗的杨保明、李青山、张玉峰等大学生发起，串连了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山西医学院革命造反队、太原十中七一、太原十二中东方红、太



太工红旗挑头组建红联站，红旗宣传车开进市区

原冶金学校红卫兵造反队、太原会计学校井冈山等七家院校的革命群众组织,集合起约 200 余人的学生请愿队伍,来到省委要和省委谈判,要求省委“公开销毁工作队进校后整理师生们的黑材料”。王大任书记和武光汤副省长接见了太原工学院的杨保明、李青山、张玉峰、省委党校的段立生、太原十中的马尚文、张定基、冶金学校的吉顺心等学生代表。小会议室里,围绕着学生们起草好的五项协议,双方申诉着、反驳着、争执着、解释着。外面院子里,静坐的学生们不时地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唱着当时盛行的红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各种各样的《毛主席语录歌》。到饭口了,王大任让武光汤安排给学生们送饭,不久,机关食堂的炊事员便来了,给学生们送来了热气腾腾的烧饼。但无论是屋里谈判的代表,还是屋外静坐喊口号、唱歌的学生,对省委送来的烧饼一概拒绝接受。

学生们起草的协议中,第五条是“省委必须当众彻底交待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王大任书记坚决不同意“罪行”二字。几经争执后,学生代表们同意将“罪行”一词,改为“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凡此种种,双方一词一句地争,一词一句地改,从下午 4 时直到晚上 10 时,王大任书记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这五项协议如下:

1966 年 10 月 26 日,太原工学院,山西省委党校,山西医学院,太原红卫先锋中学(原太原十中),太原十二中,太原红旗战校(原太原十三中),太原冶金学校部分受害革命学生,在省委就坚决执行中央批转军委 10 月 5 日的紧急指示问题,同省委负责同志王大任、武光汤等进行会谈。经过一上午和一晚上的艰苦斗争达成五项协议如下:

(1)省委立即专门组织人员,在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学生代表的监督下(监督办法由受迫害的革命学生同省委共同研究决定),整理交出这些黑材料(即迫害革命同志的材料)。整理之前,应

立即由我们的红卫兵封起来。

(2)省委必须保证省委及各单位的黑材料，层层追究到底。谁指使的，谁执行的，谁检查。谁迫害我们，谁向我们当众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这些材料必须经过群众(不包括整理或汇报这些材料的人)和被迫害的革命学生的同意后，方得处理。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理，更不许擅自销毁。谁若违反，那就是有意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3)在执行过程中，如果学生之间发生分歧，坚决按照十六条，通过正常辩论来解决。

(4)以上各条省委必须责成太原市委、各地、市、县委，立即照此办理。

(5)省委必须当众彻底交待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阻碍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性错误，路线性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得耍阴谋，放暗箭，欺骗群众，蒙混过关。否则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

省委王大任同志加注：

上述五条意见是到会代表提出，我们同意的。序头中提到“协议”问题，是到会代表同志复写时拟的。

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委员会(盖章)

1966年10月26日

面对北京高层的形势，王大任无可奈何地同意了这份协议。之后，这份协议由省委印制发至全省各地。

当晚，胜利了的200余名学生们，饿着肚子，喊着革命造反的口号，唱着红色歌儿，走出了省委。

10月27日，这些学生代表又在太原工学院电机馆开会，决定成立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杨保明担任勤务组总负责人。之后，又与王大任书记谈判，王大任书记同意这个新成立的红联站，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设立办公室。继兵团之后，红联站的大旗，也高扬在省委第二招待所的大楼上。

1·12夺权后，兵团司令部迁至大南门的少年宫，红联站总部迁至新建路的省冶金学校。

兵团与红联站都有了地盘，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不干了。要做官，杀人放火再招安，他们那些反省委的组织省委都承认了，给钱给地盘了，我革命工人联合会坚决保卫省委，怎么能没有钱也没有一块地盘呢？他也带上人去找省委，公开向省委“造反”了。卫恒和王谦对这个公开保省委的工人造反组织，自然另眼相看。一句话，照样给钱给地盘。于是，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就在省城迎泽大街工人文化宫内安下了营盘。不过，有了营盘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依旧和整日围着刘普德转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以及山西红卫兵团等组织一样，被兵团与红联站骂为“保皇狗”。



红联站的袖标

【7】文峪河水库和原平劳改砖场之役

树起兵团大旗，向山西省委开炮，袁振问题只是一发“炮弹”。正

愁没有新的“炮弹”呢，新“炮弹”就送上门来了。一天，有人来找刘灏，自称是原祁县县委书记，被黑省委迫害的晋中反党集团成员，名叫王振国。“文革”前，省委在晋中处理过一个“反党集团案”，受牵连者百余人之多。挑头的，是原专署副专员任井夫，被押在原平劳改砖场劳改；其次，便是前来找革命小将刘灏控诉黑省委罪行的王振国，是从被发配劳改的阳曲县偷偷跑来的；还有一位曾任昔阳县委第一书记的张怀英，被押在文峪河水库劳改。王振国滔滔不绝，向刘灏等革命小将述说了“四清”中发生在晋中的“十月事件”，即省委当时将他们打成“任、王、张反党集团”的过程。“袁振受卫、王、王的迫害，我们比袁振受黑省委的迫害还要厉害呀！”一个当过县委书记的领导干部，很快用自个的控诉，打动了刘灏和他的战友们。刘灏当即决定，让王振国先住在五中，再想法把任井夫和张怀英全救出来。有了这任、王、张三位受黑省委迫害的领导干部，再向山西省委开炮，不是就有了新的炮弹了吗？

定下方案，选下日期，一辆大卡车满载着五中井冈山战士，打着兵团大旗，喊着造反口号，开进了文峪河水库工地。这是刘灏的嫡系，用嫡系放心。找到负责工地保卫的民兵负责人，口口声声要批斗张怀英。见这阵势，那位负责人当下找来了正在劳动的张怀英。刘灏上前，一把将张怀英揪过来，一群井冈山小将，就围着张怀英喊口号让他低头认罪。刘灏又对那位民兵负责人说：“快把他老婆找来一块陪斗！”就有布置好的井冈山战士，簇拥着那位民兵负责人，让他上车带路，到了工地外面张怀英的临时住所。张怀英的老婆还不知又是什么大祸降临，就被几个中学生又推又架地弄到了车上。屋里简单的几件行李，也被学生们抱出来扔到了车上。卡车重新开回工地，刘灏又对那位民兵负责人说：“只在你们工地批斗不行，我们还要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张怀英呢！”对这群学生们的来意莫名其妙的张怀英，就也被

车下的学生们又推又架，车上的学生们又拉又拽地弄到了车上。刘灏不再和那位民兵负责人细说，拉开驾驶室的门，钻进驾驶室，大卡车当即开动了。当那位民兵负责人察觉情况不对时，他的两只脚，那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大卡车的四个轮子了。待他想到鸣枪示警时，大卡车早就消失在公路上的滚滚黄尘中。就这样，张怀英也住进了太原五中。

去原平劳改砖场救任井夫，可就没有去文峪河水库那般顺利了。砖场大门外有警戒线，警戒线内，有持枪站岗的公安战士。一见这阵势，刘灏先跳下车来摆摆手，不敢让身后的队伍硬往里闯了。同行的学生们有胆大的，舞动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太原五中井冈山的大旗，扯一扯臂上的红袖章，不听司令命令，就要往警戒线里闯，他们刚过警戒线，里面站岗的公安战士，便抬起枪口，朝天鸣枪了。刘灏大喊着让他们退回来，无奈地下令退兵，上车返回太原。

硬干不成，那就再动脑子吧。卫恒刚开罢中央工作会议回到太原，刘灏就找上门来了。一见面，刘灏就拿出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要批斗反革命分子任井夫的一份决定，决定上盖着红红的大图章，这可是你卫恒批准成立的革命造反群众组织的大印啊！卫恒只好表态了，表示支持革命小将批斗任井夫的革命行动。刘灏要的就是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眨眨眼，提出了具体要求：“我们要把任井夫提出来批斗！”见卫恒有些迟疑，刘灏的态度更强硬了：“你是不是想同情和包庇任井夫？”这本是不尽情理的逼问，晋中任、王、张一案，是上过省委常委会的，卫恒岂能同情和包庇他们？他只好签字同意让省劳改局具体办理“借人”手续。于是，一路顺风，再到原平劳改砖场后，递上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决定，砖场领导看看上面省委第一书记的签字，还有省劳改局的同意意见，任井夫就被刘灏带来的革命小将们顺利接出来了。

任、王、张三人一直住在太原五中，不再受罪，天天有吃有喝，刘灏让他们做的事，就是写写揭发卫、王、王的材料。由刘灏搭桥，袁振和刘格平很快结识了这三位“受黑省委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刘格平正在用人之际，这三人自然成了刘格平重用的人物。1967年1月12日刘格平组织山西夺权成功后，晋中一些群众造反组织，也于1月18日夺了晋中地委和专署的权。刘格平不认可这次夺权，一些组织又于1月31日组织了反夺权。2月11日，任、王、张三名被原省委处理过的干部，被刘格平的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任命为晋中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一块离开五中，回到晋中。再往后，在山西的“文革”发展中，这三人的政治观点，开始与刘灏领导的兵团观点相左，他们支持的群众组织，也与兵团发生了严重对立。这种结果，是刘灏这名中学生在解救任、王、张时，始料未及的。

第四章

兵团的八项要求和卫恒的六条原则针锋相对。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搞好文化大革命，山西省委却被逼进了无法正常工作的困境。

【1】八项要求与六条原则

对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卫恒和王谦回到太原又是贯彻，又是执行，一步也不敢拉下。11月2日，山西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简称三干会）。会场分别设在太原市郊外的晋祠宾馆，和市内的迎泽宾馆两地。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们在晋祠宾馆开会，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亲自主持；行署专员和县长以及各大厂矿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们，在迎泽宾馆开会，由省长王谦主持。会议内容一是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二是安排下一步领导好文化大革命和抓好生产。

虽说不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但兵团和红联站却派出人马直奔京城。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了这些学生，林彪、陈伯达的讲话和康生在山西代表团的态度，关锋向学生们说了个一清二楚。根据“中央来电”——这是“文革”中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中央不是指党中央也不是指中央文革小组，凡各地造反派组织派人在北京打听到的种种消息，在电告本组织时，都可以称之为“中央来电”或“北京来电”——兵团和红联站再次联手，向省委三干会发起猛攻。

山西省委要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兵团和红联站却认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黑省委”，明里说是要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实际上还在坚持错误。有林彪和陈伯达的讲话撑腰，有康生对山西省委的批评，他们造反的胆气更盛也更足了。

先是兵团与红联站组织人马，在11月2号和11月6号，两次冲击了晋祠宾馆，卫恒和与会的其他省委领导被围攻，三干会被迫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经风雨见世面”的兵团司令刘灏，此时比红联站的那些大学生们的招数还厉害。两次冲击三干会，只不过是把黑省委的三干会搅得不能正常开了，但三干会还在晋祠宾馆继续开着。古代兵法云，擒贼先擒王，刘灏要带领兵团直接对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下手了。11月8日，刘灏在没有和红联站通气的情况下，带人来到了晋祠宾馆，一下子就把正在准备开会的卫恒堵在了屋子里。你卫恒不是要开会嘛？你不是要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嘛，我们当然要让你把会开好。但我们现在是来“请”你的，“请”你到我们兵团的驻地去，咱们一道来清算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道来解决解决袁振问题。老实说，这个“请”字，确实显示了刘灏的聪明。革命造反派“请”你你还不来，这不是说明你还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支持学生运动吗？卫恒不去是不行的。明知是鸿门宴，他也得去。省委第一书记明白，刘灏口口声声那个“请”字，其实和“揪”字的含义相同。刘灏果然就把卫恒“请”到了兵团的驻地，而这驻地，还是卫恒亲自批准的。给卫恒做陪的，还有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这是秩序和反秩序的较量，也是理性和非理性的抗争。

刘灏代表兵团，向卫恒提出了八项要求。

一、交出卫恒历年来的讲话稿。（自然是要供大批判用）二、交出省委整群众，包括整袁振的黑材料。（给省委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这些材料就是罪证）三、凡群众召开一切批判大会，卫恒必

须随叫随到。四、省委让贾俊取代袁振，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是不合法的。（袁振无罪，怎么能让别人取代他代理太原市的第一把手呢？）五、撤消省委派往各单位的工作组、联络员和大大小小没有卫恒的“卫恒”。（这一条确实也符合那时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刘少奇不就是因为往首都大专院校派工作组，被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成了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了吗？山西省委也派出工作组进驻了太原市委，进驻了一些大专院校，这不是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什么？）六、给受迫害的袁振彻底平反。（这一条，在“文革”初期似乎成了刘灏的一个大目标，也成了他革命和造反时的一块心病）七、革命造反组织要有广播宣传车。（有林彪副主席“枪杆子笔杆子，革命要靠这两杆子”的革命指示，刘灏知道枪杆子在军队手里，他得先用笔杆子来战斗）八、兵团要在省委设立联络站。（无理归无理，但口气大得很）

一开始，卫恒还是冷静的。不管刘灏和面前的一群学生们怎样阐述他们的八项要求，省委第一书记胸有成竹。第一，你们这八项要求我无权答复，省委也不能答复。第二，运动初期凡是错整了群众的地方，省委可以按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平反。第三，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不在此例。第四，可以撤出省委派驻太原市委的工作组，但市委要工作，代理市委第一书记贾俊不能撤。第五，以后太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撤不撤和换不换人，得省委常委们开会后才能决定。第六，兵团要广播车可以给，但要有购置设备的时间，不能马上就给。

一方坚持八条要求步步紧逼，一方坚守六条原则毫不松口。白天过去了，夜晚来临了，这种名为“谈判”实为批判的对峙，还在没有结果的进行中。

双方的这种态度，使“谈判”无法谈拢。卫恒不答应刘灏的八项要求，刘灏与学生们和省委第一书记的“谈判”就结束不了。一天一夜

了，兵团的小将们可以轮番上阵，他们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热血涌动，加上年轻体壮，一个个是越战越勇。可年龄已五十出头的卫恒，喝不上一口水，闭不得一下眼，头脑渐渐地昏昏然了，越来越体力不支了。早有准备的刘灏和他的战友们一改战法，使出了第二招：毛主席早有最高指示，不是说搞好文化大革命要靠大鸣大放大辩论吗？你卫恒不是死活不同意我们的八项要求吗？那好，咱们就到太原市最热闹的五一广场大辩论去，让参加三干会的干部们和全太原市的工人群众，都停工停产来听听，看究竟是你卫恒有理？还是我们革命小将有理？

还不等卫恒听明白，一份早已拟好的《海报》，就递到了卫恒的面前。

“我看这海报就不要贴了，停工停产更不行呀……”省委第一书记几乎变成商量的口气了。

“怎么？你还想以生产压革命？不敢去五一广场，你是不是怕群众？你不敢公开辩论袁振问题，是不是还想迫害袁振……”在当时用革命口号和各种大帽子构成的世界里，省委第一书记无言以对。

刘灏将那张海报放在了卫恒的面前。其他小将们继续在口口声声地讨伐着卫恒，让他快快签字。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党的省委第一书记、高级领导干部，面对高居神坛之上的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的这场运动，面对口口声声按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要大搞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小将们，该是何等的无奈。即便对中央这次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和林彪的讲话有看法，不理解，但多少年来养成的组织观念，加上对领袖毛泽东的绝对信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按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去做，绝不愿意成为革命小将们的对立面。

9日凌晨4时左右，卫恒终于掏出他那支签发过山西省委许多重

要文件的钢笔，面对这张兵团的《海报》，在刘灏指定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的退缩，也是卫恒在特定形势下无奈的一种选择。有最高指示让他们这些人“到群众中去”，有中央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让他们这些人检查自己。或许，还有渐渐不支的体力状态，和头脑昏昏然中，想急于要结束这种“谈判”的心态……

刘灏一把抢过这张有了卫恒签字同意的《海报》草稿，一边安排人把卫恒和王大任送回省委，一边按捺不住心头胜利的喜悦，夺门而出，安排另外的手下立即印制《海报》，当天务必贴满太原市。

【2】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

被释放的卫恒和王大任，在黎明前被刘灏派出的几个学生送回到了省委机关，当卫恒向一直等他的其他省委领导通报了自己签字的情况后，由王谦省长带头，其他领导当即对他们的第一书记提出批评，认为他这样做，容易引起大会辩论时群众斗群众，还会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使省委对运动的领导走向被动。卫恒接受了同志们的批评，当即以个人名义，写出了《关于海报的声明》，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以个人名义同学生签定《海报》是错误的，希望机关干部和职工、市民不要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不要与学生们发生冲突。”并于 10 号将他的这份个人声明公布于社会。而此时，兵团印制好的那张《海报》(上面当然少不了卫恒的签字)早已贴满省城太原的大街小巷了。

认识到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要退，一心要将卫恒揪到五一广场的刘灏岂能让兵团改变战略部署？兵团于当天也贴出了声明，向社会宣布与卫恒的辩论会将如期举行。兵团的这一声明，是直接针对卫恒《关于海报的声明》的回敬，声明中还宣称：“袁振问题是山西文化大

革命的关键，不懂袁振问题就是不懂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天下午还不到两点，兵团就与北京来山西串连的学生组织首都赴晋造反大队一道联手，还召集了一些省城的其他群众造反组织，在五一广场举行了集会，同时派人赶到省委，勒令卫恒必须如约到会参加辩论。造反派们要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在五一广场公开辩论，这在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还是首次。这事儿真够新鲜也真够刺激的了！那天下午，在太原五一广场上，骤然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拿广场以往在省、市委和政府组织集会时的容纳量来估算，那天组成的人山人海，大约不少于30万人。18岁的刘司令第一次站在广场的主席台上，身旁是自己的战友们，台下是自己的将士们，望着兵团的大旗在风中高高飘扬，看着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人群，他的自我感觉进入了从未有过状态。确实感到了领袖“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这句最高指示对自己的具体演化。他沉浸在一种革命的激情和幸福感之中。

然而，此时的刘灏万万没有想到，省城与兵团、红联站观点对立，坚持保省委的群众组织，此时也悄然无声地聚集在广场了。特别是革命工人联合会，他们的会长张志安更不是等闲之辈。你刘司令不是要与省委第一书记辩论吗？由张会长组织的革命工人联合会大批人马，也从四面八方到会了。虽然没有人扛出他们的大旗，但人员早已分批混在了广场的人群中，而且更多的人，是混在了主席台四周靠前的人群中。

山西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第一次决战将要开始，刘司令，你就等着瞧吧！

下午两点四十分，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悄然停在了广场西侧的人民银行大楼下。卫恒来了。没有人注意到他。即便有人看到了停下的这辆小车和车上下来一个人，也不会认识他。省委第一书记实在与普通人没有两样。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视机，省委领导人的活动只是见诸

于报纸和广播，他们的名字和职务，老百姓们是熟悉的，他们的相貌，却并不如今天的领导人一样，能在电视上让人们天天见到。已经变成人山人海的广场，小车无法进去，卫恒只有慢慢地穿过人群，迈着沉重的步伐向主席台走去。他的心情一定太复杂也太矛盾了。他明白，不来，会授学生们以把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地接见革命小将，身为省委的第一书记，怎么能怕革命学生，不敢到他们中间来呢？而来了，一定会使拥护省委的群众与学生们产生冲突。何况，他心中明白，刘灏要与他辩论袁振问题，出头的是一个中学生娃娃，背后的的支持者，却是他认定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犯了严重错误的袁振。在这一点上，他不能示弱。

那真是一段虽短，但对此时的卫恒却显得格外漫长的距离。他终



1966年冬天兵团在五一广场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刘灏讲话。

于走上了以往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劳动节时，他站在上面向集会的群众讲话的主席台，来到了刘灏的身边。

“规定两点开会，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司令对卫恒一声喝斥，仿佛将军在喝斥一位士兵。

麦克风里当即传出卫恒的回答，那苍老而雄宏的声音通过大喇叭，传遍了五一广场：“我是走过来的，所

以误了点时间。”

直到此时,台下的群众才知道那位站到刘司令身边的老人,就是堂堂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应该说,卫恒的回答并没有错误。“走过来”,自然是人民银行大楼那边走过来的。可广场上的群众,却可以理解成卫恒是从省委“走过来”的。本来就对闹哄哄的学生运动不理解,只是怕当反革命不敢说罢了。此时对卫恒这句话的理解,便让台下的许多群众对卫恒有了同情心。黑压压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片噪杂声。台上早有准备的小将们开始呼起口号:“炮轰黑省委!”“打倒山西的土皇帝卫恒!”革命造反的一声声口号刚刚呼完,刘灏正要准备发言时,早有一位年轻的工人跳上了主席台,一把夺过麦克风,抢在刘灏之前开始了主动发言。这真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刘灏和他的诸位战友们还没有弄清楚来者何人,早有准备的“程咬金”,当即发挥出工人诗人的口才,一阵滔滔雄辩,却不是在批“黑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刘灏和他的战友们一时都没有想到,这个跳上台来主动发言的人,竟把矛头对准了兵团和兵团的刘司令。

台上还没来得及乱,广场上的人群中先乱了。支持兵团和反对兵团的群众开始辩论,后来对骂,接着动了手。更有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们,便将早就备好的砖头当武器,往主席台上的兵团小将们身上抛去。18岁的刘司令,一下子完全失去了控制局面的能力。他只能与他的那些战友们一道,押住了卫恒,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在挑动群众斗群众。

卫恒坚决既不低头也不认罪。他生怕引起群众斗群众——那可是《十六条》中毛主席给走资派们定下的罪行呀!省委第一书记从反扭他手臂的学生们中挣扎出来,高举起双臂向台下舞动着,对着麦克风大喊:“同志们,向我开炮,把矛头对准我!”

这宏亮而又颤抖的喊声,在五一广场上空回荡着。它更加激起了

群众对兵团的义愤，广场上更乱了，主席台四周也更乱了。今天，当我如实记录下卫恒当时的这一声呐喊时，我的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述的悲哀。省委第一书记的这一声呐喊，是共和国那段历史中特定的呐喊；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历史误区后，一位省委第一书记的呐喊，也包含着那段历史和特定的文化氛围中，给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造成的荒唐思维和悲剧人生。曾跟着毛泽东出生入死的卫恒，在这声呐喊中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重压？他那时一定想不明白。因为历史不给他思索的余地，时代和领袖只给了他一种权力：“向我开炮！”

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刘司令，眼下真后悔没有带上他的冶金第一团。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弟兄们，在他们的会长张志安的带领下，先将为数不多的学生们分隔开，又蜂拥而上，从主席台上将省委第一书记“劫持”走了。卫恒被救，而直到华灯初放时，刘灏和他的兵团战士们，依然被观点不同的工人们和观点对立的学生们围困着不能离开广场。毕竟人少，炮轰省委的学生们嘶哑的声音，辩驳不过众人之口，一个个趁乱开溜了。在原本计划大获全胜的这场战斗中，兵团的小将们失却了英雄本色。

【3】兵团战士与省委第一书记“拼刺刀”

五一广场与卫恒的大辩论，兵团的策划完全败北，而红联站策划的进驻省委三干会的行动，却表面上大获全胜。这帮造反的大学生们，于 11 月 14 日突然来到晋祠宾馆，强行解散了省委三干会的秘书处，然后由他们组建起了自己的秘书处，要让省委靠边站，由他们来领导正在进行的省委三干会。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个秘书处却指挥不动与会者，与会者一个个全不见了。原来，省委不得不将正在进行的三干会转入地下，在省人委礼堂和省邮电局电话会

议室,由卫恒和其他领导分别做了会议总结和下一步工作的安排。

兵团与红联站的造反行动,促使山西从官场到民间,当即形成了两派观点:山西省委是红是黑?对省委的盖子是揭是捂?是革是保?不同的认识,成了社会上各派群众组织斗争的焦点。

那位曾拍着胸膛要支持刘灏的工人阶级杨承孝,此时已不甘心做兵团冶金第一团小小的团长了。这个杨团长另立山头,成立了十三治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自封司令,再不接受刘司令的管辖。他以新的身份来见刘司令,成了堂堂的司令对司令的对话:“我决死纵队照样支持你们兵团炮轰‘黑省委’,为我们的好经理袁振翻案!”好在这支人马眼下还和兵团站在同一战壕里,刘司令有些无奈,近视镜后面的两只眼,盯着杨承孝只眨眼而没有话可说。当初就觉得这小子靠不住,刘灏突然觉得自己最早的那种感觉是对的。

跑了杨承孝,还有好战友。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领军人物邢晓光,是清华大学井冈山造反兵团司令蒯大富麾下的一名革命小将。当时,邢晓光和一道来山西串连“煽风点火”的那些首都大学生们,可谓“响当当革命造反派”的代表。他们又从首都串连了两个学生组织,一个举着北航播火兵团的大旗,一个打着北农机全无敌的大旗,虽说人马不多,却坚定不移地站在兵团和红联站的一边,支持山西的革命造反派坚决炮轰“黑省委”。广场大辩论没有成功,革命小将们决定奇兵出击,与卫恒刺刀见红。北京的革命小将和兵团、红联站的革命小将组成了一个小分队,那天(具体日期当事人说法不一,但这次行动的细节,刘灏依旧能向我们回忆清楚)一早就冲进了省委,目标明确,直奔省委第一书记的官邸。雄纠纠气昂昂地坐进了客厅,却听秘书说卫书记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哪?回答只有三个字:不知道。刘灏和大伙一商量,找人不如等人,守株待兔的成语也可以活学活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信你卫恒能不回家!等待是漫长的,

尤其是眼下急于“拼刺刀”而见不到目标。刘灏开始用目光巡视这间客厅，他突然觉得自己能以革命者的身份和气派坐进这间客厅，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变化。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太伟大了，能跟上毛主席经风雨见世面，把钻进党内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统统揪出来，这真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的重任。一想到肩上的重任，就增加了革命的警惕性。刘灏突然就听到里屋隐隐约约传出一阵响动。卫恒就在里屋！卫恒根本就没有出去！刘灏有了这种自信的判断，同时升起一种受骗的感觉。他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领着同样有了判断和感觉的小将冲进了里屋。哈哈，卫恒果然刚刚起来。

面对着将自己团团围定的小将们，省委第一书记不得不先行来一番解释：“我昨天晚上吃了八片安眠药，醒不来……”

安眠药，且一吃就是八片！

此时，这种药物的作用远不及政治的作用了，省委第一书记无法入睡，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紧跟毛主席，与群众一道，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刘灏，还有眼前的这些学生娃娃们，却偏偏与他势不两立！他一定想不明白，为什么都在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他与以刘灏打头的这群学生娃娃们之间，却如同水火。

“睁眼先看看眼前的形势吧！你还想狡猾抵赖？”北京的学生们先是一声怒喝后，便将带来的几张照片甩到了卫恒面前。那上面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正被迫跪在批斗台上，毛主席的红小将们揪着他们的头发，按着他们的头颅，拧着他们的胳膊，义愤填膺地正将这些昔日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功臣，眼下的反党集团和走资派们打翻在地。

面对照片，卫恒能说什么呢？是对？还是不对？他只能无言以对

时代已经造成的事。

面对沉默的省委第一书记，刘灏又提出，要卫恒与他们一道回兵团驻地“拼刺刀”。自打投身革命后，从来都是和群众站在一起的省委第一书记，此时没有任何理由不到群众中去，他再次被革命小将“请”到了位于迎泽大街的省委第一招待所。

“文革”中的“拼刺刀”，实际上是小型批斗会。北京来的学生们要卫恒看明白全国的一片大好形势，红联站的学生们要卫恒先承认“黑省委”执行了刘邓的资反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兵团的学生们则口口声声不离袁振事件，逼卫恒表态认罪。学生们发自肺腑地想刺刀见红，刺中刘少奇黑司令部在山西的最大黑帮，而卫恒也想发自肺腑地与学生们进行沟通，以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引导这些他认为并不是敌人的学生们端正方向，搞好他也说不明白该怎样搞好的文化大革命。结果是，他的愿望只能激怒学生们，引来更多的“刺刀”。但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卫恒有卫恒的道理，他们的刺刀依然不能见“红”。认定卫恒在负隅顽抗的学生们，继续加强了火力，面对由伟大领袖激励和鼓动起来的革命小将们，由同一个伟大领袖培养出来的这位高级干部，最后只能以沉默来抵抗“刺刀”了。

正在这时，山西省委党校的大学生、担任兵团十二中红旗战斗队指导员的梁振华，冲进来大喝一声：“革命的战友们，你们看，这是从卫恒家里和办公室刚刚搜出来的反革命罪证！”

罪证何在？一件是伟大领袖高举巨臂的小型石膏像，要命的是石膏像的一条胳膊不见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红太阳，连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岂能将老人家摧残成独臂？仿佛是事前安排好的一般，另一件罪证则是一张蒋介石的画像，画像上，“委员长”不但笑容可掬而且满面红光。当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形象和历史评价，全部定格在华君武先生画出的那个额上贴着一片膏药，形象丑陋

的光头漫画上时,这幅光彩照人的蒋介石画像,便确凿地证明了拥有者妄图变天的狼子野心。当时没有一个学生不为之而震惊。面对这两件“罪证”,他们在震惊中凝固了,又在凝固中爆炸了。刺刀终于见“红”,看你卫恒黑帮还有何话说?

关于这两件“罪证”,卫恒的妻妹侯慧茹女士对我有过解释。侯慧茹女士是卫恒之妻张坤秀的胞妹,随养父姓。她说,她姐夫卫恒家里,当时确实有一尊不到一尺高的毛主席石膏像,姐夫和姐姐工作忙,请老家的一位亲戚来帮忙做家务活。有一次,这位亲戚擦抹桌子时,不小心碰倒了那尊石膏像,砸断了一条胳膊。张坤秀回家得知此事,就把断了胳膊的那尊毛主席石膏像放到了柜子里,不再摆出。此事,她并没有和丈夫说起过。至于那张蒋介石的画像,侯慧茹女士说,她事后详细问过姐姐,姐姐说,从未见过家里有这种东西。

那张蒋介石的画像究竟从哪里来的?我问过刘灏,他也说不清。回忆当年的情形,刘灏说,北京来造反的那帮学生们,当时比他们兵



组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时刘灏(前排右二)与他的战友们。

团小将厉害的多，人家说是从卫恒家里抄出来的，他当时也相信了。还有一种说法，那时大陆和台湾处于军事对峙状态，那张蒋介石的画像，是台湾当局空投到大陆内地的一种政治宣传品。省公安厅将这种宣传品报送省委，是工作需要，作为反面宣传品，省委领导将其放在文件柜中，也绝无任何错误。省委办公厅干部周文，在其所写的《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一文（载《记述刘格平、袁振在山西 112、太原 128 夺权中镇压迫害干部史料》，刘建基、越承亮辑录）中，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我那时作为郑林同志的秘书，亲自处理过类似的传单。公安部门收缴了台湾的这些空飘物后，每个省委领导都送了一套……。当时，郑林同志看过后，我随后就用火焚烧掉了。可见，并不是卫恒同志独有的传单。”

当时，面对这两件学生们刚刚从他家中和办公室里搜出的“罪证”，原本好好的石膏像被谁断臂？卫恒不知道也不好解释，但那种由省公安厅报送省委的台湾空投品，他是绝不会放在家中的。可是，他无法解释。愤怒的学生们不容他再说一句话，早将他按倒在地。无法说话解释的卫恒也愤怒了。他奋力挣扎着，用劲挺起了腰，抬起了头，发出了大声的呐喊：“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

当愤怒的学生们再次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按倒在地时，工人联合会的一彪人马冲进了会场。失去了杨承孝的冶金第一团，刘司令带领的学生们即便有北京来的一些学生们助阵，也不是工人们的对手。工人联合会的领导，青年工人诗人张志安得知兵团与红联站的此番行动，再次发动了突袭。由他带领的工人阶级弟兄们左推右挡，懒得与学生们辩论——他们也辩论不过学生们——只是高喊着“我们也要批斗卫恒”的口号，将卫恒“劫持”出会场，护送回了省委。

刘灏此役再次失利。

失利的刘灏却没有罢休。

他的手下自有革命的小将，兵团的革命的小将们先是开进了太原市委，把主持工作的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贾俊的办公室强占了。那意思明白得很，你贾俊是“黑省委”派来的，是来整袁振的，造你的反当然有理。

接着，兵团十二中红旗的小将们又开进了山西省委，把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办公室也强占了。那意思也明白得很，你卫恒是黑省委的领导，必须打倒。

这种手段，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兵团战士，是比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红联站相对少了些理智，多了几分厉害。他们的造反行为，虽说社会上支持和反对者各不相让，但他们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小闯将，即便他们占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和太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的办公室，这两位执政党的书记，也只能拱手相让，绝不敢用他们还拥有的权力，与这些小将们相抗衡。

【4】五一广场再次揪斗卫恒

兵团要与卫恒再一次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那就是公开揪斗。

刘灏决定没有必要再与卫恒辩论，也没有必要再与卫恒拼什么刺刀了。红语录本里有最高指示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按这样的最高指示收拾卫恒，岂不是顺理成章？

在那个时代，这并不是刘灏一个人的思维。因为林彪副主席说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而不必管毛主席写下那句话时的政治背景和当时所指，是“文革”10年中人们公认的“真理”。在这种“真理”的指引下再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兵团向全

省发出《海报》，11月17日要在太原五一广场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帮分子卫恒。

杨承孝答应来广场与兵团小将一道团结战斗，但刘灏不放心。他这回多了一个心眼，生怕杨承孝失约，也生怕工人联合会再在五一广场兴风作浪。刘司令请来了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一位领导、山西大学外语系的大一学生方培泉商量。原先都是炮轰省委指挥部的战友，虽然方培泉在袁振问题上与他刘灏有分歧，但炮轰省委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双方一谈就拢。方培泉回到山西大学，与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其他领导们商量决定，把体育系的学生组成纠察队去支持刘灏的兵团，那可是一群身体格外健壮的年轻小将，有他们来保卫主席台，看你工人联合会敢再来捣乱。还好，杨承孝带着他的决死纵队也来了，十三冶的工人有的是力气，山西大学体育系革命小将们的力气，也不比工人老大哥差多少。他们肩并肩，手拉手，高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国际歌，那一份豪情，那一份壮志，分明正在进行着最伟大的革命。他们坚信自己的斗争大方向和党中央一致，心中只有一轮红太阳，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钻进党内的走资派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一回卫恒不能走来了，他被兵团小将们直接从省委机关揪上，一直揪到了五一广场的主席台上。陪同他的还有省长王谦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这三位被简称为卫、王、王的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现在成了“黑省委”走资派的主要代表，他们胸前，被挂上了写有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字样的牌子，这三位风风雨雨投身革命，在毛泽东麾下一道成长起来的老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大革命中，成了被革命造反派们揪斗的对象。有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和山大8·8红旗战斗队的体育系学生保驾，兵团的这次批斗大会一举成功。在这三位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阅历中，出现了从没

有经历过的一幕。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未曾低下的头，现在被革命小将们强按着低下了。他们的灵魂此时也许并未屈服，但他们的灵魂深处恐怕更多的想法，是责怪自己怎么没有能紧紧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从而做了革命的对象。林彪“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那个时代禁锢人们思想的圣律。当时的省公安厅领导得知兵团要在五一广场揪斗卫恒等省委领导时（那时的公检法系统还没有被造反派砸烂），曾经做出派警察保护省委领导的决定。但卫恒却以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立即严肃告知省公安厅领导：不要派人，已派出的一律撤回。又严格指示，公安人员一律不准介入这种活动。不独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如此，在全国，那时又有哪一位省委领导人，敢说一句文化大革命如此搞法错了呢？毛主席曾在党内警告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主席是要发动群众斗倒中央出了的修正主义呢。可惜，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当时有谁又认真思索过，并明确地在党内公开提出一种假设：如果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的党又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教训只能让后人去思考，而当时，刘灏是如愿了。对着广场上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他第一个发表了狠揭猛批“黑省委”的演说。潜意识中想当演员的表现欲，正在得到最大的释放，一个中学生的天赋也正在得到最大的发挥。他只想到要当好毛主席的革命小闯将，做“黑省委”的掘墓人，何曾想到这些行为，也正在给自己未来的人生制造着悲剧！在毛泽东晚年为全党和全民族铺就的那条通向灾难的大道上，习以为常地认为跟着红太阳和红司令，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年轻人，在那个时代又岂止是一个刘灏！

这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委的其他领导们，在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被公开揪到了五一广场接受批斗。再往后，这样的揪斗日益增多，我们就不再详述了。

【5】省委一心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需要一提的，是以卫恒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面对“文革”初起的这种形势，还在努力地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们的思维并没有跳出毛泽东划定的圈圈。11月21日上午，刘灏等革命小将，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张建国等人，还有首都赴晋造反的一些大学生们，再次闯入省委，直接找到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家中。大约是为了缓解这些学生们和工人们的怒气，也是为了体现自个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和革命造反的群众站在一起的态度吧，这一次，卫恒在刘灏递上来的“八项协议”上签下了自个的名字。当天晚上，当刘灏和其他与兵团共同战斗的造反组织领导，带人又来到省委，要求落实与卫恒的八项协议时，王谦省长不得不出面接见刘灏等人，并且代表省委表态说：“卫恒同志和你们达成的协议，未经省委集体讨论，其中有的是原则错误，有的应报请中央批准。”他向刘灏等人提出，让大家给省委一点时间，省委好集体讨论他们曾向卫恒书记提出的那八项要求。

22日，山西省委确实紧急开了常委会，但不是讨论刘灏等人向卫恒提出的那八项要求，而是讨论了王谦、王大任、郑林、武光汤、赵雨亭、贾俊、焦国鼐、史纪言等八人联名给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李雪峰的报告。这个八人报告的内容，主要是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了卫恒在“八项协议”上签字的问题，说这是一个“违犯党的原则和中央规定的严重政治错误”。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这份报告内容，也不得不表示了同意。卫恒甚至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此话当即遭到王谦斥责：“不同意你辞职，你死也要死在第一书记位子上。”在省长王谦的带领下，参加会议的14名常委一致通过，将这份八人报告作为省委的正式报告，立即上报中央。这次常委会对省委第一书记

卫恒作了严肃批评。会议决定,一、由卫恒写一个深刻的检讨,公开印发,省委将转发各级党委引为教训;二、今后不准用个人名义答复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或未经省委集体讨论的重大问题。卫恒同意上述决定,接受了大家的批评。应该看到,当身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凌驾于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以君临天下的个人迷信之力,号令和动员起千百万大中学生们,高喊着毛主席万岁,向着各级走资派们造反时,卫恒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在省委领导班子里能受到大家的批评,且接受这种批评,实在是一种高风亮节。无论每位常委的动机如何,山西省委常委会上这种党内的民主风气,和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当时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这件事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身为省长的王谦,撇开正在受难的省委第一书记,先与其他几名常委联名写报告,向中央和华北局告卫恒的状,又通过常委会让这种行为合法化,实际上是在卫恒的背后捅了一刀!因为当时在群众组织的协议上有过签字行为的,在卫恒之前,还有王大任。10月26日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在与太工红旗等7个学生造反组织谈判中,就在五项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省长王谦对此毫无反应。而其后卫恒的签字却引起他的震怒和告状,足见其人对省委第一书记的态度。再联系文革后期江青炮轰谢振华,让王谦取代谢振华出任了省委第一书记后,王谦必欲置谢振华于死地,同时把与他观点不同的干部群众,一个个整得死去活来的作为,足可看出其一贯的整人风格。

可惜,山西省委的悲剧还在进行着,因为按那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政治标准,山西省委是无法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

那时,中共山西省委和第一书记卫恒,还在努力地反省着,要使自己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省长王谦等人的批评压力下,卫恒又以检查的形式,于11月23日,印发了题为《我最恳切的要求 革命师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 对准我猛烈开火》的传单,派人在省城

街头大量张贴散发。这张印着卫恒签名的传单内容如下：

《我最恳切的要求 革命师生 革命职工 革命干部 对准我猛烈开火》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我在“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首都赴晋红色造反团”提出的八条《协议》上又擅自以个人名义签了字。在重大问题上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又一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又一次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制的原则。毛主席说：“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重要制度……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的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我正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而且八条《协议》本身有许多是直接违背中央有关规定的。我对待革命群众的要求，采取了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极不严肃的态度，如果不彻底立即改正，势必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斜路上去，这是我怕群众怕革命的大暴露。

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对于我所犯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感到非常痛心，我正在准备做彻底的检查，并要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现在最恳切的要求：革命师生、革命职工、革命干部对准我的错误进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并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猛烈开火，帮助我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轨道上来。

卫恒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从这份传单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1966 年“文革”初始时，面对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一种无奈心态和一种无奈的行为。

11 月 24 日，中共山西省委在省城五一广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卫

恒代表省委,在会上检讨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卫恒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共山西省委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们承认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省委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在袁振问题上,省委不认错,也不表示要给袁振平反。在刘灏为司令的兵团战士们看来,这样的检查岂能通过!而在红联站看来,省委纯粹是假检查,仅以太原工学院为例,打成反革命的师生还没有全部平反呢,这样的检查岂能通过!兵团的大批人马来造反了,红联站的大批人马也赶来造反了。更有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大学生们,围住了主席台要揪卫恒。各色战旗飘扬。多辆广播车也开进了五一广场,广播里传来一声一声向省委造反的口号。那些受命来开会、坐场的各单位群众被搅乱了。卫恒在广场主席台上无法再检查下去,只得与主席台上的其他省委领导商定,临时宣布散会。

中共山西省委还要按当时的思维,继续向群众做检查,继续向全省人民表示,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和人民群众一道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决心。11月26日,中共山西省委在解放路省委礼堂继续召开群众大会,仍由卫恒代表省委,向全省人民检查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中共山西省委还形成了(66)221号和(66)223号文件,对省委的错误作了认识,对第一书记卫恒进行了批评,指出卫恒“犯了严重的组织错误”和“严重的政治错误”。如果抛开当时错误的政治标准,从山西省委敢于自我批评和批评自个的第一书记这件事看,体现出山西省委常委会的民主空气,也体现出第一书记卫恒的民主作风,与当时党中央由毛泽东主席一人独断专行,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然而,要紧跟伟大领袖想领导好文化大革命的省委,要紧跟伟大领袖积极改正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经被紧跟伟大领袖奋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各路造反组织,逼进了无法继续正常工作的困境。

第五章

毛泽东要发动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刘格平等五名领导干部策划向山西省委夺权。1·12 夺权如一场地震，有些人震上天堂，有些人震入地狱。

【1】刘格平投书林彪与康生

从 1966 年的 11 月中下旬开始，中共山西省委开始陷入被夺权前最后的困境。继兵团之后，红联站也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批斗会，揭发控诉山西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兵团和红联站的下属组织，除了各自组织批斗卫、王、王等省委领导的大会小会外，还纷纷进驻省委机关。以卫恒为第一书记的山西省委疲于应付越来越乱的“文革”形势，根据华北局书记处的意见，决定设立一线二线和三线三套班子。省委决定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书记处书记郑林、副省长武光汤、太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贾俊等领导为一线班子，主要精力是到群众中去，领导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省长王谦为首，带领副省长刘开基等，成立起二线班子，集中主要精力抓工农业生产。为了防备这两个班子被造反组织冲击而无法工作，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为首，还有一个准备转入地下坚持省委领导的三线班子。并要求各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一线二

线和三线班子，以保持上下级之间的联系。一线领导班子继续留在省城太原，二线和三线领导班子则悄悄转移到了座落在祁县平川上的乔家大院里工作。如今，因了一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一部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让这座晋商大院成了空前火爆的旅游点，

红遍天下。几年前，我陪妻子去乔家大院旅游时，曾问滔滔不绝地向游人介绍乔家大院历史的导游小姐，可知“文革”初始时，山西省委的二线班子曾在这里驻扎过？那女孩子摇摇头，显出一脸雾水，反问道：“‘文革’？什么‘文革’？”我无言，不禁向妻子感叹：曾经真实地发生过的历史，就这样被人们遗忘了，而被艺术家们虚构而生，用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进行传播的历史，就这样被人们记住了。“文革”这场由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发动，党内党外几乎是全民族参与的历史大灾难，绝不应该被我们的后代遗忘，或者被后人去胡说和戏说。

让我们再回归当时的历史。省委的一线领导班子在省委办公楼坚持上班，这期间领导们挨了批斗后，还可以回家。然而，这种局面很快就不存在了，各路造反派们开始对省委领导大抄家，卫恒和他的助手们，不得不时时东躲西藏，在全社会已经失去正常秩序的状态下，坚持紧跟心中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带领省委，将他们并不理解的无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与康生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

现在必须提到一位重要人物了,他叫刘格平,行政三级的党内高干。

刘格平何许人也?他是当时山西省的一位副省长。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的三级高干刘格平,此时是既不认识刘灏,也不认识杨承孝。他是1965年才被中央组织部调到山西任职的,在山西当时的副省长中,并不是实权派。虽说位犹高而权不重,刘格平却有老资格可摆,别的不说,仅那个行政级别三级,省委的书记们那个能比得上?他在上世纪20年代就投身革命,1926年由共青团员直接转为共产党员,这种资历,你1938年才入党的卫恒能比得上?至于刘格平因何被安排在山西?又仅仅只给个副省长的位子,那是当时党中央组织部的事,相信自有缘由。1960年,刘格平在主政宁夏回族自治区时,发生了一起党内的残酷斗争,刘格平被打成了“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的头子”,受到政治打击。刘格平因此而被撤职,调回北京进中央党校学习。虽说此事后来被党中央过问并平反,但刘格平当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时是“封疆大吏”,在中央党校学习了几年,分配到山西却如此安排,中央组织部对他分明是一种降职使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凌驾于中央各部门之上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可谓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组长是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是江青,而堂堂顾问则是康生。早在山东渤海区党委工作时,刘格平和康生就极为熟悉。当山西省的各路造反派们炮轰省委一阵紧似一阵时,山西省委为了稳定全省大局,领导好工农业生产,让组成的二线班子转入乔家大院工作。对此,三级高干刘格平自有自个的独到认识:省委这么做,是在对抗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在搞地下特务活动。刘少奇倒了,薄一波,安子文是刘少奇线上的黑干将,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多是他们当年的老部下,自然无一例外,全是这条黑线上的人。(在其后的1967年1月9日,刘格平与山西省另一位副省长刘贯一

公开向社会亮相，贴出了大字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其中就持这种观点。)刘格平熟悉康生，断定康生眼下最关心最急迫要办成的大事，就是先把刘少奇的问题搞彻底。而刘少奇组织共产党员集体变节投降，他认定自己就是一个铁证。

这便涉及到一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1930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北方局的决定》，以贺昌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被取消。同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撤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中共河北省委。因中央指派的省委书记卢福坦未到职，故先成立中共河北临时省委。1931年1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2月26日，河北临时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接受中央派来的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共河北省委。省委驻地天津。这一年，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坏。4月8日省委在天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时，被国民党当局发现，省委书记徐兰芝、组织部长陈原道、秘书长刘亚雄以及安子文、陈伯达、刘宁一、魏文伯等13人当场被捕。徐兰芝被捕后叛变投敌，其他人被投入监狱。同日，国民党当局又在中共河北省委筹备处成员李延瑞家中，将正在开会的张金刃、韩连会、吴化梓等11人逮捕。5月26日，河北省委遭受第二次大破坏，省委书记殷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团省委书记李国盛在北平被捕。廖化平被捕后立即叛变，出卖了省委委员薄一波、胡锡奎、郭亚光、赖德，以及北平团市委书记杨立贤等人。此次先后有30多人被捕。11月12日，由于叛徒出卖，河北省委第三次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马星荣、团省委书记王德等人被捕。这些共产党人被关在北京草炭子胡同内的一个国民党监狱，先称草炭子监狱，后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院。

1934年4月20日，刘格平在河北庆云县严家务村召开群众大会，被国民党当局突袭，负伤被俘，先被关进庆云县监狱，沧县监狱，以后又辗转递解到北平军人反省院。

从1931年到1936年8月期间,北平军人反省院里这些被捕的中共党员们,有的在1932年国民党政府的大赦中被释放,有的因病保外就医出狱,也有的自愿和由家属动员,在监狱当局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了手印,走出狱门。以薄一波和安子文等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却在狱中秘密成立了党支部,与敌人坚持斗争,发誓绝不在“反共启事”上摁手印。1935年11月,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代表,化名胡服,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面对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共产党需要大批干部的紧迫局面,北方局几经研究,决定让在北平反省院坚持狱中斗争的党员们,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出狱手续,在监狱当局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摁手印出狱,迅速投身到当前抗日救亡的对敌斗争中去。北方局将这一决定报告中央,当时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党中央,批准了北方局的这个报告。北方局将党中央批准的这个决定,设法通知了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党组织。于是,在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14日,狱中共有61位中共党员,分9批在监狱当局拟就的“反共启事”上摁了手印,履行了出狱手续。在当时的《华北日报》和《益世报》上,监狱当局陆续刊登了这些“反共启事”。当事人有一人具名,也有多人具名,具名后内容雷同,照录如下:“前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友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须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作一个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作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在署名中,许多当事人用了被捕时报的假名。薄一波为张永璞、安子文为徐子文、刘澜涛为刘华甫、杨献珍为杨仲仁,等等。

据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杨锡九先生《郭挺一研究》一
-170-

文叙述，薄一波回晋，则与阎锡山有关。1936年，红军东征后，阎锡山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方针，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郭挺一任临时执行委员，他与薄一波同乡，阎锡山派其赴北平设法救薄一波出狱，以“共策保晋大业”。郭挺一带着阎锡山给宋哲元、薄一波的亲笔信，还有一笔丰厚的款项，赴北平活动。薄一波出狱后，经中共北方局批准，回到山西，经与阎锡山协商，参加了领导牺盟会和组建新军的工作。其他60名出狱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在中共北方局安排下，奔赴不同的工作岗位。这61位党员的出狱，与自首和变节是两码事，“文革”中康生说他们形成了一个叛徒集团，更是生拉硬扯成的一件冤案。

问题就在这61位党员中，偏偏没有刘格平。直到1944年，刘格平才刑满出狱。出狱后，即被上级任命为中共天津临时工委书记，投入了抗日运动和中共党建工作。刘格平为何不与那61名党员一道出狱？是当时狱中的党组织认为刘格平立场有问题，而决定不将党中央的指示通知他呢？还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情况，使狱中党组织没有能够通知到他呢？或者是如刘格平日后与山西的造反派们口口声声所说，是他坚决抵制了刘少奇让集体变节投降的黑指示？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那就不是我们这本书要解释和考据的内容了。我曾就此事原委，询问过那61位党员中的一位，他叫王玉堂，也就是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老作家、老诗人冈夫先生。那是“文革”早已结束后的1989年。那一年我任太原市文联《城市文学》的主编。当年9月上旬，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朔州市召开1989年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省各地市文联主席和刊物主编，共30余人。会议期间的一天晚饭后，我陪王玉堂老先生上街散步，其间曾说起刘格平其人，并问道：“王老，你当时也是被关在草炭子监狱的政治犯，刘格平怎么就没有和你们一样，按当时北方局的指示，公开出狱呢？”王玉堂老人瘦削的脸上一下子变得很严肃，回答说：“他那个人，和大伙儿总是不合拍。”

我的感觉是当时薄一波和安子文他们对他好像不太信任的。我那时只是个一般党员，狱中党支部的事，我也说不太明白。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刘格平的表现，我看就说明问题了嘛。”

王玉堂老人的话，并没有他写诗时的浪漫，显得十分沉重。

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被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后，在报纸上登载“反共启事”，分明是一种变节行为，称其叛徒，有根有据。但让他们通过如此途径出狱的决定，又是中共中央批准同意的，是让他们赶紧出狱，投入正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救亡大业。如此，他们的行为就成了组织行为，成了一种服从组织决定的革命行为，不能称他们为叛徒，也有根有据。

另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被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后，认定在报纸上登载“反共启事”后出狱，就是变节，就是叛徒，即便是组织决定，也绝不如此行事。在当时监狱那种封闭的环境中，如果刘格平如此认识，如此行为，确实也体现了一种政治操守和坚贞品质。对刘格平的这段历史，也未见当时的北方局和党中央有过批评、指责和否定的说法。刘格平和那 61 人是否由此而结下梁子？我不好说，但以刘格平参加革命的资历和享有的行政级别，只给安排一个山西省不进常委的副省长，他能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没有意见？而安子文，恰恰又是他当年的狱友，是登过“反共启事”出狱的人。刘格平要和安子文理论个明白，也合情理。党内应讲民主，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向上级反映对方的问题，原本正常，无可非议，即便其中交织个人恩怨，也可理解。问题是这桩历史公案，在“文革”之初，成了康生手中的一副魔术纸牌。这位党内大奸为了迎合圣意，利用这桩历史公案，配合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一道，共同做出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6 年 1 月出版的《卫恒之死》(作者为李玉明和杨顺科)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1966 年 11 月 23 日,正当山西的文革“锣鼓”甚嚣尘上之际,刘格平给林彪、康生写了一封长信,对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三十年代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坚持斗争,经组织批准营救出狱,诬陷为由刘少奇组织的“集体变节行为”,“中央应该查清”。刘格平这封信得到林彪、康生的重视。12 月 9 日,康生电话通知山西省委办公厅转告刘格平到京谈话。当天刘格平急赴北京,第二天即被康生接见。康生向他详细询问了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的出狱情况,这次会见,刘格平向康生提供了制造“61 人叛徒”案的所谓证据,得到了康生的青睐和支持。这次谈话后,刘格平于当天又给康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根据您的指示,将安子文、薄一波等几个人出狱前的表现再作一些补充。”信中还说:“如还需要问我的,请予指示。”

刘格平和康生早就熟识,而刘格平也正是在这时,受到了江青的关注。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于 1987 年 8 月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1·12”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资料》中,附有“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写的一份材料,内称:“刘格平是江青 1966 年 12 月调到北京来的”。(孙涛按:此处“调”为奉命进京之意)又说,江青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个成员关锋,安排了与刘格平的谈话内容。刘格平当时去北京,正是完成了与康生的重新联系。

【2】毛泽东默认篡改历史

当江青、康生、刘格平们结伙起来,要篡改中共历史上的这段历

史时，毛泽东主席无疑是持默认态度的。1936年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立足陕北之后，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参与决策者，则是周恩来和

业已进入党中央，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那时，毛泽东常常对张闻天戏称“明君”，对张闻天之妻刘英，也常常当面戏称“娘娘”。当历史过去了30年，针对1936年8月底至1937年3月14日前，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草岚子监狱)中61位中共党员按中央指示以登报形式出狱一事，毛泽东与张闻天的态度，形同水火。《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上，刊有《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张刃先生的一篇文章《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回忆并记述了他当年在外交学院图书馆内，参加批斗张闻天大会上的见闻，转引如下：



张闻天1976年7月1日逝世前与妻子刘英的最后合影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天黑之后，我就早早地跑到图书馆去了。批斗会场不大，挤满了人。主持人照例带领大家朗读了毛主席语录，敬祝万寿无疆之后，一声断喝：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闻天押上来！

张闻天穿一件灰色对襟的中式棉衣，棕色制服裤，脚踏棉布鞋，神态安详，微微低着头，站在会场中央。从他放下围巾，解开领扣的动

作中,看得出,他对这种场面处之泰然,内心毫无惶恐。造反派轮番发言,指斥他推行“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指使薄一波等61个人集体叛党等等。他默默地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当造反派就上述问题指着他的鼻子要他做出交待时,会场上一下子静了下来。张闻天的声音不高,语速平缓,但很清晰:“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外交政策,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制定和批准的。如果说有错误,也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负责的。我个人以为,外交工作中个别失误是有的,但说路线错了,我不同意。”“薄一波等人的出狱是党中央批准的。我当时是党中央负责人,当然知道并签了字。这件事当时就有结论,中央的其他领导也知道。现在说他们是叛徒集团,不符合历史事实。”

张闻天的这番“交待”,无疑是与造反派针锋相对的,是对他们的反驳。在当时条件下,说出这番话是需要有勇气的,要冒更猛烈的批斗,甚至人身伤害的风险,但他说了,平静而且坚定的说了。

“张闻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张闻天负隅顽抗,死路一条!”的呼声淹没了张闻天的声音。批斗会不得不草草收场。他很从容地转身走了,留下了一个年过七旬老共产党人的背影。

42年前的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记着它。张闻天是我亲眼见到并且亲耳听到讲话的、党内资格最老、地位最高的领导人,而且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说了那样一番特殊的话。在当时,以我的年龄、心理、我很佩服他。因为他与那些在批斗中吓得胡乱认罪,自轻自贱,以求宽容的人太不一样了。

毛泽东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呢?1943年8月,薄一波由山西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因七大推迟,遂入中央党校学习。到延安后,毛泽东曾与其谈话,那也是两人第一次见面。那一年3月,毛泽东已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举为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另两位书

记,是刘少奇和任弼时。坐上中共中央第一把手交椅的毛泽东,肯定了薄一波在山西与阎锡山搞统一战线的做法,当薄一波说到自个是经北方局安排,才走出北平反省院的出狱经过时,毛泽东当即说:“这件事我知道,中央是全负责。”同时,还对薄一波等 61 位同志在狱中的斗争,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然而,当走上神坛的毛泽东,执意要抹掉这一段“中央的其他领导也知道”和“这件事我知道”的历史时,这段历史也就只能任人来涂抹了。历史被随意伪造,造假之风,成了“文革”中的常态。南昌起义纪念馆里,挂上了林彪和毛主席在井冈山会师的大油画;井冈山纪念馆里,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但凡提到遵义会议,不说会上确立了张闻天总书记的历史,只说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强权在胡说时,民众虽然不敢公开摇头,但日积月累,只会导致民众对强权的怀疑。因为,党内有人依强权涂抹和伪造历史,是对民众的欺骗,也是对党的犯罪。我们现在叙述的党内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案,就是一个例证。1967 年 3 月 16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变节材料》,下发全党、全国。该文件指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在毛泽东与世长辞前,即便有张闻天这样的当事人健在,这段真实的历史,也只能变成伪历史而被别有用心的人所用。当刘格平在 1966 年的年底,以知情人的身份,向中央文革小组献策时,正达到了为涂抹历史者们投其所目的。刘格平此番奉命回山西,要“把山西的工作管起来”,山西当时所有的造反派们全望尘莫及。

中央文革小组认定,刘少奇指示 61 个党员集体叛变,这个由 61 人组成的叛徒集团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且许多人身居高位,岂不是刘少奇的一项滔天大罪?毛主席身边不但有刘少奇这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原来刘少奇的这个黑司令部,竟是由这么一大批叛徒组成

的！对林彪与康生、江青一伙来说，刘格平的这份秘密报告，就是一份“铁证”。这份秘密报告，也使政治生涯中正在受到冷落的三级高干刘格平，倾刻间，成了林彪和康生以及江青手中重要的棋子。康生由此而一手策划的 61 人叛徒集团案，为毛泽东最后击垮刘少奇增添了最新最猛的火力。有了康生和江青的支持，刘格平即将变成三晋大地上的一颗政治明星。

【3】刘格平寻找同盟者密谋夺权

获得了康生和江青支持的刘格平，还需要革命的造反派支持。他正用自己的政治目光，关注着省城那些炮轰省委的造反派们。自然，刘格平的政治目光，不会放过那位第一个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打成黑帮的革命小将刘灏。然而，刘格平毕竟是早年参加革命，在宦海中几经沉浮的政治家。奉了康生和江青的旨意，在风云变幻中，酝酿着如何走上山西“文革”政治舞台的刘格平，自然要先找同盟者，但同盟者绝不是群众组织的领导，他们只是刘格平棋盘上的车、马、炮；他要找的同盟者，是在省委班子中愿意与他一道同“黑省委”决裂的将、相、仕。

他找到了。这些同盟者其实也早在暗中有了交流和活动，他们也在寻找挑头的帅字号人物。1966 年年底的 12 月 21 日，在省委常委会上，有几位“重量级人物”做了集体亮相。这一天，省委在晋祠招待所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由省长王谦和省委二线班子的主要负责人赵雨亭主持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中央制定的“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同时传达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九位中央领导人的最新讲话精神。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缺席，他病倒了。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比虔诚，对党中央的无比忠贞，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还得尽力去理

解和执行,使卫恒身心备受煎熬,虔诚的无奈中,他终于病倒了。会议刚开始,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省委常委、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立即先后发表声明:退出“黑省委”,和山西省委脱离关系,再不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

此时观潮而动的刘格平,与那几位“重量级人物”的活动是很频繁的。只是堂堂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18岁的刘灏,那个时候还不知道省委有这么一些“大人物”也与他一样,走上了造“黑省委”反的道路。甭说刘格平了,就连省军区的那位张日清政委,还有那位副省长刘贯一,做了兵团司令的刘灏对他们统统不认识。不仅是不认识,那阵子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晓得。18岁的革命小将正处在革命带来的兴奋之中。虽说杨承孝叛离了兵团,但兵团有“汤高参”帮着司令运筹帷幄,还是在省城的造反组织中雄居老大。别的不说,单是成系统跨行业的司令部,兵团就组建了好几个。有工总司——自然由工人队伍组成,足可与不听指挥的决死纵队和兵团的死对头工人联合会抗衡。有农总司——自然由贫下中农组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呢,没有这支队伍能行?还有商总司呢——工农商学兵,除了兵,兵团岂不是样样俱全了?还有更了不起的事,兵团在华北局设立了联络处,成天在北京闹着为袁振平反。兵团还有大红印章呢,介绍信上一盖大红印,兵团战士就可以走遍全国。当然,这一切,离不开袁振的谋略和汤高参的具体参政。处在兴奋的巅峰上,刘灏却也有不如意的心病:卫恒被各路造反派们揪斗了,看来是能打倒了,可袁振的案还是没有翻过来。

下一步怎么办?他还得找袁振商量。

袁振这回却一点儿也不急了,反倒沉着气说:“你甭急嘛,刘格平同志已经向中央反映了山西的问题,中央马上就要解决山西的问题了。我们几个已经表了态,和省委彻底脱离了关系。”

袁振娓娓道来,看得出来,他脸上积下的忧郁正被喜悦所取代。

可他提到的那几个人，刘灏却一个也不认识。正不知如何是好时，袁振点拨他说：“格平同志这几天太忙，你先找找刘贯一去，他会对你说明白的。”

后台发话，刘灏直奔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的住处。

他想先问问袁振能否翻案的事儿，可人家仿佛胸有成竹，一句也不提袁振的事儿，只是向他谈省委的问题。先一桩桩谈罢，开始总结了：“搞运动嘛，怎么能怕群众呢？我们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时，不是整天和群众滚在一起吗！共产党得天下，就是靠前方打胜仗，后方搞运动呀！”临到最后，这位副省长才告诉面前的革命小将：“康生同志已经对格平同志讲啦，山西的问题不仅仅是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要考虑夺权的问题。”

夺权？刘灏心头不禁一颤。以前想的只是炮轰省委，揪出卫恒黑帮，可万万没有想过夺权。要证明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就得去找省委表态，要想为袁振平反，就得让省委下文，就是在五一广场批斗卫、王、王时，一边批，一边还得逼他们承认革命小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是刘灏过去的思维。下一步要夺省委的大权取而代之，这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张呢？从副省长刘贯一的家中讨教回来，正踌躇满志的刘灏，头脑中突然出现了一片困惑。

刘司令何去何从，又面临一次艰难的选择。

【4】毛泽东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动荡不安的 1966 年过去了，更加动荡不安的 1967 年匆匆而至。

将 1967 年冠之以“更加动荡不安”，必须从当时“文革”发动者毛泽东主席的指导思想说起。1966 年 12 月 26 日，是老人家 73 岁的生日。这一天晚上，一向不过生日的毛泽东，在他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

的家宴。受邀参与者王力，在他所著的《现场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中，对这次特别的家宴有过回忆：

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过生日，晚上临时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请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我们到时毛主席早就在等着了。那天屋里很热，吃饭是按他的惯例，他招待外国人也是这样，四菜一汤。今天每人加一小碗面条，还有烤白薯，煮玉米。吃饭前毛主席说了很多话。他从来不过生日。这实际上是个重要的会。

……毛主席讲话的概念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这话在吃饭前也说过。除上述话外，他吃饭前还说了很多话。这些话，在后来的文章中找得到。虽然没有用黑体字，但思想是毛泽东的。

正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1967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中，明确提出了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被神化了的领袖，发动起来亿万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他们又将神化了的领袖，称之为光焰无际的红太阳。已经凌驾于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之上的红太阳，又直接指挥着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于是，一次“家宴”上的最高指示，无须党中央讨论，便能胜过党中央的集体决议。毛泽东“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就在1967年得到了全面贯彻。

让我们再回到山西，回到省城太原。

元旦这天，红联站抢占了太原市有线广播站，并播放了红联站的《元旦献词》，革命造反的矛头，继续直指中共山西省委。

元月 1 日和 2 日，在太原市湖滨会堂，刘灏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和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联合召开了批斗省委主要领导人卫、王、王的大会。批斗现场与迎泽大街上的高音大喇叭接通了，那声势，充满了革命造反的腾腾杀气。开批斗会前，8·8 红旗战斗队的队长李大纲领着几位同学，来到晋祠宾馆，找到拖着病体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提出要揪他和省长王谦、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王大任去参加山西大学革命师生对他们的批斗会。当时省委还没有被夺权，群众组织要批斗省委第一书记，还得要求第一书记本人表示同意。来晋祠要揪斗卫恒的，还有别的群众组织，但卫恒先答应了兵团和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的要求。在卫恒身边工作的省委办公厅干部，向李大纲提出，要他保证在批斗会后，安全将第一书记卫恒等领导送回晋祠宾馆，李大纲也当着卫恒的面，以党性（大三的李大纲在“文革”前就是中共党员了）对这一点做了保证。这是那个年代滑稽的一幕，却真实地显示出革命的动力大中学生们，与革命的对象卫恒书记这样的领导干部们，都在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指导，要积极主动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的心态。那时，从刘灏这样的中学生，到李大纲这样的大学生，在他们的脑海中，炮轰省委，批判省委，是要让犯了错误的省委，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如刘灏，要省委给袁振平反，是要省委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省委不给袁振平反，说明省委还在坚持错误，则需要和省委继续斗争。再如李大纲，批斗卫、王、王，也是要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至于夺省委的权，对省委领导讨而诛之，对省委取而代之，这些一腔热血的年轻人们，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他们与刘格平那些政治家们不同，与杨承孝那种趁乱而起、自以为打砸抢就是革命的草根式山大王更不同。因没有找到王谦，元月 1 日的批斗对象是卫恒、王大任、副省长兼山西大学校长焦国鼐，还有山西大学的领导人刘梅

等。2日的批斗对象，又加上了省长王谦。那时这种批斗会也叫“拼刺刀”，刘灏等中学生们这次退居其次了，由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选出的方培泉、侯北记、王守仁、杨韶华、傅正杰、张连捷等师生，组成了“战士团”，开始轮流发言，批斗卫恒等省委领导和山西大学的校领导。1967年1月8日出版的《八八战报》有一篇纪实，摘要如下：

（大会开始。春雷般的战歌声、口号声、喊杀声震撼着工农兵会堂。……一场激烈的拼刺刀战斗开始了。）

战士：卫恒从华北局开会回来，于7月18日作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纲领。是卫恒镇压我省文化革命的动员令。他在报告中说，这次文化革命的打击目标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小大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卫恒，你这个“大大小小”和“伸手派”、“野心家”是什么意思？

卫恒：这个报告有错误的一面，也有正确的一面。相信党，相信群众是对的。只是不该提“大大小小”，扩大了打击目标。我说抓“伸手派”，“野心家”，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

战士：胡说！运动一开始，你就在学生中划左、中、右、反，这也是相信群众？

卫恒：在运动初期自上而下排队，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当时是想了解当权派的思想动态。（卫恒心里有鬼，连撒谎都不象。全场哗笑。）

战士：卫恒你哄鬼去吧！在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制下，山大党委刘梅等人实行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群众高呼，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刘梅之流在学生中排队，把136个敢于造反的革命师生打成“右派”、“反革命”。

战士：你这伸手派要从那里抓？

卫恒：当时是要从当权派里抓。

战士：卫恒你低下头听着，看我们山大是从那里抓的！卫恒布置的划类排队和抓“伸手派”、“野心家”，是针对革命群众的，是打击革命群众，镇压文化革命。6月16日，刘梅作了假引火烧身报告，方培泉揭穿插了这个阴谋，聂庆垒等同志给党委贴了大字报，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卫恒报告后，又被打成“伸手派”、“野心家”。（卫恒脸色发黄，故作镇静。）

.....

卫恒：这个报告有严重的错误，造成了很坏的后果。革命学生被打成“伸手派”、“右派”是非常痛心的事。这是错误的，我心里很惭愧。

战士：卫恒你对抗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提出抓“伸手派”、“野心家”，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卫恒：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表现之一。

.....

战士：你敢不敢保证在华北局会议上没有研究过“伸手派”和“野心家”的问题？

卫恒：我记不清了。确确实实记不清了。（群众高呼：不准卫恒装糊涂！揪出卫恒后台！）

战士：卫恒先靠边站！王大任回答这个问题！

王大任：我记得没有研究过。

战士：你签字。

王大任：我不采取签字的形式。

战士：焦国鼐回答！

焦国鼐：在华北局小组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过“伸手派”、“野心家”，其他具体情况记不清了。

战士：卫恒的“大大小小”、“伸手派”、“野心家”谬论危害甚大！在

省委的包庇下，刘梅之流干尽了坏事。

(群众不断高呼：“砸碎卫恒的狗头”“打倒刘梅”。台下一位工人革命造反者振臂高呼：“逮捕刘梅！”)

这便是当时的疯狂情景。毛泽东在南方巡察时，让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从刘少奇到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再到山西大学主持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刘梅，他们都想按毛泽东主席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做法，领导好“文革”。于是，他们在干部和学生中，抓“伸手派”、“野心家”；对一些学生以右派和反革命的行为记录在案。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毛泽东却将他们的做法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高领袖成了解放受害学生的救星，尽管卫恒想跟上最高领袖的思维承认错误，刘梅这一级干部也是如此，但造反的学生们向他们“拼刺刀”时，是不容许他们作任何解释的。

【5】被挤入夹板中的卫恒

卫恒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他没有想到，在袁振大搞翻案时，华北局会支持袁振，要给袁振平反。

原卫恒的秘书李玉明在《卫恒最后的二十九天半》一文(载《记述刘格平、袁振在山西 1·12、太原 1·28 夺权中镇压迫害干部史料》，刘建基、赵承亮辑录)中，有关于华北局给袁振平反的内容，摘录如下：

(1967 年)1 月 3 日，卫恒在迎泽宾馆和贾俊研究太原市的事，十一点钟左右，卫恒给华北局池必卿(孙涛注：池必卿当时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打电话(大意)：贾俊同意从太原撤出来，太原市委谁主持意见不一，一是让袁振回去，一是由市委推选一人。请同雪峰同志研究一

下，帮我们拿个主意。无论如何，给我回个电话。卫恒一直等待着。

下午五点钟左右，沁必卿来电话了：袁振问题省委要考虑一下，要看大方向，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省委有错误，是承认错误垮台，还是不承认错误垮台。卫恒问，这是谁的意见？池必卿说是华北局书记处的意见。

晚上，卫恒和贾俊一起到并州路重工厅刘正义宿舍和王谦、王大任开会研究华北局答复。显然，他们不完全同意华北局的意见。

会后，卫恒给华北局苏谦益（孙涛注：苏谦益当时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打电话（大意）：袁振问题，我们四个人研究了一下，同意贾俊撤出来，但有几个问题请华北局考虑一下。一，省委承认在袁振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涉及到华北局工作会议是不是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二，贾俊撤出来，让袁振回太原市，还不知道袁振干不干；三，反对袁振和拥护袁振的两派，势必要求公布袁振问题的材料，这是华北局会议的材料，能不能公布？四，最好请华北局和袁振谈一次话，帮助我们做点工作。

这时，已是次日凌晨了。

……（1月5日）晚上12点多了，史纪言告诉我说，华北局从电话上传来一个关于袁振问题对学生的答复稿，征求省委意见，并说李雪峰对此事很重视，要求省委连夜开常委会讨论，有意见报告华北局。

我马上将稿子送到宾馆，卫恒已经躺在床上，和在场的刘开基说着话。他们俩都看了稿子，刘开基怒气冲冲地说，怎么能说袁振基本上是正确的呢？

华北局稿子的基本内容大致是：一：袁振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对省委提意见基本是正确的，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把他说成是伸手派、野心家是错误的，这是反动路线性的错误，应予以纠正并公开检讨。二：贾俊带工作组到太原市是错误的，担任市委“文革”组

长是错误的，贾俊代理市委第一书记在手续上是合法的，他在工作中有错误应当检讨，群众有意见可以调离市委。袁振同志是否回市委工作，视袁振同志的健康情况，由省委和袁振同志协商决定，并报华北局。三：华北局工作会议是一次极重要的工作会议，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期传播了北京市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是错误的。会议文件是党内机密，应予归档，不得外传。

华北局要求连夜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卫恒说，现在哪能开成常委会，再说吧！

卫恒和山西省委处在了夹板锤中间。

也就在那几天，刘灏派到北京找华北局要求为袁振平反的兵团小将们，联合其他群众造反组织，终获大捷。华北局同意为袁振平反了。在这些学生们的要求下，华北局派出书记处候补书记张邦英，与这些学生们一道回到太原，宣布了华北局给袁振平反的决定。张邦英想见到卫恒，但是卫恒又被群众造反组织揪去挨批斗去了。

李玉明在《卫恒最后的二十九天半》一文中回忆：

1月7日，卫恒被造反派在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围攻了一天。上午，省委大院造反派组织广播张邦英代表华北局宣布为袁振平反，贾俊调离太原市委。

……张邦英提出，他从学生那里出来后，最好能和省委卫恒等负责同志见见面，交谈一下。武光汤很同意，当即打电话与王大任联系。王大任说一定要见见，书记处的都能见见最好，还要求张邦英和袁振谈一次话。

后来，史纪言来了宾馆，他对张邦英的秘书陈日升说了在并州饭店斗卫恒的情况。

对此，张邦英同志向同他座谈的造反派们提出批评：“你们要注意，怎么能那样地斗卫恒呢？把卫恒当成什么性质的事了？”

卫恒没有想到在袁振问题上，华北局会出现这样一个态度。被揪来揪去挨批斗的卫恒，还有想不到的事呢。

在省城太原的造反派们，一步步向着中共山西省委造反的声浪中，元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刘格平进京。6日，刘格平手持尚方宝剑回到山西，住进了省军区招待所，紧锣密鼓，加紧与各路群众造反组织取得联系。

关于中央文革小组这次接见刘格平，我们不妨再摘引《卫恒之死》一书中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刘格平“出山”的政治背景。

1月4日，北京来电，要刘格平立即到京谈话。接到通知，他由期待过望变得受宠若惊，当天就赶到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受江青的委托，“文革”干将关锋约王力一起在刘格平的住处与刘进行了秘密谈话。谈话以前，江青叫关锋和刘格平谈谈他在北京坐牢并不履行出狱手续的问题，问问他解放后受处分的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就要他回山西联合“革命群众组织”，把山西省的大权掌起来。在谈话开始后，关锋首先询问了刘格平本人不出狱的情况，又问了他受处分的情况。最后，关锋向刘格平传达江青的意见说：现在形势很好，你回山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

刘格平1982年5月给胡耀邦同志并党中央写的《我的申述和请求》中，曾报告了他1966年12月底接到康生电话后去了北京，住到京西宾馆，终于等到中央首长们接见的情况：

1967年元旦刚过，中央派车将我拉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的人，除中央文革的成员外，还有总理、富春同志，陈毅同志是随后来的，大家见面握手后就开门见山进入正题。先是康生说了几句高帽子的话，他说我的报告他看了，总理也看了，中央是肯定的。接着，富春同志说：“山西有煤炭有钢铁，是经济大省，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山西经济不能垮。现在山西的班子瘫痪了，中央研究让你出来，把山西的工作抓起来。”我问：“就是我一个人还是有其他同志？”总理直接说：“应该有一个班子，但山西省委瘫痪了，是毛主席要你站出来，所以这次就叫你来了。你回去后找省委一些没被打倒、问题少的同志，向他们交个底先把工作抓起来。”我说：“山西现在很乱，我去的时间又短，对那里的情况、特别是干部情况不熟悉。”总理说：“不要紧，中央支持你。军队没有乱嘛！还要发挥军队的作用。”我听后感到惆怅，脑子里想，怎么让我去找人？中央为什么不任命？但支吾半天也说不出来，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件太突然的事。晚到的陈毅同志大概看出我面有难色，接着说：“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先要取得群众的认可以后中央才能认可。否则，群众要打倒你，不买你的账，中央也没法子。”中央领导对我的这次接见，总共只有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我感到他们很忙，接着还有别的安排，也不好再说什么。第二天晚上，王力和关锋到我的住处，他们实际上利用开会的间隙来催促我，也只呆了不到半个钟头。他们对我说，中央研究由他们负责与我联系，要我尽快回山西去，一是争取群众的支持，二是可以联系军区的张日清同志，其他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谈。他们让我确定下来走的时间以后通知他们，以便派车送我。上述基本事实和这次接见，我相信中央有案可查。

如我这样的民间“文革”历史研究者，也只能以这些二手材料，证明刘格平在山西“文革”的进程中，站出来领导造反、夺权，其所作所为，并非自个的冒然行动。至于刘格平是如李玉明所回忆，在1967年1月4日接中央文革小组电话而赴京受命？还是如他自己回忆，是1966年12月底接康生电话后，才赴京受命？则难于考证了。而在他领导1·12夺权成功后，《人民日报》的表态，则准确地表明了当时党中央和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将在本章第12节《〈人民日报〉当时的导向》中，做详细的介绍。

当刘格平在省委内部已经找到同盟者以后，我们还得再简要叙述一下当时全国的形势，因为山西的“文革”运动，其走向离不开当时全国“文革”发展的大形势。

1967年元月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市人民书》，署名是上海各个造反派组织，共11家，挑头的是以王洪文为总司令的那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那时，《文汇报》是一份运动中的晴雨表。姚文元的大块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1965年11月10日首先在这张报纸上发表的，而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颗信号弹，很多人是事后才慢慢品味出来。现在，以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在《文汇报》上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颗信号弹。

果然，元月6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王洪文，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支持下，掀开了“文革”中夺权的第一页。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一举被以王洪文为首的革命造反派夺得手中。被称为“一月风暴”的上海夺权事件，震惊全国。

而此时的山西省委领导们，除了被揪去挨批斗的卫恒、王谦，其他领导们还在琢磨着如何给卫恒起草向全省人民群众检讨的稿子。

据李玉明《卫恒最后的二十九天半》一文回忆，省委书记处一些领导人，在元月 8 日的晚上，还在为给第一书记卫恒起草向革命群众的检讨书一事，而相互争吵着、熬夜研究着。

夜十一点以后，王大任、史纪言、刘贯文等到了晋祠招待所南楼，和郑林、朱卫华研究写检讨问题。

史纪言说，我觉得书记处有些人就怕承认错误，学术批判通知本来是错的，就是不承认，怕丢了面子。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卫恒对我有许多不适当的批评，如袁振到华北局开会早走了一天，是和我打过招呼的，卫恒就说我是胆大妄为，敢批准一个书记早走一天。还有，我因为写过海瑞的文章，会上大家批评我。因此，有一次开书记会，我问了卫恒一句：我参加不参加？我本是怕参加对你们有妨碍。卫恒就说我精神状态不对，问一下就是精神状态不好！

王大任说，这有什么不适当，华北局有规定为什么要早走一天？学术批判通知是我搞的，当时就是认识不清彭真搞的那个提纲是错的么，你不要事后诸葛亮，你知道不对，为什么当时不提出来？史纪言说，你就是强调当时，为什么后来清楚了还不承认错误！王大任说，你高明，你那时就知道通知不对……史纪言说，你就怕承认错误！

两人话赶话，说的都动火了。

郑林、朱卫华都起来劝解。郑林说，大任，咱们书记处是你们（卫、王、王）三人负主要责任，冷静些。朱卫华说，我看现在检讨宁肯过头，也不要不足。

话题转到了如何写检讨上。

王大任说，卫恒说他以前不是省委第一、二把手，不愿代表省委作前几年工作的检讨，这是有道理的。郑林、朱卫华也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决定了以卫恒个人名义作检讨，检讨的内容定下五条：1. 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问题,已检讨过的不重复,不足的补充;2.省委的学术批判通知基本否定;3.袁振问题按华北局的答复学生稿的精神重写;4.卫恒过去工作上的错误;5.挖灵魂。

郑林说,李雪峰的检查写得好,要参考他的写,宁肯过头,不要不足。

卫恒过去工作上有什么错误,三个书记,一个秘书长(孙涛按:指王大任、郑林、朱卫华三位书记处书记;一个秘书长指省委秘书长史纪言)都说,想不到有什么问题,省委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此时,已经次日凌晨五点多了。

元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文汇报》刊出的《告上海市人民书》,同一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也加发了编者按,全文刊发了这份《告上海市人民书》。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如下: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元月 11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同时配发了社论。《贺电》说: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一系列革命行动为全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上海的“一月风暴”,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完全肯定。

中央如何对待上海的“夺权”,势必成为全国各级党政领导们紧密关注的大事。山西省委的领导们关注着,刘格平和他的同盟者也关注着。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也竞相观看时局发展,等待最高领袖和党中央表态,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登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态度已经昭告全国了。

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由此而急转直下。

【6】各路诸侯与五人大字报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们,听到上海夺权的消息后,在他们的总部南工人文化宫内,围着张志安一个个焦虑不安。年轻的青年工人诗人反复思忖:如果中央表态否定上海的夺权,那么,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山西省委的斗争势必大方向正确。如果中央表态支持上海的夺权,那么,省委的日子将更难过,他们要保省委,与造反派们的斗争形势也一定会越加严峻。

刘普德这位被毛主席接见过的山西大学模范学生,回太原后做

了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新的领导后，头上还有省城外宾接待委员会主任和党委副书记的官职，1月5日，接到省委通知，要他去太原饭店开会，是关于研究接待阿尔巴尼亚一个代表团的会议。他也想趁机请示一下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看下一步如何能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料卫恒书记刚一来到太原饭店，就被蜂拥而入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一干大学生们揪走了。那一阶段，刘普德再也无法与省委领导沟通，既要从《人民日报》上领会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又要分析山西的“文革”形势，这位被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过的红卫兵代表，已经是一头雾水了。

刘格平要寻找盟友，在领导干部中，与省委决裂的盟友已经找好，驻太原的空字25部队（空军第十航校）和空字027部队（空军第十二航校）两支部队的首长，也都表示了对刘格平的支持。但他们毕竟是空军院校，不是正规军。要向“黑省委”发起最后的冲击，刘格平还需要军队。而张日清能否获得军区党委的支持，还需要军区党委的集体态度。元月7日，也就是党中央在《人民日报》上尚未对上海造反派夺权一事表态的前一天，张日清主持召开军区党委会，讨论军队介入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当时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由省委第一



支持1·12夺权的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少将

书记卫恒兼任，省军区党委总共 13 名常委。在这次有 13 名常委参加的会上，有 12 名表示军队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只有省军区第二政委、省军区党委书记张日清一人坚持：军队必须支持地方上的革命左派，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张日清是 1 比 12，他最后发话说：“那就我打我的报告，你们打你们的报告，咱们请中央军委最后批示吧。”两份观点截然不同的报告会后直送中央军委，正需要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造反派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全军统帅毛泽东和副统帅林彪，先后表态支持张日清，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张日清，就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军的支左一杆旗。

也就在元月 7 日这天，华北局决定给袁振平反，兵团驻华北局联络站立即将消息电告太原的兵团总部。对刘灏来说，这个消息太重要也太让他振奋了。兵团扯旗造反，杀上社会，不就是因为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受“黑省委”的迫害，从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不就是要为市委的好书记袁振平反吗？你“黑省委”不给袁振平反，华北局给平了，这不说明兵团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吗？还有更好的消息呢，驻华北局联络站的兵团战士没有给他们的刘司令丢脸，硬是逼着华北局的候补书记张邦英，与联络站的兵团战士一道来太原，亲自宣布华北局给袁振平反的决定。这种大事，更让刘司令决定要好好开个庆祝会。而在没有开庆祝会之前，刘灏就派出安着大喇叭的宣传车，先开进省委大院，向省委机关的全体干部们宣布了这个“重要消息”，然后又安排手下，满大街贴出大字报把这个好消息公布于世。对于刘灏来说，革命的目的业已达到，下一步，是省委如何检查和改正迫害袁振的错误，是不是也要象上海一样去夺山西省委的权，他还没有想到。

刘格平和张日清终于结成了准备彻底埋葬“黑省委”的同盟。在这个同盟继续寻找盟友时，又有两件事值得一叙。

其一，元月 9 日，一份署名为刘格平和刘贯一的大字报，分抄成
-194-

若干份贴在省委门前和五一广场等地，这份由山西省的两位副省长联合写出的大字报，题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情？》。在这份大字报中，两位副省长公开点了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省长王谦的名字，将他们称为“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公开将山西省委与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条“黑线”联系在一起，号召全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必须彻底追查，弄清这一反革命案情。”

这是刘格平和刘贯一向山西全社会的公开亮相。至此，在山西省的省委常委和省级领导干部中，除袁振以外，又有两位高级领导人，向全社会表明了要公开造省委反的政治态度。

其二，元月 10 日，即刘格平和刘贯一共同署名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二天，由刘格平继续挑头，由省委常委、副省长刘贯一，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省委委员、市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守中五位革命领导干部共同署名的“五人大字报”，经过多次转抄后被张贴在省委机关、市委机关和五一广场等多处地方。这张大字报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一时间，这五位省级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字，在省城家喻户晓，成了各路造反派们一致拥戴的毛主席司令部在山西的代言人。

五人大字报是山西“文革”中的重要史料，全文录下：

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即正向广大工人群众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发展。这样一个波澜壮阔、气势雄伟的大革命运动，必然要席卷全国，震惊世界。对此伟大的革命运动，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所说的：“一切革命的党派，革

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到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选择罢了。”主席这个四十年以前的教导，是完全符合今天情况的。

我们来山西虽然时间不久，但都万分有幸地经历着主席亲自领导的下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受到极大的阶级教育。而山西省委是如何领导这个革命运动的呢？我们是不断地在观察和研究着。因为山西省委限制我们一些同志参加这个运动，我们不得不如此。根据数月来观察结果，我们觉得你们（山西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不但用种种方法限制和封锁我们，而且，对我们还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你们越来越背离主席的指示，越来越走上抵抗中央的立场。我们想任何一个革命的人，也是不会饶恕卫恒、王谦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种反动罪行的。为了保卫毛主席思想和他亲自所制定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为了贯彻这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有责任揭露省委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所犯的许多重大的罪行。

一、死抱着彭真二月黑提纲不放

你们多年来对彭真大黑帮有着极不正常的关系。据说，去年四月华北局在邯郸召开会议时，李雪峰就曾告诉你们，毛主席非常反对彭真的二月黑提纲。李还透露，他个人将接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之职。按道理，你们对于彭真应该摸到一些情况了。现有铁证也证明你们是摸到彭真情况的。比如，去年四月二十六日，省委农村四请办公室所出版的第六十五期“山西四清”，原版是排印的林彪同志对张爱萍同志的讲话，卫恒亲自下令，改登“彭真同志对当前社教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的讲话”，但在出版三日后，你们就下令将这一期

“山西四清”迅速收回。这一方面证明你们反对林彪同志，一方面证明你们还在拥护反革命分子彭真，只是情况改变了，你们才将他的讲话收回。但是，当你们草拟五月六日山西省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指示时，竟还置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并由中央下达的江青同志四月的，座谈纪要于不顾，而采用彭真二月黑提纲的主要精神，而且有不少地方是全文照抄。强调这次运动是“学术批判”而不强调是政治运动，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为什么对前者是抗拒，对后者却要坚决贯彻执行呢？

当去年五月间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同志提出应当收回上述省委指示时，本来省委接受此意见，并已草成收回的文稿。但当卫恒从太原返回北京时，坚决主张不收回这个文件。并说：“收回这个文件，就等于山西省委犯了错误。”以致这一具有公开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彭真的反党黑纲领文件，至今流毒全省，实在令人愤慨至极！

这些事实说明山西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如何地在坚决顽强地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而毫不动摇地死抱着黑帮头子彭真。你们是不是还在做梦，幻想彭真卷土重来，到那时你们就好交代了？

二、坚决贯彻执行并进一步发展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去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局会议，可说是执行和发展刘、邓反动路线的最集中，最露骨的一次会议。山西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坚决执行这次会议的精神，使山西全省文化大革命运动，走上更加反动的道路。如果说五月的山西省委的学术批判的指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先奏，那么，华北局会议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当组织人们参加会议时，省委更怀鬼胎，对参加会议的代表，几经斟酌。本来按照华北局通知，省委常委除照顾日常工作外，要尽可能参加。而省委不仅不叫对省委有意见的同志参加（如刘贯一），而且对省委尚未表示意见的同志（如何英才）就连临时常委也不能参加。

这真是个破坏组织原则之先例。探其用心何在，无非经过前后方的控制，达到你们开会得以秘密进行。至于在开会期间，严密封锁，滴讯不漏，更不要说了。

会议进入开幕后，袁振同志对省委提出五点意见，并给主席和华北局写信反映山西省委问题，本来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省委应该展开讨论，澄清真相。而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竟采用高压手段，对袁振同志进行昼夜围攻，据说占用会议时间达一、二十天之久，你们为了达到镇压山西对你们有意见的干部和群众，竟将斗争袁振同志，看成是华北局会议的主要任务。而袁振同志到晋不久，势单力孤，最后被迫承认错误，这固然是袁振同志斗争性不强，坚持原则不够，是有缺点的。但反过来看，错误首先应该由卫恒、王谦负责。你们以势压人，组织围攻，以袁振同志之屈服承认错误，据为自己初战即捷之胜利。实际上此乃不过是政治迫害而已。而卫恒还满怀得意地说：“袁振将省委往黑线上拉，是有意反对省委。”我们认为袁振同志做的很对，只是把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往黑线上拉的不够，反的也还不够，因为你们确是和反革命分子彭真是一伙。

当会议进入末期，竟大肆组织张承先、郭影秋和叶林等人，向大会介绍他们在北京的所谓派工作组镇压学生和实行白色恐怖等经验，而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还交相赞誉，奉如“神明”。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当聂元梓大字报在北大出现，是毛主席亲自支持登报的，华北局也于六月二日召集各省市委书记作了传达，而卫恒在六月三日回太原后，竟还召集各大专院校负责人，对各大中学校贴大字报等革命行动，提出八条限制意见。这是又一次地在反对毛主席的指示。

综上所述，显然可以说明：山西一小撮人在华北局会议上，不但忠实地贯彻了刘、邓反动路线，而且有很多发展，使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就陷入极端错误道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省委在以后的若干次会

议上，甚至卫恒在“三干会议”上代表省委所作的检讨，只字不提华北局会议任何问题，更不愿揭露华北局是如何错误地领导这次会议的。

三、纠缠袁振问题使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一错再错

在华北局会议上将袁振问题搞错了，已如上述，如果说在华北局会议期间，特别是初期，还是刘、邓反动路线正在炽热的阶段，但华北局会议末期，特别是去年八月间，中央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正式宣告刘、邓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省委就应及时纠正错误，将袁振同志问题迅速加以解决，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完全纳入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而省委在此时还不愿对袁振同志问题作任何让步。这样，袁振同志的问题，便与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如胶如漆地纠缠在一起了。

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一事态的发展，在这里不能不追述一下历史过程。

在华北局会议上，袁振同志已被迫承认自己是“野心家”和“伸手派”，而卫恒还假惺惺地说：“袁振问题没有作结论。”这真是强盗打人一闷棍，还说自己没打人。其实卫恒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他的用意所在是：在华北局会议小范围内把袁振打成反党罪名，远未达到目的，必须在大范围内赢得全面声讨，始算宿愿以偿。一方面使袁振同志永世不得翻身，一方面使群众立刻为之慑服。看！你们（指群众）谁再胆敢向省委提意见，都会落得象袁振一样的下场。

所以，当华北局会议闭幕，卫恒回到太原，在七月十六日和十八日两次动员会议上，竟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打击目标是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野心家”、“伸手派”。卫恒甚至这样说：“山西的野心家和伸手派大有人在。”而且还有“在朝”，“在野”的。而卫恒当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唯恐根基不固，竟不惜创特种语汇，实施高压政策，这样一来，使运动打击了很多的革命群众，伤害了

不少的一般干部。而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真正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得到蒙混过关，平安无事。至于全省有多少人被打成“野心家”和“伸手派”，还无具体数字，省委也根本不愿意进行公布，以免暴露他们的罪恶行为。自然这需要认真进行追查的。

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和袁振同志的政治斗争，绝非个人之间的斗争，乃是反映一种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为了夺取太原市领导权，不仅在华北局会议上对袁振同志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而且再回到山西以后，在长时间内还疯狂地斗争袁振同志。特别露骨的是，省委在商同华北局同意下，竟决定派贾俊带领一百四十余个重要干部的所谓“工作队”，公开到太原市进行夺权。并由贾俊公开组织什么“揭发、批判袁振同志罪行会议”，和发动市委不明真相的广大的干部，以大字报的形式向袁振同志进行围攻。直欲将袁振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

省委抓住袁振同志请求离开领导文化大革命责任的机会，既宣布所谓袁振同志一伙“黑帮”为不信任人物，又宣布贾俊为太原市委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组长。直到袁振同志发布申辩书，推翻冤案后，省委除促使太原市委疯狂围攻外，并在取得华北局同意下，公布贾俊为代理市委第一书记，而将袁振调回省委工作。这样，贾俊一变而为工作组，再变而为联络员，三变而为太原市文化革命领导人，四变而为太原市委代理第一书记。不管贾俊怎样步步高升，这实际上反映省委一小撮人巧布云阵，自欺欺人。难怪乎一当贾俊公开代理市委第一书记后，广大革命群众极为愤慨，纷纷提出抗议。提出这是省委的大阴谋，并强烈要求贾俊迅速离开太原市委，而你们一直抗拒群众的正义要求。

事情发展到本月七日，经过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到华北局请愿的结果，华北局已由张邦英同志代表华北局向山西革命学生公开表示：（一）去年五月份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袁振同志对省委提出意见是

正确的；把袁振同志打成“野心家”、“伸手派”是错误的，应该加以纠正，并作出公开检讨。（二）华北局决定，撤销贾俊代理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袁振是否立即回太原市委工作，视袁振同志的健康状况由山西省委商定。至此，省委一小撮人，制造数月大阴谋的袁振同志问题的真相，为之完全暴露。

在此不能不揭露省委为了围攻袁振同志所采取的许多非法乱行。比如，在袁振同志贴出申辩书，广大群众与他取得联系后，省委不但压迫袁振同志，而且还压迫无辜革命学生。举凡跟踪、盯梢、劝阻、警告、分化瓦解、秘密窃听和公开威胁等等无一一用上。至于对袁振同志的监视侦察等等，秘密犯法行为，更不要说了。特别在后一段时间，省委别有用心地公开宣告，袁振问题是党内问题，不许广大革命群众过问，更是阴险狡诈之极。

总之，省委一小撮人想方设法打击袁振同志，其目的是为着镇压干部和群众。

还必须揭露省委一小撮人打击袁振同志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当袁振同志响应陶鲁笳临离山西时，号召各地、市委总结各地八年工作，太原市委于一九六六年春也这样做了。其中，曾很有分寸地指出市委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三面红旗”发生过动摇。特别指出原组织部长、现任候补书记徐镇海的一些错误言行。但这些言论大都来自卫恒在一九六二年在省委党校所作的总结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讲稿上，而且卫恒所讲的，对三面红旗进行了系统的恶毒的攻击。而徐镇海只不过是拾其牙慧而已。就是如此，太原市委的八年总结既触怒了省委一小撮人，又特别触怒了卫恒。卫恒居然这样说：“袁振将徐镇海打垮了，也就将我卫恒打垮了。”

反折衷主义十二条，也同样遭到省、市委一小撮人的忌恨。难怪贾俊一到市委就宣布，太原市委通过的八年总结是袁振同志的反党

纲领，反对折衷主义的十二条是袁振同志打向省市委领导同志的十二条“闷棍”。看：对待山西省委和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辩言可议呢？这不等于说对山西的任何问题不能加以批评了吗？

总之，袁振问题与山西文化大革命纠缠在一起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表明，省委一小撮人所制造的袁振同志问题，实质上是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革命派进攻。

四、玩弄“三干会”继续欺骗、镇压干部和群众

山西的“三干会”是继去年十月末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于十一月二日至十七日召开的。当卫恒、王谦由北京回来，据说于十月三十一日省委常委会议，十一月一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联席会议，又于十一月一日晚召开了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常委联席会议，讨论解决袁振同志问题。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行动诡秘、严密封锁情况下召开的。究竟搞了什么勾当，只有由当事人揭发了。特别引起我们最大注意的是，在会议初期，卫恒、王谦散发了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些发言。王谦对山西文化大革命，似乎还进行一些完全与事实相反的吹捧，而卫恒虽然揭发了刘少奇、李雪峰、安子文的一些问题，但实际上也是“小骂大帮忙”。企图用这种方法掩盖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难怪这些文件刚一下发，就迅速收回，说明此中有鬼！

最令人气愤的是，省委所代拟的由卫恒将要宣读的对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检讨，虽然前后发下三、四次修改稿，但仍然是空洞无物，根本未触及灵魂。实际上是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不愿作检讨，想继续欺骗干部和群众，蒙混过关。这说明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负隅顽抗到什么程度，也说明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对主席最高指示一贯对抗，所以，参加会议的数百名代表，在讨论此检查稿时，几乎是全部一片反对声。就是这样，省委还是照样印发，并广为张贴，企图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群众辩论大会上进行检

讨。会议勉强开成，而反映却十分恶劣。这也说明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在欺骗了干部之后，又在欺骗群众。

“三干会”代表在讨论上述检讨稿和向卫恒、王谦等一小撮人揭发问题时，自然是不很彻底的。绝大多数代表虽然有许多意见，但就是不敢发表。比如，我们所参加的小组内，当省监委副书记荆山同志揭发山西省委问题时，竟有人从中阻拦，气得该监委副书记说：“请你们允许我将言发完嘛！我知道你们在我发言后，就要围攻我”。果然第二天省委即调他下乡去了。这样，一般干部怎么还敢发言呢？！透过这一事实，说明山西在党内外是没有民主可言的。

在三千会议的同时，卫恒的精神世界也有着显著的改变。据说，此时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在北京被揭发，对卫恒等人是震动很大的。本来这些人都是反党分子，他们被揪出，全国人民为之大快，奈何卫恒这样伤感忧郁，神智失常，几乎躺倒站不起来呢？这岂不是有鬼吗？正因为如此，卫恒在此期间，曾两次犯大错误。例如：去年十一月九日和二十一日，他竟两次和革命群众私自订立协议，因事实上办不到，因而不能不两次推翻和群众的协议，以致群众认为卫恒出尔反尔，对其非常不满。

当“三干会”偃旗息鼓，无声无息地闭幕后，卫恒在布置各地市委进行检查时，还是不改腔调，不敢号召各地市委首先向省委揭发问题，而说什么“要各算各的账”。特别是在十二月初，卫恒又卧病医院，前后约达二十天之久，王谦、赵雨亭又到中央开会，兼之广大群众又连续造反，以致从十一月三干会起到现在为止，前后两个月之久，山西省委一小撮人，不但不愿意承认错误，而且更加向反动方向迅速发展，既自绝于群众，又对抗中央。

就是如此，省委在将“三干会”的情况向中央报告时，还说什么“这次会议基本达到目的了。”这显然又是向中央说谎，所欣幸的是，

省委不革命，而群众却要革命了。而且矛头所向是指向省委。

五、省委以卫恒、王谦为首的一小撮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正如十六条决定所指出的，“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的情况，省委已经走的更远了，已经搞起反动阴谋来了，你们已经转入地下，并组织反动力量。你们利用党永生，党予生，党育红，党新生等几十个名字和名称到处贴反对革命学生的大字报，反对革命工人，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工人斗工人，挑动干部反对革命群众，挑动干部围攻学生，围攻工人。还利用机关印刷厂之便，大量印刷黑传单。现在你们正在积极欺骗一部分群众，组织反动力量，并且组织以你们一小撮人亲自领导的特务，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革命的人绝不能再容忍你们的罪行。你们这样反动下去，你们完全不顾党纪国法，你们完全违背主席千百万次的教导，来反其道而行之。如果你们不愿把自己置于绝地而不顾，你们就应该公开地向群众检讨，把你们那一套黑幕揭出来。你们检讨的好，群众还可能原谅你们几分，否则，只有自绝于人们，何去何从，请你们自己选择。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出对山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看法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不是再检讨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了。数月以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事实，充分证明你们已经不是拥护党中央了，而是抗拒党中央了；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了，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了。充其量你们也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已，你们实际上已经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安子文以及大黑帮头子彭真串在一线上了。卫恒、王谦一小撮人已经肯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物了。自然，还有极少数的是你们的帮凶。我们相信山西省

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纵有一部分人今天还在你们蒙蔽之下，我们坚决相信，他们迟早会回到中央的政策上来的，和站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我们也坚决相信，山西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管经过什么曲折复杂甚至艰险的过程，人们最后将会赢得胜利的。而且很快就会到来的，这种胜利已展现在全省一千八百万人民面前了。因此，山西省委的问题的性质，已经是属于钻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而不再是其他。你们是向人民请罪呢？还是继续和人民为敌呢？向人民请罪是可以将功折罪的，继续和人民为敌，那只有死路一条，是你们自己要毁灭自己，而不是别人要毁灭你们。何去何从，只有由你们自己抉择了。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

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工人阶级同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者联合起来！

一切劳动者和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联合起来！

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刘格平

刘贯一

何英才

袁 振

陈守中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日

在刘格平、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这五位省级领导干部尚未贴出大字报炮轰“黑省委”、要打倒卫、王、王之前，在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机关，也已经出现了群众造反组织。全国都在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委还下发了 130 号红头文件，提出“要在干部群众中进行动员，放手发动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切牛鬼蛇神，迅速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起来，推向高潮”。省委和省人委的机关干部们，岂能不带头？他们的这些组织，并未跨行业，只是本部门的一些干部要贴大字报了，就几个人署个什么战斗队或什么兵团。那时成立组织简单得很，既不用去民政部门申报备案，也无须上级部门批准，在这一点上，省委和省人委这样的全省首脑机关，和学校、工厂和社会上的其他单位并无两样。这些组织，基本上是由一些年轻干部和机关工勤人员组成，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又有一腔热血，投身于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在必然。在当时，他们写大字报批判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本机关的领导，揭批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本机关当权派们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所谓问题。在省人委大院，有年轻干部们开始用全球红兵团的名义贴出了大字报，其观点，是在省委的领导下搞好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些起来揭发省委省人委问题的干部和职工，也成立了诸如红缨战斗队，机关工勤人员造反兵团等，他们贴出大字报的观点，则倾向于社会上炮轰卫恒和炮轰省委的那些造反组织。还有一些省委的机关干部们，虽然没有建立群众组织，却用“党育红”、“党予生”、“党永生”、“党红兵”、“党育生”这种化名，写出大字报，表态捍卫省委和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对炮轰省委、造省委反的那些大字报进行了批驳。这些，也是“文革”中党中央号召、毛主席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形式的大民主。

刘格平等五位省级领导干部贴出了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向全省各界表明,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各级政府明显地分裂了。于是,省委、省人委机关内的一些年轻干部们成立的组织,在如何对待刘格平等五人革命造反这件事情上,也一下子形成了两种观点。

且举一些年轻干部和他们的组织为例。

在省委调研室,由年轻干部李辅挑头,一些紧跟毛主席,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干部们,先是成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队”,并推举李辅出面,通过卫恒的秘书,请卫恒题写袖标。此举也映证了他们当时参加运动的心态。李辅是1964年从省委党校毕业后分配到省委的年轻大学生,先在省委社教指挥部工作。社教指挥部主要领导全省农村的四清运动,其时省委第一书记还是陶鲁茄,第一书记也兼这个指挥部的总指挥。李辅文章写得好,被同事们称为“陶书记的笔杆子”。刘格平等五位省级领导干部造反了,李辅和他的几位同事,又在那个战斗队基础上,组建起七一公社。他们不同意刘格平的造反观点,自然也就不紧跟刘格平了,甚至表示了反对刘格平的观点。

在省人委办公厅,有1963年几乎同时分配来的几名大学生。他们在校时是优秀者,所以毕业时能分配到省人委这样的机关。这几位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干部是来自中山大学的黄锐庵、来自山西大学的杨瑞武、苏培田、还有来自南开大学的王浦源等。他们在省人委办公厅上班不久,就被派到四清前线,“文革”开始回到机关后,出于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的思想基础,由黄锐庵挑头成立了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积极参加运动。待刘格平带头起来造卫、王、王的反时,黄锐庵就带着这个组织,积极支持刘格平,并参与了刘格平组织的夺权行动。

这些人当中,有的被历史潮流裹挟,如黄锐庵,在“文革”的洪水

浊流中终于成了一大派群众组织红总站的领导。这些人当中,也有的随着“文革”的进程而开始反思“文革”、抵制“文革”、从而对“文革”心生厌恶者,他们或偃旗息鼓,或不参与社会上派性活动,使自己的人生获得了完美。如苏培田先生和杨瑞武先生,虽与黄锐庵一起成立了省人委办公厅的东风革命造反兵团,但后来却和黄锐庵不同,没有杀向社会而陷入泥淖,“文革”结束后继续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苏培田在省委党校副校长官位上到龄退休。杨瑞武在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官位上到龄退休,并出任太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至今在职,服务于社会。

在全省的干部队伍中,省委和省政府的干部队伍,当然是素质最高的。无论在日后的“文革”进程中他们如何分化、如何对立,如何观点相左,如何争权夺势,如何因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变化而陷入不同的命运沉浮,他们当时或者建立一个革命造反组织,或者参加一个革命造反组织时,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圣洁感情,要积极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纯真想法,与当时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其动机和心态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日后人生结局不同,有自身的种种主观原因,有山西政坛变化的种种客观原因,但当初紧跟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那颗红心,是不容怀疑的。

【7】1·12 夺权(一)

袁振站到了刘格平一边,刘灏带领他的兵团战士,哗啦啦大旗一边倒,自然成了刘格平麾下的有生力量。袁振让一直支持他翻案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快快表态,刘灏自个懒得写什么文章,安排手下人连夜写就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目前时局和我们的任务》,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对刘格平的革命造反行动给予高度赞美。表明了山西革命

造反兵团除了支持袁振以外,还坚决支持刘格平的政治态度。

1967年的元月11日,刘格平和张日清派人通知省城的各路造反组织的领导(当然,像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张志安和山西红卫兵团的领导刘普德那种保皇领导是绝对不能通知的)来开会,地点是刘格平家中,内容是“通报和研究山西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时间是晚上8点整。

当晚,张日清带来了解放军,刘格平家的门前院后,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到会的领导干部,还有刘贯一、陈守中和刘志兰夫妇,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则里外忙着招呼。从北京来山西串连的学生领导们来了,省城各路造反组织的领导们也来了。别的不说,一看刘格平门前院后布满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所有参会的人就能感到,今晚的会议气氛绝非寻常。代表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来开会的,是外语系的大一学生方培泉。方培泉是山西最早成立的炮轰省委指挥部的决策人之一。他到会时,按刘格平的安排,还带来了一些体育系的学生们,这些山西大学体育系的8·8红旗战士们,个个体格健壮,被丁磊安排就地配合解放军担任起警戒任务。

奇怪的是,这次决定山西政权更迭的重要会议,堂堂的兵团司令刘灏竟没有参加,他只是委派了兵团的另外一名负责人、太原工学院瑞金兵团的司令宋捷去开会。当时刘灏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会议。“通报和研究山西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这种内容的会,又是刘格平以自个的名义发出的通知,刘灏当时认为与兵团没有太大的关系。华北局给袁振平反了,袁振的案翻了,于刘灏而言,还有比眼下这种胜利更重要的事儿,需要你刘格平来向兵团通报?需要与兵团来研究吗?

退休后的刘灏,对当年这件事直率地做了如下回忆:“那阵子我还没有想到要做官,兵团炮轰‘黑省委’,揪斗卫、王、王,目的也是要

为袁振翻案,我脑子里那时还绝没有向省委夺权的想法。华北局给袁振平反了,我好像办完了事似的,根本不知道那天晚上刘格平召集造反派们在他家开会,是要决定向省委夺权的事。代表兵团去开会的宋捷,那时的想法和我也差不多。宋捷到会了,大家推举我做夺权总指挥,这事儿他自个也拿不准,当然不敢替我答应。”

兵团来参加会议的,还有两名学生,一名是太原十二中的初二学生崔吉娃,一名是党校的大学生梁振华。崔吉娃当时刚过了 16 岁,虎头虎脑,响应英明领袖的号召,在学校组织起十二中红旗战斗队,被一群学生娃娃推举为队长。他带着大家参加了兵团,在兵团的活动中,认识了党校的大学生梁振华。崔吉娃请梁振华来十二中帮他,任命梁振华当十二中红旗战斗队的指导员。一群初中娃娃起来造反干革命,叫崔吉娃队长不过瘾,就叫成了崔司令,梁振华呢,也就被这些中学娃娃们叫成了梁政委。梁政委造反劲头大,带着十二中的一群初中娃娃,就抄了卫恒的家,把卫恒的老婆孩子赶走,他们住了进去,名曰占领了走资派头子卫恒的老巢。刘格平派人找到梁政委,梁政委就带上 16 岁的崔司令,一道来开会了。梁政委口口声声兵团长,兵团短的,很有气势,似乎他就是兵团的主事者和代言人了。

由刘格平召开的这个决定向山西省委夺权的重要会议,还有一大派群众组织没有参加,他们便是红联站。前面我们已经说到,炮轰省委指挥部在袁振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刘灏这一派成立了兵团,另一派则成立了红联站。当时的红联站中有太原工学院的大学生,也有山西省委党校的大学生,(当时省委党校除有计划地轮训在职干部外,还设有政治系培养本科大学生)与这些大学生一道革命造反的,还有不少中学的中学生。他们革命造反劲头十足,仅红联站勤务组的领导班子中,就有不少当时在学校和社会上,因革命造反而名声大噪的学生领袖,如太原工学院的杨保明、李青山,省委党校的赵凤田,太原十

中的马尚文等等。为什么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人参加这次会议呢?是因为刘格平没有通知到?还是因为接到通知的人,没有重视刘格平这位副省长的通知?

为写作这段历史,我搜集到了两种说法:其一,刘格平以为兵团和红联站原本就是一家,既通知了兵团,也就无须重复通知红联站了。其二,当时刘格平的夫人丁磊以为,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方培泉就是红联站的领导,因为他与刘灏都是炮轰省委指挥部的革命小将,炮轰省委指挥部后来在袁振问题上分了两派,怀疑和反对袁振的小将们又成立了红联站,方培泉和刘灏也分了手。方培泉到会了,红联站不就到会了?但丁磊根本不知道,方培泉与刘灏一道组建兵团后,就忙着外出去调查刘梅的问题,年底回来后,炮打省委指挥部里的太原工学院和山西省委党校的那些大学生们,已一道组建起红联站,而方培泉回到学校后,则成为8·8红旗战斗队的领导人之一,将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变成了与兵团、红联站并肩战斗的造反派组织。当日后兵团、红联站,还有丁磊组建的红总站三大组织,在山西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时,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也就时而与兵团一个观点,时而又与红联站一个认识了。

不论是那一种原因,与刘灏一道最先向山西省委造反的红联站,偏偏在刘格平要向山西省委夺权之际,被遗忘了,遭冷落了。

那个晚上的会确实开得激烈,山西新的党政权力中心,正在背着省委悄悄地成立。刘贯一主持会议,刘格平开门见山,先谈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被“黑省委”领入了歧途,接着讲他亲自去中央文革小组领回来的中央精神:“我们要坚决向‘黑省委’夺权,这样才能最后打倒‘黑省委’。”

此话既出,满屋人声哗然。有叫好者,也有窃窃私语者。夺权者,改朝换代也。这种大事,在场的造反派们还真不知如何下手。

胸有成竹的刘格平详细地布置了。他说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很明确，“黑省委”必须打倒，先由中共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来取代。这个核心小组，中央已经批准成立了，组长是刘格平，副组长是张日清，五人大字报的其他成员刘贯一、袁振、何英才、陈守中等四位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站出来与山西“黑省委”作殊死斗争的革命领导干部，除了何英才外，全是核心小组的组员。至于那位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为何没有进了刘格平一手组织起来的这个政治班底，时过境迁，已很难说明白了。何英才在革命武装斗争的烽火岁月中，有过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经历，其时省政协机关也有造反派们贴出大字报，将他诬蔑为“大叛徒”，刘格平是靠抓 61 个叛徒集团才与中央文革小组挂上的，与他一道写“五人大字报”向“黑省委”造反的何英才也出现了“叛徒”问题，这可能是刘格平不让他进入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个原因。刘格平向到会的造反派领导们指出，已经成立的中共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将取代“黑省委”，领导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眼下进行夺权斗争，具体说，就是要成立一个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这个总指挥部在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既是这次夺权的领导机构，也是夺权后山西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刘格平又明确指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都不参加这个总指挥部，总指挥部由今天来参加会议的造反派组织组成，总指挥呢，要由大家共同来民主推选。

布置完这一切后，刘格平请张日清政委讲话。张日清也当场表态：“我的部队是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决不保护走资派。不要看卫恒是省军区第一政委，他甭想动我一兵一卒，调我一炮一弹。现在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即夺权。”

期间，刘志兰给了刘贯一一份《关于省委特务活动及黑二、三线人物名单》的揭发材料，刘贯一当众宣读了这份材料。正在这时，门外又出现了一个情况。

原来,刘格平在家中召开的这个会议,共有北京和太原的 26 个造反组织的领导人到会,这些人在刘格平的家中聚会,外面则是岗哨林立。此种情况,使正在省委办公厅和省人委办公厅内,例行值班的一些机关干部,不由得产生了怀疑和警觉。副省长王中青的秘书罗广德,那天晚上也在值班。王中青当时已经被省委点名,在《山西日报》上成为大批判的对象,但他的秘书,还在正常上班,正常工作。组织原则告诉他,作为值班干部,发现什么情况,必须向有关领导即时报告。出于高度的责任心,罗广德决定去看看刘格平正在开一个什么会。一位副省长的秘书,去另一位副省长家看看,他想不会有什不妥。然而,他刚刚走到刘格平家的门前,就被站岗的解放军挡住了。他让他们进去通报一声自己的身份,刘格平的夫人丁磊闻讯后带着几个人出来,一看是王中青副省长的秘书,突然大喝一声:“他是特务,抓住特务!”不由罗广德分说,倾刻间,他便被人反拧双臂,押进了刘格平家。丁磊又指着他大喊:“这狗特务是王中青的秘书,是来替‘黑省委’打探消息的!”一听这话,刘格平家中的造反派们一个个怒火冲天,杨承孝率先大叫一声:“得先把这些特务抓起来,再把卫、王、王的家抄了!”见刘格平点头,杨承孝立即带着门外他那些担任警戒的随从们,涌出了刘格平家,冲向省委和省人委大院。卫恒的家,已经被十二中红旗的中学生们抄了、占了,他们就分头查抄了王谦、王大任、贾俊、武光汤、赵雨亭、刘开基等省委领导人和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副省长兼省人委秘书长卫逢祺等领导人的住宅。

不消两个小时,在省委、省人委办公厅值班的干部也全部被抓。他们被押在一起,被刘格平当做狗特务一顿训斥。随后张日清又一声令下,这些人就全被解放军关押起来了。在刘格平等夺权成功后,专题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打的报告中,将这一批省委和省人委机关的干部,全打成了“卫、王、王的特务组织”,并诬陷省委办公室

副主任刘贯文是这个特务组织的组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秘书李玉明、郑林副省长的秘书周文是副组长。

当晚杨承孝带领众人得胜回来，刘格平继续让大家抓紧时间，推选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同时让大家在早已起草好的那份“夺权公告”上签字。于是，有 25 个代表革命造反组织的领导们，分别签下了自己组织的名称和自个的名字。唯有方培泉没有代表山大 8·8 红旗签名，他说要回去和其他的领导们商量一下。众人也不再催他，紧接着大伙儿又是一阵哄吵哄嚷，这 25 个造反派组织，那段时间在本单位或者本系统，都是以老大自居，在总指挥人选上，一时竟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毕竟兵团的威望高，毕竟刘灏是第一个炮打卫恒黑帮的革命小将，吵来嚷去，就有多数意见开始趋向统一，建议夺权大事，还是由兵团挑头，举起夺权帅旗，总指挥嘛，自然是刘灏无疑。可刘格平瞅来瞅去，却发现袁振向他举荐的这位革命小将，今晚竟然没有到会。大家的目光，便全部扫向代表兵团来开会的兵团那名副司令宋捷。然而，这位副司令却一时无法表态了。刘灏让他来开会，没想到这“通报和研究山西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的会，竟是要向省委夺权。刘灏不在，他可不敢做主给自个的司令戴上这顶总指挥的帽子。那个年代没有手机，再去与刘灏商量或者通知刘灏赶来，不是马上就能办妥的事。众人举荐刘灏，而到会的兵团副司令偏偏抓耳挠腮地一时难以表态。他说要派人去找刘灏赶来参加会议，有人又说怕是时间赶不上了，万一找不到咋办？刘格平急着要总指挥人选，张日清急着要动手，好不容易才统一了总指挥的人选，但事情还得等找来刘灏才能定夺。就在这山穷水复之时，突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场面。十三冶革命造反决死纵队的司令杨承孝拍起了胸膛：“他妈的，谁也不用去找了，你们不干我干！”

还是工人阶级有气魄。刘格平、刘贯一和张日清大喜过望，到会

的那些群众组织的领导们，面对杨司令毛遂自荐，想想自家都是些学生和干部队伍，夺权大事，总难比人家杨司令身后工人阶级决死纵队的拳脚厉害，于是纷纷点头，谁也再不提异议了。有了总指挥，还得有副总指挥才行。于是刘格平提名，众人应声，副总指挥也有了。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领导朱永庚，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算一个副总指挥。刘灏虽然没有来，但宋捷来了，也是响当当的革命小将，算另一个副总指挥。可笑的是，这天晚上，刘灏这个兵团司令，他的助手宋捷都当上山西夺权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了，他却并不知晓这个晚上即将发生的事情。宋捷在刘格平家里，和其他各路群众造反组织的领导们忙活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才将消息告诉刘灏。而那时，由刘格平等领导干部策划，由杨承孝一干人马唱主角的山西夺权大戏，已经成功了。

如何夺权呢？刘格平又向杨承孝作了具体的交待：“夺权的具体任务便是占领省委、省人委的各个办公大楼，查封各个办公室和文件柜，没收省级机关各个部门的公章，扣押卫、王、王的二三线特务。”

有了刘格平的指点，一下子由决死纵队的司令变成了向“黑省委”夺权总指挥的杨承孝，当即调兵遣将，安排部署。张日清紧密配合，先下令调走了省军区原先在省委、省人委担任保卫任务的警卫部队，为杨总指挥的夺权行动扫清了障碍。

【8】当晚的一个插曲

这里有一个插曲不得不说。方培泉奉刘格平和杨承孝之命，在回山西大学调集人马时，先将今晚的会议情况向山大8·8红旗的几个决策人李大纲、程宝珍、樊子琚、侯光天、乾明坤等作了通报。在参与不参与今晚夺权行动的问题上，在山大8·8红旗的几个决策人中间一下子产生了分歧。他们原本对刘灏领导的兵团死保袁振就有看法，

认为袁振也是走资派,不过是被卫恒舍车保帅先行抛出来罢了。眼下听说袁振这样的走资派也成了夺权的核心领导,便怀疑这种夺权是不是走资派在向走资派夺权?争来吵去,这种认识就占了上风。以这种认识,再去分析方培泉刚刚在刘格平家参加过的会议,这会议就越加充满疑点:你刘格平说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你,口说无凭,如何让人相信?你刘格平说中央让你成立山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又是一个口说无凭,怎么能没有任命文件?你刘格平本身就是一个副省长,是不是走资派?向“黑省委”夺权可以,但这里面搅进来一个走资派袁振,又有一个啥也说不太清楚的刘格平出面,这不是山西的一伙走资派在向另一伙走资派夺权是什么?越分析问题越多,山大8·8红旗的一位学生领导侯光天,就让其他大小领导稍安勿躁,等他先去找见附近的山西驻军首长,请教一下再说。夺取政权要靠枪杆子,听听解放军的说法没错。当时山西的驻军是21军,(这年三月底21军调离山西,69军开始驻防山西。69军的军部依然设在原21军的军部所在地。)军部就与山西大学相距不远。时间紧急,21军的副政委施义之(1966年年底施义之奉命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但那晚依旧在军部处理公务。)接见了他。侯光天说明了情况,施政委表了态:我们驻军没有接到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让我们支持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所以我们也不支持你们要参加的这种向省委夺权的行动。解放军的态度了解清楚了,侯光天回校后将情况一说,其他领导马上同意与解放军的态度保持一致,责令方培泉连夜赶回刘格平家去,先撤回体育系的队伍,下一步怎么办,好好研究一下再说。方培泉重新来到刘格平家,对留在刘格平家院子里的那些体育系的8·8红旗小将们下令,让他们撤回学校。丁磊看出山西大学的这支造反派靠不上了。她问方培泉为何如此行事?方培泉支支唔唔不愿细说。偏偏这时,从刘格平住的小楼上,下来一位山大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叫王文超,“文革”初起

时,改名为左锋,是8·8红旗战斗队派驻省委联络站的联络员。左锋要向方培泉问个仔细,方培泉便将回校后,8·8红旗战斗队几位领导的怀疑和想法,一一告诉了左锋。方培泉领上队伍撤了,还安顿左锋,要静观事态发展。

原本要等方培泉带来夺权人马的刘格平夫妇,想不到等来的,却是山西大学的这支造反队伍,不说个中原因就撤兵了。此举让刘格平夫妇大为不满。再问留下的左锋,左锋便将方培泉的话,一一告诉了丁磊。丁磊一听大怒,马上展开原先拟定好的夺权组织名单,将上面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一笔勾销。出于保护自己和丈夫的考虑,她又调来了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的一些大学生,接替了原先由方培泉带来的人。

此时,杨承孝又向刘格平和丁磊进言献策了,建议在“夺权公告”的造反派组织署名中,加上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个中原因,我们只能在事后猜测了。或许,是要为刘格平壮大工人阶级的队伍吧。或许,是想讨好比他兵强马壮的张建国等那些工人造反派吧。须知,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是太原重机厂水压机车间的工人张建国,副手是与他同一车间的工人李保顺。两位年轻的工人师傅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扯旗串连,在刘灏这些中学生们的支持下,在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大学生们的帮助下,队伍迅速扩大,成了一支跨行业的工人造反大军,其人数可要比杨承孝的那个决死纵队多得多。虽然刘格平没有通知张建国来开会,但听了杨承孝的建议,还是把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补进了“夺权公告”的署名中。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已经中途退出去了,算起来,向省委夺权的,还是26家革命造反组织。

方培泉带着体育系的同学们回到山大,向8·8红旗的其他领导们再次汇报了情况。在山大8·8红旗的领导人看来,要保持革命造反

的纯洁性,绝不参加由走资派们领导的这场夺权。于是,山大8·8红旗战斗队决定,方培泉不签字是对的,退出刘格平和杨承孝们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也是对的,此举也就成了这个组织的大学生们,日后向毛主席请罪的罪因之一。

【9】1·12 夺权(二)

元月12日凌晨1点,杨承孝召来了各路造反大军共万余人马,分别冲进了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这一回,杨承孝是为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核心领导小组效力了,那革命造反的胆量,远非当初替五中井冈山兵团的刘司令抢黑材料时可比。那一回,他还只会砸锁头,可这一回,他是要夺印把子。工人阶级要执掌天下,学生娃娃们,以后你们可就得跟上我杨承孝干了!

黎明时分,杨承孝果然提着集中回来的半麻袋“印把子”,回到刘格平家向刘格平和刘贯一、张日清复命来了:“咱们他妈的向省委省人委、向市委市人委的夺权,全部成功啦!”

刘格平、刘贯一、张日清三人,听杨承孝汇报完情况,自然不会当下就去清点那些“印把子”的。殊不知,中共山西省委的大印,杨承孝一伙根本没有夺来。省委办公厅掌管这枚大印的,是一位女机要员。她面对来夺权的杨承孝和他身后那伙决死纵队的工人们,既抱定忠于职守、人在印在的信念,又运用灵活机动的策略,只交出一个省委办公厅属下办公室的红印章,来了个偷梁换柱,就把这伙造反的工人们给骗了。事后,她偷偷把省委的大印带回家中,放没地方放,藏没地方藏,为了保护这枚大印,就想了个办法,用细绳子将大印的印柄拴牢,再将绳子捆在腰上,将那枚大印藏在内裤中。就这样每天还得上班下班,又不能让别人发现身上这个秘密,其忠于职守的精神可贵,

可下一步怎么办,她当时也不知道,每天忐忑不安之心可想而知。直到1月16日,此事才有个结局,我们后面再叙。

元月12日晚上由刘格平组织,由杨承孝带头实施的大夺权,天不亮就成为爆炸新闻传遍省城。

元月13日,张日清组织部队,乘军车上街武装游行,支持1·12夺权取得胜利。

刘格平毕竟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张日清和杨承孝是他向省委夺权依靠的“枪杆子”的话,那么,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那个大学生们,则是他向省委夺权依靠的“笔杆子”了。在刘格平召集各路造反派们开会的时候,从北京来的大学生们,已经由邢晓光牵头执笔,写就了刘格平需要的第一份重要文件。

下面就是1967年元月14日发向全省各地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全文。

史无前例的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要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就必须一反到底,彻底打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

以卫恒、王谦、王大任为首的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几年来,他们秉承其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旨意,企图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战略根据地。

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更是积极地推行和发展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派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围剿,把大批革命闯将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伸手派”、“野心家”,企图扼杀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亲自纠集了赵雨亭、刘贯文等大小特务,建

立了秘密情报网，安放窃听器，派出特务，专门刺探各革命组织的动向，把其划成一、二、三类，并把其领导成员登记造册，以便不久的将来好下毒手。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把大批黑材料放在省委各部内，至今拒不交出，猖狂对抗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和中央补充规定。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在省人委某一楼内建立了一个地下黑司令部，天天云集其中密谋行动。

就是这一小撮混蛋，组织了一些保皇团体，公开与革命造反派拼命捣乱。等等。等等。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山西广大革命群众向这一小撮混蛋及其卖力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了强大攻势，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文化革命进入了崭新阶段。卫恒等一小撮黑帮分子，为了挽救其灭顶之灾，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经济战。他们拼命给一些组织大量房屋、汽车、经费，某些单位的钱像流水一样成千上万地淌出，近几天更是达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严重破坏了山西的财政经济和腐蚀了革命组织。

在他们的怂恿和操纵下，最近不断发生大规模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革命造反派，甚至发生武斗现象。大量工人不断外出串连。

狗急跳墙，前些天他们甚至不惜挑动上万工人围攻革命造反派，以致许多企业停工，严重影响生产，甚至造成骇人听闻的交通事故等。

革命的同志们！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新的转折点！为了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了保证山西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我们二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立即投入战斗。

我们庄严地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十二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大量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卫恒等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

我们大声疾呼：

一、所有的工人、农民和干部都要牢记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照常上班生产。我们革命造反派们要在积极造反的同时，坚持生产岗位，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凡是反对毛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者，就是现行反革命，立即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不得动用武器、弹药和泄露国家机密，违者依法查处。

三、鉴于前一段贪污浪费之风大盛，勒令山西省文革接待站自即日起冻结流动资金，停止发动一切车辆，并进行调查和调整，除必要的正常经费外，各机关厂矿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自即日起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监督财务机关执行。

四、上述各条，希各革命组织广为宣传，协助执行。凡有违上述各条者，由有关部门协助我们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打倒折中主义！打倒经济主义！决战刚刚开始，胜利就在前头，我们的决心下定了，为了真正捍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深信，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必将发展壮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革命的造反派们，一切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

大旗下团结起来！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个通告有 25 家革命造反组织署名。他们是：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工农商学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者联盟、山西医卫革命造反总部、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捕猎大队、山西革命干部造反兵团、北航播火兵团、北农机全无敌纵队、首都赴晋革命造反大队、山西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山西日报革命造反军、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太原市小学教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共青团山西省委机关大无畏战斗队、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晋京革命造反大军、山西反修兵团、山西红色革命造反联盟、山西农民造反兵团、山西延安文艺兵团、太机第四野战军。

请注意，杨承孝让刘格平加上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名字没有了。原因何在？出在张建国身上。这位工人造反头目，在 1 月 13 日才接到刘格平辗转递来的消息，如何对待刘格平、杨承孝们向省委夺权这件事，这位工人师傅还是动了不少脑筋的。自然，也要和学生战友们商量。他最终接受了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和红联站一些大学生们的影响，认为这是走资派在向走资派夺权。于是急匆匆找到刘格平，责问为何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就将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写进了名单？一番争吵过后，以刘格平答应划掉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署名了事。名单上，于是就成了上面提及的 25 家造反组织。

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张建国找刘格平后,刘格平根本不屑搭理他。虽然杨承孝推介了张建国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但因这个组织的大领导和二领导一个也没到会,没有人签名,自然也就不会有从名单上划去这个组织的事情了。二是说在原先署名的 26 家革命造反组织中,还有一个山西省体育界毛泽东思想第二红卫兵团,领导是当时省体校的年轻运动员赵国增。那个晚上,他也来到了准备夺权的会场上。听邢晓光念罢由刘格平定了稿的夺权公告后,这位从农村考来的年轻学生,思量再三,拿不准事儿是跟上干好?还是不干好?先前写上他们那个造反组织的名字,他没有顾虑,但要签上自个的名字,他就有些犹豫了。这可是要夺共产党省委的权呀,他有了恐惧感,怕走错,就半途遛之乎了。赵国增后来没有从事体育工作,而是进入了仕途。他还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改革开放后,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历史的云烟早已过去,这一切,都成为云烟散尽后,回眸往事时的片片花絮。当时不论何种原因,最后在正式公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中,原先纠集到一起的 26 家革命造反组织,最终变成了 25 家。

这 25 家革命造反组织,除了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和刘灏的兵团外,其他的组织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马。细细刨根究底,那些北京来山西造反的学生们,也不能常留在山西。更重要的,是省委和省人委机关内部,只有一个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新政权要掌权,离不开干部队伍,这个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就肩负重任了。黄锐庵是这个组织的领导,在刘格平家中开夺权会议时,手下也不过十几个人,现在他得先替刘格平扩充队伍。黄锐庵的这个革命造反组织,因名列夺权公告榜上,夺权成功后,在省委、省人委机关名声大噪,省委、省人委机关不少干部开始纷纷加入。后来刘格平的夫人丁磊组建红总站时,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就成了红总站的中坚力量。日后的山西,由兵团、红

联站和红总站“三家分晋”，继而派斗不断时，当年参加夺权的那二十多个组织，也就各自融入这三大组织了。

刘格平组织的夺权成功了，红联站却没有参加。面对“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红联站的领导们召开紧急勤务组会议，分析研究对策。此时红联站勤务组的主要负责人，还是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副队长杨保明。他带着其他领导们好一阵仔细分析研究，大家争来吵去，对刘格平、杨承孝夺权的一些认识上，最后达成了一致看法。一、向“黑省委”夺权是斗争的大方向，但应当联合夺权；目前参加夺权的一些组织，既没有什么名气，也不是真正的造反派组织，红联站决不能和他们混在一起；二、支持总指挥部中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对反动保皇组织要马上采取行动，配合总指挥部，立即夺取卫、王、王黑省委的宣传机器和专政机器的大权；三、对参加夺权总指挥部的一些组织要进行调查；四、对刘格平、刘贯一，包括袁振、陈守中等参与夺权的领导干部，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未很好地到群众中“亮相”，不能轻易表示信任，要派代表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汇报；五、对刘格平和杨承孝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组织上暂不参加。行动上要在各条战线也展开夺权。

与红联站一样开会紧急研究对策的，还有张志安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刘普德领导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党中央已经表态支持了，他们不论理解与不理解，眼下必须按党中央的步调走。怎么走？这两支队伍合兵一处，于元月13日，在省城的湖滨会堂急匆匆召开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会，会上也批斗了卫恒、王谦、王大任，还宣布成立“山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行动委员会”。从字眼上看，他们要当“革命派”，而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刘格平杨承孝们的夺权，他们既没有敢公开反对，当然也不会表示赞成，而是以“抓革

命促生产”的口号,表示了他们的主张。会后这两支队伍举行了大游行,当天大会后游行罢,年轻的工人诗人张志安连夜组织人马,一边搜集材料,准备向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反映,一边筹划工人请愿团进京请愿,请党中央采取措施,平息山西发生的这场反革命夺权事件。当时与张志安和刘普德持同一观点的两位市委干部,主动向张志安表态,愿去北京向党中央反映山西的夺权事件,太原的火车站已经被决死纵队控制,两人只好先到榆次,才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学生模范刘普德也支持手下,一边准备向党中央反映山西这场变故,一边观察事态发展。

这几个组织的行动,激怒了刘格平和杨承孝的同时,也激怒了兵团和红联站。以杨承孝为总指挥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立即刷出大标语,将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和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山西红卫兵团的大会和游行,斥之为保皇派向造反派的公开示威。刘格平也马上表态了,他给张志安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还有刘普德领导的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同时戴上了反革命保皇组织的帽子。

元月 13 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委礼堂集会,在一片毛主席万岁和造反有理的口号声中,杨承孝先登台表演,大讲“黑省委”的罪行和夺权的伟大胜利。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也相继讲话,表示了对杨承孝总指挥领导的这场夺权斗争的支持。元月 14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即夺权通告),正式发向全省各地、市、县。

殊料,有新华社山西分社的沈世伟记者,对张志安、刘普德组织的大会和游行,做了正常报道,事隔一天,在 1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这条报道。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为此事派出人马,冲击了新华社山西分社,揪斗了分社领导李希孟,声讨新华社山西分社支持山西保皇派的罪行。接着,杨承孝又派出人马赶赴北京,要求新华

总社和《人民日报》就此事作更正。此事的结果，是《人民日报》在元月16日发表了一条新华社的《重要更正》：“元月14日有关太原问题的报道中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应予撤消。”

这时的胜利者是刘格平和杨承孝们。

【10】山西省委全面溃败

那么，此时的中共山西省委怎么就没有动静了呢？

不，以卫恒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此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省委领导们已经被各路造反派们揪斗得无法正常联系了。卫恒被揪到榆次县挨批斗，被省委机关的秘书们接回来后，悄悄藏在了省人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设在太原北营地区的一座仓库里。他还在继续战斗着，努力地想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全省人民检讨的方式，要重新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领导这场运动走向胜利。可以设想，卫恒的心情是复杂的、沉重的。他要面对如刘灏这样的“革命小将”们的造反；忍受如杨承孝这样的“工人阶级”的辱骂和毒



革命群众组织夺权宣传画

打；按照王谦等同僚们的批评去挽回“错误”；再遵照并不理解的领袖的意图向群众“检讨”；同时还得面对刘格平等已经宣布向他夺权的那几个共产党人，继续坚持省委的领导，希望与革命群众一道，搞好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月13日，下午5点钟左右，卫恒改定了他的检讨，让史纪言从北营仓库出来和王谦、王大任联系开省委常委会讨论他的检讨。6点多钟史纪言来电话：8点钟在宾馆开常委会，一会儿又说9点左右在晋祠招待所开。卫恒正要动身，又来电话说常委会开不成了，因为袁振、张日清、刘贯一宣布和省委脱离关系，拒绝参加。卫恒又让史纪言请王谦、王大任、贾俊到北营仓库开会讨论检讨稿。王谦说，谁退出都可以，留下我们自己干。

1月14日，卫恒检讨稿的大样排出来了，卫恒、王谦和王大任、贾俊，史纪言互相看清样，提意见，修正稿子，诚心诚意地进行检讨，期望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摘自李玉明《卫恒的最后二十九天半》，载《文革劫难记》一书）

就在卫恒躲进北营仓库里写检讨的时候，刘格平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在省委大院和省城多个地点贴出了《海报》，宣布要于1月15日在五一广场召开批斗卫、王、王大会。省委办公厅的干部，趁天黑揭下一份《海报》，送到了北营仓库。面对这份《海报》，卫恒等几位省委领导最后决定，不能怕革命造反的群众，要听毛主席的话，到群众中间去，与群众一道接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1月15日一早，卫恒还安慰他的战友们说：“多吃点，今天怕是凶多吉少。”早饭后，他们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五一广场。刚到广场，卫恒等人就被杨承孝手下的一群工人从车里揪出来，连推带搡地押上了主席台。

杨承孝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早已号令省城的所有革命造反组织，到五一广场召开批斗“黑省委”卫、王、王大会。会上，中共太原市委的代理第一书记贾俊，也被造反派揪到了主席台上，与卫、王、王一道接受批斗。

杨承孝主持大会，要给批斗对象挂上冠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硬纸牌子，每一个名字上还都打上了红×。这几位不但被夺了权，而且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原省委、太原市委的主要领导人，绝不会想到他们从“文革”一开始就力图站在运动前列，真心实意地想领导好这场运动的结果，是他们变成了这场运动的敌人；更想不到他们坚定不移地跟着毛主席，特别是在这场运动中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后果，却是他们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不能接受这种历史的误会。更不能忍受这种人格的侮辱。卫恒一把将挂在脖子上的牌子揪下来，扔到脚下。其他几位领导也将牌子揪下来几把撕毁。看到这些人把纸牌子撕坏了，杨承孝另有高招。他一声令下，负责押送这些走资派的决死纵队队员们，又把早就准备好的木牌子，挂在了这几位领导人的脖子上。历史可以责难这些无知的工人师傅们，但他们失去人性与理性的原因，却是他们认定了此刻斗争的对象，是反对毛



1·12 夺权后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被批斗



1·12 夺权后王大任书记被批斗

主席的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要将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反对毛主席的黑帮分子。他们强迫卫恒低头，卫恒厉声喊道：“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决不向坏人低头！”他们于是将卫恒压倒在地。省委第一书记依旧不屈，不顾扭着他双臂的工人师傅的压迫，扭头对也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工人师傅们愤然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

山西省委这些被揪斗的领导们，这一次全受尽了摧残。中国共产党的山西省委，就这样被刘格平为代表的，同样要代表共产党的五名省级领导干部，伙同他们支持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下子打倒了。

那个脱离了刘灏，自封为十三治革命造反决死纵队司令的杨承孝，此时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名义，在批斗会结束后，让手下将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四位原省委领导带走，控制在决死纵队总部，实际上囚禁了省委第一书记和他的三位同僚。堂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和其他三位省委领导，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省委一线的其他领导人，继续被造反派们轮番揪斗，已无法正常工作。三晋大地上，省委安排好的二线领导班子虽然力图固守领导岗位，但省委第一书记被囚，各级党委都受到冲击，省委在

山西全省的指挥，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

【11】1·12 夺权(三)

二级半电焊工杨承孝一时成了三晋大地上的风云人物，学生造反组织中的小将们岂能服气？

兵团虽然参加了1·12夺权，但唱主角的却不是兵团。对共产党只有感情而没有丝毫仇恨的刘灏，革命造反的目标与夺权还无法连在一起。在袁振平反后自认为大功告成的刘司令，对刘格平主持的情况通报会不甚积极，使他没有成为山西1·12夺权的总指挥。刘灏在那晚山西的夺权行动中缺席了。而夺权后山西政局的不断动荡演变，又让刘灏无法沉默，不得不使尽了浑身解数，跳入了新的政治斗争泥淖而无法自拔。

对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取代了“黑省委”，刘灏是拥护的。袁振说了，刘格平是受刘少奇迫害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张日清是林彪副主席支持的，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听袁振的话没错。再说，袁振现在也成了核心小组的成员，支持山西党的最高领导核心小组，能有错？可对杨承孝，刘灏心中就是不服气。你原来不过是我兵团冶金第一团的区区小团长，你拉起山头自封司令，也顶多与我兵团平起平坐，可现在，你竟然成了总指挥，号令三军，也号令起我们造反最早，威震三晋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来了，就是我刘司令服你，我的兵团小将们能服你？

兵团不服气杨承孝，还有不服气的呢，那就是红联站。元月11日晚上由刘格平召开的那次会议，如前所述，红联站的领导们没有一人参加。想想自己最早炮轰黑省委，结果却由别人夺了权，这些大学生中的造反领袖们，要按他们对刘格平和杨承孝的认识继续行动了。红



刘格平接见群众造反组织代表

联站炮轰“黑省委”，揪斗卫、王、王的大方向，和兵团等其他革命造反组织一样，但对兵团保袁振的做法始终有不同看法。现在出来一个刘格平，还有张日清和袁振等要取代“黑省委”，卫、王、王是走资派，你们是不是走资派？“文革”中可以怀疑一切，红联站的领导们经过这么一怀疑，山西省的夺权就值得大大地打上一个问号了。于是乎，红联站再次做出决定，坚决不能承认杨承孝为总指挥的那个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要进行一次革命的反夺权。要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是进行广泛的宣传。

用另一种思维紧跟毛主席，要将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学生们，不愁笔杆子底下不生花。李青山亲自执笔，在杨保明的安排下，再由红联站的秀才加工润色，写成大字报并印成传单，先就刘格平、杨承孝的1·12夺权，连续发表了三份评论，又发出两份《就目前形势告全省人民书》，提出了向“黑省委”夺权，究竟应该由谁来夺的问题，并对刘格平等“革命的领导干部”是不是“革命的”提出了疑问。红联站的“三评”和“两告”皇皇五篇大文章，认定刘格平和杨承孝

搞的夺权,是一场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宫廷政变”。红联站又开出宣传车用高音大喇叭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下令让下属组织,马上开始夺本地区、本部门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抢占了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这些单位,显示了大学生们懂得夺取宣传高地的政治敏感性。接着向尚未夺权的机关和厂矿也发动起夺权。夺权! 夺权! 夺权! 一时间,红联站在省城夺权成风!

黄锐庵的东风兵团参加了1·12夺权,此时也抓紧扩大夺权成果。他们的目标是省委和省人委的各部、厅、局,年轻干部们人手不够,自有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们助战。无非是抢砸办公室和机要室,达到抢夺公章大印的目的。扫荡完省委和省人委的各个机关,再向基层冲杀。各种大印被红联站的小将们夺来,又被刘格平和杨承孝的人马夺去。越是如此,红联站的大、中学生们,要与刘格平、杨承孝决战的火药味儿,越是浓厚。

在山西大学,由于8·8派退出了刘格平领导的夺权,而8·14派原先的观点,在社会上是支持山西省委领导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是支持校党委领导好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持这种保皇观点,自然无缘参加刘格平的夺权会议。面对刘格平组织夺权成功后的急转形势,中文系大二学生朱永成领导的8·14一派当即决定,要紧跟形势,在山西大学造反夺权。

1967年1月12日晚上9时左右,朱永成带着一群学生,从李希曾家中押出这位校党委书记,再推搡着校党委书记李希曾,踢开校党委办公室的门,要李希曾交出山西大学党委的权。瞬间,办公室挤满了人,沙发上,窗台上、桌子上都是来夺权的学生。气势汹汹,不时举起拳头,高呼着“打倒走资派!”“打倒保皇派!”的口号,逼着李希曾交权。正在值班的机要秘书姚桂兰,也被来夺权的学生们推推搡搡,把她和李希曾推挤到墙角处,这里立着放机要文件和校党委大印的保

险柜。朱永成指着姚桂兰的鼻子大声叫嚷：“马上交出党委图章！否则对你不客气！”

姚桂兰说：“我是党委秘书，我只能听党委的，你们无权让我交出图章！”

他们一边冲着姚桂兰高呼：“打倒保皇派！”一边向李希曾吼道：“你是书记，让她打开柜子交出图章！”

李希曾不答应，姚桂兰也拒不交出保险柜钥匙。相持到 1 月 13 日凌晨，有学生提出砸开保险柜。他们拿来锤子、钳子、斧头，砸柜子，捣锁子。折腾了近两个小时后，砸开了保险柜的门锁，把校党委的图章和党委办公室的图章夺走，将李希曾的个人名章扔在地上。来夺权的学生们很兴奋，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夺权了！造反有理！保皇有罪！”在欢呼声中拿着两枚公章，离开了校党委办公室。

那些天，省城各单位这样的闹剧，不知上演了多少。

首都赴晋造反大队、北农机全无敌纵队、北航播火兵团、晋京革命造反大军的那些大学生领袖们，虽然全参加了刘格平组织的那个夺权会议，也成了参与夺权的 25 家造反组织的成员，但这些来自首都的大学生们，批判山西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认定大方向正确，可夺取山西省委的大权并由刘格平等取而代之，虽然参与了，心中还是忐忑，生怕在参加山西的“文革”中，不慎犯了方向性错误。特别是张日清带军队支持刘格平夺权，这事中央怎么看？他们需要了解中央文革的态度。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紧急开会，决定派办事稳健、口才甚好的陈士镛即刻回京，向中央文革了解情况。

陈士镛匆匆回京，当天晚上在原文化部一间办公室里受到关锋的接见。关锋的态度很明确，对他说：“中央文革了解张日清，军队干部支持造反派夺权，有什么不好？至于刘格平，他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对 61 个叛徒集团也

有揭露，是一个好同志。”

这次接见，让北农机全无敌纵队的大学生们，吃了定心丸，认识到参加刘格平、张日清组织夺权一事，大方向绝对正确。首都赴晋造反大队也曾派人回京，向中央文革领导人作过汇报，也摸清了中央文革支持刘格平和张日清的政治态度。

关锋只能代表中央文革小组。那么，党中央的态度呢？

山西所有的群众组织，几乎都在拭目以待。

在党中央尚未对山西夺权一事明确表态之前，元月 16 日，党中央的一报一刊《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共同发表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开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最高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负责省委二线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副市长刘开基，面对眼下的处境，在省委二线指挥部临时驻地祁县乔家大院分析形势，认定山西省委并没有变成走资派，刘格平挑头夺省委的权是错误的。两人决定立即赶赴北京，通过华北局，向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山西的情况。他俩如过去搞地下工作一样，没有回太原，而是从寿阳登上开往北京的列车。在 19 日到达北京后，当即向华北局书记苏谦益报告了山西的情况，并将两人联名给国务院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写的报告交给苏谦益书记，请他迅速转报党中央。

这两位山西省委的领导人在联名的报告中说：“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第二书记王谦、常务书记王大任、书记贾俊、武光汤等同志已被造反派揪走扣押，我们二人为坚持面上的文化革命和生产工作，由省委决定搞二线工作，最近也由于电话中断，失去了上下联系，情况掌

握不起来,工作很难进行。省级各机关也被造反派夺了权,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同时,我们认为领导夺权的几个人也都表现不好、不受群众欢迎。为此,特来北京向华北局汇报,恳请华北局、总理、党中央尽快解决山西省的组织领导问题,并恳切地希望给予指示。……”

周恩来总理看过这份报告后,让苏谦益转告赵雨亭和刘开基,准备找他俩谈谈。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也曾三次通知赵雨亭和刘开基,说周总理准备接见。但是,尚未等到周总理安排好时间接见,赵雨亭、刘开基就在下榻的东方饭店,被刘格平和杨承孝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揪住批斗,押回太原,投进了大狱。

赵雨亭和刘开基这两位山西省委二线上的领导,与卫恒、王谦等一线上的省委领导一样,全是努力要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搞好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全然不明白,要通过“文革”肃清刘少奇干部队伍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早已将刘格平做为一颗重量级棋子,要在山西将他们取而代之了。他们所担忧的“山西省的组织领导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早就安排刘格平成立一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解决了问题。我们可以设想,即便周恩来总理能接见赵雨亭和刘开基,他能违背毛泽东的意思吗?

《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公开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让山西的各派政治力量,都从中看到了希望。

杨承孝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成员们,个个弹冠相庆,兴高采烈,他们从这句最高指示中,看到了毛主席对他们夺权斗争的坚定支持。

红联站从这句最高指示中,却找到了反夺权的理由,那理由是现成的:只有我们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黑省委”的权该夺,但是由谁来夺?由谁来取代“黑省委”?你刘格平和杨承孝分明是摘桃子的人,你们怎么能担此重任?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权你们夺了,我红联站就把基层的权先夺过来。红联站挑头,马上成立了山西

革命造反夺权第二总指挥部，当时也称红色造反总部。张建国领导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下子成了红联站的主力军。这个山西革命造反夺权第二总指挥部，即红色造反总部，活动了不到半个月，得不到刘格平和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的认可和支持，便解体了。

原先死保省委卫、王、王的工人联合会领导张志安，也和他的部下一道学习了毛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不但学了，而且还立竿见影地来了个活学活用。元月 17 日上午，工人联合会的一伙年轻工人们，向省委扑来。此时，还有另一支队伍也来到了省委门前，他们便是山西大学 8·14 派的一些大学生。他们在学习了“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后，立即认识到必须听毛主席的话跟党中央走，同时付之行动。17 日一大早，朱永成亲自带领一批学生杀向省委，与工人联合会的人马在省委门前相聚，决定联合行动。早有人探明消息，说杨承孝的人马还在省委，而省人委这边，现在没有其他造反组织把守。于是这批工人和大学生们，便改道直扑进省人委大院，冲进了省人委办公厅。其时省人委办公厅的值班干部是杨瑞武，虽然他与省人委办公厅其他几名年轻干部发起成立了东风兵团，东风兵团还参加了刘格平的夺权行动，但他还在照常上班，机要室的门和存放省人委大印的保险柜钥匙，也全在他手中保管着。刘格平夺权后没有收走省人委的政府大印，原因大约是认为东风兵团是参与 1·12 夺权的组织，其成员又是省人委办公厅干部，大印继续由他们保管不会有事。谁也没有想到来二次造反和夺权的工人和大学生们，冲入省人委办公厅后，要砸开机要室的门，杨瑞武拒不开门，他们就用铁棍撬开窗户，破窗而入并且反拧住杨瑞武的双手，从他身上搜出保险柜钥匙。然后打开了机要室的保险柜，抢走了省人委的政府大印。刘格平和杨承孝闻讯，立即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向全省发出“紧急通告”，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夺权事件”，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和其他盟军，又砸了工人联

合会，抢回了那枚大印。但刘格平只闻大印抢回，却不见大印原物。这个大印，日后流落何处，终于不知所终了。

再说那枚藏在省委办公厅女机要员身上的省委大印。《人民日报》都肯定了夺权，可这大印她还是不肯交给刘格平和杨承孝们。她和办公室同事任传兴私下商量，看这枚大印怎么办？俩人商量来商量去，都觉得把这枚大印交给省委机关的革命群众组织比较放心。任传兴和七一公社的发起人李辅是老同学，于是，任传兴偷偷去找李辅说明情况和想法，李辅当下决定，这权得“夺”到造反派手里才行。1月18日那天，趁杨承孝的人马离开省委大院，七一公社派人到了省委办公厅开始了“夺权”。戏演完了。藏在女机要员身上的省委大印，被七一公社“夺”了回来。但有印了，却还是无权。“黑省委”被夺权了，新的党的核心小组已经取代了原省委，面对现实，李辅虽然反对刘格平，但刘格平却执掌了山西的大权。七一公社也不敢用这枚省委的大印，来做什么具体的事情。李辅于是决定。将七一公社“夺权”夺来的那枚中共山西省委的大印，交到了刘格平那个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

此时，山大8·8红旗的决策者们，也从毛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中，找到了他们的斗争方向，那就是要与红联站一样，赶快去支持工人阶级从基层开始向走资派夺权。这些大学生们以强大的火力（这火力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开始炮轰关锋就是一例。关锋其时正在中央文革小组，虽不是领导，却是一位重要成员。1月17日关锋在北京民族饭店，接见了从太原赶到北京的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是就山西夺权一事，来向中央文革打探消息的。这些人中，也有山西大学的造反学生。关锋表态了，无非两点。一是山西省委的卫、王、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该打倒；二是刘格平们的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消息传回来了，山大8·8红旗的决策者们分析来分析去，这一定是关锋个人的观点，一定不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伟大领袖

毛主席的想法。再联系一下太原的具体情况，便有了主意。山西太原有个太原纺织厂，厂里有一位全国有名的女纺纱工人劳模名叫解悦。太原纺织厂也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一下子分成了两派。一派叫太纺红卫兵，一派叫太纺红卫队。女劳模解悦，是太纺红卫队的领导人之一，担任指导员。太纺红卫队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出面接见了他们，并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表态支持太纺红卫队。山大8·8红旗与太纺红卫兵是一个观点，关锋支持太纺红卫队，他们不满意关锋，那就要继续和太纺红卫兵团结、战斗在一起。虽然没有参加成省里的夺权斗争，现在却由方培泉带着一批8·8小将进驻太纺，支持工人阶级太纺红卫兵起来造反，大搞基层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了。1月23日，由山大8·8红旗支持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近万名工人，在张建国和李保顺的带领下到太原纺织厂，支持太纺红卫兵向厂党委夺权。太纺红卫队出面阻拦，并扬言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支持他们。山大8·8的学生们当即刷出了炮轰关锋的大标语。张日清早已得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已经表态，支持女劳模解悦领导的太纺红卫队，对那个在刘格平家里开夺权会时，出尔反尔的山西大学的造反派方培泉也不感兴趣，当即调出军区的部队，赶到太原纺织厂支持太纺红卫队。荷枪实弹的解放军赶到，当场抓捕了方培泉等一批山大8·8红旗的学生，张建国和李保顺等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几名领导人，也一并被抓。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就此散伙，山大8·8红旗也从此背上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滔天罪名。原先省城声势最大，人数最多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散伙后，下属组织各自另寻出路。一部份成立了太原市工代会筹委会，成了坚决支持太原市新政权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持红联站观点。一部份投奔了兵团，坚决支持袁振，成了刘灏的人马。杨承孝也不失时机，招集原来张建国的部队换上了决死纵队的旗号。在这次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重组中，红联站和

兵团获得了不少人马，杨承孝也一下子整编了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16 个工厂的组织，其决死纵队威名赫赫，成了日后丁磊组建起红总站后，与红总站观点相同、并肩作战的一支最强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原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有一名叫贾克明的骨干成员。贾克明在部队文工团当过文艺兵，能歌善舞，是转业到太原市塑料公司的一名职工，在这个工人群众造反组织群龙失首的情况下，他出面组建起了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新总部，积极支持刘格平，参加了杨承孝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后来丁磊组建红总站时，贾克明的这支人马，成了红总站的骨干力量。

社会上乱了，省委和省人委这两个全省最大的权力机关里，干部们也乱了。当时在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开始后发起成立群众组织七一公社，并担任负责人的李辅先生，在其七十岁出版的《所思所忆七十年》(2012 年溪流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对此有过回忆，摘引几段如下：

当时，省委机关十分混乱。造反组织在机关安营扎寨的不少，有些是几个混混结合在一起，把王谦、史纪言的家属都赶走了，有的人甚至随便拿人家的东西。还有原来省委派到大学、大工厂的工作组，得罪了群众，如今就到机关揪工作组的领导人，有的省委部长就被揪走。

长期在晋祠疗养的省委书记郑林、朱卫华，也跑回机关找到我，提出要参加七一公社，我也让其写大字报表态，保护了他们。机关普遍认为这二位老书记一个是晋绥派，一个是晋察冀派，长期受卫、王、王排挤，小病大养，没什么工作，当然也没什么问题，就表示支持他们站出来闹革命。

大批判、大揭发、大造反，一下子成了全社会自上而下的主流。在北京，连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生女儿刘涛，也起来批判、揭发、向亲老子造反了。刘涛的造反长文《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登在 1966 年 12 月 31 号的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纸上，太原造反组织据此翻印的传单，也贴进了省委、省人委大院。这两个大院的干部们，要紧跟伟大领袖，与山西原省委划清界限的心态，与刘涛很有相近之处。有些干部开始揭批原省委，特别是有省委第一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贴出大字报，揭露卫、王、王有一个特务系统，农工部部长阴发祥就是特务头子。这也为刘格平组织造反派夺了省委的大权后，整肃所谓的“党氏兄弟”特务系统，提供了证据。

太原纺织厂的事并没有完。1 月 26 日，在张日清派出部队的支持下，这个厂的红卫兵组织垮了，红卫队开始在厂里大夺权。当天下午 4 时，解放军部队包围了厂区和宿舍区，红卫队一派在解放军战士们的配合下，占领了党委和厂部办公室、广播站、开始对领导干部和红卫兵组织的领袖和骨干抓捕和抄家。厂党委书记杨丕夫、厂长梁俊华、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贾玉琦等 102 人被抓，全押到了一处地下室里。第二天，由红卫队的领导们和解放军部队的领导们一道，从 102 名被抓者中，挑选出 33 人用大卡车送到了省军区的军事法厅收押。经过对这些人的审讯后，又将他们送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看守所。张日清派出军队干政、抓人、关押和审讯这些无辜者，在全国也是一种首创。

1·12 刘格平夺权成功后，兵团也有动作。一是决定开除梁振华。梁振华在社会上往往打着兵团的旗号活动，你不过是十二中红旗请去做指导员的，十二中红旗的小将们叫崔吉娃司令，叫你政委，也可以，但你怎么能代表兵团呢？更让刘灏下决心开除梁振华的原因，是他带着十二中红旗的一群中学生，抄了卫恒的家。刘灏认为，批斗卫

恒可以,占了卫恒的办公室也可以,那是和走资派作斗争,符合党中央十六条制定的大方向。可抄家这种事,他不赞成。五中的那些红卫兵抄老师们的家,他就看不惯。他不想让兵团也和决死纵队一样,背上抄家的恶名。刘灏和他的副司令宋捷、高参汤建中一商量,开除梁振华这事就定了。让崔吉娃去执行,这位十二中红旗的小司令没有二话,就当着自家的队伍,宣布把梁振华开除出兵团。从这件事,也可看出当时造反的学生们,其人性中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

第二个动作呢,是刘灏决定来一次反夺权。兵团是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成员,毛主席号召夺权了,“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可是毛主席的指示啊!刘灏觉得自己的思想认识有些赶不上形势了,那个晚上要是自个到会,你杨承孝能做了这场夺权大革命的总指挥?兵团小将们的不服气,“汤高参”也给刘司令打气,认为杨承孝趁虚而入太不仗义。他们加速了刘司令必须当机决策的步伐。市委大礼堂能把天翻了,五一广场能把天翻了,就不信眼下翻不了你杨承孝这个天!元月24日,刘灏决定奇兵突袭。他带着五中井冈山的小将们(这可是刘司令革命造反杀上社会时最初的骨干部队!)直奔省委,计划也是想定了的,逼迫刘格平表态,罢免杨承孝的总指挥职务。至于谁当总指挥?自然非刘灏莫属。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要以兵团小将为核心,这样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大联合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这事儿不能靠袁振,袁振仅仅是山西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而刘格平是组长。当初为袁振翻案,刘灏是先找卫恒,卫恒不答应,就叫你卫恒完蛋。现在要收拾杨承孝,就得找你刘格平,刘格平你敢不答应吗?自有卫恒的下场让你瞧。这可真是一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出击。刘灏和他的小将们绝然没有想到,他们刚刚来到省委门口,即将喊着口号要发起向省委的冲锋时,架在省委大门口的那个大喇叭里,突然传出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播音员那高亢而嘹亮的声音。内容不是别的，恰恰是在播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那份《第一号通告》。这不是党中央的声音吗？豪迈的井冈山战士们再不豪迈了。刘灏倒吸了一口凉气，头上也沁出了一滴滴冷汗。啊呀妈呀，中央这是肯定山西的夺权了，也就是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正式肯定了杨承孝这个总指挥。还敢折腾什么？快快撤吧！

反对刘格平和杨承孝夺权的红联站，一边在省城到处张贴和散发他们的“三评”和“两告”，一边派人去北京打探情况。1月16日，在《红旗》杂志编辑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和王力两位首长接见了红联站派去的代表。1月17日，这两位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又在中南海小礼堂内，接见了包括红联站代表在内的太原其他造反组织赴京打探情况的代表们，两位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再次表态，支持山西的1·12夺权。消息传回，红联站勤务组的一群学生领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了。等到元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那份《第一号通告》后，红联站作出了新的表态，形式倒也独特，是派人到原省委大院，给杨承孝担任总指挥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送去一张大喜报，全文如下：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在上海革命造反派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在向山西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夺权的决战中首先敲响（孙涛注：原文即敲响）了第一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你们的第一号通告，这是一件大喜事，是全省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对于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于你们在夺权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绩，我们表示热烈祝贺！

同志们，战友们，在向山西省委一小撮混蛋夺权的斗争中，你们为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你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是你们敢于斗争的结果，我们向你们表示衷心地祝贺！

同志们，战友们，夺权斗争刚刚开始，阶级敌人是不甘心灭亡的，他们必然还要作垂死的挣扎。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号召下团结起来，组成一支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彻底摧垮山西省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最后让我们高呼：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山西省委一小撮混蛋夺权！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打倒经济主义！

打倒山西省委一小撮混蛋们！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

1967年1月24日

这是红联站勤务组的领导们，听取了广播后当夜写就，当夜送去表态的文字，可谓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转弯子、表达态度不过夜。这份表态的“喜报”，在1967年1月26日的第二号《红色造反报》上全文刊出。这份报纸，是由红联站和中共太原市委机关红旗战斗队合办的。

元月 25 日,《人民日报》也全文转发了刘格平和杨承孝们搞出来的那个《第一号通告》,还同时发表了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就在这一天,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誓师大会,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坐镇大会,杨承孝主持大会。刘格平在讲话中表示:“坚决和造反派奋斗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张日清则代表驻山西的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宣布:“坚决支持革命群众、革命造反派。如果你们需要部队支持,我们立即派出部队支持你们、援助你们。”并高呼:“我们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我们坚决进行还击!”

元月 26 日,山西省军区、驻晋部队 21 军,还有空字 025、027 两支空军部队(这也是空军驻山西的两个航校),在五一广场武装集会,支持刘格平、杨承孝们的 1·12 夺权。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到会讲话。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12】《人民日报》当时的导向

为了让今天的读者重温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的态度,重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导向,现将元月 25 日的社论全文照录: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平地又是一声春雷,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山西省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和代表们,联合起来,把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窃取的种种大权夺回来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山西省重新掌了大印,当家作主了!

这是继上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胜利以后,在一个省

的范围内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就反抗最烈。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长期以来，上下勾结，结党营私，企图把山西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独立王国。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变本加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阴一面，阳一面，表面上高唱“检讨检讨”、“认罪认罪”，暗地里却刮阴风，放暗箭，处心积虑围剿革命派。最近，当他们陷入广大革命群众的层层包围之中，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就狗急跳墙，使出了更加阴险狡猾的手

段——反革命经济主义，企图以此挽救他们彻底灭亡的命运。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这样一些蠢人，他们对革命派的疯狂围攻和反扑，正是掘下了埋葬自己的坟墓。

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造他们的反了，罢了他们的



《人民日报》社论支持山西1·12夺权并刊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

官，夺了他们的权，这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中，善于作阶级分析，善于掌握毛主席的策略思想，不断发现和壮大左派队伍。他们不但把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军人、革命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而且把领导机关中那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领导干部也联合起来，组成了更加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山西省内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死决斗的紧要关头，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同革命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学生团结一致，上下结合、内外夹攻，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总攻击。

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

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应该热情支持他们的夺权斗争，大力宣传他们的夺权斗争，积极参加他们的夺权斗争，认真学习他们的夺权斗争经验。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在后面指手划脚是错误的，站在旁边冷眼观望也是错误的。

革命的造反者们，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干部们，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联合起来！

学习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革命造反精神，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

可以想象，当时山西各界人士学习《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时的不同心情。对照形势，对照自己，不同的人都在转弯子，自觉地，努力地要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紧跟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从领导到小卒，捧着这篇社论热泪盈眶；反对刘格平夺权的组织，也开始一边高喊支持刘格平和杨承孝的总指挥部，一边朝着各种目标去夺权了。

晚上听了广播，白天又看到了报纸，而且是看了好几遍，原本还想要去反夺权的兵团司令刘灏的脑袋瓜子疼了，也怕了。当时有一首年轻学生们人人会唱的歌，主词就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是那个年代年轻人们深入骨髓的一种信念。此时再不听毛主席的话，再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再不跟上党中央的步伐走，岂不是要犯大错误了？刘灏以最快的速度，与“汤高参”一道，做出了转弯子的表态，兵团的大标语不到一天就刷满了省城的大街小巷：坚决支持 1·12 夺权！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坚决支持工人阶级杨承孝！誓与决死纵队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刘灏暗自庆幸天不灭曹，却又由不得暗暗感叹：政治斗争真他妈的凶险！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到，“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的所谓观点，不过是一种对更高权力的盲从和奴从，转弯子是“文革”中各派的拿手好

戏，甭说群众组织的大小领导了，那些站出来革命造反的领导干部们，不也常常以能主动转弯子为自豪吗？在山西这场夺权与反夺权的争斗中，刘灏虽说不是战功卓著，却也没有翻了船，落了水。以刘格平为核心的山西新政权，成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杨承孝的大名威震全国和三晋大地，山西所有的群众组织，不得不一致接受党中央这最后的圣裁。刘格平的那个党的核心小组，和杨承孝的那个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虽然接到了红联站送来表态的“喜报”，却绝没有把这个组织当作盟友，再次对红联站的那些夺权行为，进行了反夺权。他们派出大批人马，组成造反夺权工作队，对被红联站夺了权的省直部门和各个地市，进行了“再次夺权”。如山西日报社，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这些要害部门的党、政、财、文大权，又被刘格平和杨承孝从红联站的手里夺了回来。当时的山西全省，怎一个乱字了得！

1967年1月25日下午，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事前，刘格平审定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全文如下，从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造反派们那种虔诚和疯狂。

最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们是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全体革命造反派，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致以最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当我们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我们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和看到人民日报社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万分激动，这是您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最大的鞭策。是在您老人家的伟大思想指引下，我们山西

革命造反派，从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中把大权夺过来了！我们纵情高呼一千遍一万遍毛主席万岁，也呼不尽我们对您无限热爱的心情；我们纵然高唱一千遍一万遍《东方红》，也唱不完我们永远跟着您闹革命的决心。

山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秉承他们黑司令的旨意，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长期以来，把山西搞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们打击、迫害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残酷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紧跟他们的黑司令，更加变本加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造反派。最近，又抛出经济主义这个破烂武器，对抗您老人家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企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在您老人家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实行了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给他们迎头痛击，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围剿，击败了他们经济主义的腐蚀，坚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您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英明指示，打退了他们的反扑，出现了新的革命大好形势。我们工人、农民、学生、干部的革命造反派高举您的旗帜，和领导干部中的革命造反派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军区的全力支持下，夺了他们的权，专了他们的政，成立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回忆这个幼苗刚出土时，阴风恶雨阵阵袭来，阶级敌人的黑手伸向了这株初萌的幼苗。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领导干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极力混淆领导干部中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攻击我们是被机会主义控制的“黑组织”。阶级敌人极端害怕我们革命造反派和人民解放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拿出什么“不介

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法宝，攻击我们成了“宗派主义”斗争和“反革命复辟”的工具。但是我们坚信，革命的领导干部和我们共同战斗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我们坚信，人民解放军站在我们革命造反派一边也完全符合您对他们的教导：“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唯一的宗旨。”当我们学习了您的指示以后，心更红了，眼更亮了，我们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您的思想的，我们一定高举起联合的大旗，高举起夺权的大旗，勇敢地迎接斗争的暴风雨，您那金光闪闪的宝书告诉我们：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老人家指引我们拨开了迷雾，看准了方向，站稳了脚跟。每当想起这一切，叫我们怎能不一次再一次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怎能不一遍又一遍地高唱《东方红》！我们深深地懂得，您老人家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我们正做着前人未做过的事业，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有您老人家在前面引路，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扫尽一切害人虫！用我们的铁拳，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的新山西！新中国！新世界！

最后，我们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全体革命造反派最最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面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刘格平和杨承孝，刘灏再不敢想向刘格平和杨承孝们反夺权的事了。此刻，他不能不和他们一样具体来表示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番忠心。在北京赴晋造反大队的大学生们为刘格平和杨承孝炮制的这份致敬电文稿上，刘灏也工工

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2月1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了《第二号通告》,此通告堂而皇之地刊发于1967年2月3日的《山西日报》上,号召全省人民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夺权斗争。2月7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了《第三号通告》,此通告也堂而皇之地刊发于1967年2月8日的《山西日报》上,号召全省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行动起来,展开大联合,大造反,大夺权斗争。

在《山西日报》上如此通告全省,在民众心里,那可全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呀!各级党组织岂能不听?全省各条战线岂能不乱?

【13】山西各地市夺权概述

上世纪60年代山西的行政建制为五专四市,即晋中、雁北、忻县、晋东南、晋南五个专区,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四个省辖市。现在,且按下省城太原的“文革”故事,综述一下五专三市的夺权过程。

晋中地区。1月18日晚,由数家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的晋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站,发表“接管通告”,接管了晋中地委和专署大权,对具体领导人“夺权不夺职”,要求原省委常委、地委书记王绣锦等领导在联合总站“监督下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夺权,当即被首都赴晋造反大队晋中支队等群众组织指责为假夺权。1月30日晚上,这些组织在晋中专署四楼会议室开会,成立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推举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晋中军团负责人李祥林总负责,于1月31日凌晨,向晋中地委、专署夺权。张日清指示晋中军分区支持这次夺权。军分区和驻军认为李祥林不是根红苗壮之人,建议总司更换领导人,总司遂开会,重新推举李兆田为司令。李兆田1965

年由山西农学院水利系毕业，分配在晋中水利局。他当即派人到大寨，请陈永贵出任总司常委，陈永贵欣然接受。

2月11日，省党的核心小组派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三名“受黑省委迫害的革命领导干部”回到晋中，与军分区和驻军首长组成晋中党的核心小组，主持夺权后的工作。不久，任、王、张三人认为，总司是受原地委书记王绣锦和他的二三线人物操纵的，而军分区和驻军首长，则认为总司是革命的左派组织。于是在任、王、张支持下，总司的一些下属组织，联合社会上一些反对1·31夺权的造反组织，新成立了批判刘邓红色联络总站(简称总站)，同总司相抗衡。晋中开始形成两派，一派为拥军派总司，另一派为支持任、王、张，反对驻军和人武部的总站。

雁北地区。1月20日，雁北艺校、雁北医专的学生造反组织，联合雁北地委机关的六家群众造反组织，成立了雁北革命造反兵团，夺了雁北地委和专署的大权。同日，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同军团，也来夺权。两家共同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总指挥部。但这次夺权的，全是红联站的人马，被刘格平和杨承孝定为“假夺权”。刘格平派袁振带人到雁北、大同，组织了重新夺权。一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协助群众组织于3月16日重新夺权成功。原地委领导中，被拘留31人，被军管4人，交群众监督47人。

大同市。1月12日，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大同军团、大同红军总部和大同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一道夺了大同市报社和广播站的权。18日，又挟持了市委领导人，直到24日才予以释放。20日，这几家群众造反组织对市委和市人委夺权成功。刘格平、杨承孝认为，大同的这次夺权，是受红联站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张建国、李保顺操纵的。袁振被刘格平派到大同后，支持随行的原省体委副主任王金贵，在3月16日组织了再次夺权。这次夺权，受到了当地驻军的支

持。夺权成功后,逮捕了原大同市委和市人委的 11 名领导干部,并宣布参与 1·20 夺权的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逮捕这些组织的 28 名负责人。再往后,支持 3·16 夺权的,称为好派,反对 3·16 夺权的,称为糟派。

阳泉市。1月 20 日,阳泉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夺了市委、市人委大权,此行动没有得到军队支持。其时,阳泉市化工公司党委副书记安克组建了阳泉市革命造反总指挥部。3月 12 日,刘格平指出,“以郭星来、王定漠、刘敏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已完全孤立,以孟启明(原阳泉市市长)刘尚文、张德本、安克为首的革命干部已站出来。”在省党的核心小组支持下,3月 16 日,以安克为首的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市人武部和驻军支持下,在阳泉市重新夺权成功。

忻县地区。1月 20 日,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忻县军团联合忻县专区 5 家造反组织,成立忻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夺了忻县地委和专署的大权,并宣布由被夺权的书记和专员,继续领导当地的抓革命、促生产。原忻县地委书记、曾被原山西省委罢了官的徐志远,此时已成为刘格平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党的核心小组派他于 2 月 3 日回到专区,重新组织了 26 家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了忻县专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 2 月 4 日重新组织了夺权。

晋东南地区。原地委书记王尚志已于 1966 年 12 月被迫害致死,原地区副专员程守创,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1月 25 日,晋东南地区 31 家革命造反组织,成立了晋东南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了地委和专署的大权。26 日,晋东南军分区和长治驻军发表声明,支持这次夺权行动。3月 22 日,经省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晋东南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程守创任组长。

长治市。长治市的夺权与地区同步。3月 29 日,省党的核心小组批准,由原中共长治市委常委赵连胜出任组长。

之后，晋东南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内，程守创和军分区司令武天明观点分裂，晋东南地区群众组织也分为红字号和联字号，成为全省武斗最惨烈之地。红字号支持程守创，联字号支持武天明。

晋南地区。1月26日，晋南革命职工造反兵团、山西师院革命造反大队、红教工等群众造反组织，组成晋南革命造反总部，夺了晋南地委和专署的大权。省城红联站和兵团参与了这次夺权。张日清首先表态支持。随后，刘格平却宣布这次夺权是“真保皇，假夺权”，并于2月20日，派出原省委农村政治部副主任许荒田等人，赴晋南重新夺权。3月18日，晋南15家群众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指挥部，有部分原地委、专署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参与，在驻军支持下，于临汾体育场集会，宣布1·26夺权是假夺权，重新夺了地委和专署的大权。地区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是石珉。当天，省党的核心小组发去贺电，称晋南3·18夺权，是“攻下我省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多年的最后一个极反动堡垒。”晋南地区由此形成了支持1·26夺权和支持3·18夺权的两派，尖锐对立。

（此节内容根据余汝信、曾鸣合著《文革中山西的专区、省辖市夺权》一文缩编。此文刊于2013年5月31日第7期、总第98期电子刊物《记忆》。特此说明。）

【14】山西1·12夺权何以能成功

山西的这场夺权，当时被党中央媒体赞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全国的榜样和旗帜。随着“文革”的结束，在一些官史中，又将1·12夺权表述为“非法”的篡党夺权行为。由李立功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山西》是一部官史，就将1·12夺权称为“阴谋篡党夺权事件”。有些个人的回忆文章，

还称其为反革命夺权。这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反差极大的评判，在当代中国的官方宣传文本和一些个人回忆文章中，并非孤例，实在不足为奇。但我们在面对历史，研究历史时，却应该抓住历史真实的过程和关键，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等几名领导干部的批判、谴责，甚至将他们称为野心家，将他们组织夺权的思想基础说成是别有用心，行为说成是篡党的反革命性质，不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放在当时的客观政治环境中分析和看待，那只能是唯心主义的推测。因为，宪法和党章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早已成一纸空文而名存实亡，所谓“最高指示”，如封建帝王的圣旨，必须执行。卫恒、王谦、王大任们，与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批斗卫、王、王的海报

守中们，都不是青面獠牙，他们都是党内有资历的领导干部。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们和造反组织当初妖魔化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将其定为“黑帮”，将省委说成是“黑省委”，是错误的。“文革”结束后，如果反过来对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们做妖魔化描写，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毛泽东逝世后，新的党中央并没有因刘格平们当年的夺权，而将他们定为敌人。在本书第十一章《罪与罚的

话题》一节中,将写到他们的结局。他们在“文革”之后,依旧是党的好干部,并未受到党纪和法律的惩处,受到惩处的,是他们支持过、甚至是直接操纵过的群众组织的那些领导们。这是历史,即便充满不公正,却也是历史。另外,刘格平等山西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们,领导了山西的夺权后,在3月18日组建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是受到当时的党中央支持的革命行为,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委员会这个新政权,一直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后来党中央委任谢振华取代刘格平,出任了山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在谢振华领导下,山西省又在1971年4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从而结束了使命,退出了山西的历史舞台。新省委和山西革命委员会成为山西党政两个班子,继续领导山西全省的各项工作。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如果将1·12夺权称为“阴谋篡党夺权事件”,其之前成立的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和其后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就应该是取缔的非法党组织和非法的政权,而不是延续的问题了。事实是党中央从来也没有对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有过这种说法。

从总体上看,山西省的1·12夺权,发轫于1966年5月16日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发端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行为也符合中央当时制定的《十六条》。刘格平、张日清和袁振、刘贯一、陈守中等几名省级领导干部组织夺权,是在当时毛泽东文革理论指导下的行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的人治早取代了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政策。以卫恒为首的中共山西省委要紧跟最高领袖,以刘格平为首的那些领导干部也要紧跟伟大领袖,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革命对象和打倒对象不同而已。

在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

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根据这个精神，山西省委将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和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定成了打击对象；也是根据这个精神，刘格平、张日清和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们，则将卫恒、王谦、王大任等省委领导和他们的下属人马定成了打击对象。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和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当时的山西问题上，支持的恰恰是刘格平们。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抗战时期，中共建立了晋察冀边区（辖北岳、冀中、冀东、冀热察等区），面积涉及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晋绥边区（辖晋西北、雁门、大青山等地区，一度时间内包括晋西南），面积涉及山西和绥远省交界地区；还建立了晋冀鲁豫边



刘格平(二排右八)领导 1·12 夺权后接见参与夺权的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骨干

区(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等区),面积涉及山西、河北、河南及山东交界地区。“文革”前,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卫恒,长期在太岳区工作。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谦,长期在太行区工作,两人都是出生于山西,又长期在山西工作的老干部。山西省级和地市两级领导骨干中,绝大多数人都具有在上述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履历,是土生土长的山西干部。正因为山西省委的多数领导人有这种革命履历,所以他们和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等长期在山西工作过的党中央领导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工作联系。在安子文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卫恒又是他一手培养的年轻的省委书记。当这些中央领导人被毛泽东视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并将刘少奇定为这个“黑司令部”的“黑司令”,必欲将“黑司令”的队伍击垮打倒之后,毛泽东对他们在山西的势力,自然也就要除之而后快了。而用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这些外来干部,取代原山西省委的卫恒、王谦、王大任和他们属下那些土生土长的山西本土干部,对毛泽东而言,分明是一种便捷和有效的手段。毛泽东要用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干予山西的“文革”运动,刘格平既和康生有过在一起工作的经历,人头熟,又提供了刘少奇的所谓 61 人叛徒集团的“罪行”,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必然要支持刘格平、张日清、袁振、刘贯一、陈守中这些山西党内的外来干部势力,取代原山西省委的卫、王、王们了。

举两个历史的小细节,让我们对当时卫恒们和刘格平们这两个势同水火的政治派别中,既相同又不同的心态,做一些解读。

在刘格平们组织的 1·12 夺权成功后,13 日晚上,卫恒、王谦、王大任和贾俊、史纪言等省委主要领导人,正在位于市郊北营的一个仓库开会。会议内容主要是修改省委领导“文革”运动不力,执行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稿。当他们获知刘格平等已经在省委夺权的消息,并得知有造反组织发出海报,勒令卫恒、王谦、王大任、

贾俊等领导 15 日必须到五一广场接受批斗时,他们先是一致表示了反对。但最后见到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弄来的海报后,他们又几经讨论一致决定:15 日准时到五一广场挨斗。这是一种微妙的心态变化。他们不承认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或者说,要极力摆脱与刘、邓的关系,所以他们反对刘格平们夺权。他们又认为要批斗他们的群众造反组织,是执行伟大领袖的所谓战略意图,做为省委领导,不能与群众对立,不能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他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去接受挨斗,希望取得群众谅解,从而再与群众一道,去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心要紧跟伟大领袖,一心想取得造反群众组织的谅解,从而与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将这些群众组织纳入他们的领导,这真是一种虔诚的、无奈的选择。然而,他们面对的洪流,其推手不仅仅是杨承孝们和刘格平们,而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他的“文革”助手康生和江青这些人。无论他们如何虔诚地要去紧跟,这些人将他们逼上死路的既定计划是不会改变的。

15 日晚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市迎新街的一个学校里,召开了各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刘格平、刘贯一、袁振、陈守中等人,先后在会上介绍各自的个人简要历史情况,以及“受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迫害的情况,明确地表示他们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按当时的说法,这叫做“领导干部在革命群众中亮相”。刘格平们,无疑成了紧跟伟大领袖,向刘、邓“黑司令部”和他们在山西的所谓“黑线”冲杀的斗士。虽说疯狂,却也是一种要紧跟伟大领袖,率领革命群众,搞好“文革”的虔诚举动。

还有张日清这位手握省军区大权的少将呢。仿效林彪用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保驾,张日清用军队支持了刘格平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军队的支持,为刘格平的夺权成功上了保险。

长期以来,党内党外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一种个人

迷信。“文革”开始后，林彪更是推波助澜者。当这种个人迷信浸入全党后，大家都认为毛泽东一贯正确，没有错误也不会发生错误，一切以毛泽东定的是非标准，作为划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说对，就对；说错，就错；即使自己的看法和毛泽东相左，也只会从自己方面检查，继而大步紧跟，纵然违心，也在紧跟中，一步不敢落下。被夺权的卫恒、王谦、王大任、贾俊们如此，夺权的刘格平、袁振、刘贯一、陈守中们也是如此。他们共同演绎着党内的悲剧，同时也展示着自个人性的美丑。只是，当高居神坛上的领袖对他们有了好恶并做出取舍时，得胜的一方，也就必然是毛泽东支持的一方了。这恐怕正是山西1·12夺权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再推而论之，放眼全国，当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斗，进一步形成武斗时，两派群众都是高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都是满怀着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视对方为阶级敌人，于是，全国难以计数的流血和死亡，也就由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悲剧，演绎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悲剧了。

【15】群众组织的不同命运

原中国共产党的山西省委，就这样被省委、省政府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省军区支左的解放军部队，加上革命的造反派一道被打垮、被夺权了。在没有法制的社会中，在被神化了的领袖造成的大民主混乱中，主宰一切的权力更迭后，监狱也就只能为权力而不是为法律服务了。被刘格平和杨承孝把持的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夺权后，首先将各级走资派们陆续投入了监狱。紧接着，对一些群众组织也开始了整肃。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这回彻底栽了。刘格平的表态，变成掌了大权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决定，宣布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为反

革命保皇组织，立即予以解散，总指挥张志安也被抓进了监狱。这位青年工人诗人，此时只好在监狱里望着铁窗浩叹。

被山西的新政权宣布为反革命保皇组织的，还有太原红卫兵纠察队和山西红卫兵团。它们的领导们，和刘普德的脑子一样转不过弯子，没有赶紧表态支持刘格平和杨承孝的新政权。刘普德以回家过年为理由，悄然离开了太原。群龙无首，这两个也曾风云一时的群众组织，就如鸟兽散了。然而，刘普德回到代县老家阳明堡，那个年不但没有过成，反而成了他的“灾年”。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派出几位解放军官兵，赶到阳明堡，把刘普德抓捕回太原，投进了监狱。

原先炮轰山西省委最早也最坚决的红联站，在省委倒台后，自个也成了犯错误的组织。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肯定了山西的1·12夺权，可红联站天天喊反夺权，还成立了反夺权总指挥部，在新政权看来，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在炮轰“黑省委”的革命造反中，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红联站全体将士，不得不服输了，不得不认罪了。这可是一种心甘情愿的服输，更是一种充满忏悔的认罪啊。

也就是在这种充满忏悔的认罪中，红联站内部开始了被他们称之为“整风”的领导班子调整。红联站的领导班子名为红联站勤务组，勤务组作出决定：由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的领袖之一段立生，取代太原工学院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的杨保明，出任红联站勤务组的负责人，杨保明降为勤务组一般成员。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还有一位领导赵凤田，既是红联站的发起人，也是红联站勤务组的领导成员。同是一个学校，同是一个组织，赵凤田当时力挺在学校的组织中排名在他后面的段立生出山，有人说他是举贤让贤，有人说他家庭成份不是挑不出瑕疵的红五类，怕再给红联站带来什么麻烦。弄清这些已无意义，从事后红联站的发展看，我们可以看出，那次“整风”将段立生推上了红联站的掌舵者，确实使这个群众造反组织避免了一次政治危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师生步行去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

机。也正是在段立生的领导下,红联站始终没有被刘格平收入其政治窠臼,成了一支在山西1·12夺权后与刘格平争斗的主力。

刘格平夺权成功并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后,段立生也要听毛主席的话,想带领红联站参加刘格平组建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他找到刘格平,提出了红联站也愿意加入山西1·12夺权的那个总指挥部。没料到三级高干刘格平摇摇头,又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红联站必须开除太工红旗。红联站勤务组在段立生领导下,只好先以割肉饲虎之举,作出决定,将杨保明与李青山一道创建的太工红旗开除出红联站。此举总算让刘格平满意了,在筹备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时,刘格平给了红联站一个常委名额,一个委员名额。那个常委名额自然是段立生占了。委员名额,则给了红联站里太原冶金学校的一名学生领导。在刘格平的那个新生红色政权中,红联站是少数派。

杨保明被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联站开除了,他的队伍太工红旗

也被红联站开除了。红联站的大学生们，有的去投奔兵团要改换门庭，有的去五一广场向毛主席请罪，请毛主席原谅他们犯了错误。何谓向毛主席请罪？发明权属于上海一月革命中反对过张春桥和王洪文向上海市委夺权的群众组织。他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态支持上海一月革命后，列队在上海人民广场上，向着主席台上的毛主席画像，表示迷途知返、痛改前非，以眼泪向领袖忏悔。在太原，当时有两支大学生造反组织，在五一广场冒着大雪，向毛主席请罪，他们就是太原工学院太工红旗的那些大学生，和山西大学的8·8红旗战斗队的那些大学生。

省城太原，大雪飞扬，五一广场，银装素裹。

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的大学生们，扛着他们的派旗来了。领队的不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李青山，也不是杨保明。李青山和杨保明，都是1961年考入太原工学院电机系的大五学生。他们想不通不支持刘格平和袁振这些走资派向卫、王、王那些走资派夺权，何错之有？何罪之有？队长和副队长不出面，队委会无奈何，为了保住太工红旗，队委会其他领导决定，由队委王步祥带着队员们，来到五一广场，列队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向毛主席请罪。大学生们真诚的请罪认错之心，让他们一个个哭泣不止。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大学生们，也扛着他们的派旗来了，全没有了当初气吞山河的那种革命造反架势。面对主席台上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在8·8红旗战斗队的队长李大纲、副队长侯光天和作战部长王守仁的带领下，队员们一遍遍地向老人家请罪，请求老人家饶恕他们退出1·12夺权和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侯光天哽咽着，宣读了8·8红旗战斗队向毛主席的请罪书，山西大学的8·8红旗小将们，那一大批听毛主席的话奋起造反的大学生们，也跟随着他们的大队长、副队长和作战部长，齐刷刷地跪在雪地上，面对主席台上的

领袖画像，失声痛哭，一掬掬热泪，融进了白雪未消的广场地面。

可以想到，这些即将步入知识分子行列的大学生们，心底那种真诚的痛苦和真诚的请罪。他们在用自己这种赤烈和真诚的情感，拷打自己原本并无反骨的灵魂。他们曾在这里逼着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低头请罪，而今天，当卫恒和他领导的山西省委彻底垮台之后，他们也在这里低下了向毛主席请罪的头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请罪，当他们认定自己负罪之时，对立面也认定了他们是罪人，必欲灭之而后快。太工红旗因为请罪时李青山和杨保明缺席，被杨承孝那个夺权总指挥部刷出大标语，说他们是假请罪，真顽抗。山大8·8红旗的领导们倒是全参加请罪了，杨承孝那个夺权总指挥部也刷出大标语，同样将山大8·8红旗批为假请罪，真顽抗。更严重的，有一位8·8红旗战斗队的“炮手”，因此而蒙难。此人是山西大学中文系一位名叫杨韶华的青年教师，既是8·8红旗战斗队领导层的成员，也是当时“炮打关锋”的参与者。在“炮打关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毛主席”的政治推理论和由此而形成的政治压力下，此人突然失踪。许多天后，在学校大门外的一口水井中，发现了他被铁链捆绑住手脚的尸体。

在山西大学，与8·8红旗战斗队对立的一派组织，是8·14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8·8的来由和8·14的来由，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做过介绍，仅从这个组织的名称来由上看，前者是要向山西省委造反的造反派组织，后者分明是紧跟山西省委，保卫山西省委的保皇派组织了。当然，刘格平们要向中共山西省委夺权，自然也不会去联系8·14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队长、山西大学中文系的二年级学生朱永成。等到刘格平们夺权成功了，中共中央表态支持刘格平们的夺权了，朱永成急忙统一领导层的思想，立场立刻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朱永成下令表态支持刘格平，同时派人进城刷出大标语，由

过去的“坚决支持和保卫山西省委”，变成了“坚决打倒山西黑省委、坚决揪出卫、王、王、将他们批倒批臭！”同时，在山西大学一举夺权，校党委的一干领导全成了他们批斗的对象。当看到了对立面 8·8 红旗战斗队到五一广场请罪后，朱永成又组织人马，在校园内和市区给对立面刷出了一批大标语：“山大 8·8 炮打关锋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保皇派山大 8·8 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等等。这种转变，一下子使山西大学 8·14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在社会上树起了比对立面 8·8 红旗战斗队还要革命，更敢造反的形象。再往后，山西大学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就与社会上兵团、红联站、红总站的争斗，紧密相连纠扯到了一起。8·8 红旗战斗队时而是兵团观点，时而又和红联站在好多观点上形成统一战线，而 8·14 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则成了红总站一派中坚定不移的主力。

“文革”中就是这样，各派的战斗口号常变常新，任何一派，都可以将任何大帽子扣到对立面的那一派头上。

我们再来解析一下山西的另一所高校太原工学院的情况。在本书第二章第 2 节中说过，太原工学院的两大派组织，一个是以革命圣地瑞金冠名的瑞金革命造反战斗队，另一个是以红旗冠名的红旗革命造反战斗队，前者的领导人宋捷和后者的领导人李青山、杨保明，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在学校的观点不尽相同，杀向社会后观点也不一样。都是炮轰黑省委，但宋捷和刘灏是亲密战友，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发起人之一，是坚定不移保袁振，要为袁振翻案。李青山和杨保明都是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发起人，他俩和省委党校的段立生等红联站的其他领导们，是既不保袁振，也不替袁振翻案，而是要“澄清袁振”。更重要的，是刘格平等五名起来造反的省级领导干部贴出大字报，在社会上亮相要向中共山西省委造反后，太工红旗不但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反而持怀疑态度，认定他们是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在

刘格平眼中,太工红旗这支队伍,自然和山大8·8一样,成了不可信任的死敌。

我们前面说过,在太原工学院,还有一个造反组织,叫太工永红战斗队,领导也是在校大学生,名叫高翔。太工永红战斗队这个造反组织,一开始并没有太工瑞金和太工红旗叫得响。高翔带着他的永红战斗队杀向社会后,起先也加入了红联站。与李青山和杨保明不同的是,在刘格平起来造反时,高翔一头扎进刘格平家,成了刘格平和其夫人丁磊的座上客。在刘格平召集造反组织向省委夺权的那个会议上,即1967年1月12日的晚上,在到会的26家造反组织中,高翔领导的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太工永红战斗队,竟名列榜上。虽说在这个会上签名时,在“太工永红战斗队”前,还冠以“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可一俟刘格平和杨承孝等夺权成功后,高翔便成了刘格平的嫡系。他带着太工永红这支队伍,立刻脱离了红联站。待丁磊组建起红总站以后,高翔和他带领的太工永红,也就成了红总站的下属组织。于是,在太原工学院,便出现了与山西大学略有不同的派斗格局,即兵团的“太工瑞金”,红联站的“太工红旗”,加上红总站的“太工永红”,三足鼎立,各不相让。

山西大学和太原工学院这两所大学的情况,也是山西其他大中专院校当时派斗的缩影。

许多年许多年之后,当年那些在五一广场上,虔诚地痛哭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山西大学8·8的大学生们,当年由保省委变成打省委的山西大学8·14的大学生们,一个个全进入了两鬓花白的人生。在山西大学老校长刘梅的一次寿宴上,两大派的一些骨干成员们又见面了。当他们一道回忆起当年的那个场景时,对那种极端个人迷信下不幸年代的反思和批判,对自己当时那种虔诚的疯狂,一个个唯有苦笑而已。

【16】袁振组建市革委

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年代。袁振在太原又掌权了,但经刘格平提名后,又经刘格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核心小组研究,中国共产党太原市的核心小组组长,却被确定由陈守中出任。为什么太原市新生的红色政权不是由袁振挑头,而是由陈守中挂帅?刘格平一定听了其他人的一些意见。李飞飞有如此回忆。

刘格平对山西的历史不甚了解,因此常把父亲叫去咨询。在如何配备太原干部时父亲提了个建议。父亲说袁振是个有野心的人,而积极参与夺权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又是袁振的队伍,放在太原有可能尾大不掉,无法领导,并建议由陈守中在太原组建班子,父亲说陈忠诚而无野心,又没有帮派队伍,这样会很好的支持你的工作。不知是否父亲的作用,最终是陈来组建了太原领导班子,当陈再来我家时好不威风,在父亲房间里谈话时大门口站着带枪的警卫,我家我都进不去了。(摘自李飞飞提供的文章《刘志兰夫妇与父亲》)

李飞飞的父亲,是李一夫。李一夫是支持刘格平向山西省委造反的一位山西老干部,刘格平组建起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后,任命李一夫担任了统战办公室主任。李一夫曾在包头钢铁公司党委担任过组织部部长,和当时包头钢铁公司的党委书记陈守中、党委宣传部长刘志兰在一起工作过。“文革”前陈守中、刘志兰夫妇调山西工作,不久李一夫也调回山西。李一夫向刘格平荐陈守中,由陈守中挂帅的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自然全是跟上袁振起来造省委的反,支持袁振翻案的原市委的一些党员干部。比如原市委工业部的普通干部王承

琚,由于在袁振倒而复起的转变中,坚决跟定袁振,一下子就成了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的成员。让原太原市委的第一把手袁振不再在太原市任职,这种安排也体现出刘格平的心计,看来他是不想让袁振在太原市一手遮天,才不让袁振在太原市党的核心小组当组长的。这个党的核心小组类似于中共太原市委,下一步,由谁来出任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呢?袁振一定也看出了刘格平的心计,他找来刘灏,征求这位革命小将的意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定下陈守中了,下一步市里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你看由谁出任最好?”

刘灏眨眨眼,他也在琢磨袁振的意图。这个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不就是和原先的太原市政府差不多吗?这个主任,不就是等同于原先太原市政府的那个市长吗?妈呀呀!闹革命闹到现在胜利了,胜利了原来就可以做官呀!想一想,连那个狐假虎威的杨承孝,自打投奔了刘格平,当上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后,连说起话来也气粗了不少,我一个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刘灏,怎么就不能做太原市这个新生红色政权里的官呢?但反过来又想,当了这个官还能再去上学吗?太原市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了,山西也胜利了,那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不就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吗?推迟的全国高考,不就会马上开始了吗?做了这个官,日后还能上大学吗?他思索着,又向袁振说明了自己的这些个想法。

那时,刘灏的思想确实是矛盾的。“文革”刚开始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在 1966 年 6 月 13 日下发过一个题为《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的文件;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 1967 年 1 月

1日开始,至1月底结束”。记得当时听到广播里播放这个文件的精神时,他与住校的那些高三同学们,一个个敲盆敲碗,又喊又跳,高兴着,说笑着,认为抓紧搞完运动,就能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开始上大学了。可现在不是早过了半年了吗?不是马上就到1月底了吗?这中央文件里说的新办法,怎么还不见影儿呢?

他得听听袁振的意见。

袁振不说上大学的事,只说眼下的情况:“我的意见嘛,咱们市革委的主任,你当最合适,可要说工作经验,还是陈守中比你强。你说是不是?”

刘灏当然得点头了。陈守中原来是省委委员,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与刘格平、袁振、刘贯一、何英才一道写出“五人大字报”向“黑省委”造反的革命领导干部。他怎么能和陈守中去争官呢!后来刘灏也渐渐明白袁振的棋盘上,陈守中的位置当然要比他刘灏重要得多的原因了。刘格平要重用陈守中,袁振自然也要依靠陈守中,他绝不想让自己的同僚被刘格平拉走。至于上学的事,袁振的意见说得更透彻。那意思明白得很,如果高等学校开始招生了,你刘灏是太原市新生红色政权的有功之臣,想去上大学,推荐和选拔还能落下你?

在袁振的一手策划下,经刘格平同意,元月28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在市委礼堂宣告成立。陈守中既是中国共产党太原市核心小组的组长,又出任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常委共有22人,刘灏和宋捷,一名太原五中高三的学生,一名太原工学院大一的学生,袁振一句话,就让他俩都当上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发起人李金渭,因为带领六中的革命小将们,与刘灏一道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为袁振翻案中功不可没,也与刘灏一样,以高三学生的身份,成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杨承孝也是

常委。其他人，除了太原纺织厂的全国劳模解悦外，则全是跟着袁振造反的市委一些领导干部。袁振的这个新政权成立得十分迅速，他以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坐镇省城，太原重新成为袁振的天下。袁振的案翻了，在华北局会议上，曾被中共山西省委打成野心家和伸手派的前中共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现在成了堂堂的革命领导干部。于是，坚决支持袁振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省城太原再次成为让人瞩目的革命造反组织。然而，刘灏和他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死保袁振的风头，还是被后起的造反派领导杨承孝压住了。袁振是党的高级干部，他深知此时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比中学生们有力得多。

在 1967 年 2 月 2 日的《山西日报》第 2 版上，整版刊出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报道。主题是“一个崭新的红色权力机构诞生了”；肩题是“彻底砸烂资产阶级专政机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新秩序”；副题是“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

在这篇长篇报道中，真实地记录并反映了当时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和总指挥杨承孝那种比天还大的权力：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孙涛注：即杨承孝）对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和坚决支持，宣布授予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处理太原市党、政、财、文等各种大权。他说，目前被推翻了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还阴魂不散，在他们的指使下，还有一小撮混蛋进行破坏和捣乱，我们委托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对这一小撮混蛋狠狠进行严厉的镇压。

就在这次大会上，袁振以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当众下了命令，曾跟着原省委批评和反对过袁振的市委常委、代理秘书长郭庆年和市委的普通机关干部阎秉贞、刘建民、张贵堂、潘

守德五人，被当场五花大绑，投入了监狱。同时会议主持人王承琚还宣布了对原市委、市政府一大批领导干部“开除党籍、监督劳动和停发工资的处理决定”。这些人全是按原省委的意图，贯彻前门饭店华北局会议精神，批评过袁振的各部门领导干部。

历史进入 21 世纪之后，阎秉贞、刘建民、张贵堂、潘守德四人曾联合写过一篇回忆录《“文革”初期太原第一大冤案》，（见刘建基编著印刷的《文革劫难记》书稿）现将有关内容分别摘要如下：

1967 年月 1 月 28 日，……早晨 8 时，阎秉贞、刘建民、潘守德和往常一样，照常按时到市委机关来上班。不同的是，一走进机关大门，很快就被分别“陪”着，而我们自己却丝毫未曾感到厄运即将临头。8 时 30 分左右，有人通知说，今天上午在新建路礼堂召开“庆祝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请“务必参加”，并给发了入场券。9 时许，当我们来到会场要坐在后排座位上时，又被“陪”着的人“热情”地拉拽到前三排。而张贵堂则是头天晚上就被“揪”去批斗，批斗结束后，“留”在办公室，第二天上午由造反派直接“护送”到会场的。

到会的人不少。大约过了半小时，会场后面忽然一阵骚动，人群中发出一派惊喧之声。我们回头望去，只见身着绿色军大衣，胳膊上佩带（孙涛注：原文将“戴”误为“带”了）“山西革命造反决死纵队”袖箍的袁振和同样装束的打砸抢分子杨承孝，在一群造反派领导以及一些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护卫下，蜂拥（孙涛注：原文将“涌”误为“勇”了）走进了会场。他们个个趾高气扬，满脸杀气，使整个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十分不解和惊讶！原来堂堂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怎么会突然披挂起臭名昭著被人们称之为“决匪”的战袍，招摇于今天这样的会上呢？为什么要在会场布置那么多武装人员警卫呢？……

台上的扩音器响了。会议由造反派领导王承琚(原市委工业部干事,造反夺权后成为市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委副主任,后因违法犯罪被判有期徒刑)宣布开会……

在杨承孝代表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言表态,支持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又有支持袁振的干部宣读了“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告”。其中一条就是对郭庆年等五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进行逮捕。

……会议主持人王承琚立即叫那些“陪”我们的人把我们五个人推拽到台上,并强行又摁又踢迫使跪在台前。这时,只见袁振现出一副标准的政治流氓相,猛拍桌子,厉声吼叫:“郭庆年!你抬头看看,还认得我袁振吗?你们还知道有今天吗?”看到这样恐怖的情景,被袁振也请到主席台上的太原市人民武装部部长刘生恺同志,立即表现了极大的愤慨,毅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直到 11 点多钟,临时紧急奉命赶来的公安干警才又把我们押回台前,并当众五花大绑起来,抓衣领、摁头颅,连拖带搡把我们押出会场。

……我们五人被押出新建路礼堂后,马上就塞进囚车,拉到了上马街 24 号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

……1979 年,中共太原市委专门为我们的问题颁发了[79]128 号文件,文件中明确写道:“撤销市革委 1967 年 1 月 28 日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郭庆年和阎秉贞、刘健民、张贵堂、潘守德的决定,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67 年元月 31 日,在太原五一广场,袁振又亲自主持了“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等滔天罪行”的大会。1967 年 2 月 1 日的

《山西日报》头版对太原市的这个大会作了重点报道。

该报道的肩题是“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光辉旗帜下联合起来彻底砸烂卫恒黑司令部”。

主题是“太原六万余人集会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俊等滔天罪行”。

副题是“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王谦、王大任等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刘灏、宋捷、李金渭这三名学生常委，也参加了这个大会，而且是站到了主席台上。这样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是由袁振主持的，刘灏、宋捷、李金渭都感受到了一种大革命中你死我活的那种兴奋和快感。袁振的冤案被翻过来了，重新掌权了。而接替袁振在太原市委掌权的贾俊，现在成了袁振的阶下囚。曾反对过袁振的对立面，跟着贾俊走的赵力之、刘舒侠、苏平、徐镇海、李文杰、郭庆年等太原市委的领导们，一个个被押上了主席台接受批斗。省委的王谦、王大任也被押上来了，唯独没有卫恒。原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卫恒哪里去了呢？不是袁振没有派人去揪卫恒，是杨承孝的人马把卫恒给囚禁起来，已经夺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生命。刘灏、宋捷、李金渭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是听毛主席的话要全力批倒批臭卫恒，而杨承孝一伙，竟敢夺走卫恒宝贵的生命。

【17】卫恒的惨死

元月 31 日，就在袁振兴冲冲在五一广场上，向全省人民证明自己革命造反成功，大批大斗原省委、市委的领导们时，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已经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地点就在太原迎新街十三冶三公司办公楼的 310 号房间。那座楼是决死纵队的总部，那间屋子是决死纵队

给省委第一书记设立的囚室。

前面记述过元月 15 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五一广场批斗卫恒、王谦、王大任和贾俊的事件。批斗会后，这四位省委领导，就被杨承孝囚禁在决死纵队的总部了。王谦在《卫恒同志，我怀念你》一文中，如此回忆：“1967 年的 1 月 29 日下午，看管我们的造反派，把卫恒同志押走了。这是我们（王大任、贾俊和我）和他最后的一次握别。我们和他开玩笑说：送第一书记上路，永别了！他微微地笑着说：再见了。开玩笑的话，不幸言中了。”

卫恒这次被押走，是因为康生派人来要对他审问。审问卫恒与中央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彭（彭真）、薄（薄一波）、安（安子文）、陶（陶鲁笳）”的关系。这两个人是中央文革专案组的于寰海和戴嘉煌。这两人来山西后，先找到刘格平，然后由其夫人丁磊安排他们，通过杨承孝找到卫恒。这便是王谦回忆卫恒被单独押走的原因。卫恒被押到另一间囚室，当时在场的，有杨承孝和决死纵队的另一名领导姚恩泉和一名骨干郭耀忠。他们责骂了一通卫恒就离去了。于寰海和戴嘉煌开始审问卫恒，除他二人外，还有太原市委办公厅秘书郭俊楼在现场记录。据当事人于寰海 1979 年 12 月 31 日所写材料回忆：“在我们谈话即将结束时，造反派头头杨承孝进来，对卫恒说了一些挖苦讽刺的话，并把卫恒狠狠训斥了一顿。当时我们听了感到很刺耳。我们谈话结束后，杨承孝即把卫恒用车送走了。找卫恒



卫恒夫妇合影

谈话的第二天，听丁磊告诉我们说，卫恒出事了，他昨天晚上自杀了，我们当时听了感到非常吃惊，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卫恒同你们谈话结束后，曾在一个饭馆吃了一顿晚饭，睡前还洗了脚，但第二天早晨，看管他的人发现他已经死了。”（见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文化大革命中山西省一·一二篡党夺权事件的专题材料》附件十一）

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让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心灵中充满了痛苦，在再次遭到刘格平等人和决死纵队的迫害后，卫恒惨死在被囚禁之地。卫恒的家人被撵到一幢破房子里，原省委第一书记的住宅有两层，二层被红联站太钢红旗的革命小将占了，一层被兵团十二中红旗的革命小将占了。卫恒死后第二天，决死纵队派出几个人，把卫恒的夫人张坤秀劫持到一辆车上，啥话也不说，一直开到火葬场，把张坤秀推下车，又推进停尸房。张坤秀看到的，是已经惨死的丈夫，头下枕的是砖头，牙关紧咬，双眉紧锁，铁青的面部，黑青的腹



“文革”前周恩来总理（左一）视察大寨。陈永贵（右一）卫恒（二排居中）陪同

部。她悲愤交加,又发现丈夫戴的奥米伽手表,还有身上的三十多元现金,19斤粮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完全可以想到,在于寰海和戴嘉煌两名中央文革小组的“钦差”走后,卫恒一定又遭受了决死纵队人员的毒打。卫恒夫人张坤秀看到自己丈夫那“黑青的腹部”,便足可证明这一切了。

可以想象,《人民日报》元月25日的社论,对于刘格平和杨承孝们来说,无疑是让他们兴奋无比的一道“圣裁”。他们一定让已经变成阶下囚的省委第一书记看了那天的《人民日报》。或许,满大街的高音喇叭,早就让囚室中的省委第一书记听到了那天《人民日报》的社论。党中央的机关报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卫恒明白,他现在成了“蠢人”,成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不投降就得灭亡的“敌人”!这种诬陷和打击,对一位省委第一书记来说,远比遭受刘格平和杨承孝们的侮辱和毒打更让他难以承受。一位执政党的省委第一书记,一心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从烽火岁月里经受了无数次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就这样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下,不明不白地死在了被囚禁的小屋里。他一定死不瞑目。他无法知晓身后之事。他是带着对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的不理解,却依旧带着一心要紧跟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好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善良愿望,带着虽然不理解,却又不敢对毛主席有丝毫怀疑的一腔忠诚之心,永远、永远地走了。这一天距中共山西省委被夺权只有18天。

从196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山西省委领导班子,由卫恒出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到1967年1月30日卫恒惨死在被决死纵队囚禁之地,这位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命运,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卫恒死后,当时的医生考察后写下死因不明,而杨承孝等却造谣卫恒畏罪自杀,太原一时间贴出许多说卫恒畏罪自杀的大标语和大

字报。因而,直到“文革”结束后,许多记述山西“文革”的文章,还说卫恒是“畏罪自杀”的。

卫恒被草草火化,沉冤难雪,魂无归处。卫恒的骨灰盒先是被放在火葬场的骨灰安放室,但还是被造反派勒令搬出。卫恒夫人张坤秀和她的孩子们,已经成了无家可归之人,他们既担心卫恒的骨灰被造反派们毁掉,取回又无处安放,在此困境中,张坤秀的胞妹侯慧茹与丈夫,偷偷去火葬场骨灰安放室,取出卫恒的骨灰盒,不让任何人知道,藏在自个家中。张坤秀和孩子们在动乱中一直熬过了 10 年,卫恒的小姨子也将姐夫的骨灰盒偷偷保管了 10 年。直到 1978 年 1 月 30 日,省委在太原双塔革命公墓纪念堂隆重举行了卫恒骨灰的安放仪式。然而,卫恒还是不能瞑目。因为,他任第一书记时,同意了山西省委在 1966 年下发的 221 号文件和 223 号文件,那种同意肯定是违心的。1971 年 4 月 7 日,山西省第三次党代会召开,谢振华当选为第一书记。其时,卫恒遗孀张坤秀已被打发到壶关县插队劳动。当基层党组织传达省三次党代会精神时,张坤秀听到了这次会上将卫恒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危险的敌人”的评价。她毅然赴京告状,将写好的材料托人递到周总理办公室。当年秋天,周总理将这封告状信批回山西。张坤秀和其妹侯慧茹到省里卫恒专案组询问,证实了此事。1972 年,省委专门为卫恒发了一个 55 号文件,改正了那种提法。1975 年在王谦任省委第一书记时,又下发过一个 49 号文件。这四个针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的文件,前两个用当时党中央的错误政治标准,对卫恒作了批评和定性,后两个虽然对卫恒的问题做了结论,称其为“人民内部矛盾”,却仍然说卫恒“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错误,”“执行过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78 年 7 月,还是王谦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时,省委办公厅印发了《纪念卫恒同志逝世十一周年》小册子,仍将 1975 年省委下发的 49 号文件收入其中,显示

出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后，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的思想特色，也显示出在中共中央决定结束 10 年“文革”后，极左思潮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在全国的基层，乃至在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头脑中，并不是一下子可以解除和阻止的现实。

1967 年的 2 月 1 日，即卫恒惨死后的第三天，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等人联名拟了一份加急电报，题为《关于山西夺权的情况报告及下一步部署》，报中央文革小组并报党中央转林副主席与毛主席。这封电报中说：“原省委卫恒十一日畏罪自杀。”杨承孝囚禁着卫恒，刘格平和丁磊们，是知道卫恒被杨承孝们囚禁的情况的，为何在卫恒死亡的时间上如此出错？那只有他们几个当事人清楚了。

时光流到了 1985 年的 6 月 27 日，以李立功为书记、李修仁、王森浩、王克文为副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委，终于做出了《关于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撤销了前面提到的省委 1966 年的 221、223 两个文件，以及 1972 年 55 号和 1975 年 49 号文件。

逝去的“文革”时期，是一个全党进入历史误区的时期。

当今任何美化自个在“文革”中如何如何一贯正确的人，其实是在进行自我欺骗，也是在欺骗着历史。

【18】改朝换代的岁月

让我们还回到 1967 年。

前面说过，元月 15 日上午，杨承孝在五一广场召开的那个批斗大会，远不如元月 30 日上午袁振在五一广场开的这个批斗大会成功。那天在广场的主席台上，卫恒竟然敢带头把造反派们挂在他脖子上的大纸牌子撕掉，还要高呼“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的口号，杨承孝岂能就此罢手。在迫害死卫恒之后，他继续向刘格平

表示,要再开一个批斗大会,规模要超过袁振主持召开的那个批斗大会。袁振已经在五一广场上向全省和全市人民亮相了,刘格平也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五一广场的主席台。而在向全省人民登台亮相之前,刘格平又拉上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陈守中,向党中央发去一封加急电,电文很长,是报告他们在山西胜利夺权的情况。从抬头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并报中央转林彪同志并主席”这种用词可以看出,这封加急电是直接发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五人在电文最后作了如下表态:

在这次夺权斗争中,我们几个同志,对于林总要吃透两头的指示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一头要吃透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另一头要按主席的指示,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坚定不移地依靠左派,团结中间力量,孤立和分化顽固势力。我们决心本着这些指示精神,谨慎而又坚决地将山西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配合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成功。

在2月5日上午,杨承孝又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的身份,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有12万人参加的批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谦、王大任的大会。刘格平与和他一道向省委造反的那几个战友们,以新当权者的新贵身份,得意地坐在主席台上,为杨承孝撑腰,向全省人民亮相了。《山西日报》在2月7日第三版上,刊出了报道这次大会的长篇消息。

该报道的肩题是“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全面夺权彻底夺权”。

主题是“省城十二万人集会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王谦、王大任”。

副题是“革命造反派代表愤怒控诉前山西省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斗争大会结束后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分子由解放军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报道一开头就说：

重新掌了大印，做了主人的我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劳动人民十二万人，五日上午，群情激愤地在省城五一广场举行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王谦、王大任大会。这是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以来举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斗争大会。大会充分显示了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掌权的无比威力。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更加广泛地联合起来，展开了全面夺权，彻底夺权的伟大斗争。

报道中如此描述：

这天，庄严的主席台上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挂在主席台中央。两旁观礼台上挂着巨幅标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坚决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午十一时大会开始，全场十二万人放声高唱《东方红》。

报道描述了斗争的场面：

当全副武装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革命造反派战友将王谦、王大任、贾俊、赵力之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押出示众时，整个会场变成了愤怒的海洋，人们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造反无罪，夺权有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彻底灭亡！誓死捍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这种批判和斗争是残酷的。杨承孝用东北腔愤怒地念着稿子，当念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绝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而是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这位年轻的工人竟然把“昙花一现”，念成了“云花一现”。可怜杨承孝虽不识昙花，他的生命却在山西“文革”中命丧黄泉，真正成了“昙花一现”的人物。不过，当杨承孝大声念出这个错白字时，他也正如昙花盛开被时代热捧着，成了山西“文革”的弄潮人。

《山西日报》这篇报道在结尾处，如此总结道：

斗争大会结束后，王谦、王大任、赵力之等前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由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造反派的战士们押上卡车，游街示众。革命造反派为之扬眉吐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吓得面色如土，浑身发抖。革命人民起来了，要把他们彻底埋葬。

袁振要开对卫恒的批斗会，杨承孝明明控制着卫恒，却不让刘灏的兵团找到卫恒。现在杨承孝开了如此大规模的批斗会，却偏偏不给刘灏送邀请到会的通知。杨承孝在排挤刘灏，刘灏岂能没有感觉？在山西夺权后的造反派内部，相互的不信任和彼此的倾轧已经开始了。

在刘格平、张日清和袁振们批斗原省、市委领导的同时，他们也没有忘了发表文章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夺权后的2月9日，《山西日报》第一版上刊发了张日清的长篇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全省全面的夺权斗争》。2月28日的《人民日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张日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

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紧接着在《红旗》杂志第4期上，这篇文章也被以显著位置推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是代表中共中央声音的机关报刊，这篇文章自然也就喻示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同意并支持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态度。当时社会传言，《人民日报》上张日清的那篇文章，是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和王力约请张日清写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全看了这篇文章的送审样。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记载，毛泽东主席在送审样上批示：“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看到了，不必印发。”让部队出面介入地方夺权，让张日清来支持刘格平在山西取代原来的省委而组阁，这正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意思。

张日清发表文章了，刘格平也要发表文章。2月14日的《山西日报》上，全文刊登了由刘格平牵头的那份五人大字报。对这张大字报还编了一条肩题：“刘格平等革命领导干部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写出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在编者按中，更是对这张五人大字报用尽了吹捧拔高之词。

1967年的2月中旬，刘格平扩大了他的政治班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由原先的5人，增加为9人。刘格平依然是组长，副组长为张日清，秘书长刘贯一，副秘书长刘志兰，成员陈永贵，袁振，徐志远，陈守中，曹中南。

对山西而言，1967年初确实是个改朝换代的岁月。

2月26日，省城又是20万人集会，庆祝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原先的公、检、法被刘格平和张日清一举给砸烂了。在这天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刘格平端坐在五一广场主席台的正中央，这可是台上台下有目共睹的事情。此处特意点出这事，是想请读者们注意，在其后的七月会议上，刘格平竟能红口白牙地把这事给否定了。

【19】刘格平组建省革委

3月12日至18日，以刘格平为首的9人中共山西核心小组，与杨承孝为首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召开了“山西全省革命组织代表会议”，共有3993名来自全省的造反派代表到会。会上，刘格平做了《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张日清做了《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会上按毛泽东所说的“三结合”原则，（孙涛按：即革命的领导干部代表，解放军代表，革命造反组织群众代表三方结合）选举产生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陈永贵任副主任。（孙涛按：郭永彪是地方军区首长，谢振华是刚刚接替21军到山西驻防的69军负责三支两军的副军长，焦国鼐是原山西省副省长）另外还产生了27名常委，245名委员。3月19日的《山西日报》发表社论，题为《革命的三结合方针胜利万岁》，祝贺山西以刘格平为首的这个新政权，取代了以卫恒为首的原中共山西省委，和以王谦为首的山西省人民委员会。

刘灏在这个会上只当选为全省新生红色政权里的一名委员。

杨承孝呢，却因为紧跟袁振变为紧跟刘格平，并且是山西革命造反派们向黑省委夺权时的总指挥，一下子跃居刘灏之上，当选为常委。这一次，太原五中高三70班的学生刘灏，再不能与杨承孝这个十三冶金建设公司的二级半电焊工平起平坐了。

1967年的阳春三月，不平静的山西，似乎已经取得了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3月26日，刚刚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五一广场隆重集会，向全国宣告，在以刘格平为首的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山西



刘贯一(左一)、陈守中(左二)、张日清(右一)与太工永红的领袖高翔(右二)
及其他向“黑省委”夺权的学生们在一起

的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格平任主任。原省委省人委领导全被打倒，全省各地纷纷集会庆贺。

刘格平是山西新政权的第一把手，袁振虽然在太原的新政权中没有职务，却以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身份，控制着太原的新政权。张日清呢，他是省党的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还兼上了取代公、检、法的山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第一把手。原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敏，被张日清委任为山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第二把手。与这些新贵们持不同观点的原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大批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群众被抓捕关押。

据李立功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山西》记载：从山西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成立起，到1967年5月底，全省各地共抓捕所谓走资派、特务、叛徒以及被诬陷为所谓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各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竟多达1100多人。

试举不同的三例。

所谓走资派者，如当时年近花甲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他是1934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老党员，曾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建国后，在山西省委、省政府中，一直分管政法战线的工作。在刘格平和张日清主持山西夺权之前，那位与刘格平站到一起的省政协副主席何英才，动员正在养病的郑林起来造反，被郑林严辞拒绝。刘格平和张日清夺权成功后，郑林并不承认他们这个领导班子，于是，黄锐庵那个东风兵团的政法分团就对他下手了。他们不顾这位长期分管政法战线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和副省长年迈有病，以反革命罪将郑林从病榻上抓走，关进了监狱。群众造反组织随意抓人，特别是竟抓捕了郑林这种分管政法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当时社会混乱，可见一斑。郑林在狱中曾愤然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老郑依然是老郑，革命革成反革命，坐监何罪又坐监，专政反而被专政。”此诗在“文革”时期曾在山西民间广为传诵。

还可以举一位普通教师被捕的故事。这名当时在太原市建设管理局工会学校任教的教师朱仁声，1967年带着学生们去串连，到了北京后，听说自己有一些南下的学生在榆次被解放军抓了，急忙赶回太原，到了省军区，希望说明情况，请求省军区出面救人。没料到就因为他来省军区反映情况，却被请到省军区保卫处，在一名军官指挥下，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将他逮捕了。事后才明白，他的学生中有一名同学和刘格平的女儿关系很好，因种种原因，他带学生外出串连时，没有让这名同学参加。这名同学便通过刘格平的女儿，报告了张日清，说朱仁声和他带着串连的学生们是保皇派，这才有了省军区让晋中军分区抓捕那些串连学生，又将“自投罗网”的朱仁声逮捕入狱之事。“文革”结束后朱仁声以伊克昭的笔名发表文章，对此全有记述。

再以女大学生王清英为例。她与社会上的保皇派组织领导张志

安以及山西大学的学生刘普德不一样，是山西大学数学系最早起来造反的一名女学生。“文革”运动一开始，她就到社会上参加了炮轰省委指挥部。当这个指挥部的成员们在保袁振还是打袁振问题上，分成两种观点继而解体分手后，王清英积极协助刘灏，组建起山西革命造反兵团。1·12 夺权后，刘格平将她安排在总指挥部接待办公室负责，王清英就住在办公室，每天晚上将白天的接待情况写成简报后，直接送刘格平和丁磊。有一天晚上，王清英正在刘格平家，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给刘格平打来电话，刘格平不在，是丁磊接的。王清英坐在一边，从丁磊的应答中，听到了一些王力电话的内容。第二天，她便将这些内容，当成革命动态，告诉了兵团司令部的一些人。兵团司令部的刘大康，是六中 32111 公社的发起人之一，其时，已被刘格平任命为省革委新闻宣传组的副组长。刘大康就去找丁磊，想再了解些情况。丁磊一听是王清英泄露了中央文革小组王力与她通话的内容，当下发怒了，兵团是袁振的嫡系，王清英继续留在总指挥部刘格平身边工作，岂不是给袁振留下了耳目？刘大康自讨没趣，丁磊事后就向张日清告状，说王清英胆敢偷听她和格平同志与中央的通话，必须处理。3 月 9 日晚上，那时张日清的专政委员会还没有成立呢，指挥部有人来叫王清英，说刘格平有急事要见她。王清英穿衣刚出门，就被门外静候的解放军架住，塞进一辆军用吉普车投入大狱。审她的全是省军区军事检察院的军人，核心问题，是让她交待袁振和兵团是否反对刘格平和张日清。这也就是日后的七月会议上，王清英控诉张日清专政委员会的原因。

上述各色人等，仅仅是住监吗？不是。在监狱中，这些无辜者都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当然，最倒霉的，还是那些走资派们。卫恒书记被杨承孝的决死纵队抓走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原先中共山西省委的第二号走资派王谦省长，眼下就成了山西省被关进监狱的第一号走资派。

杨承孝带着打手们入监，辱骂和痛打走资派时，这些革命造反的工人师傅们动手时还高喊着：“让你们这些走资派们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伴随着杨承孝和他手下打手们这样的嚎叫，中共山西省委的原领导人们，无一人幸免地全受到了皮带和棍棒的抽打。出生于1917年的王谦省长，其时正好50岁，杨承孝命令他下跪请罪，王谦不愧是条硬汉子，遭到毒打，既不下跪也不认罪，只是高喊：“毛主席万岁！”于是杨承孝用手中的匕首，猛地刺进了王谦的大腿，这位被夺权并投入监狱的山西省前省长，一下子倒在血泊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赵力之，与第一书记袁振意见不合，也被打成太原市头号走资派投进监狱。杨承孝带人将他拖出监室，用皮带和棍棒毒打，还辱骂：“你小子在监狱里还不规规矩矩，还反对毛主席，懂不懂啥叫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赵力之大喊：“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杨承孝骂道：“你还嘴硬！”举手就给赵力之几个大耳光，把他左耳当下打聋，以后造成双耳失听。

【20】陈永贵杀下虎头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起来造反的，有刘灏这样的高中生，有杨承孝这样的基层工人，有刘格平一类的老党员、老干部。同时，还有陈永贵和李顺达这样全国闻名的老劳模。1967年1月31日，由陈永贵挑头，联络李顺达、太纺的解悦、十三治的牛发和等劳模，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并于2月3日加入了杨承孝的那个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2月6日的《山西日报》第三版对此有详细报道。大标题是：《陈永贵等带头“杀”出来了》，文前的题要内容是：“在著名劳模陈永贵、李顺达、解悦等同志倡导下的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成立并加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这标志着我省工人

农民大联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报道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动。2月11日，陈永贵联合昔阳县的32个造反组织，成立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并任总指挥。这个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开进县委、县政府，将昔阳县的党、政、财、文大权一举夺权成功。2月16日

《山西日报》头版对此有

报道。大标题是：《陈永贵带头造反 昔阳县夺权报捷》。4月8日，昔阳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永贵出任了革命委员会主任。8月6日在《人民日报》第5版上，刊发了陈永贵的署名长文，题为《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陈永贵的文化不高，肯定写不出如此长文，但此文由他署名，足见他当时完全同意代笔秀才的观点。

杀下虎头山的陈永贵找到了刘格平，夺得了山西省委大权的刘格平，也要依靠陈永贵掌握“农业学大寨”这张牌。这一年的9月10日至17日，刘格平主持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地点就在昔阳县。卫恒死了，以王谦为首的原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们，还有原晋中地委和昔阳县委的领导们，全被从监狱中提出，押到昔阳县大会批斗。省城参加夺权的各个群众组织的领袖们，则作为嘉宾被特邀到会。刘灏带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干小将，乘一辆大卡车也住到了昔阳县。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陈永贵

这次全省学大寨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批斗走资派。在县城广场，搭起一个大台子。大会组织了一帮从农村选下的打手，每天，那些走资派们要全部押到台上，做大会批斗。头一天，王谦就被打得满脸流血，跌倒在地，又被扯起来继续做喷气式飞机状挨批。晋中地委副书记苗枫，因被殴打致多个内脏破裂，批斗会被打后第二天死亡。而指挥这一切的，就是端坐台上，身着军装的刘格平和头上扎着白毛巾的陈永贵。

下面的文字中，提到的刘开基，是省委被夺权前分管农业的副省长，提到的赵雨亭，是省委被夺权前的书记处书记。作者刘继英先生，则是刘开基的儿子。

9月中旬在昔阳县召开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刘开基和其他省委、地委领导都被押到会上批斗。给他们坐“喷气式”，头上戴了高帽子，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行示众。在会上，造反派诬陷省委反大寨，要刘开基交待反大寨罪行，刘开基拒不承认反大寨，说“大寨是省委树立的，没有省委支持哪有大寨。”被造反派拳打脚踢，肉体受到摧残。在第二天的会上毒打赵雨亭同志后，再次责问刘开基为什么反大寨，为什么要审查某某人，刘开基据理反驳，大寨的主要负责人竟恼火至极，亲自上前打了刘开基两个耳光，用砸石垒坝的手打人，其痛苦可想而知。随后一伙造反派一齐上去打，作为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开基是这天挨打最多最重的，……事后家里从监狱取回他换下的衣服，只见领口、衣袖和内裤上都是血迹斑斑。（摘自太原诗词学会和太原市桃园诗社于2005年10月8日出版的《灯火文集》第十一期中《一身正气无私无畏》一文。）

卫恒书记的秘书刘建基，曾在《“文革”中的遭难及见闻》一文（载

《记述刘格平、袁振等在山西 1·12、太原 1·28 夺权中镇压迫害干部史料》,刘建基、赵承亮辑录)中,对这次会上的打人情况,也有记述:

9月10日至17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昔阳县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山西省学大寨现场会。省革委会主任刘格平讲了话,大寨大队贾承让、郭凤莲发了言,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几万字的长篇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爪牙陶鲁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王谦、王大任、赵雨亭、刘开基、王秀锦(省委常委、晋中地委书记)谢子和(晋中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润槐(昔阳县委书记)等均被押到大会上进行残酷的批斗,陪斗的有晋中地委、昔阳县委的其他一些负责人。赵雨亭说批斗会上首先给他们坐“喷气式”飞机,那种痛苦可想而知,再是给他们都戴上高大的纸帽,挂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游街示众。游街的时候都得把双手高高举起,不举就打。……打得王谦嘴里直吐绿水,这是王大任亲眼看到的。……王大任说从此以后,武斗打人之风在全省漫延开来。

面对农业学大寨会上这种场面,刘灏和他带着的兵团小将们,有他们自个的思维和行为。其一,他们以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名义,在会场上贴出大字报,观点明确:“听毛主席的话,坚决批判黑省委反对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坚决要文斗,不要武斗。”其二,在一天的早饭后,这伙革命小将们直扑关押晋中地委走资派的“牛棚”,要批斗原晋中地委书记王绣锦。那几个看管王绣锦的打手们,一看是太原来参加会的革命小将,也不敢阻拦。刘灏一伙将王绣锦架到卡车上,又将王绣锦的行李、随身带着的衣物小包,还有一双备换的皮鞋,全从临时囚室中取出放到了车上。众小将纷纷上车,发声喊,开上卡车就走。

看管王绣锦的那几个人傻眼了，这可不象是拉上人去批斗，倒象是把人给绑架走了。无奈追不上卡车，只好去大会上报告。被押上卡车的王绣锦认识刘灏，也有过几面之交。原来，他在华北局会议上，为袁振说过几句公道话，对省委批袁振是野心家、伸手派有不同看法。刘灏要为



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

袁振翻案，找王绣锦调查过华北局会议上的情况。起初，王绣锦也以为这伙兵团小将是要拉他去批斗的，可这辆卡车不往会场上开，怎么就开出了昔阳县城呢？刚出昔阳县界，车就停下，刘灏从驾驶室副驾驶座上跳出来，喊着让王绣锦快点坐进驾驶室，王绣锦这才明白，事情并不象他想的那么坏。待刘灏告他，要把他拉到太原去藏起来避难时，王绣锦的心也就放下来了。而在昔阳，立马有了传说，说大会从省里请来的那个造反派刘灏，根本不是造反派，而是保皇派。

1977年的年底，王绣锦出任了太原市委书记，其时，任太原市北郊区委副书记的刘灏，已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大狱。轮到王绣锦来过问刘灏的问题了。他也确实过问了刘灏的专案，但却并未能将刘灏放出监狱。就这个问题，我问刘灏原因何在？刘灏说，他后来被无罪释放后，也问过王绣锦为啥不救自个出来，对方说，确实查不出你什么问

题来，也向王谦汇报过，提出无罪释放你。但王谦说了，不管查出有罪还是无罪，先关着再说。

为人宽厚的卫恒死了，在王谦终于坐上省委第一书记宝座后，袁振和省委在华北局会议上结下的死结，又被王谦延续到了刘灏的头上，这已是后话了。

继续说陈永贵。这位劳模杀下虎头山后，革命造反的勇猛劲头，当时的学生们无法相比。他常随意表态，支持群众组织起来造反。1967年11月10日出版的《兵团》报上，就登过一篇由当事人撰写的报道，正题是“发生在迎泽宾馆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副题是“东风一小撮从迎泽宾馆逼走陈永贵同志的前前后后”。文章以支持和歌赞的调子，首先写了“事件的经过”。这经过其实也很简单，1967年的10月19日，陈永贵在太原做完报告后去迎泽宾馆休息，被安排在一间放两张床的标准间里，另一位领导人的秘书要帮他换房，结果总台一位服务员说没有大房了。陈永贵便去找这位服务员，这位服务员吓哭了。当时宾馆的服务员们也各自参加了不同的群众组织，陈永贵又要找这位服务员所参加的那派群众组织的领导，结果没有找到。当晚刘格平来宾馆和陈永贵谈工作，陈永贵又说到换房问题，为此刘格平还找了宾馆的军管小组。当晚，当军管人员和宾馆另一派组织的领导要给陈永贵换房间时，陈永贵却披上棉袄，坐上自个的小车回了大寨。文章的第二段写的是“晋中十月事件的继续”。这一段是作者上纲上线，说当年“黑省委”的卫、王、王就在晋中迫害过陈永贵，现在“卫记黑帮的得力干将们”仍然在“迫害”陈永贵。最后一段是“慰问陈永贵同志”，记述了迎泽宾馆兵团一派的组织派人到了大寨，“慰问”受到迫害的陈永贵时的种种情形，文章写得很纪实，照录几段如下：

22日，上午9点，陈永贵同志在家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陈永贵同志余怒未消，开门见山地指出：“我认为宾馆是卫、王、王的宾馆！我们这些人哪能住呢？昨天他们（东风）来了六七个人，还留下一个常委要找我。你们说见不见？他们对我说，以后再去宾馆他们欢迎我，我说，我不住。实际上他们是讽刺我的。”

“对我身上的事，像吃、住、派车我都不考虑，不讲究。但对你们（‘兵团’服务员）进行讽刺，对‘十月事件’受害者，对核心小组的人刁难，打击，我是反对的。”

我们介绍了目前宾馆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说明“东风”一小撮在卫、王、王二三线人物的操纵下仍执行反动路线，对和他们有不同意见的服务员实行高压政策，不准这些同志组织革命组织，谁要组织就是反革命行动，就要逮捕。对住宾馆的同志也是分等论级不一视同仁。听到这里，陈永贵把炕桌一拍，有力地往下一坐，大声地说：

“大闹狗日的，不要怕！”

那时造反派们都在抢着支持这杆“大寨红旗”，迎泽宾馆两派组织的领导，在老陈发火后，一家是围着陈永贵赔礼，另一家干脆就跑到大寨去慰问。老陈呢，口口声声地左一个卫、王、王，右一个卫、王、王，足见他造省委反的决心之大。

也就在这一年的11月，当陈永贵在昔阳县掌了大权后，他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信，提出了在农村搞“文革”的五条意见。《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段存章的《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载《长治新闻人》2014年第一期）一文中，记载了这件事。陈永贵在信中最后写道：“我对农村干部有切身体会。干部不会不犯错误的。要分清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坏干部毕竟是少数，不能凡是干部都打倒。”段存章在文章中如此回忆：

1967年11月7日中发（67）339号文件下发，批语中说：“陈永贵

同志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谈话所提出的五条意见是正确的,供同类情况的地方参考。”接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陈永贵的五条意见,这对稳定全国农村形势,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革”前昔阳县搞过四清运动,基层干部不少人挨整。“文革”运动接踵而至,基层的不少干部又受到冲击。陈永贵希望全县基层干部稳定,这样才能促生产。其时,毛泽东带头炮打司令部,主要想解决高层赫鲁晓夫们的问题,与刘少奇抓四清运动时,矛头对准农村的基层干部不同。陈永贵给毛泽东主席直接上书,无疑让毛泽东主席更加看重这位善于领会他意图的农民劳模了。

“文革”前,曾任山西日报社总编辑、“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先生,在其晚年自印文集《大写的人》一书中收录了一篇文章:《中国农民奔小康的路径》,分析了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背景。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提出了人民公社左倾冒进给全国农业战线造成的危害,矛头直指毛泽东,而毛泽东会后对刘少奇的反击,就是要选一个典型,证明人民公社是正确的。吴象先生写道:“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过,大寨就是阶级斗争。他想通过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通过‘四清’,只解决基层问题不行,必须打倒上面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为内容,在全国农村进行了一场大浩劫。”

陈永贵在大寨反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符合圣意,带头革命造反,符合圣意,在大寨和昔阳大搞阶级斗争为纲,大批促大干,符合

圣意，“文革”开始后稳定农村，好集中火力炮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也符合圣意。伟大领袖希望全国农村都走大寨道路，于是陈永贵也就被毛泽东从一个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最后提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分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了。陈永贵在“文革”伊始扯旗造反时，对自个日后的仕途发达，一定始料未及。

“农业学大寨”的带头人杀出来了，平顺县西沟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老劳模李顺达也挺身而出，表态支持晋东南地区的革命造反派。论劳模的资格，李顺达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名闻根据地的劳模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变化多端，李顺达表态支持的晋东南地区革命造反派，简称联字号，对立面简称红字号。在“文革”的派斗演进中，联字号成了所谓的拥军派，支持省革委的军人张日清和晋东南军分区的司令武天明，反对刘格平和晋东南新政权中的地方干部程首创。就观点看，属于红联站和兵团观点。三级高干刘格平，恨的就是不听话的红联站，还有只听袁振的话，总和他步调不太一致的兵团，他手中有的是可以压倒李顺达的大王牌，那就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的大寨红旗擎旗人陈永贵。在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里，陈永贵一直在李顺达之上。刘格平和张日清的矛盾渐渐公开化了，张日清也紧紧抓住李顺达这张牌，虽无法拿李顺达与陈永贵抗衡，但有了李顺达，晋东南的联字号队伍，便成了支持张日清的力量。而刘格平和陈永贵支持的晋东南红字号，岂能把联字号放在眼中？日后晋东南地区的两派武斗在全省最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21】刘灏做官后聆听四条父训

堂堂兵团司令刘灏，在山西的这场夺权大革命中，只得到一个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他不满足。

别人且不用说，他由不得要与那个曾经是他手下一员干将的杨承孝比一比。这个二级半电焊工，话说不好，字写不好，凭啥成了在他刘灏之上的人物？还有那个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的总司令黄锐庵，原先是省人委办公厅的一个小干部，地地道道的“黑省委”小走卒。他参加刘格平的夺权行动，实际上只是在纸上签了个名，无功无劳，竟然这姓黄的也成了堂堂的造反派，成了与他刘灏平起平坐的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还有许多可比的呢。他思来想去，比来比去，总感到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贡献与获得不相称。然而面对山西已经组建起来的新政权，他那时想的更多的，不是怎样才能重新坐到全省造反派老大的交椅上，而是高考到底还进行不进行？报纸上说过要砸烂高考制度，可没有说砸烂大学呀！日后还能不能上大学呢？

准知识分子刘灏，与自诩为工人阶级的杨承孝，毕竟不是一个文化层面上的人物。即便以当时的革命标准来划分，刘灏紧跟毛主席革命造反，和杨承孝的那种革命造反，也不可划上等号。就在刘灏与杨承孝分别因革命造反，同时步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这两个官场之后，刘灏在母校五中做了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就可从一个角度，看出他与杨承孝的不同。这件不大也不小的事，就是刘灏在母校下令，先废除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五中改成太原红卫第一中学的名称，然后开会成立了五中革命委员会，他被推举为革委会主任。这事儿不算大。因为此时的刘灏，既是太原市革委会的常委，又是山西省革委会的委员，他要在五中也成立革委会，主任自然非他莫属。其时，五中几乎成了兵团的天下。连最初揪斗老师的那些组织，随着形势的发展，也纷纷归属了兵团。更重要的是教师们也革命造反了，成立了兵团井冈山教工支队。特别是那些在“横扫牛鬼蛇神”中挨过整的老师，更成了刘灏的支持者。无非就是开了一个会，五中的革委会就算成立了，刘灏就算成了五中革委会的主任了。刘灏没把这事



太原五中革委会全体合影

当成大事,是在哪一天开的会?连他也记不清了。刘灏又向市革委申请回一笔经费,对五中校园做了整修,新的围墙耸立起来了,校园整洁了,图书馆也重新开馆了。五中开始“复课闹革命”了。2006年8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承的河流》(系太原五中百年校庆丛书之一,由时任校党委副书记王一瑛主编)一书中,对此事的记载也是有年有月而无日。具体文字是:“1967年3月,刘灏为主席的太原五中革命委员会成立,开始进入‘复课闹革命’阶段。”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3月4日,太原市革委才下文,正式认定了太原五中以刘灏为主席的这个红色政权。对五中和刘灏而言,此事又绝不是一件小事。正是因为有了刘灏为主席的这个五中革委会,五中的教师们不再成为运动的对象,学生间的内斗相对平息了。刘灏按当初自己大字报指出的问题,去纠正原校党总支执行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派人把运动初期被揪斗后戴上牛鬼蛇神帽子遣送回原籍的老师们,全部喊了回来。让他们在学校参加运动,撤销对他们的专政,照发工资,该上讲

台的就上讲台去教学。刘灏认定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要揪出党内的走资派,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现在是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了,以后同学们还要考大学呢,绝不能揪斗老师。五中革委会成立后,需要有人管财务,可财务处长韦荣武在原傅作义部队中当过军官,早被官办红卫兵挂上“反动军官”的大牌子,赶回广西老家去了。刘灏认定,学校的财务,一般人可弄不了,还得由这位老处长管。手下有人说:“那么远,还用去叫回来?”刘灏说:“多远你们也得给我把韦处长叫回来。”

按《传承的河流》一书的说法,那段时间“由于社会运动的干扰,复课时开时停”。当时,能如五中这般“时开时停”地搞“复课闹革命”的中学,实在不多。刘灏能在五中做了革委会主任,而杨承孝则从革命造反的第一天开始,就始终没能在他的工作十三冶金建设公司成为多数派,更甭说一统天下了。当恶风掀起起浊浪变成了社会的主流时,当用一个政治标准来划分当时的弄潮儿时,人性的不同,也可从大众的认同度上看得出来。

山西的变化让刘灏感叹。在山西 1·12 夺权后,他虽然得到了市革委常委、省革委委员和太原五中革委会主任的名份,但那时还没有更多地想到做官。全国都在夺权,心想这一夺权,文化大革命岂不是就要结束了吗?运动一结束,只有上大学,才是正事呀。至于形势往下发展的结果,刘灏更想不到了。他在许多年后感叹地回忆说:“再往后,那真好比是箭在弦上,甭说我自己就想往前走,就是我想往下退,恐怕也由不得我刘某人了。”

也就在这一年的春节前,进入了 19 岁的刘灏,接到了从河北保定解放军某部医院发来的一份加急电报,内容只有四个字:父病速归。他不知道亲生老子生了啥病,总算是在革命造反中也有了个官衔的中学生刘灏,急匆匆登上火车,直奔保定而去。

事情还得从毛泽东“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指导思想说起。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1967年1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的社论。号令一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也开始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借此将斗争矛头指向了朱德、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贺龙等共和国的开国元帅，部队院校和机关的当权派们，自然也逃不脱被炮轰和被打倒的命运。

刘灏的父亲，一位职业军人，解放军保定某医院的院长，此刻却正躺在病床上。不是什么体内疾病，而是外伤。医院也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要按《解放军报》的社论精神革命造反，“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如此一“彻底”，他们的院长就成了被革命造反的对象。被揪被斗的院长，难免还得被医院的革命造反派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医院内部有人造反，社会上也有造反组织冲击医院来了，理由是，部队的医院成了地方走资派的避风港。确实，保定的几位地方领导，正在这所部队医院住院治病。刘院长亲自出面，去劝阻冲击医院的造反组织，结果遭到了对方的殴打。刘灏父亲的外伤，便由此而来。刘灏赶来了。父子相见，由不得抱头痛哭。刘灏绝没有想到自个在山西整天揪了这个斗那个，自个的老子却也成了穿军装的走资派，被人揪斗了，殴打了。老子是职业军人，跟着毛主席革命了大半辈子，才是个师级职务，儿子跟上毛主席才干了一年多革命，现如今倒成了堂堂山西省一大群众组织的司令。父子是割不断血亲的亲父子，但父亲不敢相信儿子眼下的显赫身份，儿子也不愿相信父亲眼下的倒霉处境。按那时的革命形势和他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谁也不能更不敢说对方的身份和处境有问题。于是父子二人的哭声中，除了亲情外，还增加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喟。当院长的老子，想阻止做了司令的儿子继续革命造

反，但那话不能说。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也让他不能和不敢说这种话。当司令的儿子，想保护他的老子，却是爱莫能助。他不过是山西的兵团司令，部队医院里的革命造反派，可不买他这个司令的账。老军人与儿子朝夕相处一段，总得安顿儿子一番才是。思来想去，做父亲的给儿子日后的人生道路规定了几条“父训”。

一、不偷不抢；二、不搞女人；（正常的恋爱除外。）三、不搞武斗；四、眼下全国大乱，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你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就得紧密依靠解放军。我的儿哟，军民鱼水情呀！

老父亲的滴滴泪花儿，流进了刘灏的心里，老父亲的四条“父训”，也铭记在儿子的心里。1967年的春节是2月9日，春节刚过，刘灏就急匆匆返回山西，山西的文化大革命局势，却又出现了令他意想不到的变化。

第六章

兵团、红总站、红联站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扑朔迷离的 4·14 事件，激起了新的政治动荡。省城太原武斗初现，中央七月会议又助长了山西的动乱。

【1】砸山艺造的革命行动和反革命行为

刘格平领导一批群众组织在山西夺权成功，虽然处理了一些群众组织，抓了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但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斗并未停息。我们下面剖析一下 1967 年 2 月 26 日晚上，几家群众组织打砸山艺造总部的事件，从中可看出，群众组织的相互攻讦和争斗，背后全有高层人物和群众组织的头头们在暗中策划。这次事件，也在山西开创了一派群众组织欲以武力，摧毁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先河。

这一年的 2 月 26 日，是个星期天。在上一章的第 18 节中，叙述了山西砸烂公、检、法后，刘格平和张日清在山西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这一天在五一广场召开成立大会的情景。刘格平忙。她的夫人在家里也忙。这天上午，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新总部的司令贾克明，带着他的贴身保镖兼秘书宋伟，乘吉普车来到刘格平家。刘格平不在，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就在客厅里，与贾克明商定了一件大事。

宋伟当时是太原五中初二的一名学生，不满 16 岁。个头高，人也



孙涛听著名作家王东满(右)回忆“文革”经历后合影

长得俊,是五中刘灏那个井冈山造反兵团的战士。早在 1966 年的年底,刘灏就组织了一批井冈山战士,去省城各个造反组织串联。在动员会上刘灏讲得好,说是要听毛主席的话,井冈山战士,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宋伟和大家一样,走出校门,几位同学热血沸腾,被安排到省手管局招待所,与在这里扯旗扎寨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军团串联、结合来了。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司令是贾克明。贾克明一眼就相中了宋伟,其他五中来的学生,让别人去安排,只把宋伟留在身边,让小伙子做他的贴身保镖和秘书。不上课了,闹革命了,宋伟很兴奋。他是军队干部的子弟,从家里找身发了白的旧军装穿上,拦腰扎条军用皮带,再找个军用挎包斜背到身上,成天价跟着贾司令,很有成就感。贾克明参加了张建国和李保顺领导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再后来,省里刘格平组织夺权成功,张建国和李保顺不听话,被抓了。贾克明组建起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新总

部，又拉起山头，还是贾司令，比过去更威风了许多，带着宋伟，常常出入刘格平家。有一回为了等刘格平接见，贾克明就在刘格平家客厅的地毯上睡着了。天很晚了，刘格平才回家，守着贾克明的宋伟，急忙把司令推醒。贾克明向刘格平汇报工作，也从不避讳宋伟。

这天，丁磊和贾克明商量大事，宋伟也坐在一边。两人商量的大事，是一次革命行动，组织人马，捣毁不支持刘格平的那个山艺造组织。丁磊取出一沓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公用信笺，她口述，贾克明执笔，写好了一份文件。丁磊取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大印，在这份文件上盖了印。那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历数山艺造的反革命罪行后，下令“今晚捣毁反动组织山艺造，希其他革命组织不得阻拦，并大力支持”。宋伟至今依然记得，丁磊当时一再嘱咐贾克明，一定要把晚上这个革命行动搞好。当时的宋伟心中，丁磊和贾克明，那都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跟着刘格平革命造反的大人物，他有一种即将见证一次伟大的革命行动的冲动和亢奋。

随后，贾克明从那沓子公用信笺上，扯下那份盖好章子的重要文件，让宋伟把这份重要文件装进贴身军用挎包，离开刘格平家，又乘车直奔东缉虎营路北的省总工会大院。这里是陈永贵、李顺达、解悦这几位劳模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所在地。贾克明跟宋伟要出那份文件，让宋伟在楼下等着，自个上了楼。不久后下来，又与宋伟坐进车内，与省城的好几家群众组织做好联系、布置。到其他组织与其头头见面时，贾克明就是口述总指挥部的命令了，有时也让宋伟取出那份文件来，让对方看上一眼。一场将在晚上进行的革命行动，就这样由丁磊布置，由贾克明具体安排妥当。

有必要说说“山艺造”这个组织了。它的全称，是山西文艺界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部就设在太原五一广场东侧的省文化局红楼内。（“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始，省文化局升格为省文化厅）“文革”一开

始,省文化局就成了重灾区。局党委支持的官办红卫兵组织,将省文化局戏研室的石丁、贾克、王易风等一批老戏剧专家,全打成了牛鬼蛇神。戏研室里还有一些年轻的专业干部,他们认为,文艺黑线的主要领导者不是这些人,充其量他们是执行者之一,眼看着他们过去喊老师的这些老文艺家们被专政了,为了革命,也为了自保,大家推举王东满领头,成立了省文化局红旗战斗队,王东满成了队长,王智才、赵尚文、张文革、孙葳葳、张乃兴、郭桃六人为队员。这个战斗队认为文艺黑线的主要责任是局领导,贴出大字报,将造反矛头对准文化局的主要领导。参加这个战斗队的人越来越多,省文化局当时有七八个下属单位,特别是其所属的山西新华印刷厂、“七二五”印刷厂、山西电影机械厂等,都有很多干部、职工、工人成了这个组织的忠实拥护者。王东满在“文革”结束后,曾被选举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作家书画研究院院长、山西省老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是享誉全国的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他当时带领的红旗战斗队里,一些骨干成员,在国家改革开放后,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者,获得声望者不少,此处不赘。这个红旗战斗队虽然没有参加红联站,却是坚决支持红联站的组织。省里面1·12夺权后,红旗战斗队这些年轻的干部,对社会问题,与红联站的学生们依旧观点一致。于是,在红联站的协助下,他们和省话剧团、省歌舞团同观点组织出面,联合省文化局下属单位观点相同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全省文艺界更大的组织,叫做山西省文艺界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山艺造。

山艺造没有加入杨承孝领导的那个夺权总指挥部,在社会上又和红联站站到了一起,成为红联站的盟军,这恐怕是丁磊要捣毁这个组织的原因。杨承孝在夺权总指挥部是总指挥,可大印却由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掌着。丁磊要捣毁山艺造,不用杨承孝,而用贾克明,原因何在?丁磊和贾克明已谢世,内中原因现在只能分析了。杨承孝在文艺

界插不上手，砸了山艺造，怕也统领不了文艺界。而贾克明则不同了，当过文艺兵，爱文艺，懂文艺，日后靠贾克明统领省城文艺界，全心全意支持刘格平，恐怕是丁磊策划这次行动的本意。

当天晚上，贾克明带着宋伟，坐吉普车来到五一广场主席台后面。贾克明坐在车内指挥，由他的一位战友、太原化工厂的年轻工人李学东具体调动，现场发令。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新总部的工人们、省体工队某个组织的运动员们、省歌舞团一二八战斗队的演员们、山西大学八一四战斗队的大学生们、还有山西省戏校闯创战斗队的学生娃娃们，对山艺造总部突然发起围攻，并冲进大楼，将住在楼内的红旗战斗队的几个单身汉如王东满、王智才、刘正心等人的宿舍全部抄了个底朝天，并将王东满等人，分别关押在几个房间。他们对大楼内上下几乎所有的办公室都打砸抢抄，连人事处的人事档案也未幸免。直到楼上楼下被打砸得一片狼藉，贾克明才下令撤兵，带着宋伟离开五一广场。就在这天晚上，“砸烂山艺造的革命行动好得很”、“山艺造是牛鬼蛇神大杂烩必须砸烂”等大标语，贴满了五一广场四周。署名不同，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署名的居多。

山艺造总部被突然袭击之后，当天夜里，山艺造的主要领导即集合人马，赶到省党的核心小组去报告情况，诉苦告状。还把省文艺界对立面的几个主要头目也强行带去。核心小组的副秘书长刘志兰代表省党的核心小组，接见了山艺造的主要领导和几个下属单位组织的头目，听了汇报，当即表态：这种打砸抢行为是错误的！一定要责成总指挥部查清此事，严办肇事者！并当面严厉斥责了山艺造对立面组织的两个主要头目。

刘志兰事后如何向省党的核心小组汇报此事？刘格平是否知道此事的始作俑者是他的夫人？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事情的发展，是3月11日，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省城体育馆召开群众组织大会，贯

彻省党的核心小组对 2·26 反革命打砸抢事件的处理决定。作为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杨承孝没有出席，主持会议的，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贾克明和一些群众组织的领导，都坐在主席台上。他的保镖和秘书、太原五中的初二学生宋伟，也坐在贾克明身边。当丁磊传达了省党的核心小组的意见，并代表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 2 月 26 日晚上打砸山艺造是一次反革命事件时，场下一阵哗然。宋伟当时就吓坏了，由不得双手紧紧捂住背着的那个军用挎包。由丁磊和贾克明一道起草，由他天天紧跟的贾司令亲笔写下，再由丁磊盖上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大印的那份文件，此时还在他的包里装着呀！事情怎么就这么变得快啊！他看一眼贾克明，他的贾司令面色冷峻，毫无表情。还有更可怕的呢。丁磊又代表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揪出 2·26 反革命打砸抢事件的组织者和肇事者、现行反革命分子李学东。于是，也坐在台上的那位年轻工人李学东，立刻被早已布置好的几个人反拧双臂，当众押下主席台，不知押到了何处。普通群众总是替罪羊，看到这里，宋伟吓坏了，出了一身冷汗。会后，贾克明把宋伟还装在包里的那份文件匆匆要走了。这位太原五中的初中生，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跟随了两个多月的贾司令，不敢再担任保镖和秘书的角色，继续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下去了。他开始做起了消遥派。

宋伟年逾花甲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当时是一个不满 16 岁的少年，是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这件事对我确实是一次摧毁性的致命打击。”将崇高的革命理想，承载在现实的革命中时，宋伟所尊敬的现实中的大人物的行为，让他感到失落和害怕了。原来，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丁磊这种人物嘴里可以随便说的一句话呀！

对“文革”的反思，并不是只发生在“文革”之后，也并不是只发生在成年人身上。此类故事太多，不再赘述。

【2】丁磊组建起红总站

刘格平和张日清，这两位山西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在红色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就坐不到一个板凳上了。

刘格平常常在和造反派组织的领导谈话时，时不时地用很不满意的口气说到张日清：他身兼十八职，还嫌权小，工作上也不懂得尊重领导。

那言外之意明白得很：你们看看他把我往哪儿搁？你们要明白我才是山西的第一把手嘛！

为了支持执掌了山西大权的丈夫，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在夺权后，比夺权前更忙碌了。她原本是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处的一名普通干部，丈夫一夜间由一名副省长变成了山西的党政一把手，她也变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为了保卫丈夫刘格平坐稳江山，丁磊采取了一个很有眼光的部署，她要拉起一个跨行业的大组织来，为丈夫组建一支嫡系部队。于是，在1967年的4月初，一个名曰山西省批判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简称红总站）的跨行业大组织宣布成立了。起初，丁磊让杨承孝当总指挥，但杨承孝有勇无谋，难以服众，便又让黄锐庵当总指挥。黄锐庵一介书生，也非帅才，丁磊最后才选中了郝庭云。郝庭云“文革”前从山西大学物理系毕业，在省电业局当技术工人。“文革”之初，对单位党支部书记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革命，后来起来造反。成了全省电业系统红色造反者联盟的总指挥，是全力支持刘格平的群众组织头目。郝庭云确有帅才，他将省直系统财贸兵团一把手周永安、省委党校红色风暴兵团一把手李理、省体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团一把手薛育华、西山矿务局矿山烈火兵团一把手沈建勋，全安排成副总指挥。这些组织，全是兵团与红联站的对立面，于是，一个与兵团、

红联站可以抗衡的跨行业大组织便形成了。红总站的总部,就设在原省委大院后面的排房里。红总站的骨干人物很多,有省人委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的黄锐庵、太原工学院永红的高翔、山西大学8·14的朱永成等。杨承孝的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成了与红总站并肩作战的主力部队,而红总站的核心人物却是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名义上,成立这个大组织是为了大联合,实质上是刘格平的夫人出面,要组织起一支覆盖全省、坚决支持刘格平的革命造反队伍。

原先想把兵团也联络进来,丁磊就曾派人找过刘灏,但遭到了拒绝。刘灏说了:“中央文革小组都号召要归口闹革命了,你丁磊现在成立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想干啥?”当然了,还有其他原因。首先,由兵团冶金第一团分裂出去的杨承孝替丁磊呐喊;那个郝庭云在电业系统拉起的电力兵团,和他组建的红色造反者联盟,又与刘灏的兵团唱对头戏;还有那个由黄锐庵在前台当司令的东风革命造反兵团,里面不都是些原先死保“黑省委”的省委机关干部吗?刘灏对这三个人早有看法,岂能与其联络?其次,在刘灏心中,天真地认为全国各地都开始夺权了,革命委员会这个新政权一成立,文化大革命不就该结束了吗?再说了,3月19日,中央刚刚发了一个《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这不就是要搞复课闹革命了吗?一旦学校复课,推迟了的高考不就该进行了吗?他这个高三学生,不也就该踏进大学开始另一种人生了吗?那时的中学生们,特别是高三的中学生们,不知有多少天真的脑瓜里,还在充溢着这种想法。

丁磊组建的这个红总站没有联合了兵团,想联合红联站那就更没门了。红联站向刘格平和杨承孝反夺权没有成功,但内心并没有臣服了刘格平和杨承孝。他们要修正错误,还要继续革命和造反,怎么能归顺到你红总站名下?特别是红联站的领导们自认为是大学生,当然认定他们要比二级半电焊工杨承孝和中学生刘灏高明。他们也确实转弯子快,动手也快,命令一些下属组织在基层单位抓紧夺了权,

在向省委夺权中没有比得上杨承孝和刘灏，但红联站随后造反夺权的风头也不小。原先人多势众的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的总指挥张志安入狱了，从而也失却了诗人般的浪漫。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被定为反动的保皇组织了，大旗既倒，下属组织开始纷纷易帜，如张建国被抓后的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样，下属组织或投奔红总站，或投奔兵团，或投奔了红联站。山西当时最大的两个工人组织工人联合会和山西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前者保省委，后者反省委，观点不同，结局相同，全是头头被抓，组织解体。山西的各派革命造反群众组织，正在重新整合之中，由省城太原而波及全省各地。骤然间，全省便形成了这种由红总站、兵团、红联站三大政治派系组成的新局面，正如中国历史上三国鼎立的局面一般。小的组织依然有，但大多都投奔在这三个大组织的属下，即便依旧自立门户者，也以观点划分，或称自己是兵团派，或称自己是红联站派或红总站派。

这三个大组织虽说都是支持山西新政权的，但兵团司令刘灏，那是绝对听袁振的，红总站是由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支持成立的，自然是刘格平的势力。红总站的干将杨承孝，此时是两边倒。一方面成天价往袁振家跑，为的是和刘灏平起平坐；另一方面又通过丁磊，希望牢牢地将刘格平作为自己的政治后台。唯有红联站，在这三足鼎立中，还没有得到山西新政权中革命领导干部的明确支持，相对处于弱势。处于弱势的红联站，在山西省委党校大学生段立生的带领下，在寻找着重振红联站大旗的机会。

【3】红联站揭发杨承孝是狗崽子

红联站里的大学生们，依旧自认为是山西最正宗、最革命的造反派，至于刘灏和杨承孝，他们的组织岂能与红联站相比？于是，红联站

中有人要在刘灏和杨承孝的政治背景上,下点特殊功夫了。几份揭发刘灏和杨承孝出身有问题的材料送到了张日清办公室。

支左一杆旗张日清由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一跃而成了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实权派副主任,正是大权在握。他领导下砸烂公、检、法后成立的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根据红联站一些群众组织的揭发,开始调查起堂堂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刘灏,还有那位1·12夺权的总指挥杨承孝来了。刘灏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那可是代代红,说他是“狗崽子”,分明是诳言妄语。但杨承孝就不同了,红联站的传单都满大街飞了,揭发这个杨承孝在鞍钢上班时就经常旷工,打架斗殴,还常常乱搞女人,更有在当时来说能“镇住人”的材料,杨承孝的生父,竟然是国民党时代某警察署的一名反动警官!龙生龙来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杨承孝原来是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呀!在你这根反革命的藤上,还能结出好瓜来?

这传单是李辅领导的七一公社印制的。十三治有一名叫李希哲的职工,在公司的人事劳资部门工作过,后来到基层做了治安工作。看到杨承孝造反,他想不通,明明是个坏人,怎么一下子成了英雄了?杨承孝的家庭和个人情况他了如指掌,到哪里去揭发呢?他认为省委机关的革命造反组织最可靠,就到省委机关七一公社,找到李辅,还送上了那份揭发材料。为此,此人在日后被杨承孝抓走并囚禁,在一次拷打中,杨承孝打开囚室的窗户,对李希哲说:“给你一条出路吧!”说着,将其推下去坠楼身亡。李希哲死了,李辅和他的七一公社,也成了杨承孝的眼中钉、肉中刺。杨承孝下令抓李辅,李辅得到消息,为了避难,只好先躲回老家应县,避免被杨承孝抓去。

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文革”那个年代,党内的纪律早已名存实亡,张日清调查刘灏和杨承孝的事,还有李辅印传单的事,杨承孝能知道了,刘灏岂能不知?刘灏给袁振诉苦,少不了受到袁振的好言

安慰。杨承孝到刘格平和袁振那里就不仅仅是诉苦，而且是告状了。在得到刘格平和袁振的安慰后，这个东北汉子也就气更粗而胆愈壮，对部下说：“刘格平和袁振都是支持我的，张日清这家伙支持红联站那帮秀才们，暗中整咱们决死纵队的革命造反派，人家刘格平和袁振两人都很不满意呐。有他们支持，我杨承孝不怕他张日清！”

张日清呢，更不怕杨承孝。在1·12夺权中，杨承孝是总指挥，宋捷是副总指挥。经过调查，刘灏根红苗正，没什么问题，但有时说话大大咧咧，不象宋捷稳重。张日清这位军区政委，堂堂少将，自有一番谋略，他喊来了兵团的第二把手宋捷，对他说：“社会上说我支持红联站，不对嘛，我也是支持你们兵团小兵们的嘛。眼下就有两件事，让刘灏出面办，可有人揭发过刘灏，虽然没查出什第问题，我怕让他办这两件事不妥。再说了，你是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这可是关系到山西红色政权纯洁的大事呀。”宋捷是聪明人，看张日清的一脸严肃劲和神秘劲，忙洗耳恭听。张日清便低声细细道来。第一件事，是让宋捷找见卫恒夫人张坤秀，让她写一份杨承孝去卫恒家抄家抢劫东西的材料。第二件事，是让宋捷想办法弄到杨承孝的指纹。第一件事是针对的杨承孝，可第二件事要干啥呢？张日清也向宋捷交了底。原来张日清派人去东北公安部门一查，杨承孝在东北果然有案底，但杨承孝夺权后，将自个名字写成了杨成效，这个杨成效，是不是就是东北有过案底的那个杨承孝呢？必须用现在这个杨成效的指纹，与当年案底档案中那个杨承孝留存的指纹核对一下，才能确定眼下山西的这位夺权总指挥，是不是和当年在东北蹲过监狱的那个罪犯是一个人。

宋捷受到山西红色新政权第二把手的如此信任，立即领命而去。张坤秀和她的孩子们早被赶出家门，挤在一间既破且黑的小屋里栖身。见夺权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宋捷来找她，要她写揭发总指挥杨承

孝的材料，天晓得这事里面有什么阴谋诡计？她一言不发，一字不写。宋捷无奈，去给张日清回复。张日清给眼前的这位革命小将出主意说：“你是省革委常委，你得说你是代表省革委，要调查杨承孝的问题，无论如何，你得给我拿到张坤秀写的材料才行。”宋捷又去找张坤秀，费尽口舌，张坤秀终于打消了顾虑，将杨承孝领人来家中抄家，抢走了什么东西，以及见到卫恒遗体时，发现丈夫身上丢了些什么东西，一一写出，交给宋捷。宋捷向张日清复命。又说：“第一件事办妥了，可杨承孝的指纹，我可不知道怎么弄？”张日清说：“你找咱们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老郭去，就是原省公安厅的郭科长，我已经和他安排好了。”经过这位老公安郭科长指点，宋捷依计而行，将杨承孝约到了并州饭店一个包间喝酒。东拉西扯，无非是眼下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山西的形势又是如何云云。席间，杨承孝出去解手，那位郭科长带人迅速进入包间，戴着细布白手套，将杨承孝的杯中残酒，倒入准备好的一只同样的杯内，再将留有杨承孝指纹的那个酒杯取走。张日清曾要求宋捷，这两件事既要办好，又要烂在肚子里。这事儿，宋捷保密了许多年。

张日清既支持红联站，又和兵团的宋捷暗中有联络，无非是要搞掉杨承孝，对刘格平大权独揽的权力进行抗争。张日清也与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们公开流露过自己的情绪：“不是我要大权独揽，是他（指刘格平）什么也不干嘛！就连每天的《山西日报》清样，都得我亲自过目，他就是懒得看嘛！”

一文一武，一个是为揪出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 61 人叛徒集团立下大功，不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还被人称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另一个是全军第一个站出来领导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而且支持了革命造反派夺权，被林彪副主席赞誉的“支左一杆旗”。刘格平这位“毛主席的好学生”，与张日清这位“支左一杆旗”，在山西党的核心

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部,渐渐地明里暗里争斗起来了,谁都不服谁。二虎相斗,各有支持者和拥护者。偏偏在这种形势下,发生在山西高层和兵团内部的两件事,更加促进了刘格平和张日清的矛盾,引发了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再次较量的大派斗。

【4】3·26 报告和炮轰刘志兰

先说第一件事。

3月下旬,中央文革小组叫刘格平进京汇报工作,刘格平便带着张日清和陈永贵到了北京。3月26日,那位与“黑省委”决裂,坚定不移地站到刘格平与张日清一边的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五人大字报”的署名者之一刘贯一,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一次由各群众造反组织大小领导人参加的大会,作了一个“重要报告”,其要害,是说山西省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斗、批、改(系《十六条》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之后,具体说,就是从后半年开始,就要解散各种



七月会议后太原工学院红心战报刊出红总站造反派残酷批斗陈守中、刘志兰夫妇的照片

群众组织，同时也要结束山西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会上作了如此报告还不算，这位曾经出版过长篇小说，能写会说的刘贯一，在会后又让人将他的这个报告印成了小册子，下发到各群众组织学习，其导致的结果，首先是惹恼了一些筹划组建红总站的骨干人物，如丁磊、郝庭云、黄锐庵、杨承孝等。刘贯一曾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过话，反对他们再组建起一个跨行业的社会大组织。这种态度与丁磊和她的战友们的想法完全是背道而驰。我们红总站刚刚筹划成立呢，结束了“文革”，我们这些人干啥？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都没有说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呢，你刘贯一这不是狗胆包天了！红总站的筹备者们如此，兵团和红联站对刘贯一的这种说法，也是一肚子恼怒。我们刚刚跟着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你刘贯一就敢结束文化大革命？刘贯一的报告也传到了北京，刘格平让刘贯一立即赴京统一思想。

再说第二件事，即炮轰刘志兰。

炮轰刘志兰的事件，当时扑朔迷离，许多年后，一些“文革”经历者还是说不明白此事如何发端。现在，我们先讲一位当事人的故事吧。

这位当事人叫宋守慧，1967年时，刚刚30岁，在省劳动厅任机要秘书，还是1·12夺权前厅里的旧文革小组成员。当时厅里干部们有不太一样的观点，但没有成立两派战斗组织。4月13日下午5时多，省革委办公厅通知，叫劳动厅派一人去丁磊家开个会。宋守慧就去了。丁磊在家里召开会，到会的有二十来个人。丁磊讲话很简单，让到会的人回去马上组织人贴大标语，从当晚到明天上午的10点前，每家都得刷够10条。内容就是一句话：“万炮齐轰刘志兰。”大多数人听丁磊说完就走了，只有三四个人留下，其中就有宋守慧。他是个爱动脑子的年轻人，第一次见丁磊，迟走一步，就是要问丁磊：“为啥要万炮齐轰刘志兰？”

丁磊大声反问他：“你是那个部门的？”

“我是劳动厅的。”

丁磊声色俱厉地逼问：“你知不知道左权是叛徒？”

“我不知道。我从小就会唱‘左权将军家住在湖南醴陵县，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丁磊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道刘志兰是左权的老婆？”

“这，我更不知道。”

丁磊不耐烦地说：“左权是叛徒，刘志兰那时是他老婆，刘志兰还能在核心小组工作？好了，好了，你回去布置去吧。”

宋守慧回到厅里，却没有布置。第二天，也就是4月14日早上，他叫上厅里另一个干部李龙义，骑两辆自行车到西门外市委宿舍去找刘志兰。这时，东风兵团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已经贴出来了。两人都不认识刘志兰，好不容易才问到刘志兰住处，是个平房院，还有站岗的警卫员。刘志兰听说有人找就从屋里出来，说：“我就是刘志兰，你们有啥事？”

宋守慧说：“我们就问你一句话，如果左权是叛徒，你就点点头，如果不是，你就摇摇头。”

刘志兰一听就急了：“谁让你们来的？”

宋守慧就把昨天去丁磊家开会的事说了一遍，又说：“我们来，就想弄清左权是不是叛徒？”

刘志兰当下就哭了，瘫在地上，挥泪说：“你们去问问毛主席，问问周总理呀，看看左权是不是叛徒……”

这时陈守中从里屋出来了，一边往起拉刘志兰，一边向两位年轻干部摆摆手说：“你们走吧。”

出了院门，宋守慧就对李龙义说：“左权真要是叛徒，刘志兰绝不会那样失态；左权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肯定不是叛徒，再说，即使左权

有问题,也不能连累老婆呀。”两人达成共识,回到厅里,就组织机关干部刷出两条大标语,内容一样,即:“东风兵团万炮齐轰刘志兰是个政治大阴谋!”署名是“劳动厅革命群众”。

接连几天,东风兵团司令黄锐庵,带着雷忠勤、雷维林几名主力队员找宋守慧辩论,但宋守慧就是不改观点。不但不改,还建立起个计委系统的五七红旗战斗队,参加了红联站。

宋守慧给我讲他的这段故事时,反复强调:“我‘文革’中就做了这么一件事,以前不认识丁磊,也不认识刘志兰,后来和她们再没有什么来往。我当时也不知道兵团那晚弄出个4·14决议,后来才听说兵团在这件事上,和红总站闹到一起了。”

那么,兵团的4·14决议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年的始作俑者、业已花甲之年的李金渭先生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李金渭当时是太原六中32111公社的主要领导人,和刘灏一道发起成立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也是袁振安排进市革委的常委。下面,我将李金渭这篇回忆文章原文照录如下:

刘志兰和32111的几个负责人关系都不错。在1966年10月,我、史纪礼、刘大康通过为袁振翻案认识了刘志兰及其丈夫陈守中。山西省1967年1月12日夺权前后我们和刘志兰接触很多。1966年年底社会形势紧张,刘志兰总希望我们经常去她家。时间长了就比较熟悉了。刘志兰特别喜欢刘大康。为了搞清省委在华北局会议上和袁振斗争的问题,66年11月刘大康和我去北京住在华北局,刘大康对我讲,刘志兰和陈守中是现在我们接触的干部中最好的领导干部,袁振有时偏袒学生,陈守中是真正爱护学生,刘志兰参加过“12·9”运动,文化程度高,政治水平高。现在毛主席号召我们斗私批修,整风,我们应该多听刘志兰和陈守中的,回太原后请刘志兰给我们作报告。刘志兰

陈守中对我也很好，我从农村出来，那时连香蕉橘子都没有见过，是刘志兰教我怎么吃的。陈守中在市委大院的口碑非常好，任太原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时我是市革命委员会常委，陈守中很相信我，让我当市革委第三办公室主任，负责文教宣传，负责太原报社的班子建立和复刊。

刘志兰对华北局书记李雪峰意见很大，她认为李雪峰是华北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1967年1月12日山西夺权后不久刘志兰对我讲，李雪峰在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打成伸手派野心家，把河北省委的林铁，内蒙古的乌兰夫打成黑帮。在北京市大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山西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李雪峰支持的，我们应该彻底打倒李雪峰，清算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67年春节过后，刘志兰就揭发李雪峰的事对六中32111进行了具体安排。首先是收集李雪峰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材料。刘志兰“文革”前是省委农工部负责人，对各县的情况熟悉，她说绛县县委书记周明山是李雪峰亲自抓的假学毛选积极分子，他在华北局会议上跟着李雪峰和山西省委整袁振非常积极，是李雪峰和山西省委的打手。刘志兰认为收集到周明山假学毛选真跟李雪峰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材料很重要。绛县县委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对周明山和李雪峰她都清楚。她向我和六中32111组织的张晓合、刘建才等详细做了介绍。根据刘志兰的指示和介绍，六中32111组织和兵团其他组织在67年春节后派了好多人次去绛县收集周明山假学毛选真跟李雪峰反毛主席的材料。收集到的材料我们都交给了刘志兰。

大约在67年4月上旬一天，刘志兰把我和刘大康叫到她办公室说李雪峰在北京市镇压学生运动被中央撤了职，现在李雪峰又到天津去了，你们到天津去同天津的造反派联合起来炮轰他，揭露他。刘志兰给了我们一捆子印好的传单，又给了300元钱做路费。临去天津我征求袁振的意见，袁振支支吾吾，不置可否。

其实我们对炮轰李雪峰原本不太积极。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山西省1月12日的夺权，承认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和太原市革命委员会是合法的。我们支持的袁振、陈守中在省市革命委员会中担任领导职务，我们都翻了身，掌了权，已不受压了。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但刘志兰是山西党的核心小组副秘书长，又和我们很熟，我们也很相信她，就接受了她交给的任务。回学校后确定史纪礼和刘建才带人去天津炮轰李雪峰。

史纪礼、刘建才到了天津后迟迟没有行动，刘志兰很着急，几次要我催他们赶快行动。我在太原也不知道天津的具体情况，不好向刘志兰交代。和兵团司令部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又先后有刘灏、叶积凯、李改组、宋树训、刘大康等去天津。他们去了后结果仍然不见行动。后来史纪礼和刘建才等竟然在天津贴出支持李雪峰的大字报。刘志兰知道后非常生气，叫我赶快把他们叫回来。

史纪礼、叶积凯、刘建才回来告诉我，他们先到了北京，有的人北京一转车就去了天津，有的人就去中央文革接待站去了解中央对李雪峰的态度。从中央文革小组知道李雪峰去天津筹备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派去的，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到达天津时对此行的目的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大家住在天津一个纺织厂（这里是天津反李雪峰较厉害的单位）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就应该炮轰李雪峰，他是华北局的第一把手，华北各省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厉害，责任是李雪峰的，北京市委对抗毛主席就是李雪峰的原因。有的说中央文革小组的话我们应该听。这时一个红旗杂志的记者找到了他们，一再提醒他们不要炮轰李雪峰，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多数人的看法是刘志兰叫我们炮轰李雪峰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我们不能听她的，不能给李雪峰贴大字报。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人还在为炮轰和不炮轰李雪峰争论不休
-318-

时，天津的大街上却出现了落款山西兵团司令部“炮轰李雪峰”的大标语。这一情况促使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人必须立即表态。他们就写了支持李雪峰的声明，落款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抄成大字报。在向这家纺织厂索要浆糊准备贴出去时遭到强烈反对，他们不仅不提供，还不许在他们这里再住下去。宋树训和刘建才等人就在天津市最热闹的地方劝业场买了浆糊把声明贴在劝业场的大门上。

声明贴出去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映。李雪峰知道后派人对史纪礼、刘建才等人表示感谢。史纪礼等对感谢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只是按中央和毛主席的路线办。正好天津发生了地震，马路两边楼房上不时有东西掉下来，史纪礼、叶积凯认为再呆下去既没有必要又不安全，于是就带着大部分人马回太原了。也有部分学生没有立即回太原而是被邀请到天津市政府去了。天津市政府组织他们去新港等地参观游玩了几天后才回来。

史纪礼回来后同我讲了在天津的情况。史纪礼对刘大康听刘志兰的话主张炮轰李雪峰不满意，说刘大康一回来就去了刘志兰家汇报，他没有去，他要我和他去刘志兰家汇报。4月13日晚我就和史纪礼去了刘志兰办公室。刘志兰秘书让我俩在楼下会客室等，刘志兰正在楼上接待客人。当时我们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想把情况向她说明，把差旅费向她交代了就完事了。可是左等右等大约等了两个小时刘志兰一直不见我们，我俩有些不耐烦。这时看到五中几个学生从楼下下来，他们就是在天津和我们持相反观点贴炮轰李雪峰大字报的人。这使我俩很气愤，马上拔腿就走。刘志兰的秘书随即追了出来叫我俩回去，我俩不理他，径直走出省革命委员会大门。省革命委员会马路的对面是工农兵医院。楼上有兵团的办公室，我俩就去了楼上办公室。正好有兵团司令部的几个人在。我俩就把对刘志兰的不满向大家讲了，大家议论了一会儿认为刘志兰派我们去天津是错误的，是破

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应该把这事情揭露出来进行批判。我们当即写了炮轰刘志兰的“4·14 决议”，并让兵团司令部的工作人员电话通知下属单位上街贴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当我们把该决议抄成两张大字报时已快天亮了，一份由其他人去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去贴，一份由我和史纪礼拿上贴在省革命委员会门口。

贴完后我和史纪礼回到学校时已天亮了。到了中午，袁振的儿子袁南征叫我和史纪礼去他家。一进门袁振就批评我们说炮轰刘志兰是胡闹，要我们立即停止。我和史纪礼不同意袁振的意见，同他进行了争辩。

我俩从袁振家出来骑着自行车到街上转了一大圈，看到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已贴满了主要街道，心里很是惬意。唯一不愉快的是贴在市革命委员会门口的那张 4·14 决议的落款兵团司令部被人改成野心司令部。我隐隐感到可能要在太原市掀起大的冲突。果然不几天支持刘志兰的大字报大标语就贴出来了，有的大字报还说 4·14 是个大阴谋，要求坚决揪出 4·14 的黑手和黑后台。省核心小组成员和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日清、刘贯一，市革委主任陈守中都出来讲话支持刘志兰。不几天后，在支持和炮轰刘志兰这一问题上群众组织很快形成了两大派。以兵团和红总站为一派的炮轰刘志兰，以红联站为首的一派支持刘志兰，认为袁振是炮轰刘志兰的后台。

炮轰刘志兰的大标语是贴出来了，但刘志兰到底有哪些问题，有多少问题我们也心中无数。我们只能就周明山和李雪峰的问题说刘志兰的不是，其他就不知道了。刘贯一和张日清一次次表态和讲话支持刘志兰，使红联站一派支持刘志兰的劲头更大，调子越来越高，“袁振是 4·14 的黑后台，袁振是叛徒”的大标语大字报越来越多。袁振开始也压我们，不让我们反刘志兰，现在也由不得他了，他也成了红联站炮轰的对象，省核心小组五个人中三个人明确反对他。他在核心小

组内显得孤立。4月初中央把核心小组组长刘格平，副组长张日清，和成员刘贯一三人叫到北京开会。三人在北京签名来电支持刘志兰，袁振接到来电感到公布后对他非常不利，要求在来电上签名，却被否定，他就起草了一个声明，内容同三人的来电一致，以刘格平、张日清、刘贯一、袁振四人的名义向社会进行了公布。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三人来电，四人声明”。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们感到问题的严重，必须把刘志兰的问题搞清，否则我们倒和中央不一致了。为了搞清楚刘志兰有没有问题，我们32111派出几路人马到刘志兰过去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调查。调查了包头后才知道刘志兰和陈守中在包钢工作时就和李雪峰有了矛盾，李雪峰利用四清运动在包钢整过刘志兰和陈守中，刘志兰反对李雪峰是有历史根源的。有的同学还调查到刘志兰和彭德怀的关系。有的人也调查到刘志兰的家庭出身不好。以当时的观点把对刘志兰不利的材料统统整理和公布出来，并向中央文革小组上报。

大约在4月18日省革委派出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陈永贵，我是成员。到北京后作为代表我列席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周总理和江青也到会。与会人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只有一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大概是当时代表中我年龄最小，大家让我递给周总理，总理的钱秘书接了大字报。江青让身边人当场把大字报展开，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呼声。我抓紧时间对钱秘书说袁振和山西的问题，我要向总理再一次汇报袁振的问题。钱秘书说总理知道袁振，支持袁振，其他问题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组讲，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负责山西问题。

67年5月1日，山西省的部分代表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庆祝活动。又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上我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并和毛

主席一起照了像。在余下的时间里除了在天安门欢呼激动外，我在天安门上开始转悠。这时我碰见一个人样子长的非常像袁振，我问他是哪里人，在哪里工作。他说是山东人，是《大众日报》的记者。我说我们山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袁振长的很像你。他说他就是袁振的弟弟。我一下感到和他的距离近了许多。我就拉上他先后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向他们讲了山西省的情况，特别是袁振的问题。他们都认为袁振在华北局向山西省委做检查不能说是叛徒，尤其是王力和关锋认为袁振年轻有为，懂工业，现在负责山西省的工农业生产，要支持他工作。当天晚上我把同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讲话的情况电话告诉了袁振。

5月7日山西代表团从北京回到了太原，省革委在五一广场召开了迎接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们传达了“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介绍了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好喜讯，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的谈话。在太原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响，使4·14反对刘志兰的运动进一步升温。

当时，刘格平和张日清去北京向中央汇报山西的工作，刘贯一做了那个报告后也赶去了北京。后来有个传说，说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他们时，江青说到了刘志兰，说“刘志兰不是个好人。”当时有小道消息，说丁磊在家中接到了刘格平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到了江青的这个态度，所以丁磊才组织炮轰刘志兰。那时，各路造反组织的大小领导，在刘格平家中出出进进，天晓得谁会传出什么小道消息来？有无此事？如今已难以核实。但有一点却是事实，那就是山西红色政权里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秘书长的刘志兰，组织中学生们要炮轰李雪峰时，她一定没想到，她也成了别人要炮轰的对象。组织炮轰她的人，竟是山西红色政权第一把手刘格平的夫人丁磊。“文革”中可以怀疑

一切,打倒一切,一些领导干部的私欲,在紧跟伟大领袖革命造反旗号下的膨胀,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中学生们。

还有一种说法,丁磊组织东风兵团炮轰刘志兰,既是为了她在省党的核心小组内取代刘志兰,也是为了搞垮红联站。红联站反对1·12夺权,被丁磊视为反对派。夺权后,刘志兰和红联站的几个领导来往很多,丁磊认定红联站投靠了刘志兰。所以,丁磊又安排太工永红的领导高翔,指挥他的人马,刷出了大标语:“刘志兰是太工红旗和红联站的黑后台。”

那个年代的群众组织,表态是重要的,弄清事实完全可以放在表态之后。兵团和红总站的嫡系组织都炮轰刘志兰了,而且将刘志兰定为红联站的黑后台,段立生立即召开勤务组紧急会议,决定红联站立即刷出大标语:“炮轰刘志兰是个政治大阴谋。”前面提到的当事人宋守慧,虽然在反对丁磊炮轰刘志兰后参加了红联站,但和段立生一直不认识。红联站的领导们,当时并没弄清刘灏的兵团司令部何以弄出个4·14决议?黄锐庵的东风兵团何以要炮轰刘志兰?他们和宋守慧一样,只是一种直觉,或者说,是一种政治选择。

兵团和红总站炮轰刘志兰的联合行动,如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山西新政权中的矛盾裂变,引发出山西一场新的政治动荡。兵团和红总站这次都将斗争矛头对准刘志兰,继而对准了刘(志兰)、陈(守中)、刘(贯一)和张日清。需要指出的是,省城三大派由此而发生的相互攻讦中,唯有对最高指示“永贵好”的宣传是一致的。这“永贵好”分明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山西代表团的团长陈永贵握手时的一句问候语,但当时这三个字却变成了一种政治评语,使陈永贵在山西进一步成了真理的化身。我曾就此事问过李金渭,问他听到毛主席说“永贵好”了没有?李金渭告我,他不但没有听见毛主席说“永贵好”,连毛主席和他握手时说了几句啥话,他也没有听清。一来代表团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山西和上海两个夺权先进地区的革命委员会代表。后排左一为李金渭、中排左二为山西代表张银花、左三为大寨铁姑娘贾秀兰、左四为山西代表王银娥、左五为陈永贵。

的人们都在喊毛主席万岁，声音太大，加上毛主席那湖南话李金渭又听不明白，只看见毛主席嘴动，就是不知道对着他说了些啥。李金渭说，他当时在山西代表团中年纪最小，给周总理送那张大字报的事儿，大伙让他干，回来在五一广场上开大会，向全省人民传达受伟大领袖接见和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事儿，大伙还是让他干。代表团从上到下，人人都说听到毛主席那句最高指示“永贵好”了，他就传达了这句自个并没有听到的最高指示。李金渭有当年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见的照片，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刘灏也曾与我说起过4·14决议这件事，说他去了天津后又去了北京，对李金渭他们听上刘志兰的话去炮轰李雪峰，是持反对态度的。他根本没有想到，李金渭他们会弄出一个兵团的4·14决议来。这个“决议”一出来，就一下子把省党的核心小组内的矛盾公开到了社

会上,也把社会上不同群众组织间的斗争重新挑动起来了。

最急的是袁振。他听说兵团派人去天津揪李雪峰,就急忙找来刘灏和汤建中,让他们赶紧把去天津的兵团小将们叫回来,说李雪峰去天津可是毛主席定下的人选,岂能乱轰。可这些兵团小将们还没有全回来,兵团却贴出来一个炮轰刘志兰的 4·14 决议,接着又将刘贯一和陈守中这两名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也和刘志兰挂在一起猛轰,袁振对刘司令好一顿批评,表示他坚决不同意兵团这么干。可事已至此,六中 32111 公社这支队伍,可是刘灏麾下得力的部队,刘司令已经无法阻止这些战友们的革命行动了。

兵团搞出个 4·14 决议,虽然袁振在随后的“三人来电,四人声明”中也公开了自个反对炮轰刘志兰、支持刘志兰的观点,但还是被红联站指为 4·14 阴谋的“黑后台”。刘灏呢,他是兵团司令,自然被红联站认定为是 4·14 阴谋的“总策划”。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中刘格平是组长,张日清是副组长,其他成员是刘贯一、陈守中和袁振。在 4·14 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张日清、刘贯一和陈守中先将矛头对准袁振,而后刘格平又和袁振站到一起,将斗争矛头对准张日清和刘(刘志兰)、陈(陈守中)刘(刘贯一)。兵团一派中拥护 4·14 决议的人马,和红总站的人马一道,又把张日清指为“刘、陈、刘”的“黑后台”,说他们夺权后执行的是“没有卫、王、王的卫、王、王路线”。

在山西,从党的核心小组,到“红色新政权”省革命委员会,再到三大派群众组织,一场新的大分化、大斗争、大混战开始了。因炮轰刘志兰,兵团和红总站滚入了同一阵线。再往上说,刘格平投靠了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一伙,张日清则成了林彪树起的支左红旗。康生、江青一伙和林彪,虽然都在高居神坛的毛泽东掌控下,但他们绝非一个政治利益团体,双方都想在各省掌握实权,自然加重了刘格平和张日清的矛盾。被利用和被愚弄的,则永远是各派群众组织。

【5】4·14 决议引发新混战

兵团的4·14决议引发的混战很快升级。红总站马上就表态了，将大标语刷满了太原城。观点是明确的，坚决支持兵团的4·14决议。早就对张日清憋了一肚子火的杨承孝，率先又以决死纵队和红总站的名义，贴出了“坚决揪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黑后台张日清”的大标语。

红联站的观点大标语也马上贴出来了：“4·14事件是妄图分裂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的一个大阴谋。”上纲上线上到了这样高的份上，自然就还得表明另一个态度：“坚决揪出4·14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袁振。”红联站在当初炮轰“黑省委”时，就提出“怀疑袁振”和“澄清袁振”的口号，甚至认为袁振就是卫恒为舍车保帅而抛出来的“车”。他们认定兵团的这个决议，是袁振的主意。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当时的一份传单，最能说明他们既要和红总站斗争，又不愿意得罪兵团的心态。传单中这样写道：

四月下旬，正是举国上下掀起疾风暴雨般的大批大斗刘少奇、邓小平的时候，……各省、市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各种手法，掀起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山西的卫恒死党也拼命向年轻的红色政权反扑。他们利用刘格平、张日清、陈永贵等同志离并赴京的机会，乘虚而入，猖狂进行反夺权活动。4·14事件就是这种形势下的必然产物。一些危险人物“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于4月14日一夜之间，把“炮轰刘志兰”、“打倒刘志兰”的巨幅标语刷遍了全城。行动如此突然，口径如此一致，来势如此凶猛，可以断定，幕后一定有人策划布置。这里需要声

明，兵团小将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负责态度，自觉起来炮轰刘志兰，完全是革命行动。他们的 4·14 决议是革命的文件，同阶级敌人策划的 4·14 事件是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制造 4·14 事件的别有用心的人，绝不仅仅只要打倒一个刘志兰，而是从刘志兰身上开刀，打开进攻中共山西核心小组的缺口。他们表面上炮轰刘志兰，实质上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以刘格平、张日清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了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

看看，以派性来划分真理，兵团搞 4·14 炮轰就是对的，而红总站跟上搞 4·14 炮轰就成了大阴谋。

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的那些大学生们，在太原出现的这次政治动荡中，也开始了新的表态，他们和红联站形成了同一种认识，由当初支持刘格平，变成了反对刘格平的一支力量。

如果仅仅是李金渭等几位兵团小将，以兵团司令部决议的形式，弄出一个 4·14 炮轰刘志兰的决议来，无非是群众组织的一个行动。如果仅仅是三大派组织兵团、红总站和红联站围绕这个兵团的决议，互相攻讦，也无非是群众组织间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但不要忘了，那时的群众组织背后，各有大人物支持。袁振想平息兵团这个 4·14 炮轰刘志兰的决议，但木已成舟，六中的革命小将们已经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刘格平呢？虽然听说兵团炮轰刘志兰的消息后，与同在北京开会的张日清、刘贯一搞了一个三人来电，让在太原的袁振向社会公布他们支持刘志兰、反对兵团炮轰刘志兰的态度，但一回到太原，实际态度就变了。刘格平抓住兵团 4·14 炮轰刘志兰决议这个机会，依靠红总站并利用兵团，开始削弱张日清的力量。刘志兰和陈守中是夫妻，刘贯一和张日清都是陈毅元帅的老部下，是新四军的干部，两人在工作中总是一唱一和，除掉这几位政治对手，正是天赐良机。红总

站的领导黄锐庵、郝庭云、高翔等人，还有那位杨承孝，是他不断召见和吹风的对象。还有红总站的其他骨干们，原本就是丁磊的座上客，也成了刘格平不断召见和吹风的对象。张日清呢？在夺权后和刘志兰夫妇，还有刘贯一，一直相处甚好，反对兵团炮轰刘志兰的态度十分坚定。这一点，他和红联站不谋而合，自然也要常常交换意见。

于是，刘格平的一些讲话和张日清的一些说法，就被红总站和红联站分别贴到了太原的大街小巷。

红总站的大字报上说，刘格平指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自1·12夺权以来，执行的是一条没有卫、王、王的卫、王、王路线。”调子不高也不低，内中的帽子，却大的怕人。刘、陈、刘和张日清搞得热乎，他们如此，你张日清夺权后执行了什么路线，还用再细说吗？

红联站的大字报上说，张日清指出：“红总站是牛鬼蛇神的大杂烩。”这口气来得更冲。红总站的后台就是你刘格平和丁磊夫妻俩，你看看你俩和什么人搞到一起了？证据是现成的，杨承孝的那些材料，当然也以大字报形式公告于天下。

群众组织的不同政治诉求，往往为政治家们所用，成了政治家们不同政治诉求的代言。“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正是有意无意地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6】刘司令指挥失灵

作为兵团的司令，刘灏此时却迟迟没有表态。他心里作难啦。李金渭他们先是被刘志兰安排去揪李雪峰，后来又炮轰刘志兰的前前后后，他当时一点也不知道。后来知道了，他也没有能力用自己的观点影响他们，更没有能力用兵团司令的身份去阻止他们。刘司令过去遇事要请教袁振，现在遇事更得请教袁振，袁振现在的官职不比以前

小,既是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又是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袁振面对刘灏着急了:“六中的 32111 怎么能乱来呢?”袁振在这件事上被指成黑后台是冤枉的,他那态度明摆着:刘格平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嘛!我就是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的嘛!还用再对刘灏说什么吗?那意思明白得很,兵团一定要支持刘格平。然而,在保定时,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曾给了刘灏四条“父训”,其中最后一条就是“依靠解放军”。张日清不就是解放军在山西的代表吗?不但在山西是代表,张日清还是全军的“支左一杆旗”,具体到如何来“依靠解放军”,不依靠张日清还依靠谁呀?“父训”中的前三条看来好做到,这第四条眼下却不好办了。听上袁振的话表态支持刘格平,那兵团的斗争矛头不就对准张日清这个解放军的代表了吗?已经 19 岁了的中学生刘灏,此时身边既有一道革命造反的战友们,也有“汤高参”这样的幕僚,众说纷纭,各有各的道理。可他想想父亲的“父训”,应该支持张日清,再听听袁振的意见,应该支持刘格平。他一时还是拿不定主意了。毕竟一位是生身父亲,一位是自个拼死冲杀,保出来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呀。

从这一年 4 月份由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发动炮轰刘志兰,到兵团六中小将李金渭作为始作俑者贴出兵团的 4·14 决议,进而发展成三大派群众组织大混战的政局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山西党政第一把手刘格平的夫人,可以公开颐指气使地操纵群众,而当时的群众组织,也并没有什么纪律可言,兵团的其他领导,不通过他们的第一把手刘灏司令,也可以大行其事。另外,从上面引用的那张传单上,我们也能看出,当时的派性就是划分真理的标准:兵团小将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红总站炮轰刘志兰可就是“阶级敌人”和“别有用心”了。

刘灏指挥失灵,兵团的这个 4·14 决议,最终让兵团与红总站一下子滚进了同一个战壕。兵团的斗争大方向,看来是由不得司令刘灏

了。生米被做成了熟饭，刘灏不得不默认了兵团的这种观点。兵团终于站到了支持刘格平的一边，刘格平和他夫人丁磊，还有红总站领导们喜不自禁。郝庭云、黄锐庵各自命令手下、高翔和朱永成也全力出动太原工学院和山西大学的人马配合，满街刷出了大标语：“红总站和兵团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誓将4·14红色风暴进行到底！”杨承孝也兴冲冲让他那些不大会写字的部下，赶紧满大街去刷大标语：“我决死纵队誓与兵团战士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谁反对刘格平，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毛主席！”

1月份还想冲刘格平和杨承孝反夺权的红联站，曾落了个革命斗争关头犯了错误的下场，现在总算熬到时机成熟了。张日清正需要群众组织支持，红联站也需要借助“全军支左一杆旗”，既与刘格平也与1·12夺权总指挥杨承孝再决一次雌雄，于是在红联站总负责人段立生的领导下，这个组织态度明确地公开了坚决支持张日清的观点。虽说支持张日清公开了，炮轰刘格平却不便马上公开目标。红联站先将矛头对准杨承孝，又贴大字报，又印传单，揭发杨承孝的问题，看你刘格平支持这个“牛鬼蛇神大杂烩”有什么好下场！走了一步又一步，红联站又做出决定，让杨保明重新回到勤务组，虽不再担任第一把手，可还是红联站领导核心的成员。太工红旗这支队伍，也重新回到了红联站，依旧是红联站的中坚力量。理由是现成的：在山西1·12夺权问题上，红联站当时没有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是红联站勤务组的集体决定，不能让杨保明和他的太工红旗承担全部责任。最后，红联站炮轰刘格平的大标语，终于在太原的五一广场刷出来了。

兵团站到了支持刘格平一边，兵团内部也有人坚持站到了张日清一边。段建中与刘灏原先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是兵团司令部的政委，这时先在六中拉出队伍，组建起古田兵团，又要在兵团司令部重新举旗，坚决支持张日清、炮轰袁振、刘格平。在兵团内部，毕竟支持

刘灏的人多,段建中此举没有成功。这位革命小将后来参军到了外地驻防,也就脱离了山西“文革”的这滩泥淖。

虽然听了袁振的话,表态支持刘格平了,但 19 岁的刘司令突然觉得如今的兵团大军,可有些不太像一年前的兵团了。那时他的意志就是兵团的意志,包括袁振,很多事上还得听他的。现在呢,袁振重新掌权了,他得听袁振的。这倒没啥,问题是他的革命意志开始受到了阻碍,他想听袁振的,比如兵团的观点和红总站变的一样了,但兵团竟然也炮轰起张日清来了,袁振可没有让他这么做呀!堂堂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好像是在被上上下下簇拥着往前走,一点儿也由不了他似的。

刘灏后来向我回忆说:“我那时就像被推上了赌场,不赌也得赌。至于是输还是赢,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1967 年,按毛泽东主席的设想,是要在全国进行全面阶级斗争的一年。全国各地的群众造反组织,正充当着这种全面阶级斗争的生力军。在山西,即便没有革命小将李金渭他们的那个 4·14 决议,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依然会表现出来。兵团的那个 4·14 决议,只不过是一根导火索。

【7】老百姓总结的一句民谚

杨承孝支持刘格平,其实与当初投奔刘灏支持刘灏时一样,革命与造反的内容,舍“砸”字而莫属。

1967 年的春天,姗姗而至,光临了太原古城。不管省城各大派群众组织是支持刘格平,还是支持张日清,反正古城太原的街树又变绿了,气候也渐渐暖和了。4 月 29 日,杨承孝组织了百余辆大卡车,以他的十三治决死纵队举旗挑头,红总站的其他一些组织如太工永红、太

机四野等，也高举着战旗，浩浩荡荡，在太原街头开始了示威大游行。百余辆大卡车上全站满了支持刘格平的坚强战士们，口号一声声发自内心而响彻云霄：坚决支持刘格平同志！大白天折腾了整整一天，黄昏时继续折腾。原来，杨承孝安排的重头戏，是要借助夜幕开场呢。

天色将晚时，由太工永红和太机四野的学生们打头阵，十三治决死纵队的工人们殿后，这百余辆大卡车直扑省委大院，兵多将广，一齐跳将下来，扬言要与七一公社展开大辩论。这是有原因的，七一公社的社员们，多是原省委的机关干部，他们不参加丁磊为核心的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支持刘格平，才成立起七一公社，后来竟然成了红联站的一支干部队伍。更重要的，是这支干部队伍一直支持刘志兰。在丁磊组织人马炮轰刘志兰，兵团又搞出一个4·14决议之后，七一公社更是刷出大标语，认定刘志兰是毛泽东司令部的人。七一公社从来都不支持和拥护刘格平，更有传言，说七一公社不但整了杨承孝的

黑材料，还整了不少刘格平的黑材料呢！不让杨承孝打垮这些人，刘格平和丁磊夫妻俩，在省委大院里就搞不成红总站的一统天下。杨承孝愿意打先锋，原因更简单。李辅的七一公社印发了揭发杨承孝的传单，此仇岂能不报？七一公社的一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参观大寨

些社员们，原先还出来进去的，要和大卡车上跳下来的人们辩论，说是大辩论，实际上和吵架无异。吵到后来，决死纵队的战士们不耐烦了，就推搡，就动起了拳脚。七一公社的机关干部们，哪里是工人老大哥的对手，倾刻间，只能落荒而逃，逃不及的被打翻在地，弄了个鼻青眼肿，狼狈不堪。

而设在省委大院的七一公社总部，一下子被砸了个灰飞烟灭，惨不忍睹。这一次行动，没有获得什么黑材料，杨承孝和太工永红、太机四野的学生领导们，又在5月1日和2日，连续对七一公社突袭，继续打砸抢。特别是5月2日上午，竟将七一公社的领导李辅抓获，押上大卡车，上街游斗。红联站勤务组一把手、省委党校的大学生段立生闻讯，紧急调集麾下人马驰援。一群学生有的紧追，有的抄近路堵截，终于在山西医学院门前，与决死纵队、太工永红、太机四野的人马相逢。一阵拳脚相加，总算将李辅救了。此事开了先河，从此省城一派群众组织抓捕另一派群众组织领导及骨干人员的事件，时有发生，再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七一公社被砸，省委大院的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首先表态：坚决支持决死纵队和太工永红、太机四野的革命行动。七一公社的社员



“文革”之初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的艺术系学生在街头宣传十六条

一看就明白,这事儿原本就是丁磊和杨承孝共同策划的,一口恶气怎么也咽不下去。红联站的核心,已经成了省委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的一帮秀才们,他们也计划过组织一次武力反扑,为自个的下属七一公社报仇,但终因不具备力量而饮恨做罢。想想以前,在炮轰“黑省委”,打倒卫、王、王的战斗中,红联站还有兵团作为可靠的盟军并肩战斗,可再看看现在,刘灏一翻脸,就站到红总站一边,支持刘格平去了。昔日的战友,变成了今天的政敌,红联站无力反扑,却不等于就要坐以待毙。毛主席早有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运用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更有林副统帅的至理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离不开这两杆子。”枪杆子自然是有的,在红联站的决策者们看来,张日清就是山西枪杆子的代表。有张日清支持炮轰刘格平,岂不是该笔杆子发挥战斗作用了吗?如果说山西1·12夺权后,红联站的革命大方向因发表了“两告”和“三评”没有闹对的话,红联站的秀才们这一回是憋足了心劲,要靠笔杆子在三晋大地上再度扬威了。拿起笔,做刀枪,刺向杨承孝,炮轰刘格平,同时,也要捎带上警告一下兵团死保的那个走资派袁振。红联站全体将士要向全社会宣告,我们绝不是任你刘格平随便捏来捏去的软柿子!

省城的五一广场上,又出现了红联站的宣传车。

五一广场原本是太原市集会的地方。以往每逢国庆节和国际劳动节,省市委和省人委市人委的领导们都要登上主席台,与广场上集会的人民群众一道举行庆典。“文革”开始,省委为了领导好运动,在广场上搭起了许多可供贴大字报的木板木架,这里又成了省城大字报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再往后,各路造反派纷纷登上了广场的主席台,山西省委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卫、王、王和一大批当权派成了阶下囚后,也多次被押上了广场的主席台。山西1·12夺权胜利,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新的省市党政领导人又登上了这个主席台。五一广场

那时真是风云变幻莫测之地，也是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群众组织的交锋和亮相之地。红联站的宣传车装备精良，四个高音大喇叭冲着东西南北，车里的男女播音员慷慨悲歌，义愤填膺地揭露说，4·14阴谋的真相，就是红总站和兵团要把斗争矛头对准张日清，进而对准解放军，从而毁我长城，以达到反对毛主席司令部的反革命罪恶目的。提醒山西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召唤革命群众要提高革命警惕，以防红总站和杨承孝等人把山西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由此及彼，刘格平自上台以来的种种劣行，也进入红联站的批判文章。那几天，围绕着红联站的宣传车，广场上从旭日东升，到华灯初放，多则十来万人，少则两三万人。真可谓四个大喇叭振聋发聩，五一广场上人山人海各抒己见。中共中央不是针对苏修连续发表过九评，直评的赫鲁晓夫下台了吗？红联站的大学生秀才们也计划连续来了个九评，一评接着一评，将杨承孝和刘格平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九评只写出六评，党中央要解决山西问题，号令山西三大派头目全部进京，要召开七月会议，其余三评，便再未写出。

太原市的老百姓当时编了这样的民谚：红总站的打砸抢，兵团的大方向，红联站的好文章。这是当时大的政治环境下民间对三个革命造反组织的评价，在党的领袖带领全党、全民走上错误道路的前提下，这种民间俚语便具有了特定的时代特色。如今我们一一解读，其打砸抢三字，无须加引号，因为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是“文革”之罪；其大方向和好文章，则都要加引号了。因为这个“大方向”的标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论、是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文革”的指挥棒，“大方向”同样是“文革”之罪；所谓“好文章”呢，则是使用“文革”语言和“文革”思路写就，虽不乏华丽的语言和当年时髦的新八股文字，且能以煽情的功效博得民众的一些共鸣，与打砸抢和“大方向”一样，其同样是“文革”之罪。打砸抢、“大方向”和“好文章”，是“文革”

年代山西三大群众组织的不同特色,它们确实推动着“文革”的浊浪,用不同的方式演绎着革命造反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忠诚。但时过境迁之后,历史老人之手,是不会将“文革”中的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刻入推进历史文明进程功德碑的。

而当时,红联站虽然处在宣传战的胜利中沾沾自喜,却不知革命造反还得靠武力来取胜。正当红联站加紧炮制大文章时,杨承孝再次出击红联站。这一回决死纵队不是砸红联站的下属组织了,而是直扑省委党校,将党校东方红造反兵团的总部团团围定。玩文的不行,玩武的杨司令可是如鱼得水,何况眼下兵更多、将更广,红总站的其他武斗队,全由他统领指挥呢。为了支持和保卫刘格平,使山西新生的红色政权千秋万代红下去,让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刘格平同志不再受红联站的攻击,杨承孝这回令手下轮番作战和休息,围困住省委党校,可谓在刘格平麾下又立战功。

【8】红联站生擒杨承孝

红联站遭劫,秀才们的连续评论只好中断,宣传车也不敢再到五一广场上去了。但红联站决不会就此罢休,省委党校那帮秀才们的信念是,要不把刘格平轰倒,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要断送在刘格平手里?红联站当初炮轰“黑省委”,揪斗卫、王、王的战绩岂不是前功尽弃?决心虽大的很,但这帮秀才们,却突不出决死纵队和红总站其他人马对省委党校的重重围困。段立生急了,给省委七一公社打电话,希望这个得力的同盟军组织想办法“围魏救赵”。李辅当即派出人员,四处侦察杨承孝的行踪。七一公社的人,还真就探到杨承孝的行踪了。

那一天,杨承孝孤身独影,来到解放路副食商店大楼。此行何意,

日后传说纷纷，解放路副食商店大楼是决死纵队的一个据点，杨司令自认为到此不必带领随从，这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杨司令的一位情妇住在此处，杨司令幽会情人，自然不便兴师动众。如此重大军情，李辅当即电话告知了红联站太原十中的七一小将们。于是，一场抓捕杨承孝的行动由此展开。当天下午，红联站太原十五中红旗的领袖、高三学生常理正，带着近三十名麾下的红旗战士，全是高中学生，赶到副食品大楼，闯入楼上，果然寻到一间大屋子。杨承孝身着海魂衫，正与几个人闲聊。推门而入的常理正大喝一声：“谁是杨承孝？”“我就是！”杨承孝边回答，边扫了一眼对方身后那些学生们臂上戴着的组织袖章，大约明白事情不好，猛地站起来说：“我是省夺权总指挥部的总指挥，你们要干什么？”常理正和杨承孝并不认识，见问对了主儿，也不回答，一摆手，吼一声：“给我抓起来！”那些高中生们当即一拥而上，挡住其他人，揪着、扭着、抬着、拖着、将杨承孝弄出了副食品大楼。早有太谷山西农学院的一帮红联站大学生，开着一辆汽车赶到。十五中的这帮高中生将杨承孝塞进车内，山西农学院那帮红联站的大学生们，便将车开走了。常理正明白，此处不可久留，遂带上队伍紧急撤退。山西农学院的那帮大学生们，也明白太原是不保险的，因车就一直往太谷开。生怕事儿走露风声，让决死纵队劫人，又从太谷转移到平遥。在太谷时，红联站这伙小将把杨承孝囚在山西农学院红联站一派的据点里，到了平遥，依然如此炮制。决死纵队杨司令被抓，围困省委党校的决死纵队人马草草收兵，开始四处寻找他们的杨司令。杨承孝这回可受了制，但他也牢牢记住了自个被囚的几处地方。

红联站抓杨承孝，还有个直接诱因。在决死纵队围困省委党校时，太工红旗的杨保明去省委党校了解情况，尚未进校，就被决死纵队的工人师傅认出来，并当场抓获。同行者急忙电话报告了太工红旗总部。太工红旗当即决定，组织人马，也伺机抓获一名决死纵队的头

目，换回杨保明。在太工红旗负责人之一贾诚安排下，太原十中七一、治校东方红、十五中红旗、还有其他一些红联站的学生们，约定在解放路的副食商店大楼集合、下手。十五中红旗的高中生们先到先得手，而到的晚的，则有一些人遭了厄运。杨承孝的副手王国太领人赶来救驾。杨承孝被车拉走，王国太便下令手下抓人，太工红旗的李耕生、太原六中参加了红联站的高中生赵艾虎等，大约有十来名学生被抓。这些学生有的被装进麻袋扔到卡车上，有的被拧到卡车上，拉到城南一处仓库院关押。赵艾虎借解手之机，翻过厕所墙头逃脱。后来红联站放了杨承孝，决死纵队也释放了他们抓获的学生们。不同的是，杨承孝没有挨打，而红联站那些被抓的学生们，多受了皮肉之苦。被决死纵队抓获的杨保明，也是乘看守人员疏忽而逃离，跑回学校。杨保明脱险归来，杨承孝便失去了交换意义，贾诚决定放其回家。为了防备杨承孝放归后，说红联站对他有过虐待，这些红联站小将们还做了两件事。一是让杨承孝打乒乓球，并拍了照，二是让杨承孝写了封给妻子的信，说自个一切均好，书报平安，让其勿念，以此做为没有虐待杨承孝的凭据。

杨承孝这个东北汉子一定记住了被抓的屈辱，日后山西进入全面武斗时，当时杨承孝被囚的几处地方，都成了决死纵队扫荡的目标。

【9】从两件事看刘灏的思维

那么，这一时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又有什么大动作呢？

有两件事，可以代表刘灏此时的思维方式。

山西大学8·8红旗战斗队，是山西最早成立的革命群众造反组织之一，由炮轰校党委到炮轰省委，按中央的“文革”部署和《十六条》的精神而言，他们代表了当时运动的主流，只是因为在袁振问题上与

刘灏有分歧，才没有成为兵团的成员。但是，在夺权问题上他们退缩了，在炮打关锋问题上，又落了个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弥天大罪，请罪过后，这支力量就处在了低潮期。红联站的领导权已经转到了党校东方红兵团，他们不会让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与他们一道来一山藏二虎，红总站又指责山西大学的这个造反组织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山大的这支队伍，如何能重振革命造反的雄威，只有投靠兵团，唯此是举。而兵团呢？“汤高参”鼓励刘司令，说我们必须扩大队伍。红联站不足惧，他们毕竟是运动初期与兵团一道战斗过的革命造反派，但红总站却是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隐患。除了杨承孝以外，红总站的那些组织，特别是那个东风兵团，不尽是些原“黑省委”的干部吗？一旦他们掌了权，那还不是又回到了没有卫、王、王的卫、王、王时代？就是那个杨承孝，也只会打砸抢，完全背离了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教导，不扩大队伍，下一步如何和红总站做斗争？

刘灏最愿意听“汤高参”用那种纵横驰骋的思想和语气，谈论天下大事，分析山西形势。于是，在 6 月 3 日，刘灏与山西大学 8·8 红旗战斗队的领导们商定，成立兵团山西大学红旗纵队，并派出兵团的一位负责人、山西大学数学系五年级的学生叶积凯，对新成立的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大学红旗纵队，举行了一次授旗仪式。其实是一支队伍两面旗帜，而山大 8·8 红旗，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倒向了兵团。同一天，在省城太原还出现了一份传单，名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重申》，内容如下：

我们认为山大 8·8 红旗战斗队和兵团山大红旗纵队是真正的革命组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许多革命工作。创建的功勋是不可抹煞的。他们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我们将像以往一样，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经刘灏同志指示，以上观

点特此重申。

下面是日期和图章。再下面是“立即批发”，署名刘灏。还有一条是“按刘灏的意图办理”，署名宋捷。

在各地市，兵团也在用这种方式扩大着自己的队伍。

刘灏还有一个决策，当然也离不开“汤高参”的策划和袁振的安排，那就是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要出版一份报纸。红联站的文章写得好，广播车一广播，先就抓住了人心。这一招兵团也得学。用自个的一张报纸大造革命舆论，号令兵团大军，势在必行。兵团司令部的下属组织中，有太原工学院瑞金兵团的工科大学生们，山大8·8红旗此时也已经倒向了兵团，那里自然不缺文科的大学生们。于是，赶在7月1日这个特殊的好日子，一张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主办的《兵团战报》就正式创刊了。在出版了8期之后，这张报纸又改名为《兵团》继续出版，主办单位也由兵团宣传部，改成了山西革命造反兵



1967年组建兵团报的编采人员合影

团司令部。

可以说,这是山西“文革”中持续最久,影响最大的一张派性报纸。

【10】红联站和红总站都骂兵团是投机派

自省城夺权并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后,全省层层夺权,层层成立了红色新政权。这些新政权也和省里的新政权一样,由站出来革命造反的领导干部、支左的地区武装部首长、和当地的群众造反组织领导组成。起先夺权后,大家在一个班子里还算相安无事,待省里的刘格平和张日清分成了两派,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后,下面也一下子分成了两派,更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了。省城太原拥张(张日清)倒刘(刘格平)和拥刘(刘格平)倒张(张日清)的派战烽烟不息,全省各地也围绕省城的派战,继续进行着被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中不断称之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以晋中和晋东南两个地区为例,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形势。

晋中,那个任井夫、王振国、张怀英(简称任、王、张)反党集团案现在翻过来了,地委书记王绣锦被打倒,以任、王、张为核心的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正和地区的军分区、人武部形成尖锐对立,势同水火。地区党的核心小组有他们的优势,全国有名的劳动模范陈永贵站到了他们一边。靠毛主席赐给大寨的“农业学大寨”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靠陈永贵这张王牌,他们认为自个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刘格平,就是代表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军人们呢?自有铁打的营盘和背后的“支左一面旗”张日清,还有最高指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撑腰,他们也认为自个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支持张日清,就

是代表了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

晋东南,地区党的核心小组内部,原地区副专员程首创和地区军分区司令员武天明,也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支持程首创的群众组织叫红色造反兵团,简称红字号,支持武天明的群众组织叫联合造反兵团,简称联字号。红字号说我们支持刘格平,党要指挥枪而绝不能让枪来指挥党,你武天明必须老老实实站在刘格平和程首创一边才行;联字号说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就是要支持张日清,刘格平与张日清过不去,你程首创和武天明过不去,你们就是反对解放军。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出了西沟,介入了山西的“文革”,表态站到了军人们这一边,也就是说,从全省的大观点而言,陈永贵是站到了支持刘格平的一边,而李顺达是站到了支持张日清的一边。山西两位最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于是成了观点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自都要极力抬出来的两个大金字招牌。

还得说一说山西当时的驻军第 69 军。这支部队是在 1967 年 3 月底 21 军调离山西后进驻山西的,没有参加山西刘格平组织的 1·12 夺权斗争。69 军的军长,是国民党起义将军董其武,主持部队工作的,是政委曹中南、副军长谢振华等首长。曹中南是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谢振华是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面对山西新政权中刘格平与张日清的斗争,不可能没有看法也不可能没有观点。只是以他俩为代表的 69 军在山西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而已。

此时的刘灏却似乎丧失了革命斗志一般,他弄来很多书,好像再不想多管兵团的事了。不是不想管,是他觉得自个管不了。他身边的“汤高参”整天帮他分析形势,他听不进去。他的助手和下属当面骂他右倾,他也待理不理。他认为刘格平支持的那个红总站,尽是些改头换面的保皇组织,可是袁振支持刘格平,下属们一个 4·14 决议,兵团公开了炮轰刘、陈、刘,揪出刘、陈、刘黑后台张日清的政治态度,并不

能代表他。他想,自个是兵团的司令,可兵团却将斗争矛头对准张日清,分明是违背了老父亲的教诲呀。为此,他又去找袁振,袁振却振振有词地开导起这位年轻的小将来了。道理讲得很对,革命怎能半途而废呢?再说,山西夺权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刘、陈、刘和张日清的问题是什么性质?该不该炮轰?党中央还没有表态嘛!你急啥?

“文革”中,各省的问题全要等中央文革小组圣裁,山西自然也不例外。以保袁起家的刘灏,此时还得听袁振的,不敢再有什么想法了,那就等吧,看中央啥时表了态,再决定自己如何走吧。

1967年7月,由中央文革小组出面主持会议,解决山西问题。说白了,也就是解决刘格平和张日清谁对谁错的问题。当时称这次会议为七月会议。

6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就把山西三大派群众组织的领导,加上山西省、太原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们,全部召进了北京。刘灏作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司令,理所当然地随队进京。接到通知,刘灏突然间就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前一段的消沉情绪一扫而光。已经19岁的中学生思前想后,感到此番进京和以前进京去替袁振翻案大有不同。那时是自个去找中央,想见的人一个也没有见上。这回是中央找自个,为啥?因为自个现在是山西政局中的一个人物了。能亲自参加中央解决山西的问题,这可是关系到山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的大事呀!在深感荣幸的同时,他又有了一种重任在肩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下,刘灏还有一桩秘不示人的心事,或者说,是一种难以述说的情感,让他又表现出一点郁郁寡欢。中央如何解决山西问题,虽然还是个谜,但无非是两种可能。具体而言,是搞垮为揭发61个叛徒集团立了头功的刘格平呢?还是撕碎“支左一杆旗”张日清呢?中央总要表态,不能和稀泥吧!如果中央支持了刘格平,兵团已经站到了支持刘格平一边,可刘灏心中却不忍心张日清遭受风吹雨打。

父亲就是军人，对张日清，他总有一丝同情心。如果中央支持了张日清，那兵团就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刘灏也不愿意是这种结果。这种心事，他向袁振和“汤高参”们说过，袁振批评过他这是小资产阶级不彻底革命的思想，他的“汤高参”和战友们，也指责过他这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就是丢不掉自个这种潜意识。就是坐在进京的列车上，他也沉默不语，无法如杨承孝那样，旗帜鲜明地向一道进京开会的各路英雄大声表态：张日清他妈的早就该垮台！

进了北京，就得坐下来谈。红联站的领导们自恃举的是“支左一杆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圣裁充满了信心。红总站的领导们坚信刘格平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更是对中央文革的圣裁充满了信心。原本善于滔滔雄辩的兵团司令刘灏，这回显得有些寡言少语了，因此也被昔日的同盟军红联站，和眼下的同盟军红总站一致斥之为投机派。

【11】七月会议康生收拾张日清

七月会议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坐阵，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主要参加，有时也有杨成武、郑维山等军队领导参加，开小会时，周恩来也出席主持过。每次大会都有一个相同的细节，刘格平和康生、曹轶欧、关锋端坐在主席台上，张日清和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的其他成员，则和山西三大派的代表们一道，坐在主席台下。这种排位，显示了当时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刘格平的支持。七月会议从7月4日开始，到8月5日结束，共召开了四次大会，中会和小会多次。会议没进行了几次，形势就开始一边倒了，倒向了刘格平一边。究其原因也简单，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正在伙同江青、陈伯达，为毛泽东彻底击垮刘少奇，炮制刘少奇是钻进党内“61人叛徒集团”的黑后台大案，刘格平是活着的人证，不支持刘格平能行？副统帅林彪要揪“军内一小

撮走资派”，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人们，在江青指挥下，也要利用这个口号，想争夺军内的权力，打张日清。正是一招好棋。七月份在武汉不就是出了个与造反派对抗的陈再道吗？武汉的造反派们可以打倒陈再道，江青都表态支持打倒陈再道了，张日清算个啥？昨天你是林副统帅的支左红旗，那是革命的需要；今天让你变成黑旗，这也是中央文革搞革命的需要。

下面，我们选取这次会议上的两个场景，从中可看出康生收拾张日清的一些原委。由于当时各群众组织的传单和小报上，刊出的是各自对会议的记录，综合如下。

1967年的7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里，由康生主持了七月会议期间的第一次大会。关锋、杨成武、吴法宪、郑维山、曹轶欧等出席。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和省革委的其他领导，还有红总站、兵团、红联站的领导们全部到会。会议一开始，康生就点到了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的王清英。

康生说：“我接到了王清英一个材料，她要见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今天身体不舒服，还有其他事情，不能来了。王清英同志来了没有？”

王清英马上回答：“来了。”

康生便点名让王清英先讲，而且说：“我把你的意见会转告江青同志的。”

于是，王清英起身，愤怒地控诉起张日清的专政委员会来了。她说她被抓了三个多月才被放出来，还戴了手铐和背铐，审问了她20多次，让她交待刘灏和杨承孝的问题，揭发刘灏和杨承孝和袁振的黑关系。

王清英控诉完了，张日清不吭声，兰敏就起身解释说：“她的案子和杨承孝的案子有关系。”

关锋插话说：“杨承孝也成案子了？是案子，你们为什么不报告中

央？”

康生便指着兰敏说：“你就讲一讲和杨承孝有关系的情况吧！”

兰敏刚刚介绍了一下他们调查回来的情况，说杨承孝的家庭出身背景和个人在鞍钢时的表现都有问题，关锋就把他的话再次打断了。

康生这时指着兰敏发问道：“你参加革命前是干什么的？”

兰敏：“煤矿挖煤的。”

康生：“我看看你的手。”

兰敏只好把手伸出去。在场的刘灏当时不免心中纳闷：康老这是要干啥呢？是要看手相吗？这纳闷不止刘司令独有，在场的所有人心中，大约一时全存了这种纳闷。

康生开口了：“矿工的手能有你这么白？一看你这双手，就知道你不是挖煤的。你那个专政委员会呀，我看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专无产阶级政的委员会。”

妈呀，康生这一句话，定性了。

康生又扭头问刘格平：“张日清搞这个专政委员会，你知不知道？”

只见刘格平摇摇头说：“是他一手搞的，我不知道。”

尽管当初成立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时，刘格平还端坐在主席台上，可现在，他却否定了历史，不承担责任了。此时，那些红联站的领导们，面对康生的淫威，谁也不敢起身，和刘格平订正这件事。砸烂公检法，成立了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原先认定这是张日清的功绩呢，现在反成了罪名了。

红总站的领导们可高兴极了。当天就急电太原，让留守大本营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喜讯告示省城人民，同时警告红联站在太原的人马：支持张日清反对刘格平，你们输定了！

太原的大街小巷立刻就贴满了北京来电：康生同志指示，山西省

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是专无产阶级政的委员会。

紧接着就是革命大行动，杨承孝在北京，可他的决死纵队丝毫不减威风，他们与太机四野等红总站的下属组织一道出动，将设在省公安厅内的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砸了个稀巴烂。想想夺权时，北京政法学院赴晋造反团政法公社的造反小将们，已经砸过一次公检法了，夺权后，张日清继续砸烂公检法，成立了专政委员会，公检法又受劫难。这一回，又轮上张日清的专政委员会完蛋了。

还可再举一例，看看康生的淫威。7月13日的会上，红总站和兵团有人揭发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的黑后台是葛莱教授，关锋当即喝问：“党校东方东的同志，你们结合了葛莱是不是？”

康生马上说：“他有个一分为三嘛！一分为三是个什么问题？”

段立生赶紧起身认错说：“我们知道了，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

关锋开始上纲了：“你们注意了就好，但你们不够慎重。1964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时，他提出了一分为三，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主席的一分为二的，这可是个大问题呀！”

段立生再次解释：“他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调查……”

康生不让段立生往下再讲了，厉声说：“没有比这更大的问题了！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接着，康生一口气点了刘少奇、彭真、安子文、杨献珍以及其他好几位中央领导人的名字，说他们控制和操纵中央党校和各地的党校，犯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会上的这个动态，当天就传回太原。

康生还有更杰出的表演呢，再举一例。

7月23日，还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康生又一次主持了有关锋、吴法宪、曹轶欧参加，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其他领导人，以及红总站、兵团、红联站领导们全部到会的第二次小会。会上，杨承孝发言时，口口声声揭发张日清反对刘格平、迫害革命小将王清英、

企图整他与刘灏的黑材料。

他刚说罢，康生就表态支持说：“这点我早看出来了，开会前在我们那儿，王清英很痛苦，神经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你们专政委员会，特别是兰敏你要好好检查。为什么把年轻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呀？你们专政委员会到底干了哪些坏事呀！”

杨承孝又起来发言，说张日清整理了他的黑材料，说兰敏骂过刘灏也是“狗崽子”，说张日清的人全是反对刘格平和袁振的。

康生再次表态支持杨承孝了，大声说：“我要问一问兰敏，你说的杨承孝的材料，你调查的十分清楚，而且有证据，说他出身于什么反动官僚家庭，你晓得不晓得杨承孝是个极端贫苦的雇农的孩子？你调查了吗？”

在为杨承孝大声辩护的同时，康生还反复强调，说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还有那个王承琚都是坏人。而张日清正是支持这些坏人的后台。

而关锋的姿态则更直接了：他说：“我现在讲另一个问题，《人民日报》和《红旗》马上要发一个社论，康老和我都看了，好得很嘛。武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到会的人当然知道武汉刚刚发生的恶性事件了。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将军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与另一派反对陈再道的群众组织发生严重武斗。此事轰动了全国。听到康生询问，与会者齐声回答“知道”，这是山西的三大派领导们自打进京开会后，难得表现出来的一致和共识。

关锋：“知道就好，现在我提一个口号：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

康生接过话题，破口大骂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百万行尸走肉，同时大骂陈再道，不时还得捎带上骂张日清和兰敏。这位被革

命小将们尊称为康老的中央首长，毛泽东麾下的老政工，骂得来了劲，竟指着张日清和兰敏，当着他老婆曹轶欧的面，也不管山西省到会的代表中，还有好几位女性，竟然骂道：“毛主席说过有的人死了重于泰山，有的人死了轻于鸿毛，我看你们死了，连根屁毛都不如！”这种权势和淫威，刹那间，让他的形象在到会的那些年轻人心底，彻底坍塌了。

然而，康生就是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至此，康生已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刘格平的态度，十分明朗地作了表达。

刘志兰、陈守中和刘贯一这三位跟张日清跟得比较紧的领导，也在不同的大会、中会上，受到了康生和关锋的辱骂。刘贯一曾在康生身边工作过一段，康生和曹轶欧夫妇一唱一和，把刘贯一骂成是饶漱石当年安排在他们身边的特务和钉子，是安子文招降纳叛的对象，1962年给邓小平写信提倡搞自留地，是要和刘少奇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刘志兰曾是左权将军的妻子，左权将军牺牲后又与陈守中结为夫妻。刘志兰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是北京师大的同学，当年双双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分子后，刘志兰和浦安修依旧有书信往来。这些私人信件被红总站抄家获得，在会上成了刘志兰的罪证。康生口口声声把刘志兰往彭德怀的线上挂，让关锋在会上公开念刘志兰给浦安修的私人信件，以侮辱人格的作法，骂她是彭德怀反党集团的人，策划了彭德怀受批判后和浦安修的假离婚。刘志兰要解释，康生就厉声质问刘志兰：“彭德怀的女人到你家干什么？不该炮轰吗？”有一次在会场上，康生火了，竟然拍案而起，大声喊道：“给我把混进红色政权的刘、陈、刘赶出会场去！”当即有红总站的几个领导人起身，将山西新政权中的这三位领导干部扭住胳膊，押出了会场。

整个七月会议期间，省城太原和全省各专署所在城市，时不时地

贴出北京来电，将七月会议上的种种小道消息，公布于社会。太原城里，也随即乱了一次又一次，有人欢乐有人愁。各专署所在城市里，也是北京来电不断，乱象不停，有人欢乐有人愁。

支持刘格平！打倒陈再道，警告张日清！把刘、陈、刘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红总站和兵团将这种标语刷遍了太原城。而“九评”只完成“六评”的红联站的秀才们，再也无心去写什么文章了，只有暗自叹息，自认倒霉。

张日清原本是想在七月会议上，满有把握地把杨承孝搞掉的，采到杨承孝指纹的那位郭科长，和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的几名专案人员，早就来到北京静候张日清的安排，要上会当着中央首长的面，当着杨承孝的面，揭发杨承孝在东北和在山西的种种劣迹了。可眼看着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一个个都坚决支持刘格平，支持杨承孝，张日清布好的人马已经无法登场了。一次会间休息，张日清以散步姿态，走近宋捷，低声道：“快传话，让老郭他们回太原吧。告他们记住，回太原后按兵不动。我安排你的事不能乱讲，要掉脑袋的！”

宋捷自然心领神会。他偷偷去通知郭科长几人，传话时，又加重了让他们保密的语气。宋捷心里明白，这事儿要传出去，杨承孝不但会和他宋捷翻脸，还真敢要了他宋捷的命！

【12】来历不明的最高指示

对张日清和他支持的红联站来说，更倒霉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如果仅仅是康生和关锋的几句指示，张日清恐怕还不至于彻底垮台，红联站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偏偏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话了。是康生代传的“圣旨”。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最高指示是一句话能定乾坤的金口玉言，林彪就多次讲

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哪！

康生代传的这道最高指示是：“69军在山西文化大革命中地位很重要，要和69军的同志们讲一下，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支持刘格平同志。”

虽说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没有点张日清的名，但这句话也就说到家了。何况那时人们把毛主席比做红太阳，对红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可以充分进行思索和发挥，而且越思索越发挥，就越感到这句最高指示有深刻的意义。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那么自然就得先站到张日清的对立面才行；要支持刘格平同志，那么首先就得反对张日清才行。更重要的是，这条最高指示分明是要让驻在山西的69军出面干预山西的文化大革命了，所有参加七月会议的大小领导、头头脑脑，这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全明白了一点：日后的山西，69军可再不是蹲在营房里只是吹号做操练兵，不过问山西文化大革命的那支军队了。

红联站对这条最高指示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条最高指示让张日清和红联站败局已定。他们面对不敢撼动也不能撼动的最高指示，竟然传出一个又一个小道消息，说这条最高指示来路不明。一个版本说，是康生在某天的会上抽身去厕所时，与69军的政委曹中南一同站在小便池前，两人一边洒尿，康生一边给曹中南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另一个版本时间地点一样，只是人物变了。说是康生在某天的会上抽身去厕所时，与刘格平一同站在小便池前，两人一边撒尿，康生一边给刘格平传达了这条最高指示。

是与不是，绝对无法核实时证。再说，在中央为解决山西问题召开的七月会议上，谁要敢不信康生传达的这条最高指示，胆敢核实这条最高指示，那不是想当反革命吗？即便最高指示是康生在那种便溺之地传达下来的，但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堂堂顾问，由康生发布的最高指示，哪能假的了？

看来,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要扳倒张日清了。红联站参加中央七月会议的代表们,一下子乱了套。不少人埋怨他们的领导,说红联站支持张日清,是被张日清骗了。消息一次次传回太原,太原一部分太工红旗的大学生们,和一部份红联站下属其他组织的大、中学生们,又气又急,认定红联站受了张日清的欺骗。7月20日,一些红联站的学生们,在红联站总部太原冶金学校扯旗集合队伍,奔向省军区门前,高喊“炮轰张日清”和“打倒张日清”的口号,冲击了省军区。红联站留在太原的领导人,当天就用电话将此事报告了在京开会的红联站首脑段立生、李青山、杨保明、于永革等人。但事情已发生,他们又远在北京开会,虽心急如焚,生怕下面再惹出什么事来,却又无力控制太原的局面。第二天,得知这个情况的张日清,这位山西省军区政委、堂堂少将,看来被康生整的不成样子了,竟在红联站代表们驻地的小马路边上,匆匆召见太工红旗的领导杨保明、李青山、于永革等人,批评了他们几句,又匆匆离去,分明是怕被红总站和兵团的人抓住,头上再被安上一个暗中串连的罪名吧!在后来的会上,康生果然就红联站冲击省军区一事,狠狠骂了红联站一通。好在当时中央文革正在揪军内一小撮,红联站冲击省军区,也算是一种反戈一击,康生没有再追查此事。

七月会议上张日清背运挨整,会后69军进入山西政坛,副军长谢振华将军渐渐开始主政,张日清并未彻底倒台。不久后,反而是红极一时的关锋、王力、戚本禹被中央文革小组抛出,打倒关、王、戚的口号响遍全国。山西的这种形势,和北京高层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出现,以及其被毛泽东主席狠批,从而被否定的过程。发起“文革”的第一个重要文件,是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这份文件里,有这样两段话:“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清洗这些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文件或报刊上出现,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而当时,凡黑体字排印者,则显示其不同于一般文字,是毛主席语录,是最高指示。由此可见,在毛泽东主席最早决定发动他的文化大革命时,斗争和打倒的对象,也包括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军队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到了 1967 年,在《解放军报》1 月 14 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中,具体提出,决不能借口军队的特殊而对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有所动摇,必须把军内一小撮揪出来!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毒全国。

在 1967 年 8 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12 期,几乎成了“揪军内一小撮”的专辑!这一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这么一来,朱德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排除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外;这么一来,毛泽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却无法“直接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了!这篇社论历数“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顿时在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狂澜!

传说,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刊发的这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篇社论上批了几个大字:“大、大、

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还在旁边写下四个大字：“还我长城！”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是“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删掉。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不用。退林彪。”

传说也有印证，8月20日，《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柱石》的社论，公开表示了反对“揪军内一小撮”。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北京连续召开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代表座谈会，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对此口号公开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行动，无论是林彪要借此全面掌控军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要借此染指军队，都是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对《五一六通知》中领袖思想的一种运用。但当最高领袖要纠正自个的想法，准备用军队稳定全国的“文革”局面时，就必须有人来承担提出这个口号的政治责任了。事情的结局，是中央文革小组内的江青、康生、陈伯达全没有承担责任，身为接班人的林彪，更没有责任了。王力、关锋这两个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成了替罪羊。“揪军内一小撮”从口号到行动，从此全面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主席要用军队稳定全国形势的步骤，得以全面展开。

【13】争先恐后去山西日报社造反

当山西三大群众造反组织的领袖们，正与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等山西新政权的当政者们一道，在北京的七月会议上成天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首长们的训话，等待最后的“圣裁”时，省城太原，7月20日除了红联站一些人冲击省军区外，还发生了各路群众组织争先恐后，不谋而合，去山西日报社造反的事件。

对山西日报社而言，这已经是“文革”开始后，第二次被群众组织造反了。第一次被造反，发生在1966年12月25日和28日。当时，报

社内部也有革命群众成立了造反组织，他们与社会上的群众造反组织串连，于 25 日内外结合，以抢黑材料为名，对报社办公楼进行了查抄。28 日，兵团、红联站的一些下属组织，再次与报社的造反组织联手，冲击报社办公楼，封了许多办公室，使报纸无法正常出版。这次群众组织去山西日报社造反，是他们认为“黑省委”操纵了《山西日报》，矛头针对的是卫、王、王领导的山西省委。而 1967 年 7 月，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已经掌控了《山西日报》，群众组织来造反，针对的就是这张报纸本身了。

事出有因。7 月 19 日晚上，《山西日报》值班总编喊来记者傅业，让这位记者中的快手，赶写一篇社会消息，一千字左右即可。当时的报纸，说的多是大话、空话，套话、革命话。为了赶时间，傅业坐在值班室，写出一页就发排一页。五页稿纸很快写完，顺利交差。在这篇稿件中，他依照当时的模式，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语。傅业任务完成，第二天一大早，便搭乘一辆顺路车，回了太谷县老家。

谁也没料到，7 月 20 日《山西日报》发往全省，这则千字消息中的“万寿无疆”竟变成了“无寿无疆”。那个年代，人们获得资讯的渠道，只有听广播和看报纸，这“无寿无疆”，首先传遍省城，进而传往全省。此时，虽然山西三大组织的领袖们，还在北京开七月会议，但他们的下属头目众多，闻知《山西日报》出了此等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事件，岂能坐视不理？如今已很难弄清，那天究竟是哪家组织最先杀到山西日报社了，反正山西日报社院里院外，被省城各路群众造反组织围堵，人山人海，口号声声。大家没有分歧，没有派性，群情激愤，观点一致，攻击“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是“无寿无疆”，真是罪该万死。各种声讨《山西日报》的大标语，贴满了报社院里院外。“文革”中，这种集体无意识导致的冲动，是集体脑残思维的结果，显示着那个时代的虔诚，也显示着那个时代的疯狂。

傅业回到太谷老家,20日下午在县城里就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大标语:“山西日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当天,这种大标语在全省各地大小城市也出现了,各派的都有。傅业的出身是黑五类,如果是他的原稿写错了,那就是现行反革命,不但要挨批斗,甚至坐牢杀头的可能都有。几天前,傅业跑社会新闻时,在五一广场就目睹了一名头戴纸糊的高帽,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牌子的人被揪斗。这个人的罪名,就是写毛主席语录时,把老人家有关革命是“暴力行动”写成了“暴力行为”。这“无寿无疆”之误,可比“暴力行为”之误更严重、更可怕呀!他赶紧给报社一位信得过的朋友打电话,那位朋友告诉他,报社已经查明白了,他的原稿没错,傅业那颗高悬的心才放了下来。“文革”中,这种荒唐事、胡折腾的事,因一个字或一句话弄错,被戴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而身陷囹圄者,不知有多少。

傅业那时负责社会新闻,每天骑个自行车满太原转,那几年写了多少稿件,他自个也说不清了。我请他去山西日报社资料室,查看1967年7月20日的报纸,这天的《山西日报》四个版上,全是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的各种最高指示。我也曾去山西省图书馆,查阅1967年7月20日的《山西日报》,在那纸张发了黄的合订本中,这天的《山西日报》四个版上,确实全是毛泽东在“文革”开始后的各种最高指示。我与傅业猜想,一定是当时的报社领导采取了补救措施,将发出去的报纸尽力收回的同时,又紧急加印了这种四个版的“文革”毛主席语录大全,做为当天的报纸补发了出去。

《山西大事记》(1840——1985)(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1967年栏下,有如下记载:“7月20日,省城一些造反派组织冲击省军区。同日,《山西日报》因发生排印错误,被造反派组织查封了编辑部。”

不知有无收藏界人士,藏有 1967 年 7 月 20 日那张印有“无寿无疆”的《山西日报》? 这张报纸,如今一定价值不菲了。

【14】刘灏扩军

七月会议上的形势已经明朗,还未返回山西,红联站的领导们对刘灏就开始冷嘲热讽,骂兵团是投机派,骂刘灏是投机商。红联站这么骂,刘灏还能忍着,偏偏红总站的领导们也骂兵团是投机派,骂刘灏是投机商。杨承孝和郝庭云、黄锐庵就指着刘灏说:“你是个大滑头。”也难怪嘛,人家红总站的领导郝庭云、黄锐庵真是不惜血本地支持刘格平,杨承孝也是坚决支持刘格平的,而刘灏的态度,人家也看得清清楚楚。如今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看来是铁了心支持刘格平,你刘灏和兵团也成了支持刘格平的观点,杨司令首先就不服气刘司令。

毕竟是个中学生,不是什么政治家,面对这些咒骂和指责,刘灏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感到自己确实在七月会议前的这场斗争中,没有把握好兵团的斗争大方向,虽说七月会议上对兵团的评价是好的,但比起六中 32111 那些敢于炮轰刘、陈、刘的兵团战友来,自己的思维还是缺少了一些敏锐的判断力。甚至在与山西大学 8·8 一派的领导人李大纲、方培泉私下交谈时,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心愿:“既然你们已经加入了兵团,希望你们能掌起兵团司令部的领导权来。”对方是大学生,他们更有全局观念。他们不同意刘灏这种想法。刘司令已经威震三晋,从兵团的发展考虑,兵团岂能没有刘灏掌印?

高参汤建中也给刘灏做了开导。汤建中读的书多,以史鉴今,自有一番能打动刘灏的道理。刘备当年并未想到会三分天下,也未想到入川去掌控地盘,但刘备听了孔明的话,不就有三分天下的结局了吗? 你刘灏虽然没有想到支持刘格平,但你现在的政治观点和实际地

位是支持刘格平了，就得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眼下大事，重要的是扩大队伍。“汤高参”又滔滔不绝，讲起了读过的历史。三年解放战争刚开始时，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430万国军，其中正规军就有200万人，都是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共产党的军队呢，只有120万人，经济上也没有外援。可毛泽东主席英明伟大，指挥这劣势军队，偏偏打败了处于优势的蒋介石。为啥？共产党是正义之师，发动翻身农民参军，策反国民党军队加入解放军，再把俘虏的敌人一教育，穿上解放军军装就掉过了枪口。刘司令呀刘司令，兵团眼下当务之急是干啥？是要帮助红联站呀。

刘灏似乎没听明白，但细细一想，“汤高参”的话，真是不无道理。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能半途而废？如何帮助红联站？给山大8·8授旗易帜，不就是个现成的经验吗？

这个工作，派人一做就成功。七月会议的风向不时传回山西，原先红联站的下属，都知道中央的首长们批评了红联站。于是在兵团主动的盛邀下，纷纷易帜。那阵子，兵团司令部里，就数办公室主任焦根林最忙。他掌管着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部的大印，许多原先红联站的下属组织派人来送申请、填表、再盖上大印，一天不知要办多少家。杨承孝要置红联站于死地，红联站的下属组织们都曾发誓要与红总站血战到底，当然不能投降杨承孝的决死纵队和红总站。兵团虽说这一回也支持了刘格平，但与兵团好赖还有过去一同革命造反，一同炮轰过“黑省委”的战斗友谊，于是乎，红联站的下属组织中，多数易帜者便投奔了兵团。刘司令自然明白兵多将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来者不拒，继续派人到处授旗。七月会议的纪要还没有下发，兵团的队伍却在层层扩大，成了省城乃至山西人数最众的群众组织了。

七月会议上，袁振也私下点拨刘灏，要抓好组织建设。刘灏是闻名三晋的革命小将，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更重要的，是山西革命造

反兵团的司令,他想好主意去找刘格平,刘格平自然要热情接见。

刘灏见了刘格平,不说是要官,而是说要来提点意见。

长得也还慈眉善眼的刘格平,知道来找他的这位革命小将背后的靠山是袁振,也明白这位兵团司令炮轰“黑省委”,批斗卫、王、王时革命造反劲头十足,可在支持他刘格平时,并不是十分卖力气。如今新政权中的对手张日清败了,毛主席都让69军支持他呢,想这个刘灏也不敢不听话。

“有什么意见你就好好说一说吧,咱们山西的文化大革命,还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才能搞好呀。”

刘灏也开门见山:“我们要求增补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和委员的名额。”

刘格平一听就不再做声了。毕竟是政治家,毕竟是在山西的高层领导中挑头造反后,取代了卫、王、王而在山西政治舞台上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三级高干,他已经从这个意见中,琢磨出了兵团司令的用心。

“会还没有完呢,你提的这个意见,我们现在还顾不上考虑呀,等咱们回去贯彻七月会议精神时再说……”刘格平侃侃而谈,想打发走刘灏,可刘灏就是不走,岂止是不走了得,他坐在刘格平的对面反而较上了劲儿。

“我们兵团和红总站都是支持你的,同样是大方向正确,你为什么就不同样对待呀?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委里,红总站的名额那么多,我们兵团为啥就比他们少?”

其实刘灏也明白其中原因,兵团在省革命委员会常委中的名额,之所以比红总站少,是因为在1·12夺权中,他没有干上总指挥,而干上总指挥的杨承孝和刘格平的夫人拉起了红总站的山头,人家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委中,自然要多弄些名额。可现在情况变了,不是刚夺权,刚成立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那阵子的形势了。既然党中央

和中央文革都支持兵团与红总站，又没有分个第一第二，省革委的常委名额中，两家的数量就该划等号才行。他想：我的意见明明有道理，看你刘格平怎么回答吧！我刘司令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蒙哄了的。

刘格平分明有些不耐烦了：“你们的名额也不少嘛。”

“怎么说不少？明明是少嘛！”早有准备的刘灏便一个一个往下数。不用他数，刘格平心里也清楚。他打断了刘司令的话，开始带上了批评的口气：

“红总站的人多，组织也大嘛！再说，他们夺权时，出的力也多嘛。你们兵团不能和红总站比嘛。革命委员会是新的权力机构，常委班子得有个代表性，你们兵团也得有个群众观点嘛……”

刘格平说了许多，道理却简单，照刘灏的理解，就是红总站的人马眼下比他兵团的人马多。任他再说什么，反正刘格平认准了自个讲的那些道理，就是不答应考虑刘灏提的意见。

刘格平是山西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也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在这位山西新的党政一把手面前碰了个软钉子，刘灏一肚子委屈，要找袁振去倾诉倾诉。

“他刘格平是过河拆桥，只靠红总站能把张日清斗倒？兵团支持他，可他就是护着杨承孝他们……”

袁振就笑，听刘灏说完，不但没有向这位在他平反问题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小将表示同情，反而赞同起刘格平的话来了：“格平同志讲的对嘛，红总站人多，组织也大嘛。搞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干革命一样，得靠实力才行。毛主席他老人家当年带上人马上井冈山，不就是要掌握实力吗？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延安，也是要掌握地盘和军队嘛，有了实力，才能轰轰烈烈搞革命啊！”

响鼓不用重锤敲，刘灏的脑瓜子一下开了窍。刘司令在北京一声令下，兵团就在太原以实际行动，向刘格平，向红总站，也向全社会显

示了实力。

1967年8月8日出版的《兵团》报上,对七月会议期间兵团的活动,有一组题为“兵团活动”的综合简讯,全文抄录如下:

○七月廿日晚,由兵团、红总站、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空字025军团、027部队和驻晋部队等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廿五万余人,在五一广场召开了“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和拥军爱民大会”,会议期间收到一百多个革命组织的贺电、贺信。会后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盛大游行。(孙涛注:所谓空字025和027,系空军在山西的两所院校,“文革”中这些军事院校也成立了各种观点的派性组织。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系指毛主席所讲让69军支持刘格平的那句话。)

○七月廿日凌晨,我兵团全体战士,在五一广场集会,愤怒声讨武汉军区陈再道操纵的保皇军“百匪”,非法刺伤和游斗谢富治和王力同志的滔天罪行。会上发表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严正声明》。会毕举行了盛大示威游行。(孙涛注:所谓“百匪”,系指武汉地区支持陈再道的一个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七月廿三日晚,兵团、空字025军团、海字802等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在省军区门口举行了“揭发、批判张日清罪行大会”,会上群情激愤,“打倒张日清”的口号震撼声阵阵不息。

○七月廿五日晚,由兵团等革命组织发起,在山西日报社门前召开了揭发、批判《山西日报》反革命复辟罪行大会。同日晚又由兵团发起,在“文庙”召开了揭发“专政无产阶级委员会”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由兵团、山西公安革命造反团等革命组织代表进行了控诉、揭发、批判。(孙涛注:山西夺权后,由张日清分管山西日报社的工作,当时批判《山西日报》反革命复辟,即批判张日清。所谓“专政无产阶级委员会”,系指张日清在公检法战线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

○七月廿六日晚，由兵团、红总站、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革命组织发起，在五一广场召开了“坚决支持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会后发出“大会通电”和“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

○七月廿七日晚，我兵团全体战士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文攻武卫、制止武斗誓师大会”，会上兵团领导人刘灏同志宣读了我兵团司令部“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严正声明”，会后有二百余辆汽车的车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七月廿七日，北营地区成立了“北营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兵团负责人张文林同志到会讲了话。会后由32111、太行仪表厂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七月三十日晚，由兵团、红总站、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革命组织发起，在五一广场召开了“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岳维藩大会”。会上揭发了岳维藩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孙涛注：岳维藩系太原市的老市长，“文革”前调任南京市任市长，文革中曾被山西的革命造反派揪回山西接受批斗，上世纪80年代又调回太原任市长直至谢世。）

○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由兵团等革命组织发起，于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晚分别在五一广场、南文化宫、工农兵会堂和驻晋部队隆重举行了《纪念“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大会》和《军民大联欢晚会》，会场上人人欢欣鼓舞，兴高彩烈，充分体现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八月四日晚我兵团在工农兵会堂召开“形势报告会”。会议要求兵团全体战士立即掀起深刻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军内的代表人物彭德怀、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深挖山西军区以张日清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区首长张益三到会介绍了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概况。

○八月五日晚由空字025部队总部、兵团、红联二站、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兵团、北师大井冈山驻晋联络站等十六个革命组织发起在五一广场召开“热烈庆祝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向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孙涛注：所谓红联二站，是红联站在七月会议上受挫后，由分裂出来的一些红联站组织另立的山头，明确支持刘格平。所谓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即指毛主席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大院贴出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仅仅是兵团十来天的活动，何其轰轰烈烈！

而这种轰轰烈烈的活动背后，只是刘司令为了要向刘格平显示兵团的人多与势众，其直接目的，是要刘格平在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中，给兵团进行一次权力的再分配。

七月会议总算开完了。在回太原的火车上，刘格平兴致很高，特意约刘灏一道，坐在他的软卧包厢里谈心。他希望这位革命小将支持他，面对坐在他对面聆听教诲的这位中学生，刘格平一定没有想到，七月会议后，红联站没有被他压垮，兵团也没有被他掌控。

【15】兵团成了最大的赢家

七月会议后的8月20日，党中央终于批发了一个七月会议纪要，以中央文件下发。这是“文革”中由康生炮制，由毛泽东批示“照办”后，党中央下发的一个错误的文件。它将山西革命委员会的几个领导定成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将山西的群众组织分了类，有的给戴上左派桂冠，有的不给戴，从而引发了山西日后更大规模的武斗。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会议纪要里却没有提到康生传达的那条最高指示。

这个文件全文如下：

七月会议纪要

196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

毛主席批示：照办。

山西省核心小组、革命委员会、省军区、69军：

中央同意《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纪要》，认为这个《纪要》是正确的，望你们认真贯彻执行。

一、会议认为，山西省两条路线斗争极为尖锐。会议肯定了刘格平、袁振、曹中南、陈永贵、徐志远等同志执行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支持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炮轰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大方向是正确的。会议也肯定了张日清同志参加夺权，站出来支左，做出了很大成绩。但是后来，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特别是4·14以来，张日清同志没有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对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错误地支持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打击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甚至在军队内进行反对刘格平同志的活动。在晋中问题上，他不支持陈永贵同志，不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反而支持军分区少数执行错误路线的负责人。尤其是4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后，张日清同志没有接受中央对他的批评及时改正错误，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会议上，中央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及与会同志，对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耐心帮助。张日清同志已认识到了错误，进行了检讨，并表示坚决改正。大家欢迎他这种态度，希望他认真改正错误，并且积极工作。鉴于张日清同志的错误在部队和群众中已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到部队、机关和广大革命群

众中,公开进行检讨,认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二、会议肯定了4·14炮轰刘志兰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4·14揭开了省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对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对于揭发批判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4·14使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更好的形势。那种认为“4·14是扭转斗争大方向”、“是反动路线”、“是个政治大阴谋”、“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要揪后台”,等等,是完全错误的。会议一致认为,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的错误很大,会议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斗争

三、山西军区和驻晋部队,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教导,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成绩,同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军区和某些军分区、武装部的少数负责人,犯了一些错误,有的犯了严重错误。例如支持了一些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有的甚至调民兵进城,大搞武斗,问题很严重。会议认为山西军区应该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

会议认为,张日清同志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广大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会议认为,空军025部队(总部)和027部队在支左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会议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军队对支左工作,由于情况不熟悉,没有经验,有的支错了,这是难免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改正错误,是革命行动,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允许人家革命,是错误的。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伟大号召,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把山西省的“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

四、必须正确对待两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总站”、“太司”是革命左派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要坚决支持他们。会议希望他们认

真贯彻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谦虚谨慎，千万不要骄傲。“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四一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责任不在他们，应该由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负责。张日清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红联站”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积极热情地帮助和团结。会议希望“红联站”的广大革命小将根据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阶级警惕性，注意坏人，如省党校葛莱（孙涛按：葛莱是省委党校教授，在哲学研究中曾提出一分为三的观点，当时被批是与中央党校杨献珍的合二而一相呼应，反对毛泽东一分为二观点，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人。因其为红联站观点，被康生指为混进红联站的坏人）之流。两大派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整风，多作自我批评，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在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双方八月三日在北京达成的协议，应共同遵守执行，要停止打内战，要停止武斗，要坚决制止打、砸、抢、抄、抓。

五、会议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由于它的主要负责人执行了错误路线，在实际上颠倒敌我关系，无视党纪国法，乱抓、乱捕革命小将、革命群众，甚至严刑逼供。另外，还乱放坏人。对革命小将、革命领导干部竟进行非法侦察，整理他们的黑材料。以致唆使群众抓捕省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议认为应该立即撤销专政委员会，改组公、检、法机构，对错捕、错判的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立即释放公开平反，赔情道歉。

六、会议认为，在晋中问题上，必须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坚决支持王振国、任井夫、张怀英等同志，坚决支持给“十月事件”受害者平反，坚决支持“晋中总站”等左派组织。（孙涛按：这种支持，很快挑起了当地两派的武斗）

七、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卫恒、王谦、王大任。会议认为，山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所精心经营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战略基地，阶级斗争是复杂的，艰巨的。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建议在山西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彻底肃清他们在山西的流毒。

八、为了保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会议认为必须支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刘格平同志。拥护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要突出革命委员会的作用，扩大革命委员会常委，增加核心小组成员，名单另报。精简办公机构。在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内，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逐步召开和成立以左派为核心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干代会。

九、会议完全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处理武汉“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指示，愤怒地声讨了王任重、陈再道的反革命罪行。并且决心从武汉事件中吸取教训。

十、会议决定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原原本本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动员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取得山西省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会议强调必须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改造世界观，增强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观念，增强两条路线斗争的观念，永远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团结

一致，为完成毛主席、党中央所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为把山西省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

七月会议纪要提到的那两个空军部队，其实是两个空军院校，由康生在七月会议期间代为下旨的那最高指示，分明是要以它们为榜样，逼迫山西的驻军 69 军表态，支持刘格平。刘格平呢，回到太原，就将这条最高指示宣传得沸沸扬扬。这条最高指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69 军”，另一个是“刘格平”。那么，这两方面的态度呢？

刘格平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七月会议纪要，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的这条最高指示。对这条最高指示，他是只能宣传，有时竟在不同的会上自己带头宣传。宣传可以，但刘格平却无力贯彻。69 军的党委，似乎对这条最高指示，并没有贯彻执行的意思。如果毛主席对部队有指示，应由中央军委传达，现在怎么由地方上的刘格平来传达呢？而且是由刘格平来传达支持他本人的最高指示呢？这有点不符合逻辑。所以，军党委一边等着中央军委正式传达这条最高指示，一边并没有认真去理会刘格平说的情况，既没有表态“站在刘格平同志一边”，也没有表态“支持刘格平同志”。由于一直没有从正式通道等来这条最高指示，于是，69 军党委对山西的三大派群众组织兵团、红联站、红总站闹哄哄斗来斗去的状态，也仍然是不表态，不介入。

七月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要支持刘格平，并且划定了山西的红总站和兵团是两个革命的左派组织，而红联站是革命组织。（在纪要中，与红总站和兵团并列被划为革命的左派组织的，还有当时的太原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为太司。此组织以太原市委、市人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为主体，在全省没有影响，日后在省城的派战中分化，分别融入了兵团和红总站两派。）且莫小看只是少了一个“左派”前置词，这一多一少的区别，便一下子将山西的群众组织分了类，红联站分明不能

与红总站和兵团一道平起平坐了。

有了这个纪要，刘格平和红总站的大小领导们，一个个心花怒放，笑逐颜开。张日清与红联站的大小领导们，却一个个垂头丧气，苦不堪言。站在红总站一边的兵团，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刘灏决没想到兵团这回押宝却赌了个胜局，而且兵团的人马这一下子反而更多了。就连刘格平的夫人丁磊和杨承孝，也没有想到，刘灏在支持刘格平的战斗中没有出什么大力气，最后反而既捞到了“革命的左派”称号，还捞到了不少人马。在他们眼中，刘灏再滑头，没有袁振做后台的话，他刘司令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山西夺权时红联站犯了错误，在支持不支持刘格平的问题上，中央七月会议又判定红联站犯了错误，至此，红总站与兵团由谁来主宰山西，已成了双方都在考虑的战略目标。红联站战斗力锐减，兵团与红总站日后的明争暗斗，也就成了必然之势。

对刘灏而言，一个七月会议，使这个 19 岁的年轻人，一改原先一度出现的消沉心态。刘司令的思想认识深处，也突然来了个“升华”。亲眼目睹了康生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架子，亲耳聆听了中央文革小组首长那种权势味道十足的讲话，他先是不由得暗自庆幸：谢天谢地，这一回总算是押宝押对了。再仔细琢磨，心里更豁然开窍：什么叫政治？原来大人物的意志就叫政治。什么叫是非？原来大人物的一句话就能定了是非。他现在好像明白了，原来大人物的“水平”，是因为其是大人物才能具备，才不可动摇。只有身份越高，“水平”也才能越高，权力越大，离真理也才能越近。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思想“升华”，使刘灏革命造反的积极性再次高涨。瞅瞅眼下全国的形势吧！大学生们都忙着闹革命呢，要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呢，大学以后还办不办？天晓得！他不再考虑日后上不上大学的事儿了，而是痛下决心，要率领做了革命左派的兵团全体将士，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山西的

虔诚与疯狂

文化大革命中大干一番。目标既虚无又实在，虚无者，这位中学生并说不清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和什么标准；而实在者，那就是在这场革命中，他也要达到自个能成为大人物的人生目的。这，恐怕也是那个年代，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领袖共同的思维。